

斯大林全集

第十二卷

斯大林全集

第十二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869·635×927紙1/16·20印張·5插頁·240,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37,000 定價：(4)3.10元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第十二卷說明

『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包括約·維·斯大林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的著作。

這個時期，布爾什維克黨展開了社會主義全綫總進攻，動員了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爲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整個國民經濟而鬥爭，爲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而鬥爭。布爾什維克黨在政策上實行了一個決定性的轉變：從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過渡到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黨解決了無產階級革命在奪取政權以後最困難的歷史任務：把千百萬個體農戶引上集體農莊的道路，引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本卷第一次全文發表了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一九二九年）上的演說『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約·維·斯大林在這篇演說中分析了蘇聯和各資本主義國家所發生的階級變動，指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向城鄉資本主義分子進攻的加緊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階級鬥爭的尖銳化。約·維·斯大林指出了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動搖和各資本主義國家革命高潮的因素的增長，論證了加緊反對各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分子的必要性。

約·維·斯大林揭穿了布哈林集團的反黨派別活動，揭穿了他們的兩面派手法，揭穿了他們爲

組織反黨聯盟同托洛茨基分子進行的幕後談判。

約·維·斯大林着重指出了右傾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是這個時期的主要危險；揭穿了右傾投降主義者是列寧主義的敵人，是富農的代理人；揭露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理論』的自由資產階級反革命本質。約·維·斯大林在反對布哈林反對派的鬥爭中發展了列寧關於通過無產階級的殘酷的階級鬥爭來消滅剝削階級的原理。約·維·斯大林指出：右傾投降主義者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路線是和布哈林在國家理論問題上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相聯系的。

約·維·斯大林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鬥爭中捍衛並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在『羣衆的競賽和勞動熱情的高漲』一文中，約·維·斯大林確定了社會主義競賽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方法，是勞動者用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扭轉國家全部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槓桿。

在『大轉變的一年』一文中，約·維·斯大林把一九二九年評定爲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條戰綫上（在勞動生產率方面，在工業和農業建設方面）取得了偉大成就的一年。約·維·斯大林在談到集體農莊運動的成績時指出：基本農民羣衆——中農加入集體農莊了；由於個體農民經濟轉上社會主義道路，國內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後根源已在消滅。

約·維·斯大林依據弗·伊·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制定了農業集體化理論，指出了實現這個理論的具體道路。

在『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的演說中，約·維·斯大林揭穿了資產階級和右傾機會主義的『平衡』論、社會主義建設『自流』論、小農經濟『穩固』論，指出了農業中的大規模集體經濟的優越性。約·維·斯大林確定了集體農莊的本質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論證了從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向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之轉變。

在『勝利衝昏頭腦』、『答集體農莊莊員同志們』以及其他著作中，約·維·斯大林揭穿了對黨的集體農莊建設路綫的『左』傾歪曲行爲，規定了糾正這些歪曲行爲的辦法，指出了農業勞動組合是現階段集體農莊運動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環節。

本卷刊印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約·維·斯大林在報告中深刻分析了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揭示了資本主義體系的矛盾的尖銳化。約·維·斯大林在說明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時，確定了蘇維埃國家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和平政策。約·維·斯大林指出了蘇聯國民經濟的日益高漲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優越性，確定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全綫進攻的實質和任務。約·維·斯大林在動員黨去反對民族問題上的各種傾向時指出：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是社會主義內容和民族形式的民族文化的繁榮時期。

本卷第一次發表了約·維·斯大林給費里克斯·康、阿·馬·高爾基、別澤緬斯基同志和拉法伊爾同志的信。

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

目錄

第十二卷說明	一—三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速記記錄)	三—六
一 一條路綫還是兩條路綫?	四
二 階級變動和我們的意見分歧	二
三 在共產國際方面的意見分歧	一—九
四 在對內政策方面的意見分歧	三—五
一、階級鬥爭問題	六
二、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	三
三、農民問題	六
四、新經濟政策和市場關係問題	五
五、所謂「貢稅」問題	四

六、工業發展速度和結合的新形式問題	五二
七、作爲理論家的布哈林	六一
八、五年計劃還是兩年計劃	七二
九、播種面積問題	七五
一〇、糧食收購問題	七六
一一、外匯後備和糧食輸入問題	八三
五 黨的領導問題	八六
一、布哈林集團的派別活動問題	八七
二、忠順和集體領導問題	八八
三、反右傾鬥爭問題	九三
六 結論	九五
羣衆的競賽和勞動熱情的高漲（葉·米庫林娜『羣衆的競賽』一書序言）	九八—一〇〇
致費里克斯·康同志（抄致中央委員會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省分局 書記柯洛齊洛夫同志）	一〇一—一〇三
祝賀烏克蘭共產主義青年團建團十周年	一〇四
在『紅色烏克蘭號』巡洋艦艦誌上的題詞	一〇五

大轉變的一年（爲紀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而作）……………一〇六—一一三

一 在勞動生產率方面……………一〇七

二 在工業建設方面……………一〇八

三 在農業建設方面……………一一三

結論……………一二〇

給特別遠東軍『警鐘報』編輯部……………一二三

必要的修正……………一二三—一二四

給祝賀斯大林同志五十壽辰的一切組織和同志……………一二五

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馬克思主義者

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一二六—一二七

一 『平衡』論……………一二八

二 社會主義建設『自流』論……………一三〇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一三一

四 城市和鄉村……………一三八

五 關於集體農莊的本質……………一四三

六 階級變動和黨的政策中的轉變……………一四六

七 結論	二五〇
給阿·馬·高爾基的信	二五二—二五五
論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問題	二六一—二六〇
答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同志們	二六一—二六六
一 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提出的問題	二六一
二 斯大林同志的答覆	二六二
勝利衝昏頭腦(論集體農莊運動的幾個問題)	二七二—二七四
給別澤緬斯基同志的信	二七五—二七六
答集體農莊莊員同志們	二七七—二八〇
給工業學院第一期畢業生	二八一—二八二
答姆·拉法伊爾同志(列寧格勒,省工會委員會)(抄致聯共(布)省委員會書記基洛夫同志)	二八三—二八四
羅斯托夫。農業機器製造廠	二八五
斯大林格勒。拖拉機製造廠	二八六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二八七—二九四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二八七—二九四

一、世界經濟危機	二〇七
二、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尖銳化	二一七
三、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	二三三
二 社會主義建設的日益高漲和蘇聯的內部狀況	三三八
一、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三八八
二、工業化的成就	三三一
三、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地位及其增長速度	三三三
四、農業和穀物問題	三四〇
五、農民向社會主義方面的轉變與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建設的發展速度	三四六
六、工人和農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狀況的改善	三五五
七、增長中的困難，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全綫進攻	二六三
八、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還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二七七
九、當前的任務	二八三
(甲) 一般任務	二八三
(乙) 工業方面的任務	二八九

(丙) 農業方面的任務 二九〇

(丁) 運輸方面的任務 二九三

三 黨 二九四

一、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問題 二九七

二、黨內事務的領導問題 三〇〇

註釋 三〇一—三〇三

年表(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 三〇五—三〇六

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①

（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

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②上的演說）（速記記錄）

同志們！我不想談到個人因素，雖然在布哈林集團某些同志的演說中個人因素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我所以不想談，是因為個人因素是小事，小事是不值得多談的。布哈林談到和我的私人通信。他讀了幾封信，從這幾封信中可以看出，我們昨天在私人關係上還是朋友，現在却在政治上發生分歧了。烏格蘭諾夫和托姆斯基的演說也流露出這種口氣。他們說，怎麼會這樣，我們都是老布爾什維克，可是突然彼此之間發生分歧，不能互相尊敬了。

我認爲所有這些怨言和號叫是一個破錢都不值的。我們不是家族集團，不是私人友誼團體，而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決不容許把私人友誼的利益擺在事業的利益之上。

同志們，如果我們被稱爲老布爾什維克只是因爲我們老，那我們的事情就糟了。老布爾什維克所

① 在這篇演說中補進了當時沒有在報刊上發表的三十多頁原文。——編者註

以受到尊敬，並不是因為他們老，而是因為他們同時又是永遠年輕而不衰老的革命者。如果一個老布爾什維克離開了革命道路，或者在政治上頹廢和墮落了，即使他活到一百歲，他也沒有權利稱爲老布爾什維克，他也沒有權利要求黨尊敬他。

其次，決不能把私人友誼問題和政治問題混爲一談，常言道，友誼是友誼，公事は公事。我們都是爲工人階級服務的，如果私人友誼的利益和革命利益發生衝突，那就應該把私人友誼放在次要地位。作爲布爾什維克，我們只能這樣提出問題。

我也不想談到布哈林反對派某些同志的演說中所夾雜的那些對個人的暗示和隱約的責備。看來這些同志想用暗示和雙關語來掩蓋我們的意見分歧的政治基礎。他們想用政客手腕來代替政治。在這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的是托姆斯基的演說。他的演說是企圖用政客手腕代替政治問題的工聯主義政客的典型的演說。但是，他們這套把戲是騙不了人的。

現在我們來談本題。

一 一條路綫還是兩條路綫？

我們有一條共同的總路綫還是有兩條路綫，——同志們，這是一個基本問題。

李可夫在這裏發表的演說中說，總路綫我們只有一條，如果說我們有某些『不大的』意見分歧，

那末這是因爲在對總路綫的了解上存在着『細微的差別』。

這樣說對不對呢？可惜不對。不但不對，而且和事實完全相反。事實上，如果我們的路綫是一條，只是我們在下解上存在着細微的差別，那末，爲什麼布哈林跑到以加米涅夫爲首的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那裏去，企圖和他們組織派別聯盟來反對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呢？布哈林在那裏說中央的路綫會『招致滅亡』，說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和黨中央有原則性的分歧，說必須徹底更換中央政治局的成員，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如果路綫是一條，那末，爲什麼布哈林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勾結起來進行反對中央的秘密活動呢？爲什麼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這件事上支持他呢？

如果總路綫是一條，那末，怎麼能設想遵循一條共同的總路綫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員會陷害遵循同一條總路綫的另一部分委員呢？

難道能夠設想，在存在着一條共同的總路綫的情況下會有這種倒戈政策嗎？

如果路綫是一條，那末，布哈林一月三十日的那個徹頭徹尾反對中央及其總路綫的宣言是從哪裏來的呢？

如果路綫是一條，那末，三人團（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二月九日的宣言是從哪裏來的呢？他們在這個宣言中厚顏無恥地對黨進行粗暴的誣蔑，責備黨（甲）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的政策，（乙）實行培植官僚主義的政策，（丙）實行瓦解共產國際的政策。

也許這些宣言已經不復存在於世了？也許這些宣言現在已經被認為是錯誤的了？也許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已經同意收回這些無疑是錯誤的和反黨的宣言了？那就讓他們公開老實地告訴我吧。那時大家就會明白，我們的路綫是一條，只是我們在了解上存在着一些細微的差別。但是從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演說中可以看出，他們不想這樣做。不但不想這樣做，而且也不打算在將來撤銷他們的宣言，他們聲稱將繼續堅持他們在這些宣言中所陳述的觀點。

既然如此，一條共同的總路綫究竟在哪裏呢？

如果路綫是一條，而黨的路綫在布哈林集團看來又是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的政策，那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難道想和我們一起實行這種會招致滅亡的政策而不和它進行鬥爭嗎？這真是胡說八道。

如果路綫是一條，而黨的路綫在布哈林反對派看來又是培植官僚主義，那末，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難道想和我們一起在黨內培植官僚主義而不和它進行鬥爭嗎？這真是無稽之談。

如果路綫是一條，而黨的路綫在布哈林反對派看來又是瓦解共產國際，那末，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難道想和我們一起瓦解共產國際而不和瓦解共產國際的政策進行鬥爭嗎？怎麼能相信這種荒謬的話呢？

不是的，同志們，李可夫說我們有一條共同的路綫，這話是不大對頭的。不管怎樣，如果看看剛才所說的布哈林集團在宣言和行動方面的事實，那就可以看出有一條共同路綫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路綫是一條，那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辭職政策是從哪裏來的呢？在有共同的總路綫的情況下，一部分政治局委員一貫拒絕執行黨中央的屢次決議，在黨內實行怠工達半年之久，難道這是可以設想的嗎？如果我們確實有一條共同的總路綫，那末，一部分政治局委員竭力實行的這種瓦解性的辭職政策是從哪裏來的呢？

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實行辭職政策的例子。例如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後的第二天以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為首的一部分同志要求改變黨的政策，拒絕担任委託給他們的職務。大家知道，當時他們實行辭職政策的理由是要要求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一起成立聯合政府，反對我們黨中央實行成立清一色的布爾什維克政府的政策。但是，當時的辭職政策是有意義的，因為它的根據是存在着兩條不同的路綫，其中一條路綫主張成立清一色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另一條路綫主張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共同成立聯合政府。這是很明白的，可以理解的。可是現在，布哈林反對派一方面宣稱總路綫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實行從十月革命時期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那裏抄襲來的辭職政策，那就絲毫不合邏輯了。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路綫是一條，那末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辭職政策就是不可理解和無法解釋的；或者我們的路綫是兩條，那末辭職政策就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可以解釋的。

如果路綫是一條，那末政治局中的三人團（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認為在政治局通過關於五年計劃和關於農民問題的基本提綱時可以棄權的事實是從哪裏來的呢？大家的總路綫是一條，而

一部分同志在經濟政策的一些基本問題上竟放棄了表決權，難道會有這樣的事嗎？不，同志們，世界上是不會有這種怪事的。

最後，如果路綫是一條，只是我們在了解上有細微的差別，那末，爲什麼布哈林反對派的同志們（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同意接受政治局委員會在今年二月七日向他們提出的和解方案呢？這個和解方案給布哈林集團指出了一條完全可以接受的出路，使他們能够擺脫他們自己所陷入的絕境，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下面就是大多數中央委員在今年二月七日提出的和解方案的原文：

『從委員會內部交換意見中查明：

(一) 布哈林承認和加米涅夫談判是政治錯誤；

(二) 布哈林承認，他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的「聲明」中關於中央實際上「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政策的論斷，關於中央瓦解共產國際並在黨內培植官僚主義的論斷，都是他在激烈辯論中冒火時說出來的，他不再堅持這些論斷，並認爲他在這些問題上和中央沒有分歧；

(三) 根據這一點，布哈林承認在政治局內同心協力工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四) 布哈林不再辭去「真理報」和共產國際方面的職務；

(五) 因此，布哈林收回他在一月三十日的聲明。

根據上述情況，委員會認爲可以不向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提出從政治

上評定布哈林的錯誤的決議草案，並建議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收回現有一切文件（演說的速記記錄等等）。

委員會建議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爲布哈林在「真理報」主筆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的崗位上進行正常工作保證一切必要的條件。」

如果我們的路綫確實是一條，只是我們在了解上有一些細微的差別，那末，爲什麼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拒絕這個和解方案呢？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應當竭力抓住政治局向他們提出的這個和解方案，以便消除黨內的緊張局面，造成政治局內同心協力工作的環境，這難道很難理解嗎？

有人談到黨的統一，談到政治局內的集體工作。但是，誰想達到真正的統一並重視工作的集體性，誰就應當接受這個和解方案，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究竟爲什麼拒絕這個和解方案呢？

如果我們的路綫是一條，那末天地間既不會有二月九日的三人團宣言，也不會有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拒絕中央政治局向他們提出的和解方案的事，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不，同志們，如果看看上面所說的事實，那就可以看出你們所說的有一條共同路綫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可見實際上我們不是一條路綫，而是兩條路綫，其中一條是中央的路綫，另一條是布哈林集團的路綫。

李可夫在他的演說中說我們的總路綫是一條，這是說謊。他想以此掩飾他自己的那條不同於黨的路綫的路綫，以便暗中破壞黨的路綫。機會主義的政策正是在於抹殺意見分歧，掩蓋黨內的真實情況，掩飾自己的立場，使黨不能把問題完全弄清楚。

機會主義需要這樣的政策是爲了什麼呢？爲了用路綫一致的空談做掩護，而在實際上執行它自己的那條不同於黨的路綫的路綫。李可夫在這次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中就是採取了這種機會主義的觀點。

不妨聽一聽列寧同志在他的一篇文章裏對一般機會主義者所做的評定。這個評定對我們所以重要，不僅是由於它的一般意義，而且是因爲它對李可夫完全適用。

列寧關於機會主義和機會主義者的特點是這樣說的：

『談到和機會主義作鬥爭的時候，決不應當忘記現代一切機會主義在各個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特徵：模稜兩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機會主義者按其本性來說總是迴避明確肯定地提出問題，企圖找出一種合力，在兩種相互排斥的觀點之間像黃領蛇一樣迴旋，力圖既「同意」這一觀點，又「同意」另一觀點，把自己的不同意見歸結爲小小的修改、懷疑、善良天真的願望等等。』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三七三頁）

這就是機會主義者的面目，他們害怕明確性和肯定性，力圖掩蓋事物的真實情況，抹殺黨內真正的意見分歧。

是的，同志們，應當善於正視現實，不管現實多麼令人不愉快。如果我們染上害怕真理的毛病，那就很危險了。布爾什維克同其他一切政黨的區別之一就是他們不怕真理，不怕正視真理，不管真理多麼令人痛苦。而現在的真理是：我們實際上沒有一條共同的路綫。有一條路綫是黨的路綫，是革命的、列寧的路綫。但同時還有另一條路綫，即布哈林集團的路綫，這條路綫用發表反黨宣言的方法，用辭職的方法，用誣衊黨的方法，用暗中破壞黨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為組織反黨聯盟進行幕後談判的方法來反對黨的路綫。這第二條路綫是機會主義的路綫。

這是用任何外交辭令，用任何關於只有一條路綫的狡猾聲明等等都掩蓋不了的事實。

二 階級變動和我們的意見分歧

我們的意見分歧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它們是和什麼有關的呢？

它們首先是和最近我們國內以及資本主義國家所發生的階級變動問題有關的。有些同志以為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帶有偶然性。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是在最近發生的階級變動和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基礎上產生的，這種階級變動和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造成了發展中的轉變。

布哈林集團的主要錯誤在於他們看不見這種變動和這種轉變，看不見而且不願意看見這種變動

和這種轉變。正因為如此，他們就不了解黨和共產國際的新任務，而這種不了解就成了布哈林反對派的特徵。

布哈林反對派的領導者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中完全避開了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問題，一句話也沒有提到階級鬥爭的尖銳化，甚至絲毫沒有暗示一下我們的意見分歧正是和這種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有關的。同志們，這一點你們是否注意到了呢？他們無所不談，既談哲學，又談理論，但是對於決定當前我們黨的方針和實際工作的那些階級變動却一句話也沒有提到。

爲什麼會發生這種怪事呢？也許是因為健忘？當然不是！政治家是不能忘記主要東西的。這是因為他們看不見和不了解目前我們國內以及資本主義國家所發生的新的革命過程。這是因為他們忽略了主要東西，忽略了政治家沒有權利忽略的階級變動。正因為如此，布哈林反對派在我們黨的新任務面前就顯得張皇失措和束手無策。

請你們回想一下我們黨內最近的一些事件。請你們回想一下最近黨因爲我們國內發生新的階級變動而提出的那些口號。我說的是這樣一些口號：自我批評的口號，加強反官僚主義鬥爭和清洗蘇維埃機關的口號，培養新的經濟工作幹部和紅色專家的口號，加強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運動的口號，向富農進攻的口號，降低產品成本和徹底改進工會實際工作的口號，清黨的口號等等。有些同志覺得這些口號令人胆顫心驚，頭暈眼花。可是很明顯，這些口號是當前黨最迫切最需要的口號。

最初，我們因爲沙赫特事件而重新提出了新的經濟工作幹部的問題，培養工人階級出身的紅

色專家來代替舊專家的問題。

沙赫特事件表明了什麼呢？沙赫特事件表明了：資產階級還遠沒有被消滅，他們對我國經濟建設正在組織而且以後還會組織暗害活動，我們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和一部分黨組織忽略了我們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因此必須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來鞏固並改善我們的組織，提高並加強我們組織的階級警惕性。

因此就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評口號的問題。爲什麼呢？因爲不大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把我們各個組織的工作置於羣衆的監督之下，就不能改善我們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和黨組織，就不能把建設社會主義和鎮壓資產階級暗害活動的工作向前推進。暗害活動不僅在煤礦區，而且在金屬生產方面，在軍事工業方面，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內，在金鎊工業等方面，都曾經發生並且繼續在發生，這是事實。因此就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

其次，由於糧食收購方面的困難，由於富農進行反對蘇維埃價格政策的發動，我們着重提出了全力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向富農進攻、對富農和富裕分子使用強迫手段收購糧食的問題。

糧食收購方面的困難表明了什麼呢？糧食收購方面的困難表明了：富農並沒有打瞌睡，富農在發展，他們在暗中破壞蘇維埃政權的政策，而我們的黨組織、蘇維埃組織和合作社組織，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不是看不見敵人，就是遷就敵人，不和敵人作鬥爭。

因此就再一次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提出了檢查和改善我們黨組織、合作社組織和一般

收購機關的口號。

再其次，由於提出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工業和農業的新任務，就產生了不斷降低產品成本、加強勞動紀律、開展社會主義競賽等等口號。這些任務要求重新審查工會和蘇維埃機關的全部實際工作，徹底活躍這些組織，並清除這些組織裏的官僚主義因素。

因此就着重提出了反對工會和蘇維埃機關裏的官僚主義的口號。

最後，關於清黨口號的問題。如果以為不砥礪黨本身就可以鞏固我們的蘇維埃組織、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和合作社組織，就可以清除這些組織裏的官僚主義惡習，那就可笑了。毫無疑問，官僚主義分子不僅生活在經濟組織、合作社組織、工會組織和蘇維埃組織裏，而且生活在黨組織裏。既然黨是所有這些組織的領導力量，那末很明顯，清黨是徹底活躍和改善工人階級其他一切組織的必要條件。因此就提出了清黨的口號。

這些口號是不是偶然的呢？不，不是偶然的。你們自己可以看出，這些口號不是偶然的。它們是一條叫做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的不可分割的鍊條上的不可缺少的環節。

這些口號首先是和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我國工業和我國農業的時期有關的。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國民經濟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社會主義向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分子實行全綫進攻。這是我國工人階級向建成社會主義方面前進的一個極大的進展。但是爲了進行這種改造，必須首先提高和加強經濟、蘇維埃、工會、黨以及合作社方面的社會主義建設幹部，必須砥礪我們的一切組織，清

除這些組織裏的髒東西，必須提高千百萬工農羣衆的積極性。

其次，這些口號是和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分子抵抗社會主義進攻的事實有關的。決不能認爲所謂沙赫特事件是偶然的。現在我們的一切工業部門中都有『沙赫特分子』。其中很多人已經落網，但是還遠沒有捕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暗害活動是抵抗社會主義發展的最危險的形式之一。這種暗害活動所以危險，尤其是因爲它和國際資本有聯系。資產階級的暗害活動毫無疑問地證明：資本主義分子還遠沒有放下武器，他們正在積蓄力量來進行新的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發動。

至於農村的資本主義分子，那更不能認爲已經繼續了一年多的富農反對蘇維埃價格政策的發動是偶然的。很多人至今還不能解釋爲什麼富農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自發地拿出糧食，而在一九二七年以後不再自發地拿出糧食了。但是，這種情況是不足爲奇的。過去富農還比較軟弱，沒有可能認真安排自己的經濟，沒有足夠的資本來鞏固自己的經濟，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或幾乎全部的餘糧運到市場上去；而現在，經過連年豐收，他們在經濟上已經安排好了，他們已經積蓄了必要的資本，於是他們就有可能在市場上玩弄手腕，就有可能把糧食這種寶中之寶囤積起來作爲自己的後備，而寧願把肉類、燕麥、大麥以及其他次要農產品運到市場上去。現在希望富農會自願地拿出糧食是可笑的。

這就是現在富農抗拒蘇維埃政權的政策根源。

城鄉資本主義分子抵抗社會主義的進攻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在重新部署

力量，其目的在於保持舊制度，反對新制度。不難了解，這種情況不能不引起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可是要擊破階級敵人的抵抗並為社會主義的前進掃清道路，除了其他一切辦法以外，還必須砥礪我們的一切組織，清除這些組織裏的官僚主義，提高這些組織的幹部，並動員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和農村勞動階層羣衆去反對城鄉資本主義分子。

我們黨目前的口號就是在這種階級變動的基礎上產生的。

關於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變動也應當這樣說。如果以為資本主義的穩定沒有變化，那就可笑了。如果斷言穩定日益鞏固，日益堅牢，那就更可笑了。事實上，資本主義的穩定每月每日都在毀壞着，動搖着。爭奪國外市場和原料的鬥爭的尖銳化，軍備的擴充，美英之間對抗的加劇，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左傾，歐洲各國罷工和階級搏鬥時期的到來，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內）革命運動的發展，世界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所有這些事實都毫無疑問地說明：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新的革命高潮的因素正在增長。

由此就產生了加緊和社會民主黨，首先是和它的『左』翼作鬥爭的任務，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支柱。

由此就產生了加緊和共產黨內的右傾分子作鬥爭的任務，因為他們是社會民主黨影響的代理人。由此就產生了加緊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作鬥爭的任務，因為它是機會主義在共產黨內的隱蔽所。由此就產生了清除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傳統的口號。

由此就產生了共產主義在工會中的所謂新策略。

有些同志不懂得這些口號的意義和作用。但是馬克思主義者任何時候都懂得：不實現這些口號，就不能準備無產階級羣衆去進行新的階級戰鬥，就不能戰勝社會民主黨，就不能挑選出能够率領工人階級進行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真正領袖。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國內以及資本主義國家所發生的階級變動，我們黨目前在對內政策方面和在共產國際方面的口號就是在這些階級變動的基礎上產生的。

我們黨看到了這些階級變動。它了解新任務的意義並動員力量去解決這些任務。所以它可以有充分準備地應付事變。所以它不怕擺在它面前的困難，因為它對克服困難已經有了準備。

布哈林集團糟糕的地方就在於他們看不見這些階級變動，不了解黨的新任務。正因為他們不了解黨的新任務，所以他們總是表現張皇失措，他們總是準備逃避困難，在困難面前退却，放棄陣地。

你們看見過在葉尼塞河那樣的大河上遇到風暴的漁夫嗎？我看見過不止一次。有一種漁夫在風暴來臨時動員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伙伴，勇敢地划着船迎着風暴前進：『弟兄們，把舵掌得更穩些，破浪前進，我們一定會勝利！』

但是也有另一種漁夫，他們一感到風暴要來就灰心喪氣，叫苦連天，使自己的隊伍精神沮喪：『真倒霉，風暴就要來了，弟兄們，躺在船底裏，閉上眼睛，也許能僥倖冲到岸邊。』（大笑）

布哈林集團的方針和行動同在困難面前張皇退却的第二種漁夫的方針和行動一模一樣，這還用

得着證明嗎？

我們說，歐洲新的革命高潮的條件正在成熟，這種情況向我們提出了新任務，要求我們加緊同共產黨內的右傾作鬥爭，把右傾分子驅逐出黨，加緊同掩護右傾的調和態度作鬥爭，加緊同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傳統作鬥爭等等。可是布哈林回答我們說，這一切都是空話，我們根本沒有這樣的新任務，實際上是大多數中央委員想對他布哈林進行『惡意攻擊』。

我們說，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向我們提出了新任務，要求我們不斷降低產品成本和加強企業中的勞動紀律，要實現這些任務，非根本改變工會的全部實際工作不可。可是托姆斯基回答我們說，這一切都是空話，我們根本沒有這樣的新任務，實際上是大多數中央委員想對他托姆斯基進行『惡意攻擊』。

我們說，國民經濟的改造向我們提出了新任務，要求我們加緊同蘇維埃機關和經濟機關裏的官僚主義作鬥爭，清除這些機關裏的腐化分子、異己分子和暗害分子等等。可是李可夫回答我們說，這一切都是空話，我們根本沒有這樣的新任務，實際上是大多數中央委員想對他李可夫進行『惡意攻擊』。

同志們，這難道不可笑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除了自己的肚臍以外，看不見世界上的任何東西，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布哈林集團不幸的地方就在於他們看不見新的階級變動，不了解黨的新任務。正因為他們不了

解黨的新任務，所以他們不得不做事變的尾巴，在困難面前低頭。

我們的分歧的根源就在這裏。

三 在共產國際方面的意見分歧

我已經說過，布哈林看不見和不了解新的革命高潮的日益增長的條件向共產國際提出的把右傾分子驅逐出共產黨、制止調和態度並清除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傳統的新任務。我們在共產國際各個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完全證實了這種情況。

這方面的意見分歧是從什麼事情開始的呢？

是從布哈林提交第六次代表大會^①的關於國際形勢的提綱開始的。通常，提綱都是預先經過聯共（布）代表團審查的。可是這一次沒有遵守這個條件。於是布哈林簽署的提綱在送交聯共（布）代表團的同時也分發給了出席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各國代表團。但是提綱中的許多條文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聯共（布）代表團不得不對這個提綱提出了大約二十處的修正。

這種情況使布哈林的處境有些尷尬。但這是誰的過錯呢？布哈林爲什麼不經聯共（布）代表團審查就把提綱分發給各國代表團呢？既然提綱不能令人滿意，聯共（布）代表團能够不提出修正嗎？結果弄成了這樣：聯共（布）代表團實際上等於提出了一個關於國際形勢的新提綱，各國代表團就把它

和布哈林簽署的原來的提綱對立起來。很明顯，如果布哈林不急於把自己的提綱分發給各國代表團，就不會有這種尷尬的處境了。

我想指出聯共（布）代表團對布哈林的提綱所提出的四個主要修正。我所以想指出這幾個主要修正，是爲了更清楚地揭示在共產國際各個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的性質。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資本主義穩定的性質問題。照布哈林的提綱說來，目前沒有發生任何動搖資本主義穩定的新現象，相反地，資本主義正在改造，並且基本上相當鞏固。很明顯，對所謂第三個時期，即對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做這樣的估計是聯共（布）代表團不能同意的。所以不能同意，是因爲保留對第三個時期的這種估計會使我們的批評家得到藉口，說我們採取了所謂資本主義『恢復健康』的觀點，即希法亭的觀點，即我們共產黨人不能採取的觀點。因此，聯共（布）代表團提出了修正，從修正中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的穩定是不鞏固的，而且不可能是鞏固的；由於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尖銳化，這種穩定正被事變的進程動搖着，而且以後還會被動搖。

同志們，這個問題對於共產國際各支部具有決定的意義。資本主義的穩定是在動搖着還是在鞏固着，——共產黨在日常政治工作中的全部方針都要根據這一點來決定。我們現在是在處在革命運動低落的時期即單純聚集力量的時期，還是處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條件日益增長的時期即準備工人階級迎接即將到來的階級戰鬥的時期，——共產黨的策略方針要根據這一點來決定。聯共（布）代表團所提出而後來爲代表大會所採納的修正所以正確，就是因爲它提出了以第二種前途即以新的革命高潮

的條件日益增長的前途爲依據的明確的方針。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和社會民主黨作鬥爭的問題。在布哈林的提綱中說，和社會民主黨作鬥爭是共產國際各支部的基本任務之一。這當然是對的。但是這還不够。爲了勝利地進行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必須強調和社會民主黨的所謂『左』翼作鬥爭的問題，就是這個『左』翼玩弄『左的』詞句並以此巧妙地欺騙工人，從而阻礙工人羣衆離開社會民主黨。很明顯，不粉碎『左』翼社會民主黨人就不可能戰勝整個社會民主黨。可是在布哈林的提綱中，關於『左』翼社會民主黨的問題竟完全沒有談到。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缺點。因此，聯共（布）代表團不得不對布哈林的提綱提出相應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代表大會採納了。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共產國際各支部內的調和態度問題。布哈林的提綱中說到必須和右傾作鬥爭，但是一句話也沒有說到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作鬥爭。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缺點。因爲當我們向右傾宣戰的時候，右傾分子總是裝扮成調和分子，使黨陷於困難的境地。爲了防止右傾分子玩弄這種手腕，必須提出堅決和調和態度作鬥爭的問題。因此，聯共（布）代表團認爲必須對布哈林的提綱提出相應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代表大會採納了。

第四個問題是關於黨的紀律問題。布哈林的提綱中沒有提到必須在共產黨內保持鐵的紀律。這也是一個不小的缺點。爲什麼呢？因爲在加緊和右傾作鬥爭的時期，在貫徹清除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這一口號的時期，右傾分子總是組成派別，建立他們自己的派別紀律，違反和破壞黨的紀律。

爲了使黨不致受到右傾分子的派別襲擊，必須提出黨的鐵的紀律和黨員無條件服從這個紀律的問題。否則就根本談不到和右傾進行嚴重鬥爭。因此，聯共（布）代表團對布哈林的提綱提出了相應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第六次代表大會採納了。

我們能不能不對布哈林的提綱提出這些修正呢？顯然不能。古時候有人關於哲學家柏拉圖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愛柏拉圖，但是我們更愛真理。關於布哈林也可以這樣說：我們愛布哈林，但是我們更愛真理，更愛黨，更愛共產國際。因此，聯共（布）代表團不得不對布哈林的提綱提出這些修正。

這可以說是我們在共產國際各個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的第一階段。

我們的意見分歧的第二階段是和所謂維托爾夫和台爾曼事件有關的。維托爾夫是漢堡黨組織的前任書記，被控盜用黨的經費，因此被開除出黨。雖然台爾曼同志和維托爾夫的罪行毫無關係，但是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裏的調和分子竟利用維托爾夫接近台爾曼同志這一點，把維托爾夫事件變成了台爾曼事件，並開始來推翻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你們大概已經從報刊的報道中知道，調和分子愛維爾特和黑爾哈特當時竟能暫時把德國共產黨的大多數中央委員拉到自己方面去反對台爾曼同志。結果怎樣呢？他們解除了台爾曼的領導職務，誣告他營私舞弊，並且沒有通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沒有得到它的批准就公佈了『相應的』決議。

由此可見，他們不但沒有執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關於和調和態度作鬥爭的指示，不但沒有和右傾以及調和態度作鬥爭，實際上反而極粗暴地違反了這個指示，和德國共產黨的革命領導進

行鬥爭，和台爾曼同志進行鬥爭，以便在德國共產黨的隊伍裏掩護右傾並鞏固調和派的地位。

而布哈林不但丟掉轉船舵，扭轉局勢，不但不丟恢復被違反的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指示的效力，叫調和分子守規矩，反而在他的一封信人所共知的信裏建議批准調和分子的篡奪行爲，把德國共產黨交給調和分子，再一次在報刊上誣衊台爾曼同志，再一次宣佈台爾曼同志有過錯。這就叫做共產國際的『領導者』！難道世界上有這樣的『領導者』嗎？

中央討論了布哈林的建議並把它否決了。這當然是布哈林所不喜歡的。但這究竟是誰的過錯呢？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並不是要人們去違反它，而是要人們去執行它。既然第六次代表大會決定向右傾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宣佈鬥爭，把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保持在以台爾曼同志爲首的基本核心手中，而調和分子愛維爾特和黑爾哈特却想推翻這個決議，那末布哈林的職責就是叫調和分子守規矩，而不是把德國共產黨的領導讓給他們。這是布哈林的過錯，因爲他『忘記了』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

我們的意見分歧的第三階段是和反對德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分子的問題，和粉碎布蘭德勒與塔爾蓋麥的派別組織並把這個派別組織的首領開除出德國共產黨的問題有關的。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對這個根本問題的『立場』是：他們總是避免參與這個問題的解決。實質上這是決定德國共產黨的命運的問題。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知道這一點，但總是阻撓這件事，一貫避免參加有關機關的會議。爲了什麼呢？大概是爲了既在共產國際面前又在德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分子面前都不失爲『潔白君子』。爲了以

後可以說：『把布蘭德勒和塔爾蓋麥開除出共產黨的並不是我們布哈林派，而是他們大多數中央委員。』這就叫做和右傾危險作鬥爭！

最後，我們的意見分歧的第四階段。這個階段是和布哈林在中央十一月全會前提出的要求有關的。他當時要求從德國召回奈依曼，要求叫台爾曼同志守規矩，說台爾曼同志似乎在一次演說中批評了布哈林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我們當然不能同意布哈林的要求，因為我們手裏沒有任何文件可以證實布哈林的要求是對的。布哈林答應提出控訴奈依曼和台爾曼的文件。可是他什麼文件也沒有提出來。他不但沒有提出文件，反而把洪別爾·德羅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發表的一篇人所共知的演說分發給聯共（布）代表團團員，而這篇演說正是後來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評定為機會主義演說的。布哈林把洪別爾·德羅的演說分發給聯共（布）代表團團員，並把它推薦為控訴台爾曼的材料，想證實他要求召回奈依曼和要求叫台爾曼同志守規矩是正確的。實際上他却以此證明了他是贊同洪別爾·德羅的，而洪別爾·德羅的立場是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看做機會主義立場的。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在共產國際各個問題上的幾點主要的意見分歧。

布哈林認為，我們同共產國際各支部內的右傾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作鬥爭，清除德國共產黨內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分子和社會民主黨傳統，把布蘭德勒分子和塔爾蓋麥分子開除出黨，就是『瓦解』共產國際，『毀滅』共產國際。恰恰相反，我們認為，我們實行這樣的政策，強調

同右傾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作鬥爭的問題，就是鞏固共產國際，清除共產國際中的機會主義者，使共產國際各支部布爾什維克化，幫助各國共產黨準備工人階級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戰鬥，因為黨是靠清除自身的腐朽物而鞏固起來的。

由此可見，這不是聯共（布）中央委員之間單純看法上的細微的差別，而是在共產國際政策的根本問題上的相當嚴重的意見分歧。

四 在對內政策方面的意見分歧

上面我已經說過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和階級鬥爭。我說過布哈林集團患了盲目症，看不見這些變動，不了解黨的新任務。我說過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布哈林反對派的張皇失措，害怕困難，準備向困難低頭。

決不能說布哈林派的這些錯誤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恰恰相反，這些錯誤是和已經過去的那個稱為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發展階段有關的，當時的建設是通過和平道路進行的，也可以說是自流地進行的，當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階級變動，當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階級鬥爭的尖銳化。

但是，現在我們所處的是和舊時期即恢復時期不同的新的發展階段。現在我們所處的是新的建設時期，即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整個國民經濟的時期。這個新時期引起了新的階級變動，引起了

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它要求我們採取新的鬥爭方式，重新部署我們的力量，改善並鞏固我們的一切組織。

布哈林集團不幸的地方就在於他們還過着舊生活，他們看不見這個新時期的特點，不了解採取新的鬥爭方式的必要性。由此就產生了他們的盲目症，張皇失措，在困難面前驚惶不安。

一、階級鬥爭問題

布哈林集團的這種盲目症和這種張皇失措的理論基礎是什麼呢？

我認爲這種盲目症和這種張皇失措的理論基礎就是布哈林對我國階級鬥爭問題所持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我指的是布哈林的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理論，我指的是他不了解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的訣竅。

有些人在這裏屢次引證布哈林的『到社會主義之路』一書中關於富農長入社會主義那段人所共知的話。但是在這裏引證這段話時有一些遺漏。讓我把這段話全部引證出來。同志們，爲了說明布哈林已經遠遠地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這樣做是必要的。

請聽吧：

『我國基本的農民合作社組織網將由一些不是富農式的而是「勞動」式的合作社細胞構成，這些細胞將長入我們的全部國家機關的體系中去，因而成爲社會主義經濟的單一鍊條中的環。

節。另一方面，富農的合作社、窩巢、也會同樣經過銀行等等長入這個體系中去，但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是異類，例如像租讓企業那樣。」^①

有些同志在引證布哈林書中的這段話時不知爲什麼把最後一句關於承租企業家的話遺漏了。羅季特大概想給布哈林幫忙，就利用這一點在這裏從座位上叫喊起來，說人家曲解了布哈林的意思。可是這整段引文的要點正是在於最後一句關於承租企業家的話。因爲既然把承租企業家和富農相提並論，而富農又長入社會主義，那末由此會得出什麼結論呢？由此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個，就是承租企業家也長入社會主義，不僅富農，而且承租企業家也長入社會主義。（大笑）

這就是由此得出的結論。

羅季特：布哈林說的是『異類』。

斯大林：布哈林說的不是『異類』，而是『在某種程度上是異類』。所以，富農和承租企業家『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主義體系中的異類。布哈林的錯誤正是在於他認爲富農和承租企業家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是異類，但還是會長入社會主義的。

請看布哈林的理論弄到了多麼荒謬的地步。

城鄉資本家，富農和承租企業家，都長入社會主義，——請看布哈林說出了多麼愚蠢的話。

①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不，同志們，我們不需要這樣的『社會主義』。讓布哈林自己把它拿去吧。

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向認為，在城鄉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調和的對立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正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而現在，按照布哈林的資本家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這一切都要顛倒過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階級利益的不可調和的對立性正在消失，剝削者正在長入社會主義。

羅·季·特：這樣說是不對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預定要有的。

斯·大·林：可是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鬥爭最尖銳的形式。

羅·季·特：問題就在這裏。

斯·大·林：但是照布哈林說來，資本家會長入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羅·季·特，你怎麼不了解這一點呢？如果城鄉資本家會長入無產階級專政體系，那末，究竟是爲了反對誰需要進行鬥爭呢？究竟是爲了反對誰需要採取階級鬥爭最尖銳的形式呢？

無產階級專政所以需要，是爲了對資本主義分子進行不調和的鬥爭，是爲了鎮壓資產階級和根除資本主義。但是既然城鄉資本家，既然富農和承租企業家會長入社會主義，那末，一般說來是否還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呢？如果需要，那是爲了鎮壓哪一個階級呢？

羅·季·特：問題就在於布哈林所說的長入是預定要有階級鬥爭的。

斯·大·林：我看羅·季·特已經發誓要爲布哈林效勞了。但是他的效勞像熊的效勞一樣，因爲他本來

想救布哈林，事實上却把布哈林沉到水底了。難怪人們說：『喜歡效勞的熊比敵人更危險。』①（哈哈大笑）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資本家階級和已經掌握政權並建立了自己專政的工人階級之間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調和的對立性；或者是沒有這種利益的對立性，那就只有宣佈階級利益的協調。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或者是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

或者是階級利益的不可調和的對立性；或者是階級利益協調的理論。

布倫坦諾或悉尼·維伯之類的『社會主義者』鼓吹社會主義長入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長入社會主義，那還可以理解，因為這些『社會主義者』實際上是反社會主義者，是資產階級自由派。可是，一個想做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竟同時鼓吹資本家階級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那就不可理解了。

布哈林在他的演說中企圖引用列寧的一段有名的話來證明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正確的。同時他硬說列寧所說的和布哈林所說的一樣：

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對列寧的粗暴而不可容忍的誣蔑。

下面是列寧這段話的原文：

『當然，在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內，社會制度是以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的合作為基礎的，而現在也容許「耐普曼」即資產階級在一定的條件下參加這個合作。』（『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

三卷第四四頁

你們可以看出，這裏一句話也沒有講到資本家階級長入社會主義。這裏只說到我們也『容許』耐普曼即資產階級『在一定的條件下』參加工人和農民的合作。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不是說我們因此就認為耐普曼有長入社會主義的可能呢？當然不是。只有不知羞恥的人才會這樣解釋列寧的這段話。這只是說，我們現在不消滅資產階級，我們現在不沒收他們的財產，而容許他們在一定的條件下存在，所謂一定的條件，就是他們必須無條件服從無產階級專政的法律，這些法律是要不斷限制資本家並逐步把他們從國民經濟生活中排擠出去的。

不通過殘酷的階級鬥爭不能排擠資本家，剷除資本主義的根柢呢？不，不能。

依靠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能不能消滅階級呢？不，不能。這樣的理論和實踐只能培植階級並使階級永久存在，因為這個理論是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相矛盾的。

而列寧的這段話完全是以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階級鬥爭理論為根據的。

在布哈林的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列寧的專政是殘酷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之間能有什麼共同之處呢？很明顯，這裏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絲毫共同之處。

布哈林認為，爲了達到消滅階級，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應當熄滅，應當取消。恰恰相反，列寧教導說，只有通過頑強的階級鬥爭才能消滅階級，而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要比無產階級專政以前更加殘酷。

列寧說：『消滅階級要經過長期的、艱難的、頑強的階級鬥爭。在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以後，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以後，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階級鬥爭並不是消失（像舊社會主義和舊社會民主黨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樣），而只是改變了它的形式，在許多方面變得更加殘酷。』（『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九頁）

關於消滅階級，列寧就是這樣說的。

通過無產階級的殘酷的階級鬥爭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列寧的公式。

通過階級鬥爭熄滅和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布哈林的公式。

這兩個公式之間能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由此可見，布哈林的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是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的。它是接近於講壇社會主義的理論的。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一切錯誤的根源就在這裏。

有人會說，布哈林的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不值得多談的，因為這個理論本身就說出了——不僅說出了，而且喊出了——布哈林的錯誤。同志們，這是不對的！當這個理論擱着不用的時候，還可以去理它；在各種各樣的同志的作品中有的是各種各樣的蠢話！直到最近我們都是這樣處置的。可是最近情況變了。近幾年來囂張起來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已經開始鼓舞這個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使它具有現實的性質了。現在已經不能說它是擱着不用的了。現在布哈林的這個奇

怪理論妄圖成爲我們黨內右傾的旗幟，成爲機會主義的旗幟。因此，我們已經不能忽視這個理論。因此，我們必須粉碎這個不正確的和有害的理論；使我們的黨員同志便於和右傾作鬥爭。

二、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

布哈林從他的第一個錯誤中產生出來的第二個錯誤，就是他對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對資本主義分子加緊反抗蘇維埃政權的社會主義政策問題採取了非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

這裏說的是什麼呢？是不是說資本主義分子比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增長得快，因而他們就加緊進行反抗，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呢？不，這裏說的不是這個。並且，說資本主義分子比社會主義成分增長得快是不對的。如果這種說法是對的，那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已經瀕於毀滅了。

這裏說的是社會主義正在勝利地進攻資本主義分子，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分子增長得快，資本主義分子的比重因此正在下降，正因為資本主義分子的比重正在下降，資本主義分子才感覺到有死亡的危險，於是就加緊進行反抗。

資本主義分子所以暫時還能夠加緊進行反抗，不僅是因為世界資本主義援助他們，而且是因為他們的比重雖然在下降，他們的相對增長和社會主義的增長比較起來雖然在減低，但他們的絕對增長還是有的，這就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積蓄力量來抵抗社會主義的增長。

在目前的發展階段，在目前這種力量對比的條件下，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和城鄉資本主義分子反

抗的加緊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錯誤就在於他們不懂得這個簡單明白的真理。他們的錯誤就在於他們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而是以庸人的態度來對待問題，企圖用各種偶然的原因來解釋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例如：蘇維埃機關『不中用』，地方同志執行政策『不謹慎』，『缺乏』靈活性，『過火行爲』等等。請看布哈林的『到社會主義之路』一書中的一段話，這段話表明他完全是以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對待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的：

『農村中的階級鬥爭，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以過去的表现形式爆發出來，而且這種尖銳化通常是由富農分子引起的。例如富農或者靠剝削別人發財並鑽進蘇維埃政權機關的人刺殺農村通訊員，——這就是階級鬥爭最尖銳的表现形式（這是不對的，因爲最尖銳的鬥爭形式是暴動。——斯大林註）。可是，這類事件通常發生在地方蘇維埃機關還軟弱無力的地區。十分明顯，隨着這種機關的改善，隨着蘇維埃政權一切下層組織的鞏固，隨着農村地方黨組織和青年團組織的改善和加強，這類現象會愈來愈少，以至最後絕跡。』^①

這樣說來，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原因是在機關方面，是在我們的下層組織中用還是不中用，軟弱還是強有力。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這樣說來，例如沙赫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暗害活動（這是資產階級分子反抗蘇維埃政權的一種形式，是階級鬥爭尖銳化的一種形式）並不是由於階級力量的對比，並不是由於社會主義的增長，而是由於我們的機關不中用。

這樣說來，在沙赫特區發生大規模暗害活動以前，我們的機關是好的，而後來在發生大規模暗害活動的時候，我們的機關不知爲什麼突然就變成毫不中用的了。

這樣說來，在去年以前，當糧食收購工作還在自流地進行，我國階級鬥爭還沒有特別尖銳化的時候，我們的地方組織是好的，甚至是理想的，而從去年起，當富農的反抗採取了特別尖銳的形式的時候，我們的組織突然就變成不好的、毫不中用的了。

這不是解釋，而是嘲弄解釋；這不是科學，而是巫師說鬼話。

這種尖銳化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原因有兩個：

第一、我們在前進，我們在進攻，工業中和農業中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都在增長，伴隨着這種增長的是城市和鄉村的一部分資本家受到相應的排擠。現在的情況是我們正在按照列寧的『誰戰勝誰』的公式生活：是我們把他們資本家打倒，如列寧所說的和他們做一次最後決戰，還是他們把我們打倒。

第二、資本主義分子不願意自動退出舞台，他們現在反抗而且將來還會反抗社會主義，因爲他們

看到他們的末日到了。他們所以暫時還能進行反抗，是因為他們的比重雖然在下降，但是他們在絕數量上還是在增長；城鄉小資產階級，正如列寧所說的那樣，每日每時都從自己中間分泌出大小資本家來，而這些資本主義分子會採取一切辦法來衛護自己的生存。

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階級自動退出舞台的事情。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資產階級不試圖用盡全部殘餘的力量來衛護自己的生存的事情。不管我們的下層蘇維埃機關是好還是壞，我們的前進，我們的進攻總是要減少資本主義分子，把他們排擠出去的，而他們這些垂死的階級總是要不顧一切地進行反抗的。

我國階級鬥爭尖銳化的根源就在這裏。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錯誤就在於他們把資本家反抗的加緊和資本家比重的增長混同起來了。這樣混同起來是毫無根據的。所以沒有根據，是因為資本家進行反抗決不是意味着他們變得比我們更有力量。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垂死的階級進行反抗並不是因為他們變得比我們更有力量，而是因為社會主義比他們增長得快，他們愈來愈比我們弱。正因為他們愈來愈弱，他們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於是不得不用盡一切力量，採取一切手段來進行反抗。

在目前這個歷史時期，階級鬥爭尖銳化和資本家進行反抗的原因就在這裏。

實際情況既然如此，那末黨的政策應當怎樣呢？

黨的政策應當是喚起工人階級和農村被剝削羣衆，提高他們的戰鬥力，加強他們的動員準備，以

便和城鄉資本主義分子作鬥爭，以便和正在進行反抗的階級敵人作鬥爭。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的好處之一就在於它有助於動員工人階級去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

布哈林的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他對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的見解的害處在什麼地方呢？

在於它會麻痹工人階級，破壞我國革命力量的動員準備，渙散工人階級，便利資本主義分子向蘇維埃政權進攻。

三、農民問題

布哈林的第三個錯誤是在農民問題上發生的。大家知道，農民問題是我們政策中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在我國的條件下，農民是由幾個不同的社會集團，即由貧農、中農和富農組成的。很明顯，我們對這些集團的態度不能是一樣的。貧農是工人階級的支柱，中農是同盟者，富農是階級敵人，——這就是我們對這些社會集團的態度。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盡人皆知的。

可是布哈林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却有些不同。在他說明農民的特徵的時候，農民分化的事實不見了，存在着幾個社會集團的事實也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剩下的只有一個叫做農村的灰色斑點。在他看來，富農不是富農，中農不是中農，農村是一片貧窮。他在這裏演說時也就是這樣說的，他說：難道我國的富農可以叫做富農嗎？這不過是窮人罷了。布哈林在這裏說：我國的中農難道像中農嗎？

這不過是挨餓的窮人罷了。很明顯，對農民的這種看法是和列寧主義不相容的根本錯誤的看法。

列寧說過，個體農民是最後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這個原理是否正確呢？無疑是正確的。爲什麼把個體農民看做最後一個資本主義階級呢？因爲在構成我國社會的兩個基本階級中，農民是一個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產爲經濟基礎的階級。因爲農民當他還是從事小商品生產的個體農民的時候，經常不斷地從自己中間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資本家來。

這種情況對於我們以馬克思主義態度對待工農聯盟問題具有決定的意義。這就是說，我們需要的不是和農民的任何一種聯盟，而只是建立在和農民中的資本主義分子作鬥爭的基礎上的那種聯盟。由此可見，列寧關於農民是最後一個資本主義階級的論點不但不和工農聯盟的思想相矛盾，反而給這個旨在反對一般資本主義分子，特別是反對農村中農民資本主義分子的工人階級和大多數農民的聯盟提供了根據。

列寧提出這個論點，是爲了指明工農聯盟只有建立在和農民本身所分泌出來的那些資本主義分子作鬥爭的基礎上才能是鞏固的。

布哈林的錯誤就在於他不懂得和不接受這個簡單的道理，他忘記了農村中的社會集團，在他的視野中富農和貧農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清一色的中農羣衆。

這種情況表明了布哈林的毫無疑義的右傾，這種右傾和『左』傾即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相反，『左』傾除了貧農和富農以外看不見農村中的其他社會集團，中農在他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在和農民聯盟的問題上，托洛茨基主義和布哈林集團之間的差別在什麼地方呢？在於托洛茨基主義反對和中農羣衆建立鞏固聯盟的政策，而布哈林集團則主張和全體農民建立任何一種聯盟。用不着證明，這兩種立場都是不正確的，一個是半斤，一個是八兩。

列寧主義無疑主張和基本農民羣衆建立鞏固的聯盟，即主張和中農建立聯盟，但不是主張建立任何一種聯盟，而是主張和中農建立能保證工人階級領導作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促進消滅階級的那種聯盟。

列寧說：『對於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協議是可以隨便了解的。從工人階級的觀點看來，這種協議只有當它擁護工人階級專政而且成爲消滅階級的一種手段的時候，才是可以容許的，正確的，原則上可能的；如果不是這樣，那末工人階級和農民成立協議的公式，當然就成爲蘇維埃政權的一切敵人和工人階級專政的一切敵人所主張的公式。』（『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八二頁）

其次：

列寧說：『現在，無產階級掌握着政權，並領導着政權。它領導着農民。領導農民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第一、實行消滅階級而不是適應小生產者的路綫。如果我們離開了這條根本的和主要的路綫，那我們就會不成其爲社會主義者，就會陷入那些現在已經成爲無產階級的最兇惡敵人的小資產者的營壘，即陷入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營壘。』（『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

二卷第三九六頁)

這就是列寧對於和基本農民羣衆聯盟即和中農聯盟問題的看法。

布哈林集團在中農問題上的錯誤就在於他們看不見中農的兩重性，看不見中農介於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兩重地位。列寧說，『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級』。爲什麼呢？因爲中農一方面是勞動者，這就使他和工人階級接近，而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者，這就使他和富農接近。由此就產生了中農的動搖。這不僅在理論上是正確的。這種動搖也是每日每時都在實際生活中表現出來的。

列寧說：『農民作爲勞動者，他傾向於社會主義，寧願工人專政而不願資產階級專政。農民作爲糧食出售者，他傾向於資產階級，傾向於自由貿易，就是說，傾向於退到「慣常的」、舊有的、「歷來的」資本主義。』（『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九頁）

因此，和中農的聯盟只有當它的目的是反對資本主義分子，反對整個資本主義的時候，只有當它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並促進消滅階級的時候，才能是鞏固的。

布哈林集團忘記了這些簡單明白的道理。

四、新經濟政策和市場關係問題

布哈林的第四個錯誤是在新經濟政策問題上發生的。布哈林在這方面的錯誤在於他看不見新經濟政策的兩個方面，只看見新經濟政策的一個方面。我們在一九二一年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是把

它的鋒芒指向戰時共產主義，指向排斥任何私人貿易自由的制度和秩序的。我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新經濟政策就是容許私人貿易的一定自由。這一方面布哈林記住了。這是很好的。

但是，布哈林認為新經濟政策只有這一方面，那就錯了。布哈林忘記了新經濟政策還有另一方面。問題在於新經濟政策決不是容許私人貿易完全自由，決不是容許在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新經濟政策是在保證國家對市場起調節作用的條件下容許私人貿易在一定限度、在一定範圍內的自由。這就是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方面。而且新經濟政策的這一個方面比它的第一個方面對我們更為重要。在我國市場上沒有像在資本主義國家所常見的那種自由玩弄價格的現象。糧食價格基本上是由我們規定的。工業品價格是由我們規定的。我們努力實行降低產品成本和降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以便保持農產品價格的穩定。這種獨特的市場秩序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沒有的，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只要新經濟政策存在，就應當保存它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反對戰時共產主義制度，其目的是保證私人貿易的一定自由；另一方面是反對私人貿易完全自由，其目的是保證國家對市場起調節作用。取消這兩方面中的一方面就不會有新經濟政策。

布哈林認為新經濟政策只會受到『從左邊』即從那些想取消任何貿易自由的人們方面來的危險。這是不對的。這是極大的錯誤。而且這種危險現在是最不現實的，因為現在我們的地方組織和中央組織裏沒有人或者幾乎沒有人不懂得保持一定的貿易自由是完全必要的和適當的。

從右邊來的危險，即從那些想取消國家對市場的調節作用，想『解放』市場，從而開闢私人貿易

完全自由的紀元的人們方面來的危險要現實得多。毫無疑問，這種從右邊來破壞新經濟政策的危險現在要現實得多。

不應當忘記，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正是在這方面進行活動，正是從右邊來破壞新經濟政策的。也應當記住，富農和富裕分子的號叫，投機分子和包買商人的號叫（我們的許多同志常常受這種號叫的影響），正是從這方面來攻擊新經濟政策的。布哈林看不見破壞新經濟政策的這第二種真正現實的危險，這個事實無可懷疑地說明他向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壓力屈服了。

布哈林提議使市場『常態化』，按地區『調整』糧食收購價格，即提高糧價。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他不滿意蘇維埃的市場條件，他想逐漸取消國家對市場的調節作用，提議向從右邊來破壞新經濟政策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讓步。

姑且假定我們聽從了布哈林的勸告。由此會得到什麼結果呢？比如說，我們在秋天，在收購初期提高了糧價。但是由於市場上總有一些人，各種投機分子和包買商人，會用高出兩倍的價錢來收買糧食，而我們又不能和投機分子競爭，因為他們總共不過收買一千萬普特左右，而我們却要收買幾億普特，所以糧食持有者還是會把糧食囤積起來，等待價格繼續上漲。這樣，到了春天，當國家最需要糧食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再度提高糧價。而在春天提高糧價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害了貧農和農村中力量單薄的階層，他們在春天不得不買進糧食，一部分做種子，一部分供消費，而這些糧食就是他們在秋天按照比較低廉的價格賣出去的。這樣做了以後，我們是否能收到什麼顯著的效果即

得到足夠數量的糧食呢？最可能的是得不到，因為總有一些投機分子和包買商人又會用高一兩倍的價錢來收買這些糧食。於是我們又必須準備再一次提高糧價，徒勞無益地爭取賽過投機分子和包買商人。

由此可見，只要一走上提高糧價的道路，我們就必定會繼續滾下去，而且沒有保證可以得到足夠數量的糧食。

但是問題還不限於此：

第一、提高了糧食收購價格，我們以後還必須提高農業所生產的原料的價格，以保持各種農產品的一定比價。

第二、提高了糧食收購價格，我們在城市裏就不能保持低廉的糧食零售價格，因而就必須提高糧食的售價。因為我們不能夠而且不應當損害工人利益，我們就必須加速提高工資。但是，這樣做就不能不提高工業品價格，因為不提高工業品價格就會違反工業化的利益，使資金從城市流入農村。

結果我們就必須不是在降低或至少穩定價格的基礎上，而是在提高糧價和工業品價格的基礎上來拉平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價格。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採取使工業品和農產品漲價的方針。

不難了解，這樣『調整』價格不能不弄得完全取消蘇維埃價格政策，取消國家對市場的調節作用，完全放縱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

這會有利於誰呢？

只會有利於城鄉富裕階層，因為工人階級以及貧農和農村中力量單薄的階層是買不起昂貴的工業品和農產品的。估便宜的是富農和富裕分子，是耐普曼和其他富有階級。

這也是結合，但這是一種特殊的結合——同城鄉富有階層的結合。工人和農村中力量單薄的階層將有充分權利來質問我們：我們是什麼政權，是工農政權還是富農耐普曼政權？

同工入階級和農村中力量單薄的階層破裂，同城鄉富有階層結合，——這就是布哈林的市場『常態化』和按地區『調整』糧價的必然結果。

很明顯，黨不能走這條死路。

布哈林對新經濟政策的全部概念是多麼混亂，他做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俘虜是多麼服貼，——這一點就從他對城鄉之間、國家和農民之間新的商品流轉形式問題所表現的極端否定的態度中也看得出來。他看見國家成了農民的商品供應者，農民正在成為國家的糧食供應者，就表示憤怒，大肆反對。他認為這是違反新經濟政策的一切規章，幾乎是破壞新經濟政策。試問，為什麼呢？有什麼根據呢？

國家、國營工業不經過中介人直接成為農民的商品供應者，而農民也不經過中介人直接成為工業、國家的糧食供應者，這有什麼不好呢？

農民已經變成國營工業所需要的棉花、甜菜、亞麻的供應者，而國營工業已經變成這些農業部門

的城市商品、種子和生產工具的供應者，從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策的觀點看來，這有什麼不好呢？

預購的方法在這裏是建立城鄉之間這些新的商品流轉形式的基本方法。難道預購的方法是同新經濟政策的要求抵觸的嗎？

由於採用這種預購的方法，農民不僅在棉花、甜菜、亞麻方面，而且在糧食方面正在成爲國家的供應者，這有什麼不好呢？

爲什麼小宗交易、少量交易可以叫做商品流轉，而按照預先就貨物的價格和質量訂立的合同（預購合同）進行的大宗交易就不能叫做商品流轉呢？

城鄉之間按照預購的方法進行商品流轉的這些新的羣衆性的形式正是在新經濟政策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些形式是我們各個組織在加強對國民經濟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的領導方面的一個極大的進步，這難道很難了解嗎？

布哈林竟不會了解這些簡單明白的道理了。

五、所謂『貢稅』問題

布哈林的第五個錯誤（我說的是他的主要錯誤），是他在城鄉之間的『剪刀差』問題即所謂『貢稅』問題上對黨的路綫進行了機會主義的歪曲。

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一九二九年二月）關於『剪刀差』問題的著名決議說的是什麼呢？決議說的是：農民除了向國家繳納普通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以外，還要繳納一種超額稅，即在購買工業品時多付一些錢，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少得一些錢。

農民繳納的這種超額稅實際上是存在的，這是不是事實呢？是的，是事實。我們還把它叫做什麼呢？我們還把它叫做『剪刀差』，叫做爲迅速發展我國工業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

是否需要採取這種『流入』的辦法呢？我們大家一致認爲，如果我們真正想保持工業迅速發展的速度，採取這種辦法作爲暫時的措施是需要的。而我們無論如何必須保持工業的迅速發展，因爲這不僅是工業本身所需要的，而且首先是農業，是農民所需要的，農民現在最需要拖拉機、農業機器和肥料。

我們能不能現在就取消這種超額稅呢？可惜不能。我們必須在最近幾年內一有可能就取消它。但是現在我們不能取消它。

於是，由於『剪刀差』而形成的這種超額稅就成了『一種類似貢稅的東西』。不是貢稅，而是『一種類似貢稅的東西』。這是因爲我們落後而產生的『一種類似貢稅的東西』。需要這種超額稅是爲了推進工業的發展，消除我國的落後狀態。

這是不是說，徵收這種額外稅我們就是剝削農民呢？不，不是這個意思。蘇維埃政權的本質不容許國家對農民有任何剝削。我們許多同志在七月全會⁽²⁾的發言中曾經直截了當地指出：在蘇維埃制

度下，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剝削農民的，因為勞動農民物質福利的不斷提高是蘇維埃社會的發展規律，而這就排斥了任何剝削農民的可能性。

農民是否負擔得起這種額外稅呢？是的，負擔得起的。爲什麼呢？

第一、因爲這種額外稅是在農民物質生活狀況不斷改善的條件下徵收的。

第二、因爲農民有自己的個人經濟，個人經濟的收入使農民能够繳納額外稅，對於工人就不能這樣說，因爲工人沒有個人經濟，雖然如此，工人却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貢獻給工業化事業。

第三、因爲額外稅的數量是逐年減少的。

我們用『一種類似貢稅的東西』的字眼來稱呼這種額外稅是否正確呢？無疑是正確的。用這些字眼可以提醒我們的同志：徵收這種額外稅是令人不愉快的，不是出於本願的，把它長期保留下去是不可容許的。我們這樣稱呼加於農民的額外稅，是想指出我們徵收這種稅並不是出於本願，而是由於需要，我們布爾什維克必須採取一切辦法，一有可能就儘快取消這種額外稅。

關於『剪刀差』問題，關於『流入』問題，關於『超額稅』問題，關於在上述文件中被稱爲『一種類似貢稅的東西』的問題的實質就是這樣。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曾經企圖挑剔『貢稅』這個字眼，並責備黨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的政策。但是現在連瞎子也看得見，這是布哈林分子極粗暴地誣蔑我們黨的卑鄙企圖。現在連他們自己也不得不默認，他們關於軍事封建剝削的胡說是徹底破產了。

因爲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布哈林分子承認『剪刀差』和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那末他們就應當承認自己的責備是誣蔑，承認黨是完全正確的；

或者他們否認『剪刀差』和『流入』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那末就請他們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好讓黨把他們算入我國工業化的反對者之列。

不管怎樣，我可以引證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許多演說，在那些演說中他們無條件地承認『剪刀差』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承認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是不可避免的。而這也就是承認『一種類似貢稅的東西』的提法。

怎麼樣，他們現在是不是還堅持『流入』的觀點，還堅持在目前保留『剪刀差』的觀點呢？讓他們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吧。

布哈林：流入是需要的，但『貢稅』是一個不好的字眼。（大笑）

斯大林：這樣看來，在問題的實質上我們並沒有意見分歧，這樣看來，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所謂『剪刀差』，額外稅，『一種類似貢稅的東西』，是目前國家工業化所必需的然而而是暫時的一種手段。

很好。那末問題究竟在什麼地方，爲什麼要吵嚷呢？因爲他們認爲『貢稅』這個字眼或『一種類似貢稅的東西』的說法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是不通用的，所以他們不喜歡這個字眼嗎？

好吧，我們就來談談『貢稅』這個字眼。

同志們，我肯定地說，這個字眼在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中，例如在列寧同志的文章中，早已得到了公認。同志們，這會使一些沒有讀過列寧著作的人感到奇怪，然而這是事實。布哈林在這裏『大喊大叫』，說馬克思主義文獻不能容忍『貢稅』這個字眼。他對於黨中央和一般馬克思主義者竟敢使用『貢稅』這個字眼感到氣憤和奇怪。但是，既然已經證明這個字眼在列寧同志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中早就得到了公認，那還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呢？或許在布哈林看來，列寧不合乎馬克思主義者的要求吧？那末，親愛的同志們，請直截了當地說出來。

例如你們就拿列寧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論「左派」幼稚病和小資產階級性』（一九一八年五月）來讀一讀下面一段話：

『存有幾千小款的小資產者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敵人，他們無疑希望把這幾千小款用在自己身上，反對貧民，反對任何全國性的監督，而這幾千小款却給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投機活動造成數十億的基礎。假定說，一定數目的工人在幾天內創造出為數一千的價值。再假定說，在我國，由於小投機活動，由於各種盜竊行為，由於小私有者「逃避」蘇維埃的法令和條例，這個總數中的二百落了空。每一個覺悟的工人都會說：假如我從這一千中拿出三百來就能建立更好的秩序和組織，那我樂意拿出三百，不是二百，因為在蘇維埃政權下，既然秩序和組織會整頓好，既然小私有者對國家各種壟斷的破壞會被徹底打破，那末以後減少這種「貢稅」，比如說減到一

百或五十，就會是十分容易的任務。」（『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〇五頁）

看來已經清楚了。能不能根據這一點就宣稱列寧同志主張對工人階級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政策呢？親愛的同志們，請你們試試看！

喊聲：「反正對中農從來沒有用過『貢稅』這個概念。」

斯大林：「你是不是以為中農比工人階級更靠近黨呢？你真是一個糟糕的馬克思主義者。（大笑）我們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既然對於工人階級可以說『貢稅』，為什麼對於不過是我們的同盟者的中農就不能這樣說呢？」

有些愛挑剔的人會以為『論「左派」幼稚病』一文中的『貢稅』這個字眼是列寧同志的失言，是偶然的失言。但是經過檢查證明，這些愛挑剔的人的猜疑是沒有任何根據的。你們就拿列寧同志的另一篇文章（更正確地說是小冊子）『論糧食稅』（一九二一年四月）來讀一讀其中的第三二四頁（『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六卷第三二四頁）^②。你們可以看到，剛才引證的關於『貢稅』那一段話，列寧同志在那裏又一字不差地重複了一遍。最後，你們再拿列寧同志的『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月，『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四四八頁）^③一文來看一看，你們可以看到，列寧在這裏也說到『我們因為在組織全民統計和實行自下而上的監督方面的落後而付出的貢稅（已不加引號）』。

由此可見，『貢稅』這個字眼在列寧的文章中決不是偶然的東西。列寧同志使用這個字眼是爲了

強調『貢稅』的暫時性，加強布爾什維克的毅力，以便一有可能就取消工人階級因為我們的落後，因為我們的『缺點』而付出的這種『貢稅』。

由此可見，在用『一種類似貢稅的東西』的說法上，我是和一些很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夥的，和列寧同志一夥的。

布哈林在這裏說，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容許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貢稅』這個字眼。他說的是什麼樣的馬克思主義者呢？如果他指的是斯列普柯夫、馬列茨基、彼得羅夫斯基、羅季特等等一類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那末布哈林的氣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些人與其說像馬克思主義者，不如說像自由主義者。如果他指的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列寧同志，那末應當承認，『貢稅』這個字眼在他們中間早已得到了公認，而不大熟悉列寧著作的布哈林在這裏是說錯了。

但是『貢稅』問題還不限於此。問題在於：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挑剔『貢稅』這個字眼而且說起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政策的話來，這並不是偶然的。毫無疑問，他們吵嚷說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是想表示他們對於我們各機關所實行的我們黨對待富農的政策極端不滿。對黨在領導農民方面的列寧的政策不滿，對我們的糧食收購政策不滿，對我們的全力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政策不滿，最後，希望『解放』市場和規定私人貿易完全自由，——這就是布哈林關於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政策的號叫中所表現出來的東西。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我沒有看見過責備黨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政策的第二個例子。這種反黨武器

不是從馬克思主義者的武庫裏拿來的。那末是從哪裏拿來的呢？是從立憲民主黨首領米留可夫的武庫裏拿來的。當立憲民主黨人想挑撥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關係的時候，他們總是說：布爾什維克先生們，你們是在農民的白骨上建設社會主義。布哈林對於「貢稅」吵吵嚷嚷，就是附和米留可夫之流的先生們，就是做人民公敵的尾巴。

六、工業發展速度和結合的新形式問題

最後是關於工業發展速度和城鄉結合的新形式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意見分歧的最重要問題之一。這個問題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在黨的經濟政策問題方面的實際分歧的一切綫索都集中在這個問題上。

什麼是結合的新形式呢？從我們的經濟政策方面來看，這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這就是說，除了城鄉結合的舊形式以外，我們還需要結合的新形式。在舊形式下，工業主要是滿足農民的個人需要（花布、鞋子、一般紡織品等等），而在新形式下，工業將滿足農民經濟的生產需要（農業機器、拖拉機、優良種子、肥料等等）。

過去我們主要是滿足農民的個人需要，很少觸及農民經濟的生產需要，而現在除了繼續滿足農民的個人需要以外，我們還必須盡力供應那些對於在新技术基礎上改造農業生產有直接關係的農業機器、拖拉機、肥料等等。

當問題是恢復農業、使農民經營過去地主和富農的土地的時候，我們可以滿足於舊的結合形式。可是現在，當問題是改造農業的時候，這就已經不夠了。現在需要更進一步，需要幫助農民在新技術和集體勞動的基礎上改造農業生產。

其次，這就是說，在重新裝備我國工業的同時，我們還必須開始認真地重新裝備農業。我們正在重新裝備我國工業，而且已經重新裝備了一部分，爲工業奠定了新的技術基礎，給工業供給了新的優良機器和新的優秀幹部。我們正在建設新工廠，我們正在改造和擴建舊工廠，我們正在發展冶金業、化學工業和機器製造業。在這個基礎上，城市正在發展，新的工業區正在增多，舊的工業區正在擴大。在這個基礎上，對於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求正在增長。而農業仍然使用着舊式農具，使用着古老陳舊的耕作方法，使用着原始的、現在已經不適用或幾乎不適用的舊技術，採用着舊的、個體小農的經營方式和勞動方式。

例如我國在革命前約有一千六百萬農戶，而現在至少有二千五百萬農戶，這個事實說明了什麼呢？這不是說明農業日益分散和零碎化又是說明什麼呢？而分散的小經濟的特徵就在於它無力充分利用技術、機器、拖拉機和農業科學成就，它是出產商品很少的經濟。

由此就產生了農產品品量的不足。

由此就產生了城市和鄉村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關係破裂的危險。

由此就產生了使農業跟上我國工業發展速度的必要性。

要避免這種關係破裂的危險，就必須開始認真地在新技术基礎上重新裝備農業。而要重新裝備農業，就必須逐步地把分散的個體農戶聯合爲大農莊即集體農莊，必須在集體勞動的基礎上建設農業，必須擴大集體經濟，必須發展原有的和新建的國營農場，必須有步驟地把預購這種羣衆性的形式應用到農業的一切主要部門中去，必須擴大幫助農民掌握新技术並使勞動集體化的機器拖拉機站系統，——一句話，必須逐步地把個體小農經濟轉到集體大生產的基礎上去，因爲只有公共的大生產才能充分利用科學成就和新技术，才能一日千里地推進我國農業的發展。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應當丟開個體貧農中農經濟。不，不是這個意思。個體貧農中農經濟在供給工業以糧食和原料方面現在起着主要作用，在最近的將來還會起主要作用。正因爲如此，必須幫助還沒有聯合爲集體農莊的個體貧農中農經濟。

但這是說，單靠個體農民經濟已經不够了。我們在糧食收購方面的困難就說明了這一點。因此，必須以全力發展集體經濟形式和國營農場來補充個體貧農中農經濟的發展。

因此，必須在個體貧農中農經濟和公共的集體經濟形式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即廣泛訂立預購合同，建立機器拖拉機站，全力發展合作社運動，使農民易於把他們的細小的個體經濟轉上集體勞動的軌道。

沒有這些條件，就不能真正發展農業。沒有這些條件，就不能解決穀物問題。沒有這些條件，就不能使力量單薄的農民階層擺脫破產和貧困。

最後，這是說，必須全力發展我國工業——我國農業生產在改造方面所賴以滋養的主要泉源，必須發展冶金業、化學工業和機器製造業，必須建設拖拉機製造廠、農業機器製造廠等等。

無須證明，不通過廣泛訂立預購合同來把基本農民羣衆引向集體經營形式，不以大量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等等供給農業，就不能發展集體農莊，就不能發展機器拖拉機站。

但是不加速發展我國工業，就不能以機器和拖拉機供給農村。因此，迅速發展我國工業是在集體基礎上改造農業的鑰匙。

結合的新形式的意義和作用就是這樣。

布哈林集團不得不在口頭上承認結合的新形式的必要性。但這不過是口頭上的承認，其目的是要在口頭上承認結合的新形式的幌子下偷運一種完全相反的東西。其實布哈林是反對結合的新形式的。布哈林所持的出發點不是迅速發展工業這一改造農業生產的槓桿，而是發展個體農民經濟。在他看來，最重要的是使市場『常態化』，容許在農產品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容許私人貿易完全自由。由此就產生了他對集體農莊的不信任態度，他在中央七月全會上的演說中和他在中央七月全會前提出的提綱中都表現了這種態度。由此就產生了他對收購糧食時所採取的一切對付富農的非常措施的否定態度。

大家知道，布哈林躲避非常措施就像小鬼躲避閻王一樣。

大家知道，布哈林直到現在還不能了解，富農在目前條件下是不會自願地、自發地交出充分數量

的糧食的。

這一點現在已經由我們兩年來收購工作的經驗證明了。

如果商品糧食還是不夠，那該怎麼辦呢？布哈林回答說：不要用非常措施驚擾富農，要從國外輸入糧食。就在不久以前，他還提議從國外輸入五千萬普特左右的糧食，就是說，用大約一億盧布的外匯輸入糧食。如果外匯需要用來輸入工業設備，那又怎麼辦呢？布哈林回答說：應當儘先從國外輸入糧食。這顯然是要把輸入工業設備的事情放在後面。

這樣說來，解決穀物問題和改造農業的基礎不是迅速發展工業，而是通過自由市場和在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來發展個體農民經濟（包括富農經濟在內）。

於是我們就有了兩個不同的經濟政策方案。

黨的·方·案·：

一、我們重新裝備（改造）工業。

二、我們開始認真地重新裝備（改造）農業。

三、爲此必須擴大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建設，廣泛地訂立預購合同和建立機器拖拉機站，作爲建立工業和農業之間生產結合的手段。

四、至於目前糧食收購方面的困難，那末必須承認可以採取一些依靠中農和貧農羣衆共同贊助的臨時的非常措施，作爲擊破富農反抗和從富農手裏取得最大限度餘糧的一種手段，而這些餘糧是

避免輸入糧食和保存外匯以發展工業所必需的。

五、個體貧農中農經濟在供給國家糧食和原料方面現在起着主要作用，將來還會起主要作用，但是單靠它已經不夠了；因此，必須以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廣泛訂立預購合同，加緊發展機器拖拉機站來補充個體貧農中農經濟的發展，以便易於把資本主義分子從農業中排擠出去，把個體農民經濟逐步引上大規模集體經濟的軌道，引上集體勞動的軌道。

六、但是要做到這一切，首先必須加緊發展工業，發展冶金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拖拉機製造廠、農業機器製造廠等等。不然就不能解決穀物問題，也不能改造農業。

結論：迅速發展我國工業是改造農業的鑰匙。

布哈林的方案：

一、使市場『常態化』，容許在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和抬高糧價，即使這樣做會使工業品、原料和糧食漲價。

二、相當地減低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發展速度，以便全力發展個體農民經濟（布哈林在七月提出的提綱，布哈林在七月全會上的演說）。

三、以自流的方式收購糧食，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不可以採取甚至不可以部分地採取非常措施來對付富農，即使這些措施受到中農和貧農羣衆的贊助。

四、缺糧時就輸入約值一億盧布的糧食。

五、如果外匯不夠，不能同時輸入糧食和工業設備，那就應當減少工業設備的輸入，也就是說，減低我國工業的發展速度，不然我國農業就會『停滯不前』，甚至會『直綫下降』。

結論：發展個體農民經濟是改造農業的鑰匙。

同志們！問題就是這樣。

布哈林的方案是降低工業的發展速度和破壞結合的新形式的方案。

我們的意見分歧就是這樣。

有時人們問：我們在發展結合的新形式，發展集體農莊、國營農場等方面是不是做遲了呢？

有人武斷地說，黨在這件事情上至少做遲了兩年。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只有不了解蘇聯經濟情況的『左的』空喊家才會這樣說。

在這件事情上做遲了是什麼意思呢？如果說的是預見到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必要性，那末我們早在十月革命時就開始做這件事情了。還在那時，在十月革命時期，黨就已經預見到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必要性，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並且可以看看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一九一九年三月）所通過的我們的黨綱。那裏十分清楚地注意到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必要性。

但是單靠我們黨的領導上層預見到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必要性，還不足以實現和組織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羣衆運動。可見這裏說的不是預見，而是實現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建設的計劃。但是要實現這樣的計劃需要許多條件，這些條件是我們以前所沒有而直到最近才出現的。

同志們，問題就在這裏。

爲了實行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羣衆運動的計劃，首先必須使黨員羣衆在這方面支持黨的領導上層。大家知道，我們黨是一個有百萬黨員的大黨。因此，必須說服廣大黨員羣衆，使他們相信領導上層的政策是正確的。這是第一。

其次，爲此必須在農民中間造成擁護集體農莊的羣衆運動，必須使農民不害怕集體農莊，使他們根據經驗相信集體農莊比個體經濟優越，而自行加入集體農莊。這是一件需要相當時間的嚴重事情。這是第二。

再其次，爲此必須使國家有一筆爲資助集體農莊建設、爲資助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所必需的經費。親愛的同志們，這件事情是需要幾億幾億盧布的。這是第三。

最後，爲此必須使工業有相當高度的發展，以便供給農業以機器、拖拉機、肥料等等。這是第四。能不能斷言我們在兩三年前就已經具備了這一切條件呢？不，不能這樣斷言。

決不能忘記，我們是執政黨，而不是在野黨。在野黨可以提出一些口號（我說的是運動中的根本的實踐口號），以求在取得政權後加以實現。誰也不會責備在野黨不立刻實現他們的根本口號，因爲大家都明白，執政的不是他們在野黨，而是別的政黨。

我們布爾什維克黨是執政黨，執政黨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種政黨的口號不是單純的鼓動性的口號，而是一種更重要得多的東西，因爲這些口號具有實際決定效力，具有法律效力，應當立即予

以執行。我們黨不能提出一個實踐口號，然後又把它擱置起來不去執行。這樣做就是欺騙羣衆。要提出一個實踐口號，特別是把千百萬農民羣衆引上集體制軌道這樣重大的口號，就必須具備直接實現這個口號的條件，而且必須創造和組織這些條件。正因為如此，對我們來說，單靠黨的領導上層預見到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必要性是不夠的。正因為如此，我們還需要具備爲立刻實現和貫徹我們的口號所必需的條件。

比如說在兩三年以前，我們的黨員羣衆對全力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是不是已經有了準備呢？不，他們當時對這件事情還沒有準備。黨員羣衆向結合的新形式方面的嚴重轉變是從糧食收購方面發生第一批嚴重困難的時候才開始的。由於發生了這些困難，黨員羣衆才感覺到加速建立結合的新形式，首先是加速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全部必要性，並在這方面堅決支持自己的中央。你看，這就是我們以前所沒有而現在已經具備的一個條件。

在兩三年以前，我們是不是已經有了千百萬農民羣衆擁護集體農莊或國營農場的嚴重運動呢？不，沒有。誰都知道，在兩三年以前，農民敵視國營農場，而把集體農莊鄙視爲毫無用處的『康姆尼』。可是現在呢？現在是另一種情況了。現在我們已經有整個整個的農民階層把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看作農民經濟獲得種子、良種牲畜、機器、拖拉機等等幫助的來源。現在只要供給機器和拖拉機，集體農莊事業就會加速前進。

一些相當大的農民階層中的這種轉變是從哪裏來的呢？是什麼促成了這種轉變呢？

首先是合作社和合作社運動的發展。不容懷疑，如果沒有合作社特別是在農民中間造成了擁護集體農莊的心理基礎的農業合作社的蓬勃發展，我們就不會看到現在整個整個的農民階層所表現的那種參加集體農莊的渴望。

現有的辦得很好的集體農莊在這裏也起了很大作用，它們給農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把小農經濟聯合爲大經濟即集體經濟是可以改進農業的。

現有的設備完善的國營農場在這裏也起了作用，它們幫助農民改善了經濟。至於你們都熟知的其他事實，我就不談了。你們看，這又是我們以前所沒有而現在已經具備的一個條件。

其次，能不能斷言在兩三年以前我們就已經有可能大量資助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給這方面撥出幾億盧布呢？不，不能這樣斷言。你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當時甚至缺少資金去發展最低限度的工業，而沒有這些工業就根本不能實現任何工業化，更不用說改造農業了。我們當時能不能從作爲國家工業化基礎的工業中抽出這些資金，把它交給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呢？顯然不能。而現在呢？現在我們有了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資金。

最後，能不能斷言在兩三年以前我們在工業方面就已經有了充分的基礎來加緊供給農業以機器、拖拉機等等呢？不，不能這樣斷言。當時的任務是要建立最低限度的工業基礎，以便將來供給農業以機器和拖拉機。當時我們也就是把有限的資金用來建立這個基礎的。而現在呢？現在我們有了這個發展農業的工業基礎。至少這個基礎在我國正在加速建立起來。

由此可見，只是到最近才在我國造成了大量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所必需的條件。同志們，情況就是這樣。

正因為如此，不能說我們在發展結合的新形式方面做遲了。

七、作為理論家的布哈林

右傾反對派的理論家布哈林在我們政策的各個基本問題上的主要錯誤，大體上就是這樣。

有人說，布哈林是我們黨的理論家之一。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問題在於他那套理論並不完全行得通。這就從我剛才所分析的他在黨的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所犯的一大堆錯誤中也可以看得出來。這些錯誤，即在共產國際方面的錯誤，在階級鬥爭問題、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農民問題、新經濟政策問題、結合的新形式問題上的錯誤，——所有這些錯誤出現在他身上決不是偶然的。不，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布哈林的這些錯誤是從他的不正確的理論觀點，從他的理論缺陷中產生出來的。是的，布哈林是理論家，但他這個理論家不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他還需要補習一下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有人援引列寧同志評論作為理論家的布哈林的那封有名的信。讓我們來讀讀這封信吧：

列寧說：『在年輕的中央委員中間，關於布哈林和皮達可夫我想說幾句話。據我看，他們是最出色的人材（在最年輕的人材中間），關於他們必須注意下面一點：布哈林不僅是黨的最寶貴的

和最大的理論家，他還理應被看做全黨所喜愛的人，但是他的理論觀點是否可以看做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還大可懷疑，因為他帶有某種經院哲學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而且我認為他從來沒有完全懂得辯證法）。①（一九二六年七月全會速記記錄第四冊第六十六頁）總之，不懂辯證法的理論家。經院哲學的理論家。他的『理論觀點是否可以看做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還大可懷疑』的理論家。這就是列寧對布哈林的理論面目所做的評定。

同志們，你們自己知道，這樣的理論家還需要補習一下。假如布哈林知道他還不是一個完全成熟的理論家，他還需要補習一下，他是一個還沒有領會辯證法的理論家，而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假如他知道這些，那末他就會謙虛一點，這對黨是只會有好處的。但糟糕的是布哈林不知道謙虛。糟糕的是他不僅不知道謙虛，而且在許多問題上，首先是在國家問題上，竟教訓起我們的導師列寧來了。這就是布哈林糟糕的地方。

說到這裏，讓我援引下一九一六年列寧和布哈林在國家問題上所發生的那次大家知道的理論爭論。這對我們揭露布哈林妄想教訓列寧的那種不自量的奢望，以及他在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等重要問題上的理論弱點的根源，是很重要的。

大家知道，一九一六年在『青年國際』雜誌⁽²⁾上登載了布哈林的一篇署名 *Nota Bene* 的論文，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這篇論文實際上是專門反對列寧同志的。布哈林在這篇論文中寫道：

『……如果以爲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差別在於前者贊成國家，後者反對國家，那就完全錯了。其實，差別在於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想要組織新的社會生產，集中的生產，即技術上最進步的生產；而分散的無政府主義生產只是意味着退到舊技術，退到舊式企業……』

『……社會民主黨是羣衆的教師，或者至少應當成爲羣衆的教師，它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着重指出它在原則上敵視國家的態度……目前的戰爭表明，國家觀念的根蒂已經深深地滲入工人的心靈。』

列寧在一九一六年發表的一篇有名的論文中批評布哈林的這種觀點說：

『這是不對的。作者提出的問題是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國家的態度有什麼差別，但回答的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另一個問題，是他們對於未來社會經濟基礎的態度有什麼差別。當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和必要的問題。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忘記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國家的態度上的主要差別。社會主義者主張在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鬥爭中利用現代國家及其機關，同樣也主張必須利用國家作爲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特殊的過渡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的過渡形式，它也是一種國家。無政府主義者想「取消」國家，把它「炸毀」（sprengen）。像 Nota Bene 同志在一個地方所說的那樣，不過他錯誤地把這種觀點加在社會主義者身上了。社會主義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引得太不完全

了——認爲資產階級被剝奪以後，國家就會「消亡」，逐漸「泯滅」……」

『要「着重指出」在原則上敵視」國家的態度，就必須真正「明確地」了解這種態度，但是作者恰恰沒有明確的了解。「國家觀念的根蒂」一語是十分糊塗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非社會主義的。不是「國家觀念」和對國家觀念的否定相衝突，而是機會主義的政策（即以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態度來對待國家）和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即以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態度來對待資產階級國家，來利用國家反對資產階級以便推翻這個階級）相衝突。這是兩種完完全全不同的東西。』（『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一五五頁至第一五六頁）

看來很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布哈林滾入了什麼樣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泥坑！

斯騰：列寧當時還沒有詳細闡述『炸毀』國家的必要性。布哈林雖然犯了無政府主義的錯誤，但是已經着手闡述這個問題了。

斯大林：不，現在說的不是這個，現在說的是對於一般國家的態度，說的是布哈林認爲工人階級應當在原則上敵視任何國家，包括工人階級的國家在內。

斯騰：列寧當時只談到利用國家的問題，在對布哈林的批評中絲毫沒有談到『炸毀』問題。

斯大林：你弄錯了。『炸毀』國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公式，而是無政府主義的公式。我敢向你担保，這裏說的是布哈林（和無政府主義者）認爲工人應當着重指出自己在原則上敵視任何國家，因而也敵視過渡時期的國家，敵視工人階級的國家的態度。

你試向我們的工人解釋一下，說工人階級應當抱着在原則上敵視無產階級專政的態度；要知道，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國家。

布哈林在他登載於『青年國際』雜誌上的論文中所陳述的觀點，是否認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的國家的觀點。

布哈林在這裏忽略了一件『小事情』，即忽略了整個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工人階級如果真正想鎮壓資產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就非有自己的國家不可。這是第一。

第二、說列寧同志當時在他的批評中沒有提到『炸毀』、『取消』一般國家的理論，這是不對的。從我所摘引的一段話裏可以看出，列寧不僅提到了這種理論，而且對它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把它視爲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並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建立和利用新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理論來和它對立。

最後，決不能把『炸毀』和『取消』國家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和無產階級國家『消亡』或『打破』、『粉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混爲一談。有人喜歡把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混爲一談，以爲它們是同一思想的表现。但這是不對的。列寧在批評『炸毀』和『取消』一般國家的無政府主義理論的時候，正是以『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和無產階級國家『消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爲根據的。

爲了使問題更加清楚，我在這裏不妨引證列寧同志關於國家問題的一篇手稿，這篇手稿大概是在一九一六年底或一九一七年初（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寫的。從這篇手稿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

(甲) 列寧批評布哈林在國家問題上的半無政府主義錯誤的時候，是以無產階級國家『消亡』和『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爲根據的；

(乙) 照列寧的說法，雖然布哈林『比考茨基接近真理』，但他還是『不但沒有揭露考茨基分子，反而以自己的錯誤幫助了他們』。

請看這篇手稿的原文：

『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寫給倍倍爾的一封信，對於國家問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下面是信中最重要的一段話的全文：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按這幾個字的文法意義來說，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本國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制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這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無政府主義者用『人民國家』這一個名詞把我們挖苦得夠了，雖然馬克思的駁斥蒲魯東的著作以及後來的『共產黨宣言』都已經直接指出：隨着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施行，國家就會自行消散(sich auflösen)和消失。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不得不用來以暴力鎮壓敵人的一種暫時機關，那末說什麼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因爲當無產階級還需要(着重號是恩格斯加的)國家的時候，那它就不是爲了自由，而是爲了鎮壓自己的敵人；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的時候，這樣的國家就不復存在了。因

此，我們建議到處都把國家（着重號是恩格斯加的）一字改成『公團』（*Gemeinwesen*）。這是一個極好的德文古字，相當於法文中的『公社』。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裏，這大概是最精彩和最激烈的所謂「反對國家」的一段話了。

（一）「應當拋棄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

（二）「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那究竟是什麼呢？顯然是從國家到無國家的過渡形式！）

（三）無政府主義者用「人民國家」這一個名詞把我們「挖苦」（*in die Zähne geworfen* 直譯爲指着鼻子說）得足够了。（就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替他們那些德國朋友的這種明顯的錯誤慚愧；但他們認爲而且根據當時的情況當然是正確地認爲，這種錯誤遠沒有無政府主義者的錯誤嚴重。請注意這點！！）

（四）「隨着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施行，國家就會「自行瓦解」（『消散』）（請注意）和消失」……（請和後來的『消亡』對照一下）……

（五）國家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所需要的一種「暫時機關」……（當然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

（六）需要國家不是爲了自由，而是爲了鎮壓（*Niederhaltung* 一字原意不是鎮壓，而是制止復辟，制服）無產階級的敵人。

(七) 到有自由的時候，國家就不存在了。

(八) 「我們」(即恩格斯和馬克思)建議「到處」(在綱領中)都把「國家」一字改成「公團」(Gemeinwesen)、「公社」!!!

由此可見，不僅機會主義者，而且考茨基也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庸俗化和污辱了。

機會主義者對這八項極豐富的思想一項也不懂!!

他們只看見目前的實際需要：利用政治鬥爭，利用現代國家來訓練和教育無產階級，來「奪取讓步」。這是對的(和無政府主義者相反)，但這還只是百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如果可以用算術來表示的話。

考茨基在他的宣傳作品和一般政論作品中完全抹殺了(或者忘記了? 或者不懂得?)第一、二、五、六、七、八等項和馬克思的《Zerbrechen》一字(考茨基在一九一二年或一九一三年和潘涅庫克辯論的時候(見下面第四十五頁至第四十七頁)，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完全滾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

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們主張：(甲)現在利用國家；(乙)在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利用國家，——這是對實際工作立刻就有最重要意義的兩項。(布哈林正是忘記了這兩項!)

我們和機會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們持有下面這些更深刻、「更恆久的」真理：(子)國家

是「暫時」性的；（丑）現在關於國家的「廢話」是有害的；（寅）無產階級專政不完全帶有國家性質；（卯）國家和自由是相矛盾的；（辰）把國家一字改成「公團」，「公團」是更正確的觀念（概念，綱領用語）；（巳）「粉碎」（Zerbrechen）官僚軍事機器。

還有一點不能忘記：德國公開的機會主義者（伯恩斯坦、科里布等等）直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而正式綱領和考茨基却間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在日常鼓動中不談到它，容忍科里布及其同夥的背叛行爲。

一九一六年八月曾向布哈林寫過：「讓你的關於國家的思想成熟起來，再說吧。」可是，他還沒有讓自己的思想成熟起來，就又署名《Nota Bene》爬到刊物上發表文章了，結果不但沒有揭露考茨基分子，反而以自己的錯誤幫助了他們！但實際上，布哈林是比考茨基接近真理的。」（乙）關於國家問題的理論爭論的簡單經過就是這樣。

問題看來已經很清楚：布哈林犯了半無政府主義的錯誤，已經是改正這些錯誤，跟隨列寧前進的時候了。但是只有列寧主義者才會這樣想。布哈林原來是不同意這一點的。他反而硬說：犯錯誤的不是他，而是列寧；不是他跟隨了或者應當跟隨列寧走，相反地，倒是列寧不得不跟隨布哈林走。

同志們，你們不認爲這是可能的嗎？那末，請再往下聽吧。一九一六年發生這些爭論後過了九年（在這九年當中布哈林一直保持着緘默），列寧逝世後過了一年，即在一九二五年，布哈林在『法權革命』文集上發表了從前『社會民主黨人文集』（乙）編輯部（即列寧）所未予發表的『論帝國主義國家理

論」一文。布哈林在這篇文章的註釋中公然聲稱：在這次爭論中對的不是列寧，而是他布哈林。同志們，這看來似乎令人難以相信，但這是事實。

請聽這個註釋的原文吧：

『弗·伊·(即列寧)發表了一篇短評來反對「青年國際」雜誌上的那篇文章。讀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並沒有錯誤，那個錯誤是硬加在我頭上的，因為我清楚地看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從伊里奇的短評中可以看出，他當時對關於「炸毀」國家(當然是資產階級國家)的原理的看法是不正確的，他把這個問題和無產階級專政消亡的問題混淆起來了。也許我當時應當更多地發揮專政的問題。但我所能為自己辯護的，就是當時社會民主黨人普遍頌揚資產階級國家，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炸毀這個機器的問題上了。

當我從美國回到俄國遇見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的時候(這是在我們秘密舉行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當時弗·伊·隱藏起來了)，她的第一句話就是：「弗·伊·要我轉告你，在國家問題上他現在和你沒有意見分歧了。」伊里奇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關於「炸毀」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但是他把這個問題，後來又把專政學說發展到了這種程度，以致在這方面的理論思想發展中開闢了整整一個時代。』

⊙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列寧逝世後過了一年，布哈林就是這樣議論列寧的。

你看，這就是沒有學成的理論家的過分妄自尊大的標本！

很可能，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真的向布哈林說過布哈林在這裏所寫的話。但是由此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由此只應當得出一個結論：列寧有某些根據認為布哈林放棄了或準備放棄自己的錯誤。僅此而已。可是布哈林却另有想法。他認定：從今以後，應當被看做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創始者或者至少是提倡者的不是列寧，而是他布哈林。

我們一向認為而且現在仍然認為我們是列寧主義者。而現在看來，列寧和我們（他的學生）都是布哈林主義者。同志們，真是有點好笑。可是，既然遇到了布哈林的這種狂妄自大，那有什麼辦法呢。

也許有人以為布哈林在他上述文章的註釋中不過是偶而失言，他說了蠢話，後來就忘了。但這種想法原來是不對的。布哈林說這些話原來是十分認真的。這就從下面的事實中也可以看得出來：布哈林在這個註釋中所做的關於列寧錯誤而布哈林正確的聲明，在不久以前，就是在一九二七年，即在布哈林第一次攻擊列寧後過了兩年，又在馬列茨基所寫的布哈林傳略中發表了，而布哈林連想都沒有想到要抗議馬列茨基的這種……大膽行爲。很明顯，布哈林反對列寧的言行決不能認為是偶然的。

這樣說來，對的是布哈林，而不是列寧；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提倡者不是列寧，而是布哈林。

同志們，布哈林的理論偏見和理論野心就是這樣。

儘管如此，這個人在這裏演說時卻還有勇氣說我們黨的理論觀點中『有某種東西腐朽了』，說我們黨的理論觀點中有托洛茨基主義傾向！

說這種話的就是這個布哈林，就是這個在理論上和實踐中現在犯了（過去也犯過）許多極嚴重的錯誤，不久以前還是托洛茨基的門生，昨天還企圖和托洛茨基分子結成聯盟反對列寧主義者，還跑去和他們暗中勾結的布哈林！

同志們，這難道不可笑嗎？

八、五年計劃還是兩年計劃

現在讓我來談談李可夫的演說。布哈林曾經企圖給右傾提供理論根據，而李可夫在他的演說中竭力想為這件事情打下實際建議的基礎，拿我國農業方面的困難的『可怕景象』來嚇唬我們。這並不是說，李可夫沒有涉及理論問題。不，他是涉及理論問題的。可是，他涉及理論問題的時候，至少犯了兩個嚴重錯誤。

李可夫在他那個被政治局委員會否決了的關於五年計劃的決議草案中說，『五年計劃的中心思想在於國民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雖然政治局委員會否決了這個完全不正確的觀點，但是李可夫在這裏演說時仍然為這個觀點辯護。

蘇維埃國家五年計劃的中心思想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話對不對呢？不，不對。我們需要的並不是國民勞動生產率的任何一種增長。我們需要的是國民勞動生產率的一定的增長，即能够保證國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一貫比資本主義成分佔優勢的增長。五年計劃如果忘記了這個中心思想，就不是五年計劃，而是五年胡說了。

任何一個社會，無論資本主義社會或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都關心勞動生產率的一般增長。蘇維埃社會和其他任何社會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它所關心的不是勞動生產率的任何一種增長，而是能够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比其他經濟形式首先比資本主義經濟形式佔優勢，因而能够保證戰勝和排擠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那種增長。可是，李可夫忘記了蘇維埃社會發展的五年計劃的這個真正的中心思想。這是他的第一個理論錯誤。

他的第二個錯誤在於他看不見或者不願意了解集體農莊和任何個體經濟（包括資本主義個體經濟在內）在商品流轉方面的差別。李可夫斷言，從糧食市場上的商品流轉方面看來，從取得糧食方面看來，他認為集體農莊和糧食私有者之間沒有差別，所以在他看來，我們向集體農莊，向糧食私有者還是向阿根廷的某個糧商買糧食，反正都是一樣。這是完全不對的。這是重複人所共知的弗魯姆金的論調，弗魯姆金有一個時候曾經斷言，在他看來，無論在什麼地方和無論向什麼人買糧食，向私有者還是向集體農莊買糧食，反正都是一樣。

這是用偽裝形式爲富農在糧食市場上的陰謀詭計辯護、辯解和辯白。雖然這種辯護是從商品流

轉的觀點上進行的，但是這並不能改變事情的真相，這终究是為富農在糧食市場上的陰謀詭計做辯護。如果從商品流轉方面看來集體經濟形式和非集體經濟形式之間沒有差別，那末是否還值得去發展集體農莊，是否還值得給它們優待，是否還值得去執行戰勝農業中的資本主義分子這一困難任務呢？顯然，李可夫採取了不正確的觀點。這是他的第二個理論錯誤。

這些不過是順便提一提。現在來談談李可夫在演說中提出的實際問題。

李可夫在這裏斷定說，除了五年計劃以外，還需要有另外一個平行的計劃，即發展農業的兩年計劃。他以農業方面的困難作為提出這個平行的兩年計劃的根據。他說，五年計劃是一件好事，他贊成這個計劃，但是如果我們同時還提出一個農業的兩年計劃，那就更好了，否則農業就會停滯不前。

從表面上看，這個提議似乎沒有任何壞處。但是如果仔細地看一看，那就可以看出：想出農業的兩年計劃是為強調五年計劃具有不現實的、紙上空文的性質。我們能不能同意這一點呢？不，不能。我們對李可夫說過：如果你在農業方面不滿意五年計劃，如果你認為五年計劃所規定的用於發展農業的撥款不夠，那就請你直率地說出你的補充建議，說出你的追加投資額，我們同意把農業方面的這些追加投資額加進五年計劃。結果怎樣呢？原來李可夫並沒有任何關於農業追加投資的補充建議。試問，究竟為什麼需要平行的農業兩年計劃呢？

其次，我們對他說過：除了五年計劃以外，還有年度計劃，這是五年計劃的一部分。我們可以把你在發展農業方面的那些具體的補充建議加進頭兩年的年度計劃，如果你真的有這種建議的話。結

果怎樣呢？原來李可夫並不想提出這種具體的追加撥款的計劃。

於是我們明白了：李可夫提出兩年計劃不是爲了發展農業，而是想強調五年計劃具有不現實的、紙上空文的性質，想破壞五年計劃的威信。爲了安慰『心靈』，爲了裝飾門面，就需要五年計劃；爲了行動，爲了進行實際工作，就需要兩年計劃，——這就是李可夫的戰略。李可夫提出兩年計劃，是爲了以後在五年計劃實際執行過程中拿兩年計劃來和五年計劃對立，改編五年計劃，使五年計劃遷就兩年計劃，削減工業撥款。

就是根據這些理由，我們否決了李可夫關於平行的兩年計劃的建議。

九、播種面積問題

李可夫在這裏嚇唬黨，斷言蘇聯的播種面積有不斷縮小的趨勢。同時他向黨暗示，播種面積的縮小應當歸咎於黨的政策。他沒有公開說我們的農業正在走向退化。但是他的演說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我們有某種類似退化的現象。

播種面積有不斷縮小的趨勢，這樣說對不對呢？不，不對。李可夫在這裏利用的是全國播種面積的平均數。但是使用平均數的方法如果不用按地區統計的材料加以校正，那就不能認爲是科學的方法。

也許李可夫曾經讀過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果他讀過，他就應當記得列寧在那本書

中怎樣責罵那些在估計播種面積的增長時採用平均數的方法而忽視按地區統計的材料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真奇怪，李可夫現在竟重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錯誤。如果按地區觀察播種面積的變動情形，就是說，如果科學地對待問題，那就可以看出，一些地區的播種面積在不斷增加，另一些地區的播種面積有時縮減（主要是受氣候條件的影響），但是沒有材料可以證明我國有什麼地方，哪怕只是一個重要的產糧區，播種面積在不斷縮小。

的確，在遭受霜災或旱災的地區，例如在烏克蘭的某些地區，播種面積最近有縮小的現象……

喊聲：並不是整個烏克蘭。

施里赫特爾：烏克蘭的播種面積增加了百分之二點七。

斯大林：我指的是烏克蘭的草原地帶。但是在其他沒有受到不良氣候條件影響的地區，例如在西伯利亞、伏爾加河流域、哈薩克斯坦和巴什基里亞，播種面積是不斷增加的。

爲什麼有些地區的播種面積不斷增加，而另一些地區的播種面積有時縮小呢？實際上，不能武斷地說黨的政策在烏克蘭是一種，而在蘇聯的東部或中部是另一種。同志們，這是胡說八道。很明顯，氣候條件在這裏有着相當重要的意義。

是的，富農縮小播種面積並不是由於氣候條件的影響。這也許應當「歸咎於」黨的幫助貧農和中農羣衆反對富農的政策。但是由此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難道我們什麼時候答應過實行一種能使農村所有的社會集團（包括富農在內）都滿意的政策嗎？而且一般說來，如果我們還想實行馬克思主義

的政策，那末難道我們能够實行一種既使剝削者滿意又使被剝削者滿意的政策嗎？如果由於我們實行了列寧的旨在限制和戰勝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富農開始部分地縮小他們的播種面積，這又有什麼特別呢？難道還能不能不是這樣嗎？

也許這個政策不正確，——那末請直截了當地向我們說。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竟因爲富農部分地縮小播種面積而驚惶起來，硬說這是一般播種面積的縮小，忘記了除富農以外還有貧農和中農，他們的播種面積正在擴大，忘記了還有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它們的播種面積正在加速增加，這不是很奇怪嗎？

最後，在李可夫的演說中，關於播種面積問題還有一個不正確的地方。李可夫在這裏抱怨說，在某些地方，即在集體農莊最發展的地方，貧農和中農的個人耕地開始縮小了。這是事實。但這有什麼不好呢？又怎能不是這樣呢？既然貧農和中農開始拋棄個人耕地而轉上集體經濟，那末集體農莊的擴大和增多就必然會引起貧農和中農個人耕地的縮小，這難道還不明顯嗎？而你想要怎樣呢？

現在集體農莊有二百多萬公頃土地。到五年計劃結束的時候，集體農莊將要有二千五百萬公頃以上的土地。集體農莊的耕地靠吸收誰的耕地來擴大呢？靠吸收貧農和中農的個人耕地。而你想要怎樣呢？否則又怎樣把貧農和中農的個體經濟引上集體經濟的軌道呢？在許多地區，集體農莊的耕地將要靠吸收個人耕地增加起來，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真奇怪，有人竟不願意了解這些簡單的道理。

一〇、糧食收購問題

關於我們在糧食方面的困難，有人在這裏說了一大堆荒唐話。但是，他們把我們在糧食方面發生暫時性的困難的主要因素忽略過去了。

他們首先忘記了今年我們收穫的黑麥和小麥（我說的是總收穫量）大約比去年少五億至六億普特。這能够不影響到我們的糧食收購嗎？當然不能不影響到。

也許這應當歸咎於中央的政策吧？不，這同中央的政策毫不相干。這是由於烏克蘭草原地帶發生嚴重歉收（霜災和旱災）和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區、西北區發生部分歉收的緣故。

主要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去年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我們在烏克蘭收購了二億普特糧食（黑麥和小麥），而今年只收購了二千六百萬至二千七百萬普特。

同樣也是由於這個原因，小麥和黑麥的收購量在中央黑土區幾乎減少了八分之七，在北高加索幾乎減少了四分之三。

今年在東部某些地區內，糧食收購量幾乎增加了一倍。但是，這不能補足當然也沒有補足我們在烏克蘭、北高加索和中央黑土區少購的數字。

不應當忘記，在收成正常的情况下，在烏克蘭和北高加索收購的糧食約為全蘇聯收購的全部糧食的一半。

真奇怪，李可夫竟把這個情況忽略過去了。

最後，還有第二種情況也是我們在糧食收購方面發生暫時性的困難的主要因素。我指的是農村富農分子對蘇維埃政權的糧食收購政策的反抗。李可夫迴避了這個情況。但是迴避這個因素，就是迴避糧食收購工作中的主要問題。最近兩年來的糧食收購經驗說明什麼呢？它說明手裏有很多餘糧並在糧食市場上起重要作用的農村富裕階層不願意按照蘇維埃政權規定的價格自願地把必要數量的糧食賣給我們。爲了保證城市、工業區、紅軍和技術作物區的用糧，我們每年大約需要五億普特糧食。用自流的方法，我們大約能收購三億至三億五千萬普特。其餘的一億五千萬普特就不得不用有組織地對農村富農階層和富裕階層施加壓力的方法來取得。這就是最近兩年來的糧食收購經驗向我們說明的問題。

最近兩年來發生了什麼變化，這些變化是從哪裏來的，爲什麼自流的方法從前有成效，而現在已經不行了呢？發生的變化是：近幾年來富農和富裕分子成長起來了，幾年的豐收對他們發生了作用，他們在經濟上鞏固了，積蓄了一些資本，因此，他們現在能够在市場上玩弄手腕，把餘糧囤積起來等待高價，而依靠其他農產品來周轉。

決不能把糧食看做普通商品。糧食不是棉花，棉花是不能吃的，也不是任何人都買的。糧食和棉花不同，在我們現在的條件下，它是人人都買而且沒有它就不能生存的一種商品。富農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們把糧食囤積起來，並以此感染了一般的糧食持有者。富農知道糧食是寶中之寶。富農知

道餘糧不僅是他們發財致富的手段，而且是盤剝貧農的手段。在目前情況下，富農手裏的餘糧是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加強富農分子的手段。因此，我們從富農手裏取得這些餘糧，不僅有助於城市和紅軍的糧食供應，而且能打破這種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加強富農階級的手段。

要取得這些餘糧，必須做些什麼呢？首先必須消除有害和危險的自流心理。必須組織糧食收購工作。必須發動貧農和中農羣衆反對富農，組織他們共同支持蘇維埃政權加強糧食收購工作的措施。烏拉爾和西伯利亞按照捐獻原則實行的糧食收購方法，其意義就在於它能發動農村勞動階層反對富農以加強糧食收購工作。經驗表明，這個方法能使我們獲得良好的結果。經驗表明，這些良好的結果表現在兩方面：第一、我們取得了農村富裕階層的餘糧，從而有助於國家的糧食供應；第二、我們在這件事情上發動了貧農和中農羣衆反對富農，在政治上教育他們，把他們組織成爲我們在農村中的一支強大的千百萬人的政治軍隊。有些同志沒有注意到這後一種情況。然而這後一種情況正是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糧食收購方法的重要結果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結果。

固然，這種方法有時候同對富農採取非常措施的辦法結合起來了，於是引起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可笑的號叫。但這有什麼不好呢？爲什麼不能在某些時候，在一定的條件下對我們的階級敵人即富農採取非常措施呢？爲什麼在城市裏可以成百地逮捕投機分子，把他們放逐到土魯漢斯克邊區去，而對於那些進行糧食投機活動、企圖扼殺蘇維埃政權並盤剝貧農的富農，就不能用社會強制的方法，按照貧農和中農賣給我們收購機關糧食的價格去收購他們的餘糧呢？這是從哪裏得出來的結論呢？

難道我們黨曾經表示過在原則上反對對投機分子和富農採取非常措施嗎？難道我們沒有對付投機分子的法律嗎？

看來，李可夫和布哈林主張在原則上反對對富農採取任何非常措施。但是要知道，這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政策，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策。你們不會不知道，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施行以後甚至主張恢復貧農委員會政策——當然是在一定的條件下。那末對富農部分地採取非常措施又算得什麼呢？這和貧農委員會政策比較起來，甚至算不得滄海一粟。

他們布哈林集團的擁護者希望說服階級敵人自願放棄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餘糧自願賣給我們。他們希望那些已經成長起來、進行着投機活動並且有可能依靠其他農產品來玩弄手腕而把餘糧藏起來的富農按照我們的收購價格自願把自己的餘糧賣給我們。他們不是瘋了嗎？他們不了解階級鬥爭的訣竅，不知道什麼是階級，這不是很明顯嗎？

他們不是知道在爲加強糧食收購工作而召開的村民大會上，富農怎樣嘲弄我們的工作人員和蘇維埃政權呢？他們不是知道這樣的事實，例如在哈薩克斯坦，我們的鼓動員花了兩個鐘頭勸說糧食持有者把糧食拿出來供應國家，可是富農口裏咬着煙斗走出來回答說：『小伙子，你跳個舞，我就給你兩普特糧食。』

喊聲：混蛋！

斯大林：你們試試說服這樣的人吧。

是的，同志們，階級就是階級。誰也逃不出這個真理。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方法的好處其實就在於它能够幫助我們發動貧農和中農階層去反對富農，它能够幫助我們擊破富農的反抗，強迫他們把餘糧交給蘇維埃政權機關。

目前在布哈林集團中最時髦的字眼就是糧食收購工作中的「過火行爲」。這個字眼在他們那裏是最暢銷的貨物，因為它能够幫助他們掩蓋他們的機會主義路線。當他們想掩蓋自己的路線時，他們通常總是說：我們當然不反對對富農施加壓力，可是，我們反對在這方面所發生的觸及中農的過火行爲。接着他們就敘述這些過火行爲的『可怕景象』，宣讀『農民』的來信，宣讀馬爾柯夫一類同志的張皇失措的信，然後就做出結論：必須取消對富農施加壓力的政策。

請看：因為在實行正確的政策中有過火行爲，所以就必須取消這個正確的政策。機會主義者慣用的手段就是：藉口在實行正確的路綫中有過火行爲，就來取消這條路綫，用機會主義的路綫來代替它。同時，布哈林集團的擁護者處心積慮地保持緘默，絕口不提還存在着另一種過火行爲，更危險和更有害的過火行爲，即同富農結合，遷就農村富裕階層，用右傾分子的機會主義政策來代替黨的革命政策。

當然，我們大家都反對這些過火行爲。我們大家都反對對富農的打擊觸及中農。這是很明顯的，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但是，我們堅決反對用布哈林集團所熱心使用的那套關於過火行爲的廢話來取消我們黨的革命政策，用布哈林集團的機會主義政策來代替我們黨的革命政策。不，他們這套把戲

是騙不了人的。

請你們說一說，黨的哪一個政治措施在實行中沒有發生過某種過火行爲。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必須反對過火行爲。但是，難道可以根據這一點來斥責唯一正確的路綫本身嗎？

就拿實行七小時工作制這樣的措施來說吧。毫無疑問，這個措施是我們黨最近所實行的最革命的措施之一。誰不知道，我們實行這個實質上具有深刻的革命意義的措施時常常發生許多過火行爲，有時是最可惡的過火行爲呢？這是不是說，我們應當取消實行七小時工作制的政策呢？

布哈林反對派的擁護者是不是知道，他們拿糧食收購工作中的過火行爲做王牌，是滾到什麼樣的泥坑裏去了呢？

一一、外匯後備和糧食輸入問題

最後，略爲談談糧食輸入和外匯後備問題。我已經說過，李可夫和他的最親密的朋友曾經屢次提出從國外輸入糧食的問題。李可夫起初說必須輸入八千萬至一億普特糧食。這大約需要兩億盧布的外匯。後來他提出輸入五千萬普特，即價值一億盧布外匯的糧食的問題。我們否決了這種做法，認定對富農施加壓力，取得他們握有的大批餘糧，要比花費準備用來輸入我國工業設備的外匯好些。

現在李可夫改變了戰綫。現在他硬說資本家要貸給我們糧食，而我們似乎不想接受。他說，從經過他的手的那個電報中可以看出，資本家願意貸給我們糧食。同時他把事情說成這樣：似乎我們這

裏有這樣的人，或者由於任性，或者由於其他某種不可理解的原因而不願意接受貸給我們的糧食。

同志們，這都是胡說。如果以爲西方的資本家突然憐憫起我們來，願意幾乎白白地或者長期地貸給我們幾千萬普特糧食，那就可笑了。同志們，這是胡說。

那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各種不同的資本家集團想摸我們的底，想試探我們的財政力量、我們的支付能力、我們的堅定性已經有半年了。他們找我國駐巴黎、捷克斯洛伐克、美國和阿根廷的商務代表，答應以三個月或最多六個月的最短期的信貸方式賣給我們糧食。他們要達到的與其說是想以信貸方式賣給我們糧食，不如說是想探知我們的情況是否真的困難，我們的財政力量是否真的已經枯竭，我們的財政狀況是否穩固，我們是否會上他們的鉤。

目前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對於我國的財政力量爭論得很厲害。有些人說，我們已經破產，蘇維埃政權的垮台即使不是幾星期的事，也只是幾個月的事了。另外一些人說，這話不對，蘇維埃政權很穩固，它有財政力量和足夠的糧食。

現在的任務在於我們要表現出應有的堅定性和剛毅性，不要理睬關於貸給我們糧食的虛偽諾言，要向資本主義世界表明：我們不輸入糧食也行。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意見。這是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的意見。

根據這個理由，我們決定拒絕南森之類的各種慈善家關於以信貸方式輸入蘇聯一百萬美元糧食的建議。

根據同一理由，我們對巴黎、美國、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這些資本主義世界的偵探關於貸給我們少量糧食的建議給了否定的回答。

根據同一理由，我們決定在糧食消費方面實行最嚴格的節約，在糧食收購方面發揮最高度的組織性。

我們這樣做是想達到兩個目的：一方面避免輸入糧食，保存外匯以輸入工業設備；另一方面向我們的一切敵人表明，我們穩固地屹立着，我們不打算理睬小恩小惠的諾言。

這樣的政策是否正確呢？我認爲它是唯一正確的政策。它所以正確，不僅是因爲我們在這裏，在我國內部發現了取得糧食的新的可能性。它所以正確，還因爲我們既然避免了輸入糧食，既然拋開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偵探，我們就鞏固了自己的國際地位，提高了自己的支付能力，並徹底粉碎了關於蘇維埃政權『即將滅亡』的胡說。

前幾天，我們和德國資本家的代表們進行了幾次初步談判。他們答應給我們五億貸款，並且事情看來是這樣的：他們爲了保證自己的工業得到蘇聯的定貨，的確認爲給我們這筆貸款是必要的。

前幾天，英國保守黨代表團來到我國，他們爲了保證自己得到蘇聯的工業定貨，也認爲確認蘇維埃政權的鞏固是必需的，給我們貸款是適當的。

我想，如果我們沒有表現出我在上面說過的那種必要的堅定性，我們就不會有這些新的可能性，就不能首先從德國人方面，隨後又從一部分英國資本家方面得到貸款。

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我們似乎因爲任性而拒絕接受以想像中的長期信貸方式貸給我們的想像中的糧食。問題在於要識破我們敵人的面目，識破他們的真正意圖，並表現出爲鞏固我國國際地位所必需的剛毅性。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拒絕輸入糧食的原因。

由此可見，糧食輸入問題並不像李可夫在這裏所說的那樣簡單。糧食輸入問題是我國的國際地位問題。

五 黨的領導問題

這樣，我們就分析了我們在理論方面以及在我們黨對共產國際的政策和對內政策方面發生意見分歧的一切主要問題。從上面所說的可以看出，李可夫說我們有一致的路綫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從上面所說的可以看出，實際上我們有兩條路綫。一條是黨的總路綫，是我們黨的革命的列寧路綫。另一條是布哈林集團的路綫。這第二條路綫還沒有完全形成，一方面是因爲在布哈林集團中有想像不到的糊塗觀點，另一方面是因爲這第二條路綫在黨內的勢力很小，於是總想用某種方法僞裝起來。但是你們可以看出，這條路綫還是存在着，而且是一條同黨的路綫不同的路綫，是一條幾乎在我們政策的一切問題上都同黨的總路綫對立的路綫。這第二條路綫是右傾的路綫。

現在來談談黨的領導問題。

一、布哈林集團的派別活動問題

布哈林說我們黨內沒有反對派，說布哈林集團不是反對派。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從全會的爭論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布哈林集團是新反對派。這個集團的反黨活動在於它企圖修正黨的路綫，它企圖修改黨的路綫，並準備條件使另一條路綫即反對派的路綫（它只能是右傾的路綫）代替黨的路綫。

布哈林說三人團不是派別集團。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布哈林集團含有派別活動的一切因素。這裏既有政綱，又有派別性的小圈子，既有辭職政策，又有反對中央的有組織的鬥爭。還需要什麼呢？既然布哈林集團的派別活動的真相已經昭然若揭，為什麼還要隱瞞呢？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舉行聯席全會，就是爲了在這裏說出我們意見分歧的全部真相。真相就是布哈林集團是派別集團。而且這不是普通的派別集團，我可以說它是我們黨內有過的一切派別集團中最討厭最愛吹毛求疵的派別集團。

這就從他們現在企圖利用阿札里亞騷動這種微不足道的小事來達到他們的派別目的這一點也看得出來。其實，這個所謂阿札里亞『暴動』同喀琅施塔得暴動那樣的暴動比較起來算得什麼呢？我認爲，和這種暴動比較起來，所謂阿札里亞『暴動』甚至算不得滄海一粟。是否有過托洛茨基分子或季

諾維也夫分子企圖利用這種嚴重的喀琅施塔得暴動來反對中央、反對黨的事情呢？同志們，應該承認，不曾有過這樣的事情。相反地，在發生這種嚴重暴動的時期，存在於我們黨內的一些反對派集團都會經幫助黨來鎮壓暴動，不敢利用暴動來反對黨。

而現在布哈林集團是怎樣做的呢？你們已經有機會看到，他們企圖最卑鄙最無恥地利用這個極小的阿札里亞『暴動』來反對黨。這不是極端嚴重的由派別活動造成的頭昏眼花和吹毛求疵，又是什麼呢？

看來，他們要求我們做到在和資本主義國家接壤的邊疆地區不發生騷動事件。看來，他們要求我們實行一種能使我們社會中的一切階級，使富人和窮人，使工人和資本家都感到滿意的政策。看來，他們要求我們做到在我們這裏沒有不滿分子。布哈林集團中的這些同志不是瘋了嗎？

怎麼能要求我們這些和國內外資本主義世界作鬥爭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做到在我們國內沒有不滿分子，在和敵視我們的國家接壤的某些邊疆地區不會偶而發生騷動事件呢？資本主義包圍的存在，如果不是爲了使國際資本能竭盡全力在我國邊疆地區組織我國不滿分子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發動，那又是爲了什麼呢？除了頭腦簡單的自由主義者以外，還有誰會向我們提出這樣的要求呢？派別性的吹毛求疵有時能把人弄到自由主義者的盲目無知和目光短淺的地步，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二、忠順和集體領導問題

李可夫在這裏斷言，布哈林對我們黨中央來說是最『無可責難』和最『忠順』的黨員之一。

請允許我對這一點表示懷疑。我們不能相信李可夫的話。我們需要事實。李可夫却拿不出事實來。

例如拿布哈林同那個和托洛茨基分子有聯系的加米涅夫集團進行幕後談判，即進行關於組織派別聯盟、改變中央政策、更換政治局委員、利用糧食收購危機反對中央的談判來說吧。試問，布哈林對自己中央的『忠順』和『無可責難』究竟在哪裏呢？

相反地，這不就是一個政治局委員完全違反對自己的中央、對自己的黨的忠順態度嗎？如果這叫做對中央的忠順態度，那末什麼叫做對自己的中央的背叛行為呢？

布哈林愛說忠順，愛說老實，但是爲什麼他不想看看自己，問問自己：他和托洛茨基分子進行幕後談判反對自己的中央，因而背叛了自己的中央，是不是最不老實地違反了忠順於自己的中央的起碼要求呢？

布哈林在這裏說黨中央缺乏集體領導，並且要我們相信，是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委員違反了集體領導的要求。

當然，我們的全會對一切都能容忍。它也可以容忍布哈林的這些厚顏無恥的假仁假義的話。但是只有真正不知羞恥的人才敢於在全會上這樣反對大多數中央委員。

事實上，既然大多數中央委員都駕上國家的大車，盡一切力量向前拉，請求布哈林集團在這項艱

難的事業中幫幫忙，而布哈林集團不但不幫助自己的中央，反而千方百計地加以阻礙，把棍子投到車輪下，以辭職相威脅，並和黨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商量反對我們黨中央，那末在這裏還談得上什麼集體領導呢？

除了偽君子以外，還有誰能否認，和托洛茨基分子建立反黨聯盟而背叛自己中央的布哈林，不願意而且不會在我們黨中央委員會中實行集體領導呢？

除了瞎子以外，還有誰能看不見，布哈林總是空談中央的集體領導，指摘大多數中央委員，是爲了以此掩蓋自己的叛變立場呢？

應當指出，布哈林違反忠順於黨中央的起碼要求和黨中央集體領導的起碼要求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例子：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當列寧還在世的時候，布哈林在和約問題上處於少數地位後就跑到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那裏，跑到我們黨的敵人那裏，和他們進行幕後談判，企圖和他們結成聯盟來反對列寧和中央。當時他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談了些什麼，可惜我們還不知道（*См.*）。但是我們知道，當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打算逮捕列寧並舉行反蘇維埃政變……然而最奇怪的：布哈林一方面跑到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那裏和他們串通一氣進行反對中央的秘密活動，一方面却繼續叫喊（也像現在這樣）必須實行集體領導。

此外，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有過這樣的例子：當列寧還在世的時候，布哈林在我們黨的莫斯科區域委員會中擁有多數並得到『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支持時竟號召全體黨員表示不信任黨中央、拒絕

服從黨中央並提出我們黨內的分裂問題。這是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在中央已經通過必須接受布列斯特和約條件的決議以後的事情。

布哈林的忠順和集體領導就是這樣。

李可夫在這裏說必須實行集體工作。同時他指出他和他的最親密的朋友主張集體工作，這樣也就是暗指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是反對集體工作的。但是，李可夫沒有舉出一個事實來證實自己的話。爲了揭穿李可夫的這種無稽之談，讓我舉出幾個事實，幾個例子，來說明李可夫是怎樣實行集體工作的。

第一個例子：你們都知道向美國輸出黃金的事情。也許你們中間有許多人以爲黃金是根據人民委員會或中央的決定，或者是得到中央的同意，或者是通知中央之後向美國輸出的。但是，同志們，事實不是這樣。中央和人民委員會同這件事情毫無關係。我們有一個非經中央批准不得輸出黃金的決議。但是這個決議被違反了。究竟是誰准許輸出黃金的呢？原來是李可夫的一個代理人通知李可夫並得到他的同意之後准許輸出黃金的。

這是什麼，是集體工作嗎？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和美國一家私營大銀行談判的問題。這家銀行的財產在十月革命後被收歸國有，現在它要求賠償損失。中央已經得悉，我們國家銀行的代表正在和這家銀行談判賠償它的損失的條件。

你們知道，賠償私人損失問題是同我國對外政策有直接關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許有人以為這個談判是得到人民委員會或中央的准許進行的。但是，同志們，事實不是這樣。中央和人民委員會同這件事情毫無關係。後來，中央得悉這個談判之後，決定停止談判。這裏就產生一個問題：是誰批准這個談判的呢？原來是李可夫的一個代理人通知李可夫並得到他的同意之後批准這個談判的。

這是什麼，是集體工作嗎？

第三個例子：是關於供應富農和中農農業機器的問題。事情是這樣：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經濟委員會（ЦЭ）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李可夫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一個代理人）決定減少對中農的農業機器供應，增加對農村上層階層即富農的機器供應。請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經濟委員會的這個反黨反蘇維埃的決議原文：

『在哈薩克和巴什基里亞兩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西伯利亞邊區和下伏爾加邊區、伏爾加中游區和烏拉爾區，本條指出的農業機器和農具的銷售百分數，對農村上層階層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對中農階層降低到百分之三十。』

請看：在黨加緊向富農進攻並組織貧農和中農羣衆反對富農階級的時期，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經濟委員會却通過了關於降低對中農的機器供應額和提高對農村上層階層的供應額的決議。

這就叫做列寧的共產主義政策！

後來，中央知道了這件怪事之後，撤銷了經濟委員會的決議。但是，是誰批准這個反蘇維埃決議的呢？是李可夫的一個代理人通知李可夫並得到他的同意之後批准這個決議的。

這是什麼，是集體工作嗎？

看來，這些例子儘够說明李可夫和他的代理人是怎樣實行集體工作的了。

三、反右傾鬥爭問題

布哈林說，被我們黨的組織『惡意攻擊』（用他的話說）的三個政治局委員受到了『公民死刑』^①。他說，黨在報刊和會議上批評三個政治局委員即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錯誤，是使他們受到了『公民死刑』，而他們這三個政治局委員却『不得不』默不作聲。

同志們，這都是胡說。這是企圖削弱黨的反右傾鬥爭的一種自由主義化的共產黨員的謊話。在布哈林看來，如果他和他的朋友犯了右傾錯誤，那末黨沒有權利揭露這些錯誤，黨應該停止反右傾的鬥爭，等待布哈林和他的朋友自願地放棄自己的錯誤。

布哈林對我們的要求豈不是太多了嗎？他是否以爲黨是爲他而存在，不是他爲黨而存在呢？當全黨都動員起來反對右傾並向困難進行堅決攻擊的時候，誰強迫他默不作聲，靜坐不動呢？爲什麼他布哈林和他的最親密的朋友現在不出來進行堅決鬥爭去反對右傾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呢？如果布哈林和他的最親密的朋友決定採取這個並不怎麼困難的步驟，黨是會歡迎他們的，這一點難道有誰

會懷疑嗎？究竟爲什麼他們不決定採取這個他們終究必須採取的步驟呢？是不是因爲他們把自己集團的利益擺在黨和黨的總路綫的利益之上呢？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沒有參加反右傾的鬥爭，這究竟應該怪誰呢？關於三個政治局委員受到『公民死刑』的那些話，是這三個政治局委員想強迫黨默不作聲並停止反右傾鬥爭的一種掩飾得很拙劣的企圖，這不是很明顯嗎？

決不能把反右傾的鬥爭看做我們黨的次要任務。反右傾的鬥爭是我們黨的決定性的任務之一。如果我們在自己的隊伍裏，在自己的黨內，在領導運動和引導無產階級前進的無產階級政治參謀部裏，容許右傾分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動，而右傾分子正在企圖渙散黨，瓦解工人階級，使我們的政策適合『蘇維埃』資產階級的口味，從而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面前低頭，——如果我們容許這一切，那末這將意味着什麼呢？這豈不是意味着我們準備逐漸消滅革命，瓦解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逃避困難，把陣地讓給資本主義分子嗎？

布哈林集團是否懂得，拒絕和右傾作鬥爭就是背叛工人階級，背叛革命呢？

布哈林集團是否懂得，不克服右傾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就不能克服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而克服這些困難，就不能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性勝利呢？

既然如此，那末所謂三個政治局委員受到『公民死刑』的可憐話還有什麼價值呢？

不，同志們，布哈林分子用自由主義者的所謂『公民死刑』的廢話是嚇不倒黨的。黨要求他們和我們黨的全體中央委員站在一個行列中同右傾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作堅決的鬥爭。黨要求布哈林集

團這樣做，是爲了有助於動員工人階級，擊破階級敵人的反抗並徹底克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或者布哈林分子執行黨的這個要求，那末黨就會歡迎他們；或者他們不這樣做，那末就讓他們自己去埋怨自己吧。

六 結 論

現在我來做結論。

我提出下列幾項建議：

(一) 首先應該斥責布哈林集團的觀點。應該斥責這個集團在它的宣言和它的代表的演說中所陳述的觀點，認定這些觀點是和黨的路綫不相容而和右傾的立場完全相符合的。

(二) 應該斥責布哈林和加米涅夫集團的幕後談判，認定這是布哈林集團不忠順和進行派別活動的最明顯的表現。

(三) 應該斥責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所實行的辭職政策，認定這是粗暴地違反了黨紀的起碼要求的。

(四) 應該撤銷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現任職務，並警告他們，如有不服從中央決議的絲毫企圖，中央將不得不取消他們的政治局委員的資格。

(五) 應該採取措施，使政治局各個委員和候補委員在會議上發言時不說出任何離開黨的路綫，離開中央和中央各機關的決議的話。

(六) 應該採取措施，使黨和蘇維埃的機關刊物，無論是報紙或雜誌，都完全執行黨的路綫和黨的各個領導機關的決議。

(七) 應該規定特別辦法（直至取消中央委員資格和開除出黨）來對付那些企圖洩漏黨、黨中央、黨政治局的決議的機密的人。

(八) 應該把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關於黨內問題的決議分發給各級地方黨組織和第十六次代表會議(三)的代表，這個決議暫時不在報刊上公佈。

在我看來，出路就是這樣。

有些同志堅持立即取消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資格。我不同意這些同志的意見。在我看來，現在不必採取這種極端辦法。

全文第一次刊印

① 克雷洛夫的寓言「隱士和熊」描寫熊爲隱士效勞，用大石頭驅除隱士頭上的蒼蠅，結果反把他打死。——譯者註

②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一一頁至第三一二頁。——譯者註

③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二二二頁。——譯者註

④ 一種侮辱性的假死刑。——譯者註

羣衆的競賽和勞動熱情的高漲

(葉·米庫林娜「羣衆的競賽」一書序言)

幾乎用不着懷疑，廣泛展開的千百萬工人羣衆的競賽，在目前我國建設中，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事實，也是最重要的事實之一。我們遼闊廣大的國家各個不同角落的整個整個工廠的競賽，工人和農民之間的競賽，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之間的競賽，這種羣衆性的生產上的互相呼應在勞動者的專門合同中固定下來，——所有這些事實都毫無疑問地表明，羣衆的社會主義競賽已經展開了。

勞動羣衆的強大的生產高潮開始了。

甚至最頑固的懷疑論者現在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了。

列寧說：「社會主義不僅不窒息競賽，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廣泛地、真正大規模地運用競賽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數的勞動者參加這樣一種使他們能够大顯身手，施展自己的本事，表現自己的天才的工作。天才在人民中間是取之不盡的，可是資本主義把這種天才成千上萬以至成百萬地壓抑、蹂躪和窒息了……」

「……只是現在，才廣泛地、真正大規模地創造了表現進取心、競賽和大胆首創精神的可

能……」因爲「千百年來都是爲別人勞動，爲剝削者做苦工，現在第一次有可能爲自己工作……」

「……現在當社會主義政府執政時，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組織競賽。」⁽¹²⁾
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會議關於競賽問題發出專門的告工人和勞動者書就是以列寧的這些論點爲根據的。

有些官僚主義的「同志」認爲競賽是布爾什維克的一種例行的時髦花樣，既然是時髦花樣，就一定會隨着「季節」的結束而消失。這些官僚主義的「同志」當然是錯了。實際上，競賽是在千百萬勞動羣衆最大積極性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方法。實際上，競賽是工人階級用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扭轉國家全部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槓桿。

另外一些官僚主義的「同志」被競賽的巨浪嚇倒了，他們企圖給競賽製造一個人爲的框子，把競賽加以限制，把競賽事業「集中」起來，縮小它的規模，從而去掉競賽中最重要東西——羣衆的主動性。不用說，官僚主義者的企圖是不會實現的。無論如何，黨是會採取一切辦法來粉碎這種企圖的。不能把社會主義競賽看做辦公室裏的事情。社會主義競賽是羣衆實事求是的革命的自我批評的表現，這種自我批評所依靠的是千百萬勞動者的創造主動性。凡是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壓制羣衆的這種自我批評和這種創造主動性的人，都應該作爲我們偉大事業的障礙而被丟在道旁。

官僚主義的危險首先具體地表現在它束縛羣衆的活力、主動性和自動精神，它埋沒蘊藏在我們

制度內部、工人階級和農民內部的巨大的後備力量，它不讓我們利用這些後備力量去同我們的階級敵人作鬥爭。社會主義競賽的任務在於粉碎這些官僚主義的束縛，為發揮羣衆的活力和創造主動性開闢廣闊的場所，發掘蘊藏在我們制度內部的巨大的後備力量，並把這些後備力量投入天平盤去同我們國內外的階級敵人作鬥爭。

有時人們把社會主義競賽和競爭混爲一談。這是很大的錯誤。社會主義競賽和競爭代表兩個完全不同的原則。

競爭的原則是：一些人的失敗和死亡，另一些人的勝利和統治。

社會主義競賽的原則是：先進者給予落後者以同志的幫助，從而達到普遍的提高。

競爭是：打敗落後者以確立自己的統治。

社會主義競賽是：一些人工作得不好，另一些人工作得好，再有一些人工作得更好，——趕上更好的，以達到普遍的提高。

其實這也就說明爲什麼社會主義競賽能使千百萬勞動羣衆表現出空前未有的生產熱情。不用說，競爭在任何時候都不能產生什麼類似這種羣衆熱情的東西。

近來我們的報刊上關於競賽的文章和報道越來越多了。人們說到競賽的哲學、競賽的根源、競賽的可能結果等等。但是很少能看到這樣的報道：比較連貫地描寫羣衆自己如何進行競賽，千百萬工人羣衆在實行競賽和簽訂合同的體驗如何，工人羣衆怎樣把競賽事業看做自己的切身事業。可是，

這一方面對我們來說正是競賽的極重要的一面。

我認爲葉·米庫林娜同志的小冊子是根據競賽的實際材料來連貫地敘述競賽是勞動羣衆自己的事情的初次嘗試。這本小冊子的價值在於它樸素而真實地敘述了構成社會主義競賽內部動力的那些偉大勞動高潮的深刻過程。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一日

載於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真理報】第一一四號

署名：約·斯大林

致費里克斯·康同志

(抄致中央委員會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省

分局書記柯洛齊洛夫同志)

康同志！

魯索娃同志對米庫林娜同志的小冊子（『羣衆的競賽』）的短評收到了。我對這件事情的意見是這樣：

（一）魯索娃同志的評論給人一種過於片面和偏頗的印象。我可以假定天地間沒有紡紗女工巴爾季娜，在查里雅吉耶也沒有紗廠。我也可以假定查里雅吉耶工廠「每周打掃一次」。可以認為，米庫林娜同志也許因為受了某個講述者的蒙蔽而寫了一些很不確實的東西，這當然是不好的和不可原諒的。但是難道問題在這裏嗎？難道這本小冊子的價值是由個別細節而不是由它的總的傾向決定的嗎？當代名作家蕭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靜靜的頓河』中寫了一些極為錯誤的東西，對塞爾佐夫、波德焦爾柯夫、克利沃什呂柯夫等人物做了簡直是不確實的介紹，但是難道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靜靜的頓河』是一本毫無用處的書，應該禁止出售嗎？

米庫林娜同志的小冊子的價值在什麼地方呢？在於它傳播了競賽的思想，以競賽的精神感染了讀者。最重要的就在這裏，而不在于個別細節上的錯誤。

(二) 也許因為我給米庫林娜同志的小冊子寫了一篇序言，批評家們就對這本小冊子抱了過高的、異乎尋常的希望，可是現在他們失望了，因此就決定懲罰這本小冊子的作者。但這是不正確的和不公平的。米庫林娜同志的小冊子當然不是科學著作。米庫林娜同志的小冊子是一本描述羣衆競賽情形，描述競賽實際情況的故事。僅僅如此而已。如果我的序言給她這本實質上很平常的小冊子造成了過高的評價，那末這不是米庫林娜同志的過錯。決不能因此以禁止出售這本小冊子來懲罰小冊子的作者以及它的讀者。禁止出售的只能是非蘇維埃傾向的作品，反黨反無產階級的作品。米庫林娜同志的小冊子裏沒有任何反黨的和非蘇維埃的東西。

(三) 魯索娃同志對於米庫林娜同志『蒙蔽斯大林同志』這一點特別憤慨。不能不珍視魯索娃同志在這件事情上對斯大林同志所表示的關懷。但是這種關懷在我看來是不必要的。

第一、『蒙蔽斯大林同志』並不那麼容易。

第二、我一點也不因為給一個在文壇上無名的人的一本平凡的小冊子寫序言而後悔，因為我認為米庫林娜同志的小冊子雖然有個別的也許是很大的錯誤，但是一定會使工人羣衆得到很大益處。

第三、我堅決反對只給文壇『要人』、文壇『名人』、『巨匠』等等的小冊子和書寫序言。我認為我們現在應當拋棄這種推崇本來已經被捧得很高的文壇『要人』的老爺習慣，由於這些『要人』的『偉

大』，我們的年輕的、不出名的、被大家遺忘了的文學力量正在呻吟叫苦。

在我們國家裏有成百成千有才能的年輕人，他們竭盡全力要從下面衝上來，以求把自己的微末貢獻投入我們建設事業的總寶庫。但是他們的努力往往是徒勞無益的，因為他們常常被文壇『名人』的自負、我們某些組織的官僚主義和冷酷無情以及同輩的嫉妒（它還沒有轉為競賽）壓抑下去。我們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打穿這堵死牆，使不可勝數的年輕力量得到出路。我所以給一個在文壇上無名的作者的一本平凡的小冊子寫序言，就是企圖在解決這個任務方面邁進一步。我今後也只給年輕力量中間普通的、無名的作者的普通的、不引人注意的小冊子寫序言。也許某些崇拜名位的人不喜歡這種做法。但是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呢？我根本就不喜歡崇拜名位的人……

（四）我認為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同志們應當把米庫林娜同志叫到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爲了她所犯的錯誤『揪她的耳朵』。我決不反對爲了米庫林娜同志的錯誤在報刊上好好地責罵她一頓。但是，我堅決反對把這個無疑是有才能的作家推下深淵，讓她埋沒。

至於禁止出售米庫林娜同志的小冊子，我認爲對這個粗暴的意見應該『不予處理』。
致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

第一次刊印

祝賀烏克蘭共產主義青年團建團十周年

值此烏克蘭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建團十周年之際，謹向在國內戰爭的戰鬥中受過考驗的、正在勝利地展開社會主義競賽並積極參加烏克蘭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烏克蘭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致熱烈的祝賀。

約·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於莫斯科

載於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

「真理報」第一五七號

在『紅色烏克蘭號』巡洋艦艦誌上的題詞

到過『紅色烏克蘭號』巡洋艦。出席了文娛晚會。

一般的印象是：一些傑出的人，爲了我們的共同事業準備獻出一切的又勇敢又有文化的同志。

和這樣的同志相處是愉快的。在這樣的戰士的隊伍裏和敵人鬥爭是愉快的。有這樣的同志是能够戰勝整個剝削者和壓迫者世界的。

『紅色烏克蘭號』的朋友們，祝你們成功！

約·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載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紅色黑海水兵報』（塞瓦斯托坡里）第二六〇號

大轉變的一年

(爲紀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而作)

過去的一年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條戰綫上發生大轉變的一年。這個轉變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社會主義向城鄉資本主義分子堅決進攻的標誌下進行的。這個進攻的特點在於它已經使我們在我國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建(改造)事業的各個主要方面取得了許多決定性的勝利。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黨在新經濟政策的最初階段適當地利用了我們的退却，以便在以後，在新經濟政策的下幾個階段組織轉變並向資本主義分子實行勝利的進攻。

列寧在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說過：

『我們現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後退，但是我們這樣做是爲了先後退幾步，然後再快跑，更有力量地向前跳。僅僅是在這樣一個條件下，我們才在施行我們的新經濟政策時向後退却……以便在退却之後開始極頑強地向前進攻。』(『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九九頁)

過去一年的總結毫無疑問地說明，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勝利地執行了列寧的這個極重要的指示。

*

*

*

如果拿過去一年對我們有決定意義的經濟建設方面的總結來看，那末我們在這條戰綫上進攻的勝利，我們過去一年的成就，可以歸結爲以下三個主要部分。

一 在勞動生產率方面

幾乎用不着懷疑，最近一年來我國建設中最重要的事實之一就是我們在勞動生產率方面達到了決定性的轉變。這個轉變表現於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綫上發揮了創造主動性，掀起了強大的勞動高潮。這是我們過去一年的第一個主要成就。

羣衆的創造主動性的發揮和勞動高潮的掀起是從以下三個主要方面促成的：

- (甲) 通過自我批評，反對束縛着羣衆勞動主動性和勞動積極性的官僚主義；
- (乙) 通過社會主義競賽，反對曠工和破壞無產階級勞動紀律的分子；
- (丙) 通過實行不斷生產制，反對生產中的守舊思想和因循習慣。

結果，我們在勞動戰綫上就取得了極大的成就，在我們這個遼闊廣大的國家的每個角落裏都呈現出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的勞動熱情和在勞動中的互相呼應。而這個成就的意義實在是無可估量的，因爲只有千百萬羣衆的勞動高潮和勞動熱情才能保證勞動生產率的不斷增長，如果沒有這種增長，社會主義在我國就不能最後戰勝資本主義。

列寧說：『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造成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徹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徹底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九四頁）

根據這一點，列寧認為：

『我們必須充滿勞動熱情、勞動意志和頑強精神，因為現在只有這樣才能最迅速地挽救工人和農民，挽救國民經濟。』（『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七四頁）

這就是列寧在黨面前提出的任務。

過去的一年表明，黨勝利地執行了這個任務，堅決地克服了這條道路上的困難。

黨在過去一年的第一個重要成就就是這樣。

二 在工業建設方面

黨的第二個成就就是和黨的第一個成就密切地聯系着的。黨的第二個成就就是我們在過去一年中基本上順利解決了重工業基本建設的資金積累問題，加快了生產資料生產的發展速度，並創造了把我國變為金屬國家的前提。

這就是我們過去一年的第二個主要成就。

輕工業問題是沒有什麼特別困難的。這個問題我們在幾年以前就已經解決了。比較困難、更加重要的是重工業問題。

所以比較困難，是因為它需要大量投資，而且工業落後的國家的歷史表明，重工業沒有大量長期的借款是不能發展的。

所以更加重要，是因為不發展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就不能實行任何工業化。

但是因為我們過去和現在既沒有得到長期的借款，也沒有得到比較長期的信貸，所以問題的尖銳性對我們就非常明顯了。

世界各國的資本家正是根據這一點才拒絕給我們借款和信貸，他們以為我們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決資金積累問題，我們在改造重工業問題上必定失敗，因而不得不向他們低頭，受他們盤剝。

過去一年的總結在這方面向我們說明了什麼呢？過去一年的總結的意義在於它徹底粉碎了資本家老爺們的如意算盤。

過去的一年表明，儘管蘇聯受到公開的和隱蔽的財政封鎖，可是我們並沒有去受資本家盤剝，而且我們靠自己的力量勝利地解決了資金積累問題，奠定了重工業的基礎。這一點現在連工人階級的死敵也不能否認了。

第一、既然去年大工業的基本投資是十六億多盧布，其中約有十三億盧布投入了重工業，而今年

大工業的基本投資是三十四億多盧布，其中有二十五億多盧布將投入重工業；第二、既然去年大工業的總產值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其中重工業的總產值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而今年大工業的總產值應當增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重工業的總產值應當增加百分之四十六，——那末重工業建設的資金積累問題實際上對於我們已經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難，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我們正在加快步伐沿着發展我國重工業的路綫前進，超過舊速度，把我們『歷來的』落後性扔在後面，這難道可以懷疑嗎？

既然如此，那末五年計劃的預計數字在過去一年已經超額完成，被資產階級論客看做『無法實現的夢想』的、使我們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集團）胆顫心驚的五年計劃最高方案實際上變成了五年計劃最低方案，這又有什麼奇怪呢？

列寧說：『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豐收還不够，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良好也還不够，我們還要有重工業……不挽救重工業，不把它恢復起來，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會滅亡而不成其為獨立的國家……重工業是需要國家補助的。如果我們找不到這種補助，那我們就會滅亡而不成其為文明的國家，更不必說成爲社會主義國家了。』（『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八八頁至第三八九頁）

請看，列寧是多麼尖銳地提出資金積累問題和黨在建設重工業方面的任務。

過去的一年表明，黨勝利地執行了這個任務，堅決地克服了這條道路上的種種困難。

這當然不是說工業不會再有嚴重的困難了。建成重工業的任務不僅會遇到資金積累問題，而且會遇到幹部問題，就是：

(甲) 吸收成千上萬的擁護蘇維埃的技師和專家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

(乙) 培養工人階級出身的新的紅色技師和紅色專家的問題。

如果說資金積累問題可以認為基本上已經解決了，那末幹部問題却還待解決。而在目前工業進行技術改造的情況下，幹部問題正是社會主義建設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

列寧說：『我們所缺少的主要的東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領……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證我們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問題「只」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文化力量。』（『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二三頁至第二二四頁）

很明顯，這裏所說的首先是『文化力量』問題，是一般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和工業管理的幹部問題。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儘管在資金積累方面取得了對重工業具有重要意義的極大成就，但是只要幹部問題沒有解決，建成重工業的問題就不能認為已經完全解決了。

因此，黨的任務是：切實地解決幹部問題，無論如何要攻下這個堡壘。

黨在過去一年的第二個成就就是這樣。

三 在農業建設方面

最後，談談黨在過去一年的第三個成就，這個成就就是和前兩個成就有機地聯系着的。這裏指的是我國農業發展中的根本轉變：從細小的落後的個體經濟進到巨大的先進的集體農業，進到共耕制，進到機器拖拉機站，進到以新技術為基礎的勞動組合即集體農莊，進到用數百台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裝備起來的巨大的國營農場。

這裏黨的成就在於我們已經使許多地區的基本農民羣衆從舊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轉到新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僅僅有利於一小撮富翁資本家，而絕大多數農民不得不破產和忍受貧困的痛苦；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則排擠富翁資本家，按新方式重新武裝中農和貧農，用新工具，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來武裝中農和貧農，使他們擺脫貧困和富農的盤剝，走上協作的集體耕種制的廣闊道路。

黨的成就在於我們已經在農民中間組織了這種根本轉變，並引導了廣大的貧農和中農羣衆跟着我們前進，儘管我們遇到了許多難於置信的困難，儘管各色各樣的黑暗勢力，從富農和神甫到庸人和右傾機會主義者，都進行了瘋狂的反抗。

請看幾個數字。

一九二八年，國營農場的播種面積是一百四十二萬五千公頃，其商品穀物產量是六百多萬公担（三千六百多萬普特），集體農莊的播種面積是一百三十九萬公頃，其商品穀物產量約三百五十萬公担（兩千多萬普特）。

一九二九年，國營農場的播種面積是一百八十一萬六千公頃，其商品穀物產量約八百萬公担（約四千七百萬普特），集體農莊的播種面積是四百二十六萬二千公頃，其商品穀物產量約一千三百萬公担（約七千八百萬普特）。

在即將到來的一九三〇年，國營農場的播種面積照控制數字規定大概達到三百二十八萬公頃，其商品穀物產量將是一千八百萬公担（約一億一千萬普特），集體農莊的播種面積必將達到一千五百萬公頃，其商品穀物產量將是四千九百萬公担左右（約三億普特）。

換句話說，在即將到來的一九三〇年，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商品穀物產量將要達到四億多普特，即佔整個農業商品穀物產量（農村外的流轉）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應當承認，這樣快的發展速度連我國社會主義化的大工業也未曾有過，雖然這種工業的發展速度一般說來已經很快了。

很明顯，我們年輕的社會主義大農業（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有着偉大的前途，它將顯示出發展的奇蹟。

在集體農莊建設方面取得這個空前的勝利是有許多原因的，其中至少應當指出以下幾點。

首先，取得這個勝利是因為黨執行了列寧的教育羣衆的政策；通過發展合作社運動逐步地引導農民羣衆走向集體農莊。取得這個勝利是因為黨從兩方面進行了勝利的鬥爭，一方面反對那些企圖超過運動而用命令手段發展集體農莊的人（『左的』清談家），另一方面反對那些企圖把黨拉向後退而做運動尾巴的人（右傾糊塗蟲）。黨如果不執行這樣的政策，就不能把集體農莊運動變爲農民自己的真正羣衆性的運動。

列寧說：『當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的士兵奪取政權的時候，他們清楚地知道，農村中的建設將遇到很大困難，在這裏必須更加穩步前進，在這裏企圖用法令和命令來實行公共耕種制是極端荒謬的，能够贊成公共耕種制的只有極少數的覺悟農民，絕大多數農民沒有決定這樣做。因此，我們僅僅採取了革命發展所絕對必需的辦法：決不超過羣衆的發展程度，而要等到前進的運動從這些羣衆親身的經驗中、從他們親身的鬥爭中成長起來。』（『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一二一頁）

如果說黨在集體農莊建設戰綫上取得了極大的勝利，那末這是因爲黨切實地執行了列寧的這個策略指示。

其次，在農業建設方面取得這個空前的勝利是因為蘇維埃政權正確地估計到了農民對新農具、對新技術的日益增長的需要，正確地估計到了農民保存舊式耕作方法就沒有出路，並且估計到這一切之後及時地給了農民許多幫助：成立農具租賃站、拖拉機隊和機器拖拉機站，組織公共耕種制，建

立集體農莊，用國營農場的力量從各方面幫助農民經濟。

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現了這樣一個政權，蘇維埃政權，它用事實證明了它有決心而且有能力給予勞動農民羣衆以系統的長期的生產上的幫助。

歷來苦於缺乏農具的勞動農民羣衆不會不熱烈歡迎這種幫助，走上集體農莊運動的道路，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從今以後，工人的舊口號『面向農村』大概要用集體農民的新口號『面向城市』來補充，這又有什麼奇怪呢？

最後，在集體農莊建設方面取得這個空前的勝利是因為我國先進工人擔任了這項工作。我指的是成十成百地散佈在我國各主要地區的工人工作隊。必須承認，在一切現有的和可能的集體農莊運動宣傳員中，工人宣傳員對於農民羣衆是最好的宣傳員。工人已經說服了農民，使他們相信集體大經濟比個體小經濟優越，並且現有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就是顯示出這種優越性的明顯的例證，這又有什麼奇怪呢？

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成就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的，這個成就在我看來是近幾年來一切成就中最重要、具有決定意義的成就。

『科學』的反對意見，即否認建立面積四萬到五萬公頃的大規模穀物工廠是可能的和適當的那種意見，已經破產而且被粉碎了。實踐推翻了『科學』的反對意見，再一次表明了不僅實踐應當向『科

學』學習，而且『科學』也不妨向實踐學習。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大規模穀物工廠是紮不下根的。但是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決不能忘記這個『小小的』差別。

在資本家那裏，因為存在着土地私有制，所以不購買許多土地或不繳納絕對地租，就不能建立大規模穀物工廠，而要這樣做就不能不使生產負擔很大的開支。在我們這裏則恰恰相反，因為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既沒有絕對地租，也沒有土地的買賣，這就不能不為大規模穀物經濟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在資本家那裏，建立大規模穀物農場的目的是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或者至少是獲得相當於所謂平均利潤率的利潤，一般說來，不這樣資本家就沒有興趣去建立穀物農場。在我們這裏則恰恰相反，大規模穀物農場同時又是國營農場，它們為了保證自己的發展既不需要最大限度的利潤，也不需要平均利潤率，可以只限於最低限度的利潤，有時甚至沒有任何利潤，這又為大規模穀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最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大規模穀物農場無論在信貸上或稅收上都沒有特別的優待，而在旨在支持社會主義經濟的蘇維埃制度下，現在和將來都有這種優待。

最可敬的『科學』竟把一切都忘記了。

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集團）的斷言已經破產而且被粉碎了，他們斷定說：

(甲) 農民不會加入集體農莊；

(乙) 加速發展集體農莊只會引起羣衆的不滿和工農結合的破裂；

(丙) 農村中社會主義發展的『大道』不是集體農莊，而是合作社；

(丁) 發展集體農莊和向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會使國家沒有糧食。

所有這些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陳詞濫調都已經破產而且被粉碎了。

第一、農民加入了集體農莊，而且是整村、整鄉、整區加入的。

第二、羣衆性的集體農莊運動不是削弱而是鞏固了工農結合，給了工農結合以新的、生產的基礎。現在連瞎子也看得見，如果基本農民羣衆還有什麼嚴重的不滿，那就不是由於蘇維埃政權的集體農莊政策，而是由於蘇維埃政權在供應農民機器和拖拉機方面趕不上集體農莊運動的發展。

第三、關於農村中社會主義發展的『大道』的爭論，是只配愛恆瓦里德和斯列普柯夫一類年輕的小資產階級自由派去進行的煩瑣爭論。很明顯，當沒有羣衆性的集體農莊運動的時候，合作社的低級形式即供銷合作社是『大道』，而當合作社的高級形式即它的集體農莊形式出現的時候，集體農莊就成爲發展的『大道』了。

列寧的合作社計劃是農村中社會主義發展的不加引號的大道，這個計劃包括農業合作社的一切形式，從低級形式（供銷合作社）到高級形式（生產合作社——集體農莊）。把集體農莊同合作社對立起來，就是侮辱列寧主義並證明自己愚昧無知。

第四、現在連瞎子也看得見，如果不向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如果不開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運動，我們現在既不會有今年糧食收購方面所取得的決定性勝利，也不會有已經積蓄在國家手中的幾千萬普特常備糧。

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肯定地說，由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運動的發展，我們正在完全擺脫糧食危機，或者說已經擺脫糧食危機。如果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更加迅速地發展下去，那就沒有理由懷疑，再過兩三年我國就會成爲世界上糧食最多的國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糧食最多的國家。

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的新現象是什麼呢？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新現象，就是農民已經不像從前那樣一批一批地加入集體農莊，而是整村、整鄉、整區、甚至整個專區地加入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中農加入集體農莊了。這是農業發展中的根本轉變的基礎，而這個根本轉變是蘇維埃政權過去一年最重要的成就。

托洛茨基主義的所謂工人階級沒有本領導基本農民羣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孟什維克『觀點』正在破產，正在被粉碎。現在連瞎子也看得見，中農轉到集體農莊方面來了。現在大家都很清楚：工業和農業的五年計劃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五年計劃，那些不相信我國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人是沒有權利慶賀我們的五年計劃的。

世界各國資本家夢想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後一點希望——『神聖的私有制原則』正在破滅，正在化爲泡影。被他們看做資本主義滋養料的農民正在大批大批地離開被頌揚的『私有制』旗幟而走

上集體制的軌道，走上社會主義的軌道。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後一點希望正在破滅。

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國資本主義分子拚命企圖發動舊世界一切力量來反對舉行進攻的社會主義，因而使階級鬥爭尖銳化。資產階級是不願意『長入』社會主義的。

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資產階級的走狗，形形色色的司徒盧威分子和蓋森分子、米留可夫分子和克倫斯基分子、唐恩分子和阿布拉莫維奇分子最近對布爾什維主義發出了惡毒的狂吠。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後一點希望正在消失，這可不是開玩笑。

階級敵人的這種發狂的憎恨和資產階級走狗的這種惡毒的狂吠，除了證明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最困難的戰綫上確實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以外，還能證明什麼呢？

列寧說：『掌握着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能够在事實上向農民指明公共的、集體的、協作的、勞動組合的耕種制的優越性的時候，只有當它能够用協作的、勞動組合的經濟來幫助農民的時候，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是正確的，才能牢靠地和實在地把千百萬農民羣衆真正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七三頁至第一七四頁）

列寧就是這樣提出把千百萬農民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的方法問題的，就是這樣提出把農民引上集體農莊建設軌道的方法問題的。

過去的一年表明，黨勝利地執行了這個任務，堅決地克服了這條道路上的種種困難。

列寧說：『只有我們真正改進和改善了中農生活的經濟條件，中農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才會站

到我們方面來。如果我們明天能够拿出十萬台頭等拖拉機，供給汽油，供給駕駛員（你們很清楚知道，這在目前還是一種夢想），那末中農就會說：「我贊成康姆尼」（即贊成共產主義）。可是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戰勝國際資產階級，必須迫使它給予我們這些拖拉機，或者必須把我們的生產率提高到能够自己製造這些拖拉機的程度。只有這樣提出這個問題才是對的。」（『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九〇頁）

列寧就是這樣提出在技術上重新武裝中農的方法問題的，就是這樣提出把中農吸引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方法問題的。

過去的一年表明，黨也勝利地執行了這個任務。大家知道，到即將到來的一九三〇年的春天，我們的田野上將要有六萬多台拖拉機，再過一年將要有十萬多台拖拉機，而再過兩年就會有二十五萬多台拖拉機了。幾年前認為是『幻想』的事情，現在我們已經有可能把它變為現實，而且綽綽有餘了。

這就是中農轉到『康姆尼』方面來的原因。
黨的第三個成就就是這樣。

黨在過去一年的幾個主要成就就是這樣。

結 論

我們正在開足馬力沿着工業化的道路前進，向社會主義前進，把我們歷來的『俄羅西的』落後性扔在後面。

我們的國家正在變成金屬的國家，汽車化的國家，拖拉機化的國家。

當我們使蘇聯坐上汽車，使農夫坐上拖拉機的時候，讓那些以自己的『文明』自誇的可敬的資本家們試試追上我們吧。我們還要看，到那時哪些國家可以『評定』為落後的國家，哪些國家可以『評定』為先進的國家。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日

載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真理報』第二五九號

署名：約·斯大林

給特別遠東軍『警鐘報』編輯部

謹向捍衛十月革命的權利和利益、防止中國地主和資本家侵犯的特別遠東軍的戰士和指揮員致兄弟的敬禮！

要機警地注視中國反革命分子的每一行動，要以殲滅性的打擊回答打擊，從而幫助我們的中國弟兄，中國的工人和農民打碎束縛他們的地主和資本家的枷鎖。

要記住，在這個喜慶的日子，蘇聯千百萬勞動者都懷着愛戴的心情想念着你們，和你們一起慶祝偉大的國慶，和你們一起為特別遠東軍的勝利而歡欣鼓舞。

十月革命萬歲！

特別遠東軍萬歲！

中國的工人和農民萬歲！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真理報』第二五九號

必要的修正

十二月十六日『真理報』（第二九六號）登載了一篇沒有署名的文章『能不能沒有混亂思想？』（『黨的建設』欄）這篇文章批評了『青年團真理報』（西上的『列寧主義概論』）一文中論述革命突破世界帝國主義戰綫的最有利條件問題的一個原理。

作者從被批評的文章中引了下面一句話：『列寧主義教導說，革命首先在成爲帝國主義鍊條最薄弱一環的地方開始。』接着，作者在這句話和引自布哈林『過渡時期的經濟』的下面一句話之間劃上等號：『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崩潰是從最薄弱的國民經濟體系開始的。』然後，作者又引證列寧對布哈林書中上面這句話的批評意見，於是得出結論說，『青年團真理報』上的『列寧主義概論』一文犯了類似布哈林所犯的錯誤。

在我看來，『能不能沒有混亂思想？』一文的作者犯了錯誤。無論如何不能在『帝國主義鍊條首先在其最薄弱的地方被衝破』的論點和布哈林的『帝國主義鍊條首先在國民經濟體系最薄弱的地方被衝破』的論點之間劃上等號。爲什麼呢？因爲前者說的是應當被衝破的帝國主義鍊條的薄弱，即帝國主義力量的薄弱；而後者，布哈林所說的是必須衝破帝國主義鍊條的國家的國民經濟體系的薄弱，即反帝國主義力量的薄弱。這根本不是一回事。不僅如此，這是兩個完全相反的論點。

照布哈林說來，帝國主義戰綫首先在國民經濟體系最薄弱的地方被衝破。這當然是不對的。如果這是對的，那末無產階級革命就會首先在中非洲某個地方開始，而不是在俄國開始。『列寧主義概論』一文所談的是一種和布哈林的論點完全相反的論點，就是說，帝國主義鍊條首先在其（鍊條）最薄弱的地方被衝破。這是完全正確的。世界帝國主義鍊條所以正是在這樣的國家裏被衝破，是因為它（鍊條）當時正是在這個國家裏最薄弱。不然它就不會被衝破。不然孟什維克反對列寧主義就會是正確的了。

帝國主義鍊條在一個國家裏表現薄弱是決定於什麼呢？決定於這個國家有一定限度的工業發展和文化程度。決定於這個國家有一定數量的工業無產階級。決定於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革命性。決定於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有能够跟着無產階級堅決進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嚴重的同盟者（例如農民）。總之，決定於使帝國主義在這個國家裏必然陷於孤立和必然被推翻的幾個條件的配合。

『能不能沒有混亂思想？』一文的作者顯然把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混同起來了。
的確，能不能沒有混亂思想？

載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真理報』第二九八號

署名：約·斯·

給祝賀斯大林同志五十壽辰的 一切組織和同志

我把你們的祝賀看做是對按照自己的形象誕生了我和培育了我的偉大的工人階級政黨的祝賀。正因為我把這種祝賀看做是對我們光榮的列寧黨的祝賀，我才敢於向你們表示布爾什維克的謝意。

同志們，你們可以相信，我決心今後繼續把我的全部力量，把我的全部才能，必要時把我的全部熱血一滴一滴地獻給工人階級的事業，獻給無產階級革命和世界共產主義的事業。 致
深切的敬意

約·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載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真理報』第三〇二號

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馬克思主義者

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云上的演說）

同志們！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引起普遍注意的主要事實，就是集體農莊運動的蓬勃發展。目前集體農莊運動的特點是：現在不像過去那樣只有個別貧農集團加入集體農莊，現在中農也大批加入集體農莊了。這就是說，集體農莊運動已經由勞動農民個別集團和個別階層的運動變成幾百萬幾千萬基本農民羣衆的運動了。這一點也應該用來說明下面這個極其重要的事實：具有強大的日益增長的反富農的巨浪性質的集體農莊運動，正在自己的道路上掃除富農的反抗，擊破富農，爲農村中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開闢道路。

但是，如果說我們有理由以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實際工作成就自豪，那末關於我們在一般經濟方面特別是在農業方面的理論工作成就就不能這樣說了。而且應當承認，我們的理論思想趕不上實際工作成就，我們的實際工作成就和理論思想的發展之間有些脫節。但是，理論工作不僅必須趕上實際工作，而且要超過實際工作，武裝我們的實際工作者去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

我不想在這裏多講理論的意義。你們對於理論的意義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大家知道，理論如果是真正的理論，就能使實際工作者有能力確定方針，認清前途，對工作充滿信心，相信我們的事業必定勝利。這一切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具有而且不能不具有莫大的意義。糟糕的是我們正是在這方面，在我國經濟問題的理論研究方面開始跛腳了。

否則又怎樣解釋在我們這裏，在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關於我國經濟問題還流行着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呢？怎樣解釋這些大大小小的理論直到現在還沒有受到應有的反擊呢？怎樣解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基本原理，這些能消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理論的特效藥劑竟開始被遺忘，不在我們報刊上廣泛宣傳，不知爲什麼沒有被提到首要地位呢？不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同資產階級理論作不調和的鬥爭，就不能徹底戰勝階級敵人，這難道很難了解嗎？

新的實踐產生對過渡時期經濟問題的新的看法。現在，新經濟政策問題，階級問題，建設速度問題，結合問題，黨的政策問題，都應該有新的提法。爲了不落後於實踐，必須立即根據新的情況研究這一切問題。不這樣就不能戰勝那些引起我們實際工作者思想混亂的資產階級理論。不這樣就不能根除這些已經成爲頑固偏見的理論。因爲只有和理論上的資產階級偏見作鬥爭，才能鞏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陣地。

現在讓我從這些被稱爲理論的資產階級偏見中拿出幾個來批判一下，並通過對我國建設的幾個關鍵問題的說明來揭示出這些偏見的荒誕性。

一 『平衡』論

你們當然知道，在共產黨員中間還流行着一種所謂我國國民經濟各種成分『平衡』論。這種理論當然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但是右傾管壘中的許多人在鼓吹這種理論。

按照這種理論的說法，我們首先有社會主義成分，——這是一個箱子；此外，我們還有非社會主義成分，或者說資本主義成分，——這是另一個箱子。這兩個箱子沿着不同的軌道和平地向前移動，互不相撞。大家知道，按幾何學說來，平行綫是不會相交的。可是，這個高明理論的編造者認為，這兩條平行綫總有一天會相交，而當它們相交的時候，我們就有了社會主義。這個理論沒有看到，在這兩個所謂『箱子』後面站着階級，而這兩個『箱子』是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在生死存亡的鬥爭中，在按照『誰戰勝誰』的原則進行的鬥爭中移動的。

不難了解，這種理論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不難了解，從客觀上說，這種理論的目的是要保持個體農民經濟的障地，用『新的』理論武器把富農分子武裝起來反對集體農莊，破壞集體農莊的障地。

可是，這種理論直到現在還在我們的報刊上流行着。而且不能說它已經受到我們理論家的嚴重反擊，更不用說致命的反擊了。發生這種荒誕的事情，不是由於我們的理論思想落後，又是由於什

麼呢？

其實，只要從馬克思主義寶庫中取出再生產理論來和各種成分平衡論相對立，就能把這後一個理論打得粉碎。的確，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理論教導說，現代社會不逐年實行積累就不能發展，而沒有逐年擴大的再生產就不能實行積累。這是很明白的，可以理解的。我們的集中的社會主義大工業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擴大再生產理論發展的，因為它的規模每年都在擴大，它有自己的積累，並一日千里地向前發展。

但是，我們的大工業並沒有包括整個國民經濟。相反地，在我國國民經濟中佔優勢的還是小農經濟。能不能說我國小農經濟是按照擴大再生產原則發展的呢？不，不能這樣說。我國小農經濟的大部分不能實現逐年擴大的再生產，相反地，連簡單再生產也是很少有可能實現的。如果農業基礎是這樣一種既不能實現擴大再生產而又在我國國民經濟中佔優勢的小農經濟，那末不能加速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化的工業呢？不，不能。能不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就是說，建立在最巨大最統一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和最分散最落後的農民小商品經濟基礎上呢？不，不能。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會使整個國民經濟全部崩潰。

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於使農業成爲大農業，使農業能實行積累和實現擴大再生產，從而改造國民經濟的農業基礎。

但是怎樣使農業成爲大農業呢？

要做到這一點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道路，就是用在農業中培植資本主義的方法使農業成爲大農業，結果是使農民貧困，使資本主義企業在農業中發展起來。我們擯棄了這條道路，因爲它是和蘇維埃經濟不相容的。

另一條是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農業中培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結果是使小農經濟聯合成爲以技術和科學裝備起來的大規模集體經濟，這種經濟有可能向前發展，因爲它能够實現擴大再生產。因此，問題就是這樣：或者走第一條道路，或者走第二條道路；或者向資本主義後退，或者向社會主義前進。任何第三條道路都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平衡』論就是企圖指出第三條道路。正因爲它指望着第三條（不存在的）道路，所以它是空想的，反馬克思主義的。

因此，只要拿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和各種成分『平衡』論相對立，就能把這後一個理論打得粉碎。爲什麼我們的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不這樣做呢？誰需要使這種可笑的『平衡』論在我們報刊上流行，而把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理論束之高閣呢？

二 社會主義建設『自流』論

現在來談政治經濟學中的第二種偏見，即第二種資產階級類型的理論。我指的是社會主義建設

事業『自流』論，這種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但是，我們右傾營壘中的同志們竭力鼓吹這種理論。

這種理論的編造者的論斷大致如下：我們這裏有過資本主義，當時工業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的，而農村是自發地、自流地跟着資本主義城市走，按照資本主義城市的形象進行改造的。既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這樣，為什麼在蘇維埃經濟制度下不能也是這樣呢？為什麼農村，小農經濟不能自流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自發地按照社會主義城市的形象進行改造呢？這種理論的編造者根據這一點就斷言農村能自流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既然農村本來就能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我們何必為建立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操心，我們何必爭吵呢？

你們看，這又是一種從客觀上說來目的在於給農村資本主義分子一種新武器來反對集體農莊的理論。

這種理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是絲毫用不着懷疑的。

而我們的理論家直到現在還沒有抽出時間去痛斥這種引起我們集體農莊實際工作者思想混亂的奇怪理論，這不是很奇怪嗎？

毫無疑問，社會主義城市對個體小農村的領導作用是巨大而不可估量的。正因為如此，工業對農業有改造的作用。但是，單靠這個因素是否就能使小農的農村自己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自流地跟着城市走呢？不，不能。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村自發地跟着城市走，因為城市的資本主義經濟和農民的小商品個體經濟基本上是同一類型的經濟。當然，小農商品經濟還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但是它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經濟是同一類型的，因為它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列寧在評論布哈林的『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時說得萬分正確，他說：『農民的商品資本主義趨勢』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趨勢』^①是完全相反的^②。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並大量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③（列寧）。

能不能說農民小商品經濟基本上和城市中的社會主義生產也是同一類型的呢？很明顯，如果離開馬克思主義，是不能這樣說的。否則列寧就不會說：『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的時候，資本主義在俄國比共產主義有更穩固的經濟基礎。』^④

因此，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是一種腐朽的反列寧主義的理論。

因此，要使小農的農村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除了其他一切辦法以外，還必須在農村中培植社會主義大經濟，即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作為能帶領基本農民羣衆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的社會主義基地。

因此，社會主義建設『自流』論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城市只有在農村中培植基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並按照新的社會主義軌範來改造農村，才能帶領小農的農村。

奇怪的是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自流』論直到現在還沒有受到我們土地問題理論家應有的反擊。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現在來談政治經濟學中的第三種偏見，即小農經濟『穩固』論。大家都知道，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大經濟優越於小經濟的著名原理，認為這個原理只在工業中有效，而在農業中是不適用的。鼓吹這種理論的大衛和赫茨之類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家企圖『依據』的事實是：小農吃得苦，耐得勞，爲了保住自己的一小塊土地甘願忍受任何困苦，因此，小農經濟在和農業中的大經濟作鬥爭的時候就表現出穩固性。

不難了解，這種『穩固性』比任何不穩固性都壞。不難了解，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只有一個目的：讚美和鞏固那個使千百萬小農羣衆破產的資本主義制度。正因爲這種理論有這樣的目的，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很容易就把這種理論擊破了。

但是現在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我們的實踐，我們的實際情況提供了反對這種理論的新論據，而我們的理論家却令人奇怪地不願意利用或不會利用這種新武器去反對工人階級的敵人。我所指的

實踐是：我國土地私有制已經消滅，土地已經國有化，這就使小農擺脫了對自己那一小塊土地的奴隸般的依戀，因而使他們易於從小農經濟轉向大規模的集體經濟。

究竟是什麼東西在過去和現在而且在將來還會把西歐的小農束縛在他們的小商品經濟上呢？首先而且主要的是他們私有的一小塊土地；是土地私有制。他們爲了買一小塊土地成年累月地攢錢，他們買到以後，自然就不願離開它，爲了保住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他們的個體經濟的基礎，他們寧願忍受各種困苦，寧願陷入愚昧和貧困的境地。

能不能說這個因素在我們這裏，在蘇維埃制度條件下還同樣繼續發生作用呢？不，不能這樣說。所以不能這樣說，是因爲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正因爲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我們這裏的農民也就沒有西方農民的那種對一小塊土地的奴隸般的依戀。這種情況不能不使小農經濟易於轉上集體農莊的軌道。

這就是在我們這裏，在土地國有化的條件下，農村的大經濟，農村的集體農莊能夠很容易地顯示出對小農經濟的優越性的原因之一。

這就是消滅了絕對地租，廢除了土地私有制而實行了土地國有化的蘇維埃土地法的偉大革命意義。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我們擁有新論據去反對那些說小農經濟在反對大經濟的鬥爭中表現出穩固性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究竟爲什麼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不充分地利用這個新論據去反對一切資產階級理論呢？

我們實行土地國有化的根據之一，就是『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的名著『剩餘價值學說史』和列寧關於土地問題的著作所提供的理論前提，這些著作是最豐富的理論思想寶庫。我指的是關於一般地租的理論，特別是關於絕對地租的理論。現在很明顯，這些著作的理論原理已經在我們城鄉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得到了光輝的證實。

只是令人不能理解，爲什麼查楊諾夫一類的『蘇維埃的』經濟學家的反科學理論應當在我們報刊上自由流行，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地租和絕對地租理論的天才著作就不應當廣泛宣傳並提到首位，倒應當束之高閣呢？

你們大概記得恩格斯的『農民問題』這本著名的小冊子。你們當然記得恩格斯多麼慎重地對待把小農引上協作經濟道路，引上集體經濟道路的問題。讓我從恩格斯的這本小冊子中引證有關的一段話吧：

『我們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竭力設法使他們生活得好些，使他們易於轉到協作社，如果他們決定這樣做的話；如果他們還不能決定這樣做，那我們就設法給他們盡量多的時間，讓他們在自已的一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10)

⑩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你們看，恩格斯多麼慎重地對待把個體農民經濟引上集體制軌道的問題。怎樣解釋恩格斯的這種初看起來似乎過分慎重的態度呢？他在這個問題上的出發點是什麼呢？顯然，他的出發點是存在着土地私有制，農民有『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他們很難離開它。西方的農民就是這樣。存在着土地私有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就是這樣。當然，在這裏是需要十分慎重的。

能不能說在我們蘇聯也有同樣的情況呢？不，不能這樣說。所以不能這樣說，是因為我國沒有把農民束縛在他們的個體經濟上的土地私有制。所以不能這樣說，是因為我國實行了使個體農民易於轉上集體制軌道的土地國有化。

這就是近來我們的集體農莊運動能夠比較容易和比較迅速地發展的原因之一。

遺憾的是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還沒有打算把我國農民情況和西方農民情況之間的這種差別相當清楚地揭示出來。但是，這樣的工作不僅對我們蘇維埃工作人員，而且對世界各國共產黨人都會有極大的意義。因為將來在資本主義各國，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初期，究竟要在土地國有化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還是在沒有這種基礎的情況下建設社會主義，這對於資本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並不是無關重要的。

我在不久以前發表的一篇文章（『大轉變的一年』^①）中發揮了幾個人所共知的證明農業中的大

① 見本卷第一〇六頁至第一二一頁。——編者註

經濟優越於小經濟的論據，在那裏我指的是大規模的國營農場。無須證明，所有這些論據也完全適用於集體農莊這種大經濟單位。我說的不僅是那些有機器拖拉機基礎的發達的集體農莊，而且是那些代表集體農莊建設中所謂工場手工業時期的、依靠農民的原有農具的初級集體農莊。我指的是目前在全盤集體化地區所建立的那些不過是把農民的生產工具集合起來使用的初級集體農莊。

例如拿前頓河區霍泊爾區的集體農莊來說吧。從表面上看，這些集體農莊在技術方面似乎和小農經濟沒有區別（機器很少，拖拉機很少）。其實，在集體農莊裏面單是把農民的工具集合起來使用就產生了我們的實際工作者所夢想不到的效果。這種效果表現在哪裏呢？表現在轉上集體農莊軌道後播種面積擴大了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五十。爲什麼會有這種『衝昏頭腦』的效果呢？因爲農民在單幹條件下是沒有力量的，而當他們把自己的工具集合起來並聯合爲集體農莊的時候，就變成了巨大的力量。因爲農民已經有可能開墾在單幹條件下難以開墾的熟荒地和生荒地。因爲農民已經有可能把生荒地拿到自己手裏。因爲已經有可能使用荒原、零星小塊土地和地界等等。

開墾熟荒地和生荒地問題對於我國農業有極大的意義。你們知道，過去俄國革命運動的軸心就是土地問題。你們知道，土地運動的目的之一是要消除缺地現象。當時許多人認爲缺地現象是絕對的，就是說，俄國再沒有適於耕種的閒地了。而實際情形怎樣呢？現在已經十分清楚，在蘇聯有過而且現在還有幾千萬公頃的閒地，但是農民用他們可憐的工具是根本無法開墾這些土地的。正因爲農民過去無法開墾生荒地和熟荒地，所以他們就趨向於耕種『熟地』，耕種屬於地主的土地，耕種適於

在單幹條件下用農民原有的農具耕種的土地。這就是「缺地」的根本原因。因此，無怪乎我們的以拖拉機裝備起來的穀物托拉斯現在有可能使用約兩千萬公頃的閒地，這些土地是農民沒有耕種過的，而且是以單幹的方式用小農的農具所不能耕種的。

各個階段（不論是最初階段或是用拖拉機裝備起來的更發展的階段）的集體農莊運動的意義之一，就在於農民現在已經有可能使用熟荒地和生荒地了。這就是農民過渡到集體勞動之後播種面積大大擴大的秘密所在。這就是集體農莊優越於個體農民經濟的一個根本原因。

不用說，當我們的機器拖拉機站和機器拖拉機隊去幫助全盤集體化地區的初級集體農莊的時候，當集體農莊本身有可能把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集中在自己手裏的時候，集體農莊對個體農民經濟的優越性就更加不容爭辯了。

四 城市和鄉村

關於所謂「剪刀差」問題，存在着一種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培植的偏見，對這種偏見也像對其他一切不幸還流行在蘇聯報刊上的資產階級理論一樣，應該宣佈無情的戰爭。我指的是一種認為十月革命給予農民的東西似乎比二月革命少，認為十月革命其實什麼也沒有給予農民的理論。

這種偏見有一個時候曾被一位「蘇維埃的」經濟學家在我們的報刊上宣揚過。固然，這位「蘇維

埃及』經濟學家後來放棄了自己的理論。（喊聲：『這個人究竟是誰？』）這個人就是格羅曼。但是，這種理論得到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擁護，並被利用來反對黨。而且沒有任何根據可以斷定說，這種理論目前在『蘇維埃的』輿論界已經不流行了。

同志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它牽涉到城鄉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它牽涉到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問題。它牽涉到最迫切的『剪刀差』問題。因此，我認為這種奇怪的理論是值得分析一下的。

說農民從十月革命沒有得到任何東西，這是否正確呢？讓我們看看事實吧。

我手裏有著名統計學家涅姆契諾夫同志的著名統計表，這個統計表在我的『在糧食戰綫上』(1)一文中發表過。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革命前地主『生產』的糧食不下六億普特。所以，地主當時是六億普特糧食的持有者。

根據這個統計表，富農當時『生產』的糧食是十九億普特。這是富農當時所擁有的一種很大的力量。

根據同一個統計表，貧農和中農生產的糧食是二十五億普特。

這就是舊的農村，十月革命前的農村的情景。

十月革命後農村中發生了什麼變化呢？我可以引用同一個統計表的數字。例如拿一九二七年來說吧。地主在這一·年生產了多少糧食呢？很明顯，他們一點也沒有生產，而且也不能生產，因為地主已經被十月革命消滅了。你們一定懂得，這必然大大改善農民的狀況，因為農民擺脫了地主的羈絆。

這當然是農民由於十月革命而得到的很大的好處。

富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了多少糧食呢？不是十九億普特，而是六億普特。可見富農的力量在十月革命以後的時期被削弱了三分之二以上。你們一定懂得，這不能不改善貧農和中農的狀況。

而貧農和中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了多少糧食呢？不是二十五億普特，而是四十億普特。可見貧農和中農在十月革命後所生產的糧食比革命前多了十五億普特。

這就是說明貧農和中農從十月革命得到了莫大好處的事實。

這就是十月革命給予貧農和中農的東西。

既然如此，怎麼能硬說十月革命沒有給予農民任何東西呢？

但是，同志們，還不止此。十月革命廢除了土地私有制，消滅了土地的買賣，實行了土地國有化。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現在農民要生產糧食，完全用不着購買土地了。從前，他們爲了購買土地成年累月地攢錢，只要買到土地，情願借債，情願遭受盤剝。購買土地的費用當然加在糧食生產的成本上。現在農民用不着這樣做了。現在農民不必購買土地就能生產糧食。因此，農民用來購買土地的幾億盧布，現在都留在農民的荷包裏了。這是什麼，是改善了農民的狀況還是沒有改善農民的狀況呢？顯然是改善了農民的狀況。

其次，直到最近，農民還不得不以單幹方式使用舊式農具耕種土地。大家都知道，使用舊式的、現在已經不適用的生產工具單幹，不能爲生活得好些，不能爲不斷提高自己的物質生活、發展自己的

文化、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廣闊道路提供必要的好處。現在，在大力開展集體農莊運動以後，農民已經有可能把自己的勞動同鄰居的勞動聯合起來，聯合為集體農莊，開墾生荒地，利用熟荒地，得到機器和拖拉機，從而把自己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一倍，甚至兩倍。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由於聯合為集體農莊，農民現在已經有可能用同樣的勞動生產出比以前多得多的東西。因此，這就是說，糧食生產的成本比以前低得多了。最後，這就是說，在價格穩定的情況下，農民出賣糧食得到的錢會比以前得多。

既然如此，怎麼能硬說十月革命沒有給予農民好處呢？

說這種荒唐話的人顯然是在誣衊黨，誣衊蘇維埃政權，這難道還不明顯嗎？但是由此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剪刀差』問題，消滅『剪刀差』問題，現在應當有新的提法。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如果集體農莊運動以現有的速度發展下去，『剪刀差』在最近期間就會消滅。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城鄉之間的關係問題已經建立在新的基礎上，城鄉之間的對立將加速消除。

同志們，這種情況對於我們的整個建設事業有極大的意義。它改變着農民的心理，使他們面向城市。它為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創造了基礎。它為用集體農民的『面向城市』的口號補充黨的『面向農村』的口號創造了基礎。

這是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因為現在農民從城市得到了機器、拖拉機、農藝師、組織者以及為反

對和戰勝富農所需要的直接幫助。極不信任城市，把城市看做強盜的舊式農民退到後面去了。代替他們的是對城市抱着希望，希望從城市得到生產上的實際幫助的新式農民，即集體農民。生怕下降為貧農而只想悄悄地（會剝奪選舉權呵！）上升到富農地位的舊式農民，已經由有着新的前途——加入集體農莊，擺脫貧困和愚昧而走上經濟和文化高漲的廣闊道路的新式農民所代替了。

同志們，事情就是這樣變化的。

同志們，更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竟沒有採取一切辦法去痛斥和根除一切企圖誣譏十月革命的成果和日益增長的集體農莊運動的資產階級理論。

五 關於集體農莊的本質

集體農莊作為一種經濟類型，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之一。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

有一個人在這裏發言時侮辱集體農莊。他斷言集體農莊這種經濟組織同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毫無共同之處。同志們，我必須指出，對集體農莊做這樣的估計是完全不正確的。毫無疑問，這種估計是根本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經濟類型是由什麼決定的呢？很明顯，是由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關係決定的。否則還有什麼可以決定經濟類型呢？但是，難道在集體農莊裏有私人佔有生產資料的階級和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階

級嗎？難道在集體農莊裏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嗎？難道集體農莊不是在屬於國家的土地上實行基本生產工具公有化嗎？有什麼根據斷言集體農莊作爲一種經濟類型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之一呢？

當然，在集體農莊裏是有矛盾的。當然，在集體農莊裏是有個人主義殘餘甚至富農思想殘餘的，這些殘餘還沒有消失，但是過一個時候，隨着集體農莊的鞏固，隨着集體農莊的機械化，這些殘餘必定會消失。但是整個說來，把矛盾和缺點都包括在內，集體農莊作爲一種經濟因素基本上是農村發展的新道路，是和富農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相反的農村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難道可以否認嗎？在我國條件下，集體農莊（我說的是集體農莊，而不是冒牌的集體農莊）是在同資本主義分子進行殊死搏鬥中發展起來的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基地和策源地，這難道可以否認嗎？

有些同志企圖侮辱集體農莊而把它稱爲資產階級的經濟形式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這不是很明顯嗎？

一九二三年我們還沒有羣衆性的集體農莊運動。列寧在他的『論合作制』一書中指出的是合作社的一切形式，既包括它的低級形式（供銷合作社），也包括它的高級形式（集體農莊）。他當時關於合作社，關於合作社企業是怎樣說的呢？請看列寧的『論合作制』一書中的一段話吧：

『在我們的現存制度下，合作社企業和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爲合作社企業是集體企業，但它們和社會主義企業並無不同之處^①，如果它們是建築在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土地

和生產資料上的。」（『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三頁）

可見列寧並不是把合作社企業孤立起來觀察，而是把它們和我們的現存制度聯系起來觀察，注意到合作社企業是在生產資料屬於國家的國家裏，在屬於國家的土地上經營的；列寧這樣觀察合作社企業之後，就斷定說它們和社會主義企業並無不同之處。

列寧關於一般合作社企業就是這樣說的。

關於目前的集體農莊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這樣說，這不是很明顯嗎？

列寧認為在我國條件下『單純的合作社的發展就等於社會主義的發展』，其原因之一就在於此。你們可以看出，上面提到的那位發言人侮辱集體農莊，就是犯了極嚴重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

從這個錯誤中產生了他的另一個錯誤——關於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問題的錯誤。這位發言人把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說得有聲有色，使人會以為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和集體農莊外的階級鬥爭並無不同之處。甚至會以為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更加殘酷。而且不只是上面提到的那位發言人一個人犯了這種錯誤。空談階級鬥爭，叫嚷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是目前我們的一切『左的』空喊家的特徵。在這種叫嚷中最可笑的是這些叫嚷者在沒有或幾乎沒有階級鬥爭的地方『看見了』階級鬥爭，而在有階級鬥爭並且階級鬥爭很尖銳的地方却看不見階級鬥爭。

集體農莊內是否有階級鬥爭的因素呢？是的，是有的。既然集體農莊內還保存着個人主義心理甚至富農心理的殘餘，既然集體農莊內還存在着物質生活狀況方面的某些不平等現象，那末集體農莊內就不能沒有階級鬥爭的因素。不能說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和集體農莊外的階級鬥爭是相同的呢？不，不能。我們的『左』清談家的錯誤就在於他們看不見這個差別。

集體農莊外的，集體農莊成立以前的階級鬥爭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同佔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並用這些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盤剝貧農的富農進行鬥爭。這個鬥爭是生死存亡的鬥爭。

而集體農莊基礎上的階級鬥爭是什麼意思呢？首先，這就是說，富農已經被擊潰並被剝奪了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其次，這就是說，貧農和中農已經在基本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基礎上聯合為集體農莊。最後，這就是說，這是集體農莊莊員之間的鬥爭，他們中間一部分人還沒有擺脫個人主義殘餘和富農思想殘餘，企圖利用集體農莊內的某些不平等現象圖利營私，而另一部分人想把這些殘餘和這些不平等現象從集體農莊中剷除掉。只有瞎子才看不見集體農莊基礎上的階級鬥爭和集體農莊外的階級鬥爭之間的差別，這不是很明顯嗎？

如果以為有了集體農莊，就有了建成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一切，那就錯了。如果以為集體農莊莊員已經變成社會主義者，那就更錯了。不是的，要改造集體農民，克服他們的個人主義心理，使他們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還必須做很多工作。集體農莊機械化實現得愈快，集體農莊拖拉機化實現得愈快，達到這個目的也就愈快。但是這絲毫沒有減弱集體農莊作為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積

桿的極大的意義。集體農莊的偉大意義，正在於它是農業中採用機器和拖拉機的主要基地；是用社會主義精神去改造農民、改造農民心理的主要基地。列寧說得對：

『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整個心理和習慣，是需要經過幾代的事情。只有物質基礎，只有技術，只有在農業中大規模地使用拖拉機和機器，只有大規模地實行電氣化，才能解決這個和小農有關的問題，才能使他們的整個心理健全起來。』（『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四頁）

集體農莊正是這樣一種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只有通過它，千百萬個體小農才能參加擁有機器和拖拉機的大經濟，而機器和拖拉機是經濟繁榮的槓桿，是農業按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槓桿，誰能否認這一點呢？

我們的『左的』清談家把所有這些都忘記了。

我們的這位發言人也把這一點忘記了。

六 階級變動和黨的政策中的轉變

最後談談國內階級變動和社會主義向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的問題。

我們黨最近一年來的工作的特點就是：

（甲）我們黨、我們蘇維埃政權向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展開了全綫進攻；

(乙)大家知道，這個進攻產生了並且繼續產生着非常顯著的良好結果。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已經從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這就是說，我們已經實行並且還在繼續實行我們整個政策中的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轉變。

直到最近，黨都是主張限制富農的剝削趨向的。大家知道，這個政策早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就已經宣佈了。這個政策在施行新經濟政策時以及在我們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又重新宣佈了。大家都記得列寧評論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提綱的著名的信（一九二二年），列寧在那封信裏再一次說到必須實行這個政策的問題。最後，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又肯定了這個政策。直到最近，我們都是實行這個政策的。

這個政策是否正確呢？是的，它在當時無疑是正確的。在五年或者三年以前，我們能不能向富農舉行這樣的進攻呢？當時我們能不能指望這樣的進攻獲得勝利呢？不，不能。這樣做就是最危險的冒險主義。這樣做就是最危險地以進攻為兒戲。因為這樣做我們一定會失敗，既然失敗了，就會使富農的陣地鞏固起來。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我們在農村還沒有能夠據以向富農舉行堅決進攻的據點，即廣大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網。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可能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社會主義生產代替富農的資本主義生產。

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間，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反對派會拚命強迫黨採取立刻向富農進攻的政策。黨沒有採取這種危險的冒險行動，因為黨知道，嚴肅的人是不能允許自己以進攻為兒戲

的。向富農進攻是一件嚴肅的事情。決不能把它和反富農的高調混爲一談。也不能把它和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反對派拚命強迫黨採取的同富農扭打的政策混爲一談。向富農進攻，這就是擊破富農並消滅富農階級。離開這些目的，進攻就是高調，就是扭打，就是空喊，隨便叫做什麼都可以；只是不能叫做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進攻。向富農進攻，這就是準備實際行動，打擊富農，而且把他們打得再也站不起來。這就是我們布爾什維克所說的真正的進攻。在五年或者三年以前，我們不能舉行這樣的進攻而指望獲得勝利呢？不，不能。

的確，富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了六億多普特糧食，其中通過農村外的交換賣出了大約一億三千萬普特。這是一個十分嚴重而不可忽視的力量。當時我們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生產了多少呢？大約八千萬普特，其中運到市場去的（商品糧食）約爲三千五百萬普特。請你們自己判斷一下，我們當時能不能用我們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和商品糧食代替富農的生產和商品糧食呢？顯然不能。

在這種情況下向富農舉行堅決進攻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一定會失敗，一定會加強富農的陣地而得不到糧食。正因爲如此，當時儘管有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反對派的冒險主義高調，我們也不能夠而且不應當向富農舉行堅決進攻。

可是現在呢？現在的情況怎樣呢？現在我們有充分的物質基礎來打擊富農，擊破富農的反抗，消滅富農階級，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代替富農的生產。大家知道，一九二九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生產的糧食不下於四億普特（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經濟的總產量少兩億普特）。其次，大家知道，

一九二九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提供的商品糧食在一億三千萬普特以上（即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的商品糧食多些）。最後，大家知道，一九三〇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糧食總產量將不下於九億普特（即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的總產量多），而它們所提供的商品糧食將不下於四億普特（即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的商品糧食多得多）。

同志們，現在我們的情況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國經濟中所發生的變動。

由此可見，現在我們已經有了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代替富農生產的物質基礎。正因為如此，我們向富農舉行的堅決進攻現在取得了不容置疑的勝利。

如果說的是真正的堅決進攻，而不限於空洞的反富農高調，那就應當這樣向富農進攻。

這就是我們近來從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的原因。

那末，對於剝奪富農財產的政策怎樣辦呢？是否可以容許在全盤集體化地區剝奪富農財產呢？——各地的人們問。真是可笑的問題！當我們主張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時候，當我們沒有可能轉為向富農堅決進攻的時候，當我們沒有可能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代替富農生產的時候，剝奪富農財產是不能容許的。那時不容許剝奪富農財產的政策是必要的和正確的。而現在呢？現在情形不同了。現在我們有可能向富農舉行堅決進攻，擊破富農的反抗，消滅富農階級，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代替富農的生產。現在剝奪富農財產是由實行全盤集體化的貧農和中農羣衆自己進行

的。現在在全盤集體化地區剝奪富農財產已經不是簡單的行政措施。現在在這些地區剝奪富農財產是建立和發展集體農莊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現在來多談剝奪富農財產問題是可笑而不嚴肅的。既然割下了腦袋，也就不必憐惜頭髮了。

還有一個同樣可笑的問題：能不能讓富農加入集體農莊？當然不能讓他們加入集體農莊。所以不能，是因為他們是集體農莊運動的死敵。

七 結 論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的理論工作決不能忽略的六個關鍵問題。

這些問題的意義首先在於對這些問題進行馬克思主義的闡述就能根除一切資產階級理論，而這些理論有時——真叫我們丟臉——竟被我們的黨員同志傳播着，引起我們的實際工作者的思想混亂。早就應該剷除這些理論，拋棄這些理論了。因為只有和諸如此類的理論作無情的鬥爭，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的理論思想才能成長和鞏固起來。

最後，這些問題的意義在於它們使過渡時期經濟中的舊問題有了新面貌。

新經濟政策問題，階級問題，集體農莊問題，過渡時期的經濟問題，現在都有了新的提法。

必須揭露把新經濟政策了解為退却而且僅僅了解為退却的那些人的錯誤。事實上，列寧還在開

始施行新經濟政策時就曾說過，新經濟政策不只是退却，它同時又是準備向城鄉資本主義分子舉行的新的堅決進攻。

必須揭露認為需要新經濟政策只是為了城鄉之間的聯系的那些人的錯誤。我們需要的不是城鄉之間的任何一種聯系。我們需要的是能保證社會主義勝利的那種聯系。我們所以採取新經濟政策，就是因為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當它不再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列寧說過，新經濟政策的施行是認真而長期的。但他從來沒有說過，新經濟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

還必須提出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的問題。必須研究我國國民經濟平衡表的編制格式問題。中央統計局在一九二六年當做國民經濟平衡表公佈的東西，不是平衡表，而是數字遊戲。巴札羅夫和格羅曼對國民經濟平衡表問題的見解也是不合適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把蘇聯國民經濟平衡表的格式制定出來，如果他們一般說來願意研究過渡時期的經濟問題的話。

如果我們的馬克思主義者經濟學家分出一部分工作人員根據過渡時期經濟問題在目前發展階段的新的提法去專門研究這些問題，那就很好了。

載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真理報」第三〇九號

給阿·馬·高爾基的信

親愛的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

非常抱歉，信回遲了（太遲了！），請不要罵我。我忙得不成樣子。此外，還生過一點病。這當然不能替我辯護，但可以說明一些情況。

（一）我們不能沒有自我批評。無論如何不能，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沒有自我批評，機關的停滯和腐朽，官僚主義的滋長，工人階級創造主動性的破壞就不可避免。當然，自我批評會給敵人提供材料。在這一點上你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它也為我們的前進，為勞動者建設力量的發揮，為競賽的展開，為突擊隊等等提供了材料（和推動力）。好處是會抵銷和蓋過壞處的。

可能我們的報刊過分強調了我們的缺點，有時候甚至（無意地）宣揚了這些缺點。這是可能的，甚至是可以肯定的。這當然不好。因此，你要求用我們的成績來和我們的缺點相平衡（依我說，要用成績來蓋過缺點）。在這一點上你當然也是正確的。我們一定立即彌補這個缺陷。這一點你可以不必懷疑。

（二）我們有各種各樣的青年。有垂頭喪氣的，疲倦懈怠的，悲觀失望的（例如捷寧）。也有朝氣

勃勃的，活潑愉快的，意志堅強和不達勝利決不罷休的。現在，當我們割斷生活中的舊聯系而建立新聯系的時候，當我們破壞走慣了的道路而鋪設沒有走慣的新道路的時候，當從前過着富裕生活的整批整批居民脫出軌道，離開隊列，給從前受壓制、受折磨的千百萬人讓開道路的時候，青年不可能都是清一色的同情我們的羣衆，他們中間不可能沒有分化和分裂。第一、在青年中間有富家子弟。第二、即使拿我們自己的（按社會地位）青年來說，也不是每個人都有足夠的意志、力量、毅力和理解力，都能把大規模破壞舊事物和急速建設新事物的景象看做是理所當然的，因而也是合乎願望的景象，並且是和那種應當讓人能夠『休息』和『享福』的『四海昇平』的天堂般的安樂生活很少相像的景象。顯然，在這種『令人頭昏的混亂情況』下，我們不可能沒有疲倦懈怠的人，神經過度緊張的人，未老先衰的人，悲觀失望的人，脫逃的人以及投到敵人陣營裏去的人。這是革命的不可避免的『消耗』。

現在主要的是：在青年中間起領導作用的不是垂頭喪氣的人，而是我們的戰鬥的青年團員——摧毀資本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建設社會主義的布爾什維克，解放一切被壓迫者和被奴役者的布爾什維克的人數衆多的新的一代的核心。這就是我們的力量。這也就是我們勝利的保證。

(三)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不應當採取有組織地從思想上（以及從其他一切方面）影響的辦法竭力減少灰心者、叫苦者、懷疑者等等的人數。相反地，我們的黨、我們的文化組織、我們的報刊、我們的蘇維埃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組織這種影響並取得重大成果。因此，我們（我們的朋友）完全接受你的建議：

(甲) 創辦『國外』雜誌(三)；

(乙) 出版一些關於『國內戰爭』的通俗文集，吸收阿·托爾斯泰和其他文學家參加這個工作。

不過必須附加一句：這些事情一件也不能交給拉狄克或他的某個朋友去領導。問題不在於拉狄克的善良心願或誠懇態度。問題在於派別鬥爭的邏輯，他和他的朋友並沒有完全放棄這種鬥爭（還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意見分歧，這些分歧會推動他們進行鬥爭）。我們黨的歷史（並且不僅我們黨的歷史）教導說，事物的邏輯比人的心願的邏輯更有力量。如果把這些事情交給政治上堅強的同志去領導，而吸收拉狄克和他的朋友做撰稿人，那就會更正確些。這樣做會更正確些。

(四) 我們認真地討論了關於創辦專門雜誌『關於戰爭』的問題以後得出這樣的結論：現在沒有出版這種雜誌的理由。我們認為比較適當的是在現有的政治雜誌上論述戰爭問題（我說的是帝國主義戰爭）。況且不能把戰爭問題同政策問題分開，因為戰爭是政策的表現。

至於描寫戰爭的小說，那必須嚴加選擇之後再出版。在書籍市場上出現了許多描寫戰爭的『恐怖』，引起對一切戰爭（不僅對帝國主義戰爭，而且也對其他一切戰爭）的反感的文藝小說。這是沒有多大價值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小說。我們所需要的是能够把讀者從帝國主義戰爭的恐怖引到了解必須打倒組織這種戰爭的帝國主義政府的小說。此外，要知道我們不是反對任何戰爭。我們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因為它是反革命的戰爭。但是我們擁護解放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戰爭，雖然大家知道這種戰爭不僅沒有免於『流血的恐怖』，甚至充滿了這種恐怖。

在我看來，打算反對戰爭『恐怖』的沃龍斯基的立場同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的立場沒有多大區別。

(五) 你說得完全正確，在我們這裏，在我們的報刊上，在反宗教宣傳問題上極爲混亂。有時竟說出了有利於敵人的令人驚奇的蠢話。這方面要做的工作多極了。但是，我還沒有來得及和做反宗教工作的同志們商談你的建議。關於這一點我下次寫信告訴你。

(六) 我不能滿足加米古洛夫的請求。沒有時間！此外，我算什麼批評家，真是見鬼！就此擱筆。

緊緊握手並祝你健康。

謝謝你的問候。

約·斯大林

聽說你需要一位俄國醫生。是真的嗎？想要哪一位？請來信告知，一定派去。

約·斯。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七日

第一次刊印

論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問題

『紅星報』(四)第十六號刊載的『消滅富農階級』一文一般說來無疑是正確的，但有兩個地方說得不確切。我認爲必須予以糾正。

一、該文說：

「在恢復時期，我們實行了限制城鄉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從改造時期開始，我們就從限制的政策過渡到排擠他們的政策了。」

這種論斷是不對的。限制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和排擠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並不是兩個不同的政策。這是同一個政策。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是限制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即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的必然結果和組成部分。不能把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同排擠富農階級看成一樣。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是排擠和戰勝那些受不住稅收壓力、受不住蘇維埃政權的種種限制辦法的富農個別隊伍。很明顯，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限制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不能不導致排擠富農個別隊伍。因此，排擠富農個別隊伍不能不做是限制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必然結果和組成部分。

我們不僅在恢復時期實行了這個政策，而且在改造時期，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七年十二

月)以後的時期,在我們黨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一九二九年四月)時期,以及在這次代表會議以後直到一九二九年夏季,我們也都實行了這個政策;而從一九二九年夏季起,我們進入了全盤集體化階段,開始了向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方面的轉變。

如果看一看黨的最重要的文件,例如從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見就中央總結報告所通過的決議(五))到一九二九年四月第十六次代表會議(見『關於發展農業的途徑』的決議(三六))這個期間的文件,那就不能不看出,『限制富農剝削趨向』或『限制農村資本主義增長』的論點總是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戰勝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論點同時並提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黨沒有把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同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即限制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分開。

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及第十六次代表會議完全是站在『限制農業資產階級的剝削趨向』(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七))這一政策的基礎上,站在『採取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辦法』(同上)這一政策的基礎上,站在『堅決限制富農剝削趨向』(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五年計劃的決議(六))這一政策的基礎上,站在『向富農進攻』即『進一步地、更有步驟和更堅決地限制富農和私商』(同上)這一政策的基礎上,站在『更堅決地從經濟上排擠』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成分』(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就中央總結報告所通過的決議(四))這一政策的基礎上。

因此，(甲)該文作者把限制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和排擠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說成兩個不同的政策是不正確的。事實說明，這裏只有一個限制資本主義的總的政策，而排擠富農個別隊伍是這個政策的組成部分和結果。

因此，(乙)該文作者斷言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只是在改造時期，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時期才開始的，這也是不正確的。事實上，無論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前，即在恢復時期，還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後，即在改造時期，排擠都是有的。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時期，只是用新的補充辦法加強了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因此，對富農個別隊伍的排擠也就必然加強了。

二、該文說：

『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完全是從排擠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中產生出來的，它是後一政策在新階段上的繼續。』

這種論斷是不確切的，因而也是不對的。當然，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由以前限制即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整個時期準備好的。但這還不是說，它和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沒有根本區別，它似乎是限制政策的繼續。像我們的作者那樣說，就是否認從一九二九年夏季起在農村發展中所發生的轉變。那樣說，就是否認這個時期內我們在我們黨的農村政策上實行了轉變的事實。那樣說，就是給我們黨內的右傾分子造成一種思想上的護符，因為右傾分子現在正抓住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來反對黨的新政策，就像過去弗魯姆金抓住第十四次代表大

會的決議來反對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政策一樣。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宣佈加強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的出發點是什麼呢？它的出發點是：雖然對富農實行了這種限制，但富農作爲一個階級在相當時期內還是要繼續存在的。根據這一點，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決定保留土地租佃法，雖然明明知道大多數租佃者都是富農。根據這一點，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決定保留農村僱傭勞動法，要求切實執行這個法律。根據這一點，再次宣佈了不准剝奪富農財產。這些法律和這些決議是否同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抵觸呢？當然不抵觸。這些法律和這些決議是否同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抵觸呢？當然是抵觸的！因此，現在在全盤集體化的地區就不得不把這些法律和這些決議擱在一邊，而全盤集體化的範圍不是逐日擴大而是逐時擴大的。況且，這些法律和這些決議已經被全盤集體化地區集體農莊運動的進程本身擱在一邊了。

既然如此，能不能斷言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繼續呢？顯然不能。

該文作者忘記了：如果把生產工具和土地自由使用權保留在富農階級手裏，如果在我們的實踐中保存農村僱傭勞動法和土地租佃法並禁止剝奪富農財產，那末用稅收和其他任何限制辦法都是不能排擠富農階級的。作者忘記了：在實行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時只能指望排擠富農的個別隊伍；這和在相當時期內保存富農階級並不抵觸，相反地，倒是預計到這一點的。要排擠富農階級，單靠限

制和排擠富農個別隊伍的政策是不夠的。要排擠富農階級，必須在公開的戰鬥中擊破這個階級的反抗，剝奪這個階級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產基礎（土地的自由使用、生產工具、租用土地、勞動僱傭權等等）。

這就是向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方面的轉變。否則關於排擠富農階級的談論就只能合乎右傾分子的心意並對他們有利的無謂空談。否則就不能有任何真正的農村集體化，更談不到全盤集體化了。我們農村中的那些正在粉碎富農而實行全盤集體化的貧農和中農對這一點了解得很清楚。看來我們的某些同志還不了解這一點。

因此，目前黨在農村中的政策並不是舊政策的繼續，而是從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舊政策向消滅富農階級的新政策方面的轉變。

載於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紅星報」第十八號

署名：約·斯大林

答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同志們

(10)

一 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提出的問題

一、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關於俄共(布)策略的提綱(三)中說蘇維埃俄國有兩個主要階級。

現在我們說要把富農和新資產階級作為階級來消滅。

這是不是說我國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形成了第三個階級？

二、你在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說過：『我們所以採取新經濟政策，就是因為它為社會主義專業服務。當它不再為社會主義專業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怎樣了解這個『拋開』，又怎樣拋法？

三、隨着在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方面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黨應當怎樣改變現在決定着無產階級和農民各階層相互關係的口號，『要善於和中農成立協議，一分鐘也不放棄對富農的鬥爭，而只是穩固地依靠貧農』(列寧)(三)？

四、必須採取哪些方法才能消滅富農階級？

五、同時實行兩個口號，在全盤集體化地區實行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在沒有全盤集體化的地區實行限制和排擠富農的口號，是否會引起沒有全盤集體化的地區的富農自我消滅（糟蹋財產和生產資料）？

六、我國富農階級的消滅和階級鬥爭的尖銳化，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和革命浪潮的高漲，對『喘息時機』的長短會有什麼影響？

七、你對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的革命高潮轉變為直接革命形勢的可能性怎樣估計？

八、整個整個車間的工人決定入黨，從黨和工人階級今後的相互關係來看，對工人階級的這種新動態應當怎樣估計？

九、由於集體農莊運動的大規模發展，擴大農村黨組織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在擴大的範圍和接收各階層集體農莊莊員入黨方面，我們的政策應當怎樣？

十、你對經濟學家在政治經濟學的一些極重要問題上所發生的爭論的看法怎樣？

二 斯大林同志的答覆

第一·個·問·題·。列寧說過有兩個主要階級。但是，他當然知道存在着第三個階級即資本主義階級

（富農和城市資產階級）。富農和城市資產階級當然不是在新經濟政策施行以後才『形成』階級的。他們在新經濟政策以前就已經存在，不過是一個次要的階級。新經濟政策在發展的最初階段，曾在某種程度上便利了這個階級的發展。但是，新經濟政策更多地幫助了社會主義成分的增長。黨轉入全綫進攻，就把問題急劇地轉到了打垮並消滅農村資產階級和一部分城市資產階級方面。

爲了說得確切起見，必須指出，黨並沒有指示把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擴大到城市新資產階級方面去。應該看到耐普曼和富農之間的差別：耐普曼基本上早就被剝奪了生產基礎，所以在我們的經濟生活中不佔多少重要的地位；而富農直到最近在農村中還佔重要的經濟地位，我們只是現在才剝奪他們的生產基礎。

我認爲我們的某些組織忘記了這個差別，它們企圖用消滅城市資產階級的口號來『補充』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所以犯了錯誤。

第二個問題。我在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代表大會上演說時所講的那句盡人皆知的話應當這樣了解：當我們已經不需要容許某種程度的私人貿易自由的時候，當這種容許只會產生壞結果的時候，當我們有可能通過自己的商業組織來調整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貿易及其私人流轉，不必容許資本主義某種活躍的時候，我們就『把新經濟政策拋開』。

第三個問題。很明顯，隨着蘇聯大部分地區的集體化，富農階級將會消滅，——因此，伊里奇的公式的這一部分就不適用了。至於集體農莊裏的中農和貧農，那末隨着集體農莊的機械化和拖拉機

化，他們將融合爲集體化農村的工作人員的統一的隊伍。因此，將來在我們的口號中就不會再有『中農』和『貧農』的概念了。

第四個問題。消滅富農階級的主要方法是普遍集體化。其餘一切辦法都必須適應這個主要方法。凡是和這個方法抵觸或者會減弱它的作用的都必須拋棄。

第五個問題。決不能把『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和『限制富農』的口號說成兩個獨立的和平等的口號。從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時起，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就成了主要口號，而在沒有全盤集體化的地區，限制富農的口號就從獨立的口號變成了補助口號，變成了主要口號的補助口號，變成了使這些地區易於爲過渡到主要口號準備條件的口號。可見在目前新的情況下，『限制富農』的口號所佔的地位同它一年前和更早以前所佔的地位比較起來已經根本改變了。

應該指出，可惜我們的某些報刊沒有注意到這個特點。

在沒有全盤集體化的地區，一部分富農預料要被剝奪財產而實行『自我消滅』，『糟蹋財產和生產資料』，這是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當然必須反對這種行爲。但是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我們應當准許把剝奪富農財產不當做集體化工作的一部分，而當做在集體化以前和離開集體化而進行的獨立工作來做。准許這樣做，就是拿分配所沒收的富農財產使個別農民個人致富的政策來代替把這些財產變爲集體農莊公有的政策。這種代替是後退一步，而不是前進一步。反對富農『糟蹋』財產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加強沒有全盤集體化的地區的集體化工作。

第六個問題。你們所列舉的手段和條件能大大縮短『喘息』時期。但是，它們無疑地一定會加強和增多我們的防衛手段。這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際形勢，取決於國際資本主義陣營內的矛盾的增長，取決於世界經濟危機的進一步擴展。但這是另一個問題。

第七個問題。不能在『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勢』之間劃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綫。不能說：『在這條綫之內是革命高潮，一過這條綫就是向直接革命形勢的飛躍。』只有書獃子才會這樣提問題。前者通常是『不知不覺地』轉為後者的。任務在於立即準備無產階級進行堅決的革命戰鬥，不要等待所謂直接革命形勢的時刻『到來』。

第八個問題。整個整個車間甚至整個整個工廠的工人希望入黨，這是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革命熱情大大提高的標誌，是黨的政策正確的標誌，是廣大工人階級羣衆熱烈擁護這個政策的標誌。但是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我們應該接收一切希望入黨的人入黨。在車間和工廠裏有各種各樣的人，甚至有害害分子。因此，黨應該繼續採用個別對待每個希望入黨的人和個別接收入黨這一經過考驗的方法。我們不僅需要數量，而且需要質量。

第九個問題。不言而喻，集體農莊中黨的隊伍將比較迅速地發展。最好是集體農莊運動中一切在反富農鬥爭中鍛鍊得最堅強分子，特別是僱農和貧農分子，都能在黨的隊伍裏得到發揮自己力量的機會。這裏當然應該特別堅決地實行個別對待和個別接收入黨的方法。

第十個問題。在我看來，在經濟學家的爭論中有很多煩瑣的和臆造的東西。如果剝去爭論的外

殼，那末爭論雙方的主要錯誤如下：

(甲) 任何一方都未能很好地運用兩條戰綫鬥爭的方法：既反對『魯賓主義』，又反對『機械主義』；⁽¹⁾⁽²⁾⁽³⁾

(乙) 雙方都離開了蘇聯經濟和世界帝國主義的基本問題而陷入了學究式的抽象議論，因而把兩年的工作消耗在抽象的題目上，這當然是合乎我們敵人的心意並對他們有利的。 致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二月九日

載於一九三〇年二月十日

『真理報』第四十號

勝利衝昏頭腦

(論集體農莊運動的幾個問題)

現在大家都在談論蘇維埃政權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的勝利。甚至敵人也不得不承認我們獲得了重大勝利。這些勝利確實是偉大的。

截至今年二月二十日，蘇聯全國百分之五十的農戶已經集體化了，這是事實。這就是說，截至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日，我們已經超額完成了集體化五年計劃的一倍以上。

截至今年二月二十八日，集體農莊已經收藏了春播用的種子三千六百多萬公担，等於計劃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約合二億二千萬普特，這是事實。不能不承認，在糧食收購計劃順利完成以後，單是集體農莊方面就收藏了二億二千萬普特種子，這是一個極大的成就。

這一切說明什麼呢？

說明農村向社會主義的根本轉變可以認為已經有保證了。

無須證明，這些勝利對於我們國家的命運，對於作為我國領導力量的整個工人階級以及對於黨本身都有極大的意義。姑且不說直接的實際結果，這些勝利對於黨本身的內部生活，對於我們黨的教

育也是有巨大意義的。這些勝利鼓起了我們黨的勇氣和對自己力量的信心。這些勝利用相信我們的事業必勝的信念武裝了工人階級。這些勝利把千百萬新的後備力量吸引到我們黨的周圍。

因此，黨的任務是：鞏固既得的勝利，有計劃地利用這些勝利以求進一步的前進。

但是，勝利也有它的陰暗的一面，特別當它是比較『容易地』，所謂『出乎意料之外地』得到的時候。這樣的勝利有時使人產生自負和驕傲的心理：『我們什麼都能幹！』『我們什麼都不在乎！』這些勝利往往使人陶醉，人們也就開始被勝利衝昏頭腦，喪失權衡輕重的知覺，喪失了解現實的能力，出現過高估計自己力量而過低估計敵人力量的趨向，出現想『一下子』解決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切問題的冒險企圖。這樣也就不會關心鞏固既得的勝利和有計劃地利用這些勝利以求進一步的前進。爲什麼我們要鞏固既得的勝利呢，我們就這樣也能『一下子』跑到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因爲『我們什麼都能幹！』『我們什麼都不在乎！』

因此，黨的任務是：和這種對事業有害的危險情緒作堅決鬥爭，把它從黨內清除出去。

不能說這種對事業有害的危險情緒在我們黨的隊伍裏有什麼廣泛的散佈。但是，這種情緒在我們黨內畢竟是有的，而且沒有根據可以斷定說這種情緒不會加強起來。如果這種情緒在我們這裏得到公認，那末毫無疑問，集體農莊運動就會大大削弱，這個運動被破壞的危險就會成爲現實。

因此，我們報刊的任務是：有系統地揭穿諸如此類的反列寧主義的情緒。

舉幾個事實來說。

一、我們的集體農莊政策取得勝利的原因之一，就在於這個政策是以集體農莊運動的自願原則和估計到蘇聯各個不同地區的各種不同條件的原則為依據的。決不能用強力去建立集體農莊。這樣做是愚蠢的和反動的。集體農莊運動應當依靠基本農民羣衆的積極支持。決不能把先進地區集體農莊建設的一套做法機械地搬到落後地區去。這樣做是愚蠢的和反動的。這樣的『政策』一下子就會破壞集體化思想。在規定集體農莊建設的速度和方法的時候，應當周密地估計到蘇聯各個不同地區的各种不同條件。

在集體農莊運動中，我們的產糧區走在一切地區的前面。爲什麼呢？

第一、因爲在這些地區我們有最多的已經鞏固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通過這些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農民已經有可能相信新技術的力量和意義，相信新的集體經濟組織的力量和意義。

第二、因爲這些地區在糧食收購運動中有兩年反富農鬥爭的經驗，這不能不有助於集體農莊運動。

最後，因爲這些地區最近幾年來從工業中心得到了大批優秀幹部。

能不能說其他地區，例如消費地區（如我國北方各區）或者還落後的民族居住的地區（如土爾克斯坦），也具備了這些特別有利的條件呢？

不，不能這樣說。

很明顯，和自願原則一樣，估計到蘇聯各個不同地區的各種不同條件的原則是健康的集體農莊

運動的最重要前提之一。

而我們的實際情況有時又是怎樣呢？能不能說自願原則和估計到地方特點的原則沒有在某些地區遭到破壞呢？不，可惜不能這樣說。例如大家知道，在北方某些消費地區，立即組織集體農莊的有利條件比產糧區要少些，但是人們往往竭力用對集體農莊運動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用發展集體農莊的紙上決議，用組織實際上還不存在但是已經有一大堆吹牛的決議說得它好像『存在』的紙上集體農莊，來代替組織集體農莊的準備工作。

或者拿土爾克斯坦某些地區來說，那裏立即組織集體農莊的有利條件比北方消費地區還少。大家知道，在土爾克斯坦某些地區已經有人企圖用武力威脅的辦法，用不供給暫時不願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灌溉用水和工業品的威脅辦法來『趕上並超過』蘇聯各先進地區。

在這種普利施別也夫下士^①的『政策』同黨在集體農莊建設事業中以自願原則和估計到地方特點的原則為依據的政策之間能有什麼共同之處呢？很明顯，它們之間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絲毫共同之處。

誰需要這種歪曲，這種對集體農莊運動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這種對農民的可恥的威脅呢？除了我們的敵人，誰也不需要！

這種歪曲會造成什麼結果呢？會加強我們的敵人而破壞集體農莊運動的思想。

以『左派』自居的製造這種歪曲的人事實際上是在幫助右傾機會主義，這不是很明顯嗎？

二、我們黨的政治戰略的最大優點之一，就是它善於在每一個時機找出運動的基本環節，抓住了這個基本環節，然後就把整個鍊條拖向一個總的目標去解決任務。是否可以說黨在集體農莊建設體系中已經找出了集體農莊運動的基本環節呢？是的，可以而且應當這樣說。

這個基本環節是什麼呢？

也許是共耕社吧？不，不是共耕社。生產資料還沒有公有化的共耕社是集體農莊運動中已經過時的階段。

也許是農業公社吧？不，不是公社。公社在目前還是集體農莊運動中的個別現象。把這種不僅生產公有化而且分配也公有化的農業公社作為主要形式，條件還沒有成熟。

在目前時期，集體農莊運動的基本環節，即現在應當抓住的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形式，就是農業勞動組合。

在農業勞動組合中實行公有化的是基本生產資料，主要是穀物業方面的基本生產資料：勞動、土地使用、機器和其他農具、耕畜以及經營用的建築物。在農業勞動組合中不實行公有化的是：宅旁園地（小菜園、小果園）、住宅、一部分產乳牲畜、小牲畜、家禽等等。

勞動組合是集體農莊運動的基本環節，因為它是解決穀物問題的最適當的形式。而穀物問題又是整個農業體系中的基本環節，因為不解決穀物問題就不能解決畜牧業（小牲畜和大牲畜）問題，也不能解決給工業提供主要原料的技術作物和特種作物問題。正因為如此，農業勞動組合在目前時期

是集體農莊運動體系中的基本環節。

集體農莊『標準章程』就是從這一點出發的，它的最後定本今天公佈了①。

我們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也應當從這一點出發，他們的職責之一就是切實研究這個章程並徹底實行這個章程。

黨在目前時期的方針就是這樣。

能不能說黨的這個方針在實行時沒有遭到破壞和歪曲呢？不，可惜不能這樣說。大家知道，在蘇聯某些地區，爭取集體農莊存在的鬥爭還遠沒有結束，勞動組合還沒有鞏固，但是有人企圖跳出勞動組合的範圍，一下子跳到農業公社。勞動組合還沒有鞏固，但是他們已經在使住宅、小牲畜和家禽『公有化』，而這種『公有化』也就變成了紙上的官僚主義的命令，因為現在還沒有使這種公有化成為必要的條件。他們這樣做，彷彿穀物問題在集體農莊中已經解決，它是已經過時的階段，目前時期的基本任務不是解決穀物問題，而是解決畜牧業和養禽業問題。試問，誰需要這種把集體農莊運動的各種形式攪成一團的魯莽『工作』呢？誰需要這種愚蠢的對事業有害的急躁冒進呢？當穀物問題還沒有解決，集體農莊的勞動組合形式還沒有鞏固的時候，拿住宅、全部產乳牲畜、全部小牲畜和家禽的『公有化』來戲弄集體農民，——這樣的『政策』只能合乎我們的死敵的心意並對他們有利，這難道

①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真理報』。

還不明顯嗎？

在這種熱心的『公有化者』當中，有一位竟向勞動組合下命令，責令『三天之內把每個農戶的家禽總數統計出來』，設置專門的『指揮員』來指揮統計和監督工作，『佔領勞動組合中的制高點』，『指揮社會主義戰鬥，不得離開崗位』，而——當然的事——把整個勞動組合緊握在拳裏。

這是什麼呢，是領導集體農莊的政策還是瓦解集體農莊和破壞集體農莊威信的政策呢？

至於那些從拆下教堂的鐘着手組織勞動組合的所謂『革命家』，那就更不用說了。把鐘拆下，——這該是多麼革命呵！

在我們隊伍裏怎麼能產生這種『公有化』方面的魯莽兒戲，這種想跳過自身的可笑企圖，這種目的在於迴避階級和階級鬥爭而實際上是幫助我們的階級敵人的企圖呢？

它們只有在我們集體農莊建設戰綫上『容易地』和『出乎意料之外地』取得勝利的情況下才能產生。

它們只有在一部分黨員產生了魯莽情緒，認為『我們什麼都能幹！』『我們什麼都不在乎！』的情況下才能產生。

它們只有在我們的某些同志被勝利衝昏了頭腦，暫時喪失了清醒的理智和冷靜的眼光的情況下才能產生。

爲了糾正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工作路綫，必須消除這種情緒。

這就是黨的當前任務之一。

領導的藝術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落在運動後面，因為落在後面就是脫離羣衆。但是也不能跑得太遠，因為跑得太遠就是失掉羣衆而使自己孤立。誰想領導運動而同時又保持和千百萬羣衆的聯系，誰就應當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既反對落後的人，又反對跑得太遠的人。

我們黨所以強而有力和不可戰勝，就是因為它在領導運動的時候善於保持和加強自己同千百萬工農羣衆的聯系。

載於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

『真理報』第六十號

署名：約·斯大林

① 指俄國作家契訶夫所寫的短篇故事『普利施別也夫下士』中的主人公。他驕傲自大，愚昧無知，蠻不講理，干涉他人自由，想壓制和窒息一切有生命的東西。——譯者註

給別澤緬斯基同志的信

別澤緬斯基同志！

信寫遲了。

我不是文學專家，當然也不是批評家。但是由於你的堅決的請求，我可以把我個人的意見告訴你。

『射擊』和『我們生活的一天』我都讀過了。這兩部作品中既沒有任何『小資產階級的』東西，也沒有任何『反黨的』東西。這兩部作品，特別是『射擊』，可以認為是目前革命的無產階級藝術的範例。

固然，這兩部作品中有些青年團先鋒主義的殘餘。沒有經驗的讀者讀了這兩部作品，甚至會以為不是黨在改正青年的錯誤，而是相反。但是，構成這兩部作品的主要特徵和基本思想的並不是這個缺點。它們的基本思想在於尖銳地提出了我們機關的缺點問題，並且深信這些缺點能夠改正。不論是『射擊』或是『我們生活的一天』，其中主要的東西就在這裏。它們的主要價值也就在這裏。這個價值

大大地蓋過了而且深深地掩沒了它們那些很小的、在我看來是正在消失的缺點。

致

約·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九日

第一次刊印

答集體農莊莊員同志們

大家從報上知道，斯大林的『勝利衝昏頭腦』^①一文和中央的『關於反對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的路線』^②的著名決議在集體農莊運動的實際工作中間引起了很多反應。因此，近來我收到了莊員同志們的許多來信，要求答覆信中所提出的問題。本來我應當以私人通信方式答覆來信。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半數以上的來信沒有寫明寄信人的地址（忘記寫地址了）。可是，信中所涉及的問題對於我們所有的同志都有莫大的政治意義。此外，當然我也不能不答覆那些忘記寫明自己地址的同志。因此，我不得不從來信中挑出一切必要的問題，公開地即在報刊上答覆莊員同志們的來信。加上中央對此已有直接的決定，所以我就更樂意這樣做了。

第一·個·問·題·：在農民問題上發生錯誤的根源在哪裏？

答·：在於不正確地對待了中農。在於在和中農的經濟關係方面採用了暴力。在於忘記了和中農羣衆的經濟結合不應當建立在強制手段的基礎上，而應當建立在和中農協議的基礎上，建立在和中

① 見本卷第一六七頁至第一七四頁。——編者註

農聯盟的基礎上。在於忘記了目前時期集體農莊運動的基礎是工人階級和貧農聯合中農去反對一般資本主義，特別是反對富農。

當和中農結成統一戰綫向富農進攻的時候，一切都進行得很好。可是，當我們的某些陶醉於勝利的同志不知不覺地從進攻富農的道路滾到反對中農的道路的時候，當他們因為追求集體化的高的百分數而對中農採用暴力，褫奪中農的選舉權，像剝奪富農那樣剝奪中農財產的時候，進攻就被歪曲，和中農的統一戰綫就被破壞，富農當然也就得到了企圖恢復元氣的機會。

他們忘記了：在我們的階級敵人鬥爭時，暴力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在對待作為我們的同盟者的中農時，暴力就是不可容許的和極端有害的了。

他們忘記了：在解決軍事性質的任務時，騎兵式的突襲是必要的和有利的，但是在解決集體農莊建設任務而且是聯合中農來進行的建設任務時，騎兵式的突襲就是不適用的和極端有害的了。

這就是在農民問題上發生錯誤的根源。

請看列寧關於和中農的經濟關係所說的話：

『我們首先應當依據的真理，就是在這裏採用暴力方法其實是什麼也做不到的。這裏的經濟任務完全是另一種樣子。這裏沒有上層可以拆去，而留下整個基礎和整個結構。這裏沒有城市有過的那種上層，即資·本·家。在·這·裏·採·用·暴·力，就·是·葬·送·全·部·事·業……要·想·在·經·濟·方·面·對·中·農·採·用·暴·力，那·是·再·愚·蠢·不·過·了。』（『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八七頁、第一八八頁）

其次：

『用暴力對待中農是極有害的。中農是一個人數衆多的千百萬人的階層。甚至在歐洲，那裏任何地方的中農都沒有這樣大的力量，那裏技術和文化、城市生活和鐵路交通特別發達，那裏最容易產生用暴力對待中農的思想，可是無論什麼人，無論哪一個最革命的社會主義者，都沒有主張用強制手段對待中農。』（『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八七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第二個問題：集體農莊運動中的主要錯誤是什麼？

答：主要錯誤至少有三個。

（一）違背了列寧的建立集體農莊的自願原則。違背了黨關於集體農莊建設的自願原則的基本指示和農業勞動組合標準章程關於自願原則的規定。

列寧主義教導說，必須根據自願原則，用說服農民，使他們相信公共的集體經濟比個體經濟優越的方法把他們引上集體經濟的軌道。列寧主義教導說，只有向農民指明並用事實、用經驗證明集體農莊比個體經濟好，集體農莊比個體經濟有利，集體農莊能使農民，使貧農和中農擺脫貧窮和困苦的時候，才能說服農民，使他們相信集體農莊的優越性。列寧主義教導說，沒有這些條件，集體農莊就不能鞏固。列寧主義教導說，任何想用暴力迫使農民接受集體農莊經濟的企圖，任何想用強迫手段建立集體農莊的企圖，都只能產生不良後果，只能使農民離開集體農莊運動。

事實也的確是這樣，當遵守這個基本規則的時候，集體農莊運動就節節取得勝利。但是，我們的某些陶醉於勝利的同志竟開始忽視這個規則，開始表現出過分的急躁，並且因為追求集體化的高的百分數而開始用強迫手段建立集體農莊。無怪乎這種『政策』的不良後果很快就暴露出來了。迅速出現的集體農莊，像它迅速出現那樣迅速地消失了，而一部分昨天還很信任集體農莊的農民現在開始躲避集體農莊了。

這就是集體農莊運動中的第一個和主要的錯誤。

請看列寧關於集體農莊建設的自願原則所說的話：

『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過渡到公共耕種制，過渡到公共的大經濟。但是，任何強迫手段都是蘇維埃政權所不能採取的；任何法律都不能強迫這樣做。農業公社是根據自願原則建立的，過渡到公共耕種制只能是自願的，在這方面，任何強迫手段都是工農政府所不能採取的，而且是法律所不容許的。如果你們中間任何人看到這樣的強迫手段，那你們應當知道，這是濫用職權，這是違反法律，這是我們正在竭力糾正而且一定要糾正的現象。』○（『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二十六頁至第二十七頁）

其次：

『掌握着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能够在事實上向農民指明公共的、集體的、協作的、勞動組合的耕種制的優越性的時候，只有當它能够用協作的、勞動組合的經濟來幫助農民的，勞動組合的耕種制的優越性的時候，只有當它能够在事實上向農民證明自己是正確的，才能牢靠地和實在地千百萬農民羣衆真正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因此，任何有助於協作的、勞動組合的農業的措施，其意義都是難以估價的。我們有千百萬零散的、分佈在窮鄉僻壤的個體農戶……只有當過渡到協作的、勞動組合的農業是必要而可能的這一點在實踐中和在農民親身經驗中得到證明的時候，我們才有權利說，俄國這樣幅員廣大的農民國家已經在社會主義農業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①（『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七三頁至第一七四頁）

最後，再看列寧著作中的另一段話：

『蘇維埃政權的代表們鼓勵各種協作社以及中農農業公社，但是不應當容許在建立這種協作社和農業公社的時候採取任何強迫手段。只有那些由農民自己自由發起的、其好處經他們在實踐中檢驗過的聯合才是有價值的。在這件事上過分急躁是有害的，因為這只能加強中農對新事物的成見。那些擅敢利用不僅是直接的而且哪怕是間接的強迫手段來使農民加入公社的蘇維埃政權代表，都應當受到極嚴厲的處分，應當撤銷他們在農村中的工作。』②（『列寧全集』第四

① 蕭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九四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幾乎用不着證明，黨是會十分嚴格地執行列寧的這些指示的。

(二) 違背了列寧的在進行集體農莊建設時必須估計到蘇聯各個不同地區的各種不同條件的原則。忘記了蘇聯有各種各樣的地區，這些地區各有不同的經濟結構和文化水平。忘記了這些地區中間有先進的、中等的和落後的。忘記了集體農莊運動的速度和集體農莊建設的方法對於這些遠不相同的地區不能是一樣的。

列寧說：『如果我們簡單地按照死板格式來為俄國各地抄錄法令，如果烏克蘭和頓河區的布爾什維克黨員、蘇維埃工作人員不加分析地籠統地把這些法令推行到其他地區去，那就錯了……』因為『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來束縛自己，無論如何也不能一成不變地認為我們的經驗，俄國中部的經驗，可以完全搬到一切邊區』（『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三八頁）。

其次，列寧說：

『如果死板地把俄國中部、烏克蘭和西伯利亞混為一談，使它們服從於一定的死板格式，那就愚蠢萬分了。』（『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八頁）

最後，列寧責成高加索的共產黨員，要他們

『了解他們的特殊情況，他們的共和國的、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情況和條件不同的特殊情況；了解決不可以抄襲我們的策略，而必須深思熟慮地改變它的形式以適合於不同的具體條件』（『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九五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根據列寧的這些指示，我們黨中央在它『關於集體化的速度』的決議（見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真理報』^{〔三〕}）中按照集體化的速度把蘇聯各地區分成三類，其中北高加索、伏爾加河中游和伏爾加河下游基本上可以在一九三一年春季完成集體化；其他產糧區（烏克蘭、中央黑土區、西伯利亞、烏拉爾、哈薩克斯坦等等）基本上可以在一九三二年春季完成集體化；其餘地區可以把集體化的完成延到五年計劃期末，即延到一九三三年。

而實際上又是怎樣呢？實際上我們的某些陶醉於集體農莊運動的初步成就的同志把列寧的指示和中央的決議都安然忘記了。莫斯科省因為拚命追求集體化的虛誇數字，竟責成其工作人員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就完成集體化，雖然該省擁有不下三年的時間（到一九三二年底）。中央黑土區因為不願意『落後於他人』，竟責成其工作人員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就完成集體化，雖然該區擁有不下兩年的時間（到一九三一年底）。而南高加索人和土爾克斯坦人因為熱心於『趕上並超過』各先進地區，竟採取了在『最短期間』完成集體化的方針，雖然他們擁有整整四年的時間（到一九三三年底）。

很明顯，在這種匆忙的集體化『速度』之下，那些對集體農莊運動準備較差的地區因為熱心於

『超過』準備較好的地區，就不得不施行強烈的行政壓力，企圖用自己的行政熱情來彌補集體農莊運動快速發展所缺少的因素。其後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知道，在這些地區造成了混亂，後來不得不由中央加以干涉來消除這種混亂。

這就是集體農莊運動中的第二個錯誤。

(二) 違背了列寧的在進行集體農莊建設時不容許跳過運動尚未完結的形式原則。違背了列寧的原則：不要超過羣衆的發展程度，不要命令羣衆運動，不要脫離羣衆，而要和羣衆一起前進並推動他們前進，把他們引導到我們的口號下面，並幫助他們根據自己親身的經驗來相信我們的口號的正確性。

列寧說：『當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的士兵奪取政權的時候，他們清楚地知道，農村中的建設將遇到很大困難，在這裏必須更加穩步前進，在這裏企圖用法令和命令來實行公共耕種制是極端荒謬的，能够贊成公共耕種制的只有極少數的覺悟農民，絕大多數農民沒有決定這樣做。因此，我們僅僅採取了革命發展所絕對必需的辦法：決不超過羣衆的發展程度，而要等到前進的運動從這些羣衆親身的經驗中、從他們親身的鬥爭中成長起來。』^①（『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一二一頁）

根據列寧的這些指示，中央在它『關於集體化的速度』的著名決議（見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真理報』）中認為：

（甲）目前時期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形式是農業勞動組合；

（乙）因此必須制定作為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形式的農業勞動組合的標準章程；

（丙）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決不能容許從上面『命令』集體農莊運動和『把集體化當做兒戲』。

這就是說，現在我們應當採取的方針不是建立公社，而是建立作為集體農莊建設的主要形式的農業勞動組合；決不能容許跳過農業勞動組合而逕直成立公社；決不能用『命令』集體農莊和『把集體農莊當做兒戲』來代替農民參加集體農莊的羣衆運動。

看來是很明白了。

而實際上又是怎樣呢？實際上我們的某些陶醉於集體農莊運動的初步成就的同志把列寧的指示和中央的決議都安然忘記了。這些同志不去組織建立農業勞動組合的羣衆運動，却使個體農民逕直『轉上』公社章程。不去鞏固運動的勞動組合形式，却用強迫手段使小牲畜、家禽、自用產乳牲畜和住宅『公有化』。

列寧主義者所不容有的這種急躁情緒的後果現在是大家都知道的。穩固的公社通常當然沒有建立起來。但是許多農業勞動組合却放棄了。固然，『好的』決議留下來了。但是它們有什麼用處呢？

這就是集體農莊運動中的第三個錯誤。

第三個問題：『怎麼會產生這些錯誤，黨應當怎樣糾正這些錯誤？』

答：這些錯誤是由於我們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迅速取得勝利而產生的。勝利有時能衝昏人的頭腦。勝利往往使人產生過分的自負和驕傲。這特別容易發生在執政黨的代表人物身上。尤其是像我們黨這樣一個幾乎具有無比的力量和威望的黨。列寧所激烈反對的那種共產黨員驕誇的事實，在這裏是很可能產生的。相信法令、決議和命令萬能的心理，在這裏是很可能產生的。黨的革命措施在我們這闊廣大的國家的某些角落變成黨的個別代表的空洞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的危險，在這裏是很現實的。我指的不僅是地方工作人員，而且是個別省委工作人員和個別中央委員。

列寧說：『共產黨員的驕誇，就是說，側身於共產黨內而還沒有被清洗出去的人妄想用共產黨員名義發號施令來解決自己的一切任務。』（『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五十四頁）

集體農莊運動中的錯誤，對黨在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路線的歪曲，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如果讓這些錯誤和歪曲行爲今後仍然繼續下去，如果不把它們迅速而徹底地消滅，那末它們的危險在哪裏呢？

這裏的危險就在於這些錯誤會直接使我們去破壞集體農莊運動，和中農鬧翻，使貧農隊伍瓦解，使我們的隊伍混亂，使我們整個社會主義建設削弱，使富農恢復起來。

簡單地說，這些錯誤有一種趨向，要把我們從鞏固同基本農民羣衆的聯盟的道路，從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推上同這些羣衆決裂的道路，推上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

這種危險在二月下半月就已暴露出來了，當時我們的一部分迷惑於過去的勝利的同志和列寧的路綫背道而馳。黨中央注意到這種危險，立即干預這件事，委託斯大林在專論集體農莊運動的文章中給那些輕舉妄動的同志們以警告。有些人以為『勝利衝昏頭腦』一文是斯大林個人的創舉。這當然是胡說。我們中央所以存在，並不是爲了讓什麼人在這種事情上表現個人的創舉。這是中央所採取的深入探查的辦法。而當錯誤的深度和範圍已經查明的時候，中央就立即以自己的威望的全部力量來打擊錯誤，公佈了它的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的著名決議。

要使狂奔疾馳的人懸崖勒馬轉上正確的道路是很困難的。但是，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所以稱爲列寧黨的中央委員會，就是因爲它善於克服更大的困難。而且它基本上已經克服了這些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黨的整個整個的隊伍要止住自己的奔馳，及時轉上正確的道路並在行進中整編自己的隊伍是很困難的。但是，我們黨所以稱爲列寧黨，就是因爲它有足夠的機智來克服這些困難。而且它基本上已經克服了這些困難。

這裏主要的問題在於要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並在自己身上找到在最短期間消滅這些錯誤的力量。因爲陶醉於不久以前的勝利而害怕承認自己的錯誤，害怕自我批評，不願意迅速而堅決地糾正錯誤——這就是主要的困難。只要克服了這個困難，只要拋棄了誇大的計劃數字和文牘官僚主義的追求最高數字的做法，只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轉到集體農莊的組織建設和經濟建設的任務上，就能使錯誤徹底消滅。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懷疑，黨基本上已經克服了這個危險的困難。

列寧說：『過去一切滅亡了的革命政黨所以滅亡，就是因為它們驕傲自大，不善於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說出自己的弱點。而我們是不會滅亡的，因為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弱點，並且能够學會克服這些弱點。』①（『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七八頁）

列寧的這些話是不能忘記的。

第四個問題：反對歪曲黨的路綫是不是後退，是不是退却？

答：當然不是！只有那些把繼續犯錯誤和繼續進行歪曲當做進攻，而把和錯誤作鬥爭當做退却的人，才會說這是退却。用堆積錯誤和再三歪曲來實行進攻，——不用說，這是很好的『進攻』……

我們提出了農業勞動組合作爲目前時期集體農莊運動的基本形式，制定了相應的標準章程作爲集體農莊建設工作的指南。我們是不是離開這件事而退却了呢？當然不是！

我們提出了鞏固工人階級和貧農同中農的生產結合作爲目前時期集體農莊運動的基礎。我們是不是離開這件事而退却了呢？當然不是！

我們提出了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作爲目前時期我們在農村實際工作中的主要口號。我們是不是離開這件事而退却了呢？當然不是！

我們還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就規定了蘇聯農業集體化的一定速度，把蘇聯各地區分爲幾類並爲每

①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一類地區規定了特殊的速度。我們是不是離開這件事而退却了呢？當然不是！

這怎能說是黨的『退却』呢？

我們要使那些犯了錯誤和有歪曲行爲的人從他們的錯誤中退出來。我們要使魯莽的人從他們的魯莽行爲中退到列寧主義立場上來。我們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能繼續向我們的階級敵人實行真正的進攻。這是不是說我們這樣做就是後退呢？當然不是！這只是說我們要實行正確的進攻，而不要把進攻當做魯莽的兒戲。

只有怪人和『左』傾過火分子才會把黨的這個立場看做退却，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這種妄談退却的人至少不懂得兩件事情。

(甲)他們不知道進攻規律。他們不懂得不鞏固既得陣地的進攻是必遭失敗的進攻。

比如在軍事方面，進攻在什麼時候才可以成爲勝利的進攻呢？只有在這樣的時候：人們不是一味前進，而是同時努力鞏固既得的陣地，根據已經改變的情況重新部署自己的力量，使後方機關跟上來，把後備隊調過來。爲什麼要這樣做呢？爲了保證自己免遭意外，消滅任何一次進攻都不能避免的個別地方被突破的現象，從而準備徹底消滅敵人。一九二〇年波蘭軍隊的錯誤，如果單從軍事方面來說，在於他們忽視了這個規則。這也就是他們一口氣打到基輔，然後又不得不同樣地一口氣退到華沙的原因之一。一九二〇年蘇維埃軍隊的錯誤，如果也是單從軍事方面來說，在於他們進攻華沙時重犯了波蘭軍隊的錯誤。

關於階級鬥爭戰綫上的進攻規律也必須這樣說。不鞏固既得的陣地，不重新部署自己的力量，不給前綫保證後備隊，不使後方機關跟上來等等，就不能實行順利的進攻以消滅階級敵人。

全部問題在於魯莽的人不懂得進攻規律。全部問題在於黨懂得這些規律並實現這些規律。

(乙) 他們不懂得進攻的階級本質。他們大叫進攻。但是向哪個階級進攻，聯合哪個階級去進攻？我們是聯合中農向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因為只有這種進攻才能使我們取得勝利。但是，如果這種進攻因為黨的個別隊伍陶醉於勝利而開始離開正確的道路，把自己的鋒芒轉向我們的同盟者，轉向中農，那怎麼辦呢？難道我們需要的是任何一種進攻，而不是聯合一定階級去反對一定階級的進攻嗎？要知道唐·吉訶德也以爲他向風車衝鋒就是向敵人進攻。可是大家知道，他在這種所謂進攻中會碰得頭破血流。

大概唐·吉訶德的桂冠使我們的『左』傾過火分子睡不着覺吧。

第五個問題：我們的主要危險是什麼，是右傾危險還是『左』傾危險？

答：現在我們的主要危險是右傾危險。右傾危險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們的主要危險。

這種說法同中央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的決議中關於『左』傾過火分子的錯誤和歪曲行爲是目前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障礙的著名論點是不是矛盾呢？不，不矛盾。因為『左』傾過火分子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的錯誤是一種爲右傾在黨內的加強和鞏固造成有利環境的錯誤。爲什麼呢？因為這些錯誤把黨的路綫歪曲了，因而便利了破壞黨的威信的活動，也就便利了右傾分子反對黨的領導的鬥爭。

破壞黨的領導的威信是右傾分子藉以掀起反黨鬥爭的最基本的條件。這個條件是『左』傾過火分子，是他們的錯誤和歪曲行爲給右傾分子造成的。因此，爲了勝利地和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必須克服『左』傾機會主義者的錯誤。『左』傾過火分子在客觀上是右傾分子的同盟者。

『左』傾機會主義和右傾主義之間的特殊聯系就是這樣。

這種聯系也應該用來說明下面這個事實：某些『左』傾分子時常說要和右傾分子結成同盟。這種聯系也應該用來說明下面這種特殊現象：一部分『左』傾分子昨天還在『實行』高呼烏拉的進攻並企圖在短短兩三個星期內使蘇聯全國集體化，而今天却消極起來，心灰意懶，把鬥爭地盤安然讓給右傾分子，從而實行在富農面前真正退却（沒有引號！）的路綫。

目前時期的特點，就在於和『左』傾過火分子的錯誤作鬥爭是我們勝利地和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的條件和特殊形式。

第六個問題：怎樣估計一部分農民退出集體農莊這件事？

答：一部分農民退出集體農莊這件事說明最近在我們這裏出現了一些不鞏固的集體農莊，目前不堅定的分子正在離開這些集體農莊。這就是說，有名無實的集體農莊將要消失，鞏固的集體農莊將要繼續存在和更加鞏固。我認爲這是完全正常的現象。某些同志因此而悲觀失望，張皇失措，拚命抓住誇大的集體化百分數。另外一些人則幸災樂禍，預言集體農莊運動必定『失敗』。這兩種人都大錯特錯了。這兩種人都遠遠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對集體農莊運動實質的了解。

退出集體農莊的首先是那些所謂死魂靈。這甚至不是退出，而是暴露了空架子。我們是不是需要死魂靈呢？當然不需要。我認爲北高加索人和烏克蘭人解散有死魂靈的集體農莊而組織真正有生命的和真正穩固的集體農莊是做完全正確的。這種做法對集體農莊運動是只有好處的。

其次，退出的是那些公開敵視我們事業的異己分子。很明顯，這種分子被驅逐得愈快，對集體農莊運動就愈好。

最後，退出的是那些動搖分子，這種人既不能叫做異己分子，也不能叫做死魂靈。這是今天我們還沒有能說服他們相信我們事業的正確，但明天我們一定能說服他們的那些農民。這種農民的退出是集體農莊運動的一個嚴重損失，雖然這個損失是暫時的。因此，爭取集體農莊的動搖分子是目前集體農莊運動最迫切的任務之一。

由此可見，一部分農民退出集體農莊並不僅僅是一種壞現象。由此可見，既然這種退出使集體農莊清除了死魂靈和公開異己分子，那末它也就是使集體農莊健全和鞏固的一種有益過程。

一個月以前，有人認爲產糧區的集體化已經達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現在已經很清楚，如果指的是真正的和比較穩固的集體農莊，那末這個數字顯然是誇大了的。如果在一部分農民退出集體農莊以後產糧區的集體化能保持百分之四十（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那就是目前集體農莊運動的極大成績。我是拿產糧區的平均數字來說的，我清楚地知道我們個別全盤集體化地區的集體化已經達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產糧區的集體化達到百分之四十，——這就是說，到一九三〇年春季我們就完成了

原定集體化五年計劃的一倍。

誰敢否認蘇聯社會主義發展方面的這個歷史性成就的決定意義呢？

第七個問題：動搖的農民退出集體農莊是不是做得對？

答：不，他們做得不對。他們退出集體農莊是違反自己切身利益的，因為只有集體農莊才能使農民擺脫貧困和愚昧。他們退出集體農莊就是把自己置於更壞的境地，因為他們使自己失去了蘇維埃政權給予集體農莊的那些優待和好處。集體農莊中的錯誤和歪曲行為不能成為退出的理由。應當留在集體農莊裏用共同的力量來糾正錯誤。既然蘇維埃政權將用全部力量和這些錯誤作鬥爭，那末這些錯誤就容易糾正了。

列寧說：

『商品生產下的小經濟制度決不能使人類擺脫羣衆所受的貧困和壓迫。』（『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五十一頁）

列寧說：

『靠小經濟是擺脫不了貧困的。』（『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二七頁）

列寧說：

『如果我們仍舊依靠小經濟來生活，即使我們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是不免要滅亡的。』（『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六五頁）

列寧說：

『只有依靠共同的、勞動組合的、協作的勞動才能擺脫帝國主義戰爭迫使我們進入的絕境。』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二三頁）

列寧說：

『必須過渡到模範大農莊中的共同耕種制』，因為『不這樣就不能擺脫俄國現在所處的那種經濟破壞狀態，那種簡直是絕望的狀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六六頁）。

這一切說明什麼呢？

說明集體農莊是使農民擺脫貧困和愚昧的唯一手段。

很明顯，農民退出集體農莊是做得不對的。

列寧說：

『你們大家從蘇維埃政權的全部活動中當然可以知道，我們對公社、勞動組合以及一切旨在把個體小農經濟轉變為公共的、協作的或勞動組合的經濟並逐漸促進這種轉變的一般組織賦予多麼巨大的意義。』○（『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七三頁）

列寧說：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蘇維埃政權把公社和協作社放在第一位，給予它們以直接優先權。』○（『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八六頁）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蘇維埃政權將給集體農莊以個體農戶所享受不到的優待和優先權。這就是說，蘇維埃政權在分配土地方面，在供應機器、拖拉機、種子等方面，在減輕賦稅方面，在發放貸款方面，將給集體農莊以優待。

爲什麼蘇維埃政權給集體農莊以優待和優先權呢？

因爲集體農莊是使農民擺脫貧困的唯一手段。

因爲優先幫助集體農莊是幫助貧農和中農的最切實的方式。

前幾天，蘇維埃政權決定對集體農莊的全部公有化的耕畜（馬、犍牛等等），對集體農莊集體所有的和莊員個人所有的全部奶牛、豬、羊和家禽免稅兩年。

此外，蘇維埃政權決定把莊員償付貸款的期限延至年底，並把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在四月一日以前被判處的全部罰款和法律處分取消。

最後，蘇維埃政權決定在本年度必須給集體農莊五億盧布的貸款。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這些優待是用來幫助集體農民的。這些優待是用來幫助那些在退潮時能夠站穩腳根，在反對集體農莊的敵人的鬥爭中受到了鍛鍊，保住了集體農莊並擊住了集體農莊運動的偉大旗幟的集體農民的。這些優待是用來幫助那些現在是我們集體農莊的基本核心，而且將要鞏固和辦好我們的集體農莊，把千百萬農民爭取到社會主義方面的貧農和中農莊員的。這些優待是用來幫助那些現在是集體農莊的骨幹，並且完全配稱爲集體農莊運動的英雄的集體農民的。

退出集體農莊的農民是得不到這些優待的。

農民退出集體農莊是做錯了，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他們只有回到集體農莊裏來才能保證自己得到這些優待，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第八個問題：對公社怎麼辦，是不是應當把它們解散？

答：不，不應當而且用不着把它們解散。我說的是真正的公社，而不是紙上的公社。在蘇聯產糧區有許多值得獎勵和支持的優秀公社。我指的是那些經受多年考驗，受過鬥爭鍛鍊，完全證實了自己有存在價值的老公社。不應當把它們解散，但是應當把它們改造成勞動組合。

建立和管理公社是一件複雜而困難的事情。只有具備了有經驗的幹部和受過鍛鍊的領導者，巨大而穩固的公社才能存在和發展下去。匆忙地從勞動組合章程轉到公社章程，只能使農民離開集體農莊運動。所以對待這件事情要特別鄭重，絲毫不能急躁。勞動組合是一件比較容易辦的事情，是廣大農民羣衆比較容易了解的。所以勞動組合是目前時期集體農莊運動最普遍的形式。只有隨着農業

勞動組合的加強和鞏固，才能造成農民轉向公社方面的羣衆運動的條件。但這不會是很快的事情。所以作爲高級形式的公社只有在將來才能成爲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環節。

第九個問題：對富農怎麼辦？

答：前面我們所說的都是關於中農的問題。中農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因此，我們對中農的政策應該是友好的。富農則是另一回事了。富農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我們和他們之間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和平。我們對富農的政策是把他們作爲一個階級來消滅的政策。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一下子就能把他們消滅掉。這是說我們將設法包圍他們並把他們消滅。

請看列寧關於富農所說的話：

『富農是最殘忍、最粗暴、最野蠻的剝削者，在其他國家的歷史上，他們屢次恢復過地主、皇帝、神甫、資本家的政權。富農的人數比地主和資本家多。但是富農在人民中間畢竟佔少數……這些吸血者在戰爭期間靠人民的貧困發了財，他們抬高糧食和其他產品的價格，積蓄了成千累萬的金錢。這些蜘蛛靠因戰爭而破產的農民，靠挨餓的工人長肥了。這些水蛭吸了勞動人民的血，城市和工廠的工人愈挨餓，他們就愈發財。這些吸血鬼過去和現在都把地主的土地抓到自己手裏，他們再三盤剝貧苦農民。』（『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三十九頁）

我們在實行限制這羣吸血者、蜘蛛和吸血鬼的剝削趨向的政策時是容忍了他們的。我們所以容忍了他們，是因爲當時沒有什麼可以代替富農經濟，代替富農生產。現在我們有可能用我們集體農莊

和國營農場的經濟來代替他們的經濟，而且綽綽有餘了。現在用不着再容忍這些蜘蛛和吸血者了。再容忍這些焚燒集體農莊、殺害集體農莊活動家並企圖破壞播種的蜘蛛和吸血者，就是違反工人和農民的利益。

因此，必須以布爾什維克所特有的那種最堅決最徹底的精神去實行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第十個問題：集體農莊最近的實際任務是什麼？

答：集體農莊最近的實際任務是為播種而鬥爭，為最大限度地擴大播種面積而鬥爭，為正確組織播種而鬥爭。

目前集體農莊的其他一切任務都必須適應於播種任務。

目前集體農莊的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須服從於組織播種的工作。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及其非黨積極分子的穩固性，集體農莊的領導者及其布爾什維克核心的才能，將不是在響亮的決議和堂皇的祝詞中受到檢驗，而是在正確組織播種這一實際工作中受到檢驗。但是要光榮地實現這個實際任務，必須把集體農莊工作人員的注意力轉到集體農莊建設的經濟問題方面去，轉到集體農莊內部建設的問題方面去。

直到最近，集體農莊工作人員所注意的中心問題還是追求集體化的高的數字，而且人們不願意看見真正集體化和紙上集體化之間的差別。現在應該拋棄這種醉心於數字的心理。現在工作人員的注意力應該集中於鞏固集體農莊，使集體農莊在組織上趨於完善，組織集體農莊中的實際工作。

直到最近，集體農莊工作人員的注意力還集中於組織大集體農莊，組織所謂『大型農場』，而這些『大型農場』往往變成在農村中沒有經濟根基的笨重的紙上機關。於是，表面工作吞沒了實際工作。現在應該拋棄這種醉心於表面的心理。現在工作人員的注意力應該着重於農村集體農莊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工作。當這項工作有了相當成績的時候，『大型農場』自然就會出現。

直到最近，還很少注意吸收中農參加集體農莊的領導工作。可是在中農中間有許多出色的管理人材，他們能够成爲集體農莊建設中極好的經濟工作人員。現在應該消除我們工作中的這個缺點。現在的任務就是吸收中農中的優秀分子參加集體農莊的領導工作，讓他們在這方面發揮自己的才能。

直到最近，還沒有充分注意農村中的婦女工作。過去一段時期表明，農村中的婦女工作是我們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環。現在應該堅定不移地消除這個缺點。

直到最近，某些地區的共產黨員還認爲他們能够用自己的力量解決集體農莊建設的一切任務。因此，他們沒有充分注意吸收非黨分子參加集體農莊的負責工作，沒有充分注意提拔非黨分子擔任集體農莊的領導工作，沒有充分注意在集體農莊中組織廣大的非黨積極分子。我們黨的歷史證明，集體農莊建設的過去一段時期再一次表明，這種方針是根本不正確的。如果共產黨員關在自己的小圈子裏，用一堵牆同非黨分子隔開，他們就會葬送整個事業。共產黨員在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戰鬥中能够得到光榮，共產主義的敵人能够被擊潰，其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員善於吸收非黨優秀分子參加工作，他們善於在非黨的廣大階層中間吸取力量，他們善於把廣大非黨積極分子團結在自己黨的周圍。

現在應該堅決不移地消除我們對非黨分子的工作中的這個缺點。

糾正我們工作中的這些缺點，徹底消除這些缺點，——這也就是把集體農莊的經濟工作納入正軌。

總之：

- (一) 正確地組織播種，——這就是任務。
- (二) 把注意力集中在集體農莊運動的經濟問題上，——這就是解決這一任務所必需的手段。

載於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

『真理報』第九十二號

署名：約·斯大林

給工業學院第一期畢業生

培養工人階級和一般勞動者出身的、能够在社會政治方面和生產技術方面領導企業的新的社會主義工業幹部是當前的首要任務。

不完成這個任務就不能使蘇聯由落後的國家變為先進的國家，由農業國家變為工業國家，變為電氣化和金屬的國家，變為機器和拖拉機的國家。

工業學院是我國培養這種幹部的最重要的熔爐之一。

工業學院第一期畢業生是工業學院向我們敵人的營壘、向生產保守和技術落後的營壘射出的第一箭。

希望今天離開學校門的新的工業領導者在實踐中，在實現布爾什維克的建設速度方面，表現出發揮勞動熱情和進行真正革命工作的榜樣。

謹向為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培養新的、有技術知識素養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者的工業學院的第

一期畢業生致敬。

約·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載於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真理報』第一一五號

答姆·拉法伊爾同志

(列寧格勒，省工會委員會)

(抄致聯共(布)省委員會書記基洛夫同志)

拉法伊爾同志！

因為時間不夠，所以簡單答覆如下：

(一) 今年三月中央反對集體農莊運動中的過火行爲同布列斯特時期或施行新經濟政策時期之間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相似的地方。那時我們所看到的是政策上的轉變。現在，在一九三〇年三月沒有任何政策上的轉變。我們制止了輕舉妄動的同志，——僅此而已。因此，你的建立在類比上(雖然不完全如此)的一切推論都是不能成立的。

(二) 集體農莊運動問題方面的政策上的轉變(由於中農羣衆轉向集體農莊)在我們這裏確實有過，但不是在一九三〇年三月，而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政策上的這個轉變的基礎還是在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奠定的(見『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

我已經說過，這個轉變具有純粹實踐的性質是在一九二九年底。你一定知道，中央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的著名決議中對新政策做了明文規定，並規定了蘇聯各種不同地區的集體農莊運動的速

度。事實證明，中央這個決議的每項條文都是完全正確的。

中央在這裏是不是有某種落後於運動進程的現象呢？我認爲，既然這裏指的是理論上的預見和制定相應的政治方針，那末這裏是沒有任何落後現象的。

不少黨的隊伍和個別中央委員在他們的實際政策中是不是有落後的現象呢？無疑是有的。不然在我們這裏，無論在黨內或中央內部，就不會有維護總路綫和反對各種傾向的鬥爭了。

(三) 執政黨是否可能立即抓住生活中發生的新過程，同時立即把它們反映到自己的實際政策中呢？我認爲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可能，是因爲先有事實，然後事實反映在黨的最先進的分子的意識中，只有在這以後，黨員羣衆的頭腦裏才開始意識到新過程。你記得黑格爾的『米涅爾娃的貓頭鷹只在夜間飛出來』這句話嗎？換句話說：意識多少落後於事實。

在這方面，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我們政策上的轉變同布列斯特時期和施行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轉變之間的差別是：黨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比在布列斯特時期和施行新經濟政策時期更快地意識到客觀現實中的新過程。這是因爲黨在這個期間進步了，它的幹部變得更加敏感了。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一次刊印

羅斯托夫。農業機器製造廠

謹向農業機器製造廠的工人、技術人員和領導核心的全體人員祝賀勝利。你們的勝利是偉大的，因為單是你們一個農業機器製造廠按最高計劃每年就應當生產價值一億一千五百萬盧布的農業機器，而戰前所有的九百個農業機器製造廠每年總共只生產價值七千萬盧布的農業機器。

祝你們在完成這個計劃方面獲得成就。

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六日

載於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七日

《真理報》第一六五號

斯大林格勒。拖拉機製造廠

謹向榮膺紅旗勳章的蘇聯第一個大型的拖拉機製造廠的工人和領導人員致敬並祝賀勝利。你們每年應交給國家的五萬台拖拉機，就是炸毀舊的資產階級世界並為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開闢道路的五萬發砲彈。

祝你們在完成你們的計劃方面獲得成就。

約·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七日

載於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八日

「真理報」第一六六號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向

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一 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日益增長和蘇聯的外部狀況

同志們！自從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來，已經兩年半了。時間看來並不很長。但是，在這期間世界各民族和各國的生活却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如果要一兩個字來概括這個時期的特徵，那末可以稱它為轉變時期。不僅對我們蘇聯，而且對全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一個轉變時期。但是，在這兩個轉變之間有根本的區別。對蘇聯來說，這個轉變意味着轉向新的更大的經濟高漲；而對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這個轉變則意味着轉向經濟衰落。在我們蘇聯這裏，社會主義建設無論在工業或農業方面都是日益高漲。在他們資本家那裏，經濟危機無論在工業或農業方面都是日益增長。

簡括說來，目前形勢的面貌就是這樣。

請回憶一下兩年半以前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當時，幾乎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和貿易都在增長；幾乎所有農業國的原料和糧食的生產都在增長。當時，美國是最興旺的資本主義國家；紅極一時，人們高唱『繁榮』的勝利歌，拜倒在金元面前，讚美新技術，頌揚資本主義合理化。宣告資本主義『恢復健康』和資本主義穩定的堅不可摧的紀元到來。『普遍』叫囂蘇維埃國家『必定滅亡』；蘇聯『必定崩潰』。

昨天的情況是這樣。

現在的情況怎樣呢？

現在，幾乎所有資本主義工業國都發生了經濟危機。現在，所有農業國都發生了農業危機。不是『繁榮』，而是羣衆的貧困和失業人數的大量增加。不是農業高漲，而是千百萬農民羣衆的破產。一般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國資本主義萬能的幻想已在破滅。頌揚金元和資本主義合理化的勝利歌聲愈來愈微弱了。關於資本主義犯『錯誤』的悲觀的號叫愈來愈高了。而關於蘇聯『必定滅亡』的『普遍』叫囂則代以必須懲治『這個國家』的『普遍』的狠毒的切齒聲，因為這個國家在四周都發生危機的時候竟敢發展自己的經濟。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結果正像布爾什維克在兩三年前所說過的那樣。

布爾什維克說過，在千百萬工農羣衆的生活水平被限制在一定範圍的條件下，資本主義國家技

術的發展，生產力和資本主義合理化的發展，必不可免地會引起劇烈的經濟危機。資產階級的報刊曾經嘲笑布爾什維克的『奇特預言』。右傾分子曾經表示不同意布爾什維克的預言，用『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空談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實際上結果怎樣呢？結果正像布爾什維克所說過的那樣。

事實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來看看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的具體材料。

一、世界經濟危機

(甲) 在研究這次危機的時候，首先惹人注意的是下列一些事實：

一、目前的經濟危機是生產過剩的危機。這就是說，商品的生產量超過市場所能吸收的數量。這就是說，紡織品、燃料、工廠製品和食品的生產量超過基本消費者即人民羣衆能用現錢購買的數量，因爲人民羣衆的收入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因爲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人民羣衆的購買力停留在極低的水平上，所以資本家爲保持高昂的價格就把『多餘』商品如紡織品、糧食等等堆積在倉庫裏甚或銷毀，同時縮減生產，解僱工人，於是人民羣衆就因爲商品生產過多而不得不過貧困的生活。

二、目前的經濟危機是戰後第一次世界經濟危機。它所以是世界危機，不僅因爲它遍及世界所有或幾乎所有的工業國，甚至不斷把德國數十億馬克賠款注入自己機體的法國也沒有能够倖免一定程

度的蕭條，根據一切材料來看，這種蕭條一定會轉爲危機。它所以是世界危機，還因爲工業危機是和農業危機同時發生的，而農業危機現在已經擴展到世界各主要農業國的各種原料和糧食的生產方面了。

三、目前的世界危機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雖然它帶有普遍性，但它襲擊各國的時間和程度各不相同。工業危機最先開始於波蘭、羅馬尼亞和巴爾幹。去年它在那一帶延續了整整一年。農業危機開始的明顯的徵象早在一九二八年底就在加拿大、美國、阿根廷、巴西和澳大利亞顯露出來了。在整個時期美國的工業是上升的。到一九二九年中，美國的工業生產幾乎達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只是從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起才開始轉變，接着就發生了急轉直下的工業生產危機，把美國拋到一九二七年的水平。接着加拿大和日本發生了工業危機。隨後中國和各殖民地國家也發生了破產和危機，在這些國家裏，危機因銀價下跌而日益加深，生產過剩的危機同已經被封建剝削和繁重捐稅弄得疲憊不堪的農民經濟的破壞交織在一起。至於西歐方面，那只是在本年初才開始發生危機，而且各國的程度也不一樣，法國的工業生產在這個時期竟還有繼續增長的表現。

我認爲沒有必要特地敘述一些證明危機存在的數字。關於危機存在這一點，現在已經沒有人爭辯了。所以，我只引證一下德國『商情研究所』最近公佈的一個不大的但具有代表性的統計表。這個統計表表現出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波蘭以及蘇聯等國採礦工業和大型加工工業的各主要部門的發展情形。這個統計表從一九二七年算起，而以一九二八年的生產水平爲一百。

這個統計表如下：

年份	國別							
	蘇聯	美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波蘭		
一九二七年	八二·四	九五·五	一〇五·五	一〇〇·一	八六·六	八八·五		
一九二八年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九二九年	一一三·五	一〇六·三	一〇七·九	一〇一·八	一〇九·四	九九·八		
一九三〇年(第一季度)	一七一·四	九五·五	一〇七·四	九三·四	一一三·一	八四·六		

這個統計表說明什麼呢？

首先，它說明美國、德國和波蘭的大工業生產經受着極明顯的危機，其中美國的生產水平經過一九二九年上半年的高漲以後，一九三〇年第一季度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百分之十點八，降到一九二七年的水平；德國的生產水平經過三年的停滯以後，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八點四，降到比一九二七年的水平低百分之六點七的程度；波蘭在去年發生危機以後，生產水平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十五點二，降到比一九二七年的水平低百分之三點九的程度。

第二，它說明英國已經有三年在老地方踏步不前，停留在一九二七年的水平上下，經受着沉重的經濟停滯，而且它的生產水平在一九三〇年第一季度已經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零點五，因而進入了

危機的初期階段。

第三、它說明在資本主義大國中只有法國的大工業稍有增長，增長的百分數在一九二八年是十三點四，一九二九年是九點四，而一九三〇年第一季度僅僅比一九二九年增長了百分之三點七，可見這裏的增長曲綫是逐年下降的。

最後，它說明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中只有蘇聯的大工業一直在蓬勃發展，而且一九三〇年第一季度的生產水平超過了一九二七年的水平一倍以上，增長的百分數從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十七點六提高到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二十三點五，而一九三〇年第一季度又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二，可見這裏的增長曲綫是逐年上升的。

有人會說，截至本年第一季度完結時的情況固然是這樣，但本年第二季度的情況可能好轉。然而第二季度的材料完全推翻了這種推測。相反地，這些材料說明第二季度的情況更加惡化。這些材料說明紐約交易所的股票更加下跌，美國的破產浪潮更加洶湧；說明美國、德國、英國、意大利、日本、南美、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各國的生產日益縮減，工人的工資更加降低，失業人數日益增加；說明法國有許多工業部門已經進入停滯時期，這種停滯在目前國際經濟環境下就是危機開始的徵象。失業者現在美國有六百多萬，德國約有五百萬，英國有二百多萬，意大利、南美和日本各有一百萬，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奧地利各有五十萬。更不用說，使千百萬農場主和勞動農民陷於破產的農業危機已經進一步尖銳化了。農業的生產過剩危機達到了這種地步；爲了保持高昂的價格和資產

階級的利潤，巴西有兩百萬袋咖啡拋到海裏；美國把玉蜀黍當煤炭燒；德國拿幾百萬普特黑麥餵豬；對於棉花和小麥則採取一切辦法縮減播種面積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這就是日益擴大的世界經濟危機的一般情況。

(乙)現在，當世界經濟危機擴大它的破壞作用，使整個整個的中小資本家階層沉入水底，使整批整批的工人貴族和農場主陷於破產，使千百萬工人羣衆挨餓的時候，大家都要問：危機的原因在哪裏？危機的根源是什麼？怎樣和危機作鬥爭？怎樣消滅危機？於是就有人編造了各種各樣關於危機的『理論』。於是就有人提出了整批整批『緩和』、『預防』和『消滅』危機的方案。資產階級的在野黨攻擊資產階級政府，說它們『沒有採取一切辦法』來預防危機。『民主黨人』譴責『共和黨人』，『共和黨人』譴責『民主黨人』，而雙方又一致譴責胡佛集團及其『聯邦準備銀行體系』『未能』『制止』危機。甚至有這樣的聰明人，他們認為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是由於『布爾什維克的陰謀詭計』。我指的就是有名的『工業家』列赫別爾格，老實說，他不大像一個工業家，倒很像著作家中的『工業家』或工業家中的『著作家』。(笑聲)

很明顯，所有這些『理論』和方案都是和科學毫無共同之處的。必須承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危機面前完全破產了。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把他們前輩有時還表現過的那點起碼的生活敏感都喪失無遺了。這些先生們忘記了，不能把危機看做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偶然現象。這些先生們忘記了，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這些先生們忘記了，危機是隨資本主義統治的產生而產生的。在

一百多年內，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每隔十二年、十年、八年或更短的時間就發生一次。在這個時期內，各種類型和各種色彩的資產階級政府，各種等級和各種才能的資產階級活動家毫無例外地都會經試圖用自己的力量『預防』和『消滅』危機。但是他們都失敗了。他們所以失敗，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範圍內不能預防或消滅經濟危機。既然如此，那末現今的資產階級活動家同樣遭受失敗，這又有什麼奇怪呢？既然如此，那末資產階級政府的各種措施實際上不是使危機緩和，不是使千百萬勞動羣衆的狀況改善，而是使破產現象日益厲害，使失業浪潮更加洶湧，使較弱的資本主義聯合被較強的資本主義聯合吞併，這又有什麼奇怪呢？

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根源和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本身。危機的根源在於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成果的資本主義佔有形式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的這個基本矛盾的表現，是資本主義生產能力的巨大增長和千百萬勞動羣衆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因為資本主義生產能力的增長是爲了取得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而勞動羣衆的生活水平却總是被資本家竭力保持在最低限度範圍內。爲了在競爭中獲得勝利並榨取更多的利潤，資本家不得不發展技術，實行合理化，加緊剝削工人，並且把自己企業的生產能力提高到最大限度。爲了不落後於他人，所有資本家都無論如何不得不走上這條拚命發展生產能力的道路。但是，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千百萬工農羣衆（歸根到底他們是基本購買者）的購買力却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由此就產生了生產過剩的危機。由此就產生了或長或短的周期性的人所共知的後果：商品滯銷，生產縮減，失業增長，工資降低，從而生產

水平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化。生產過剩的危機就是這種矛盾的猛烈破壞性的表現。

如果資本主義能夠把生產不用於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而用於不斷改善人民羣衆的物質生活狀況，如果它能夠把利潤不用於滿足寄生階級的奢望，不用於改進剝削方法，不用於輸出資本，而用於不斷提高工農的物質生活，那就不会有危機了。但這樣資本主義也就不成其爲資本主義了。要消滅危機，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

一般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根源就是這樣。

但是在說明目前的危機的特徵時還不能以此爲限。不能把目前的危機看做過去的危機的簡單重複。目前的危機是在某些新的條件下產生和發展的。必須弄清這些條件，才能看到危機的全貌。目前的危機因爲有許多特殊情況而更加複雜和深刻。不弄清這些情況，就不可能對目前的經濟危機有一個清楚的概念。

這些特殊情況是什麼呢？

這些特殊情況歸結爲以下幾件突出的事實：

一、危機特別沉重地打擊了資本主義的主要國家，打擊了資本主義的堡壘，即打擊了集中着世界各國生產和消費量不下半數的美國。顯然，這種情況不能不使危機的影響範圍大大擴展，不能不使危機尖銳化，並給世界資本主義造成許多額外困難。

二、在經濟危機擴展的進程中，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危機和各農業國的農業危機不但同時發生，而且互相交織在一起，因而使困難加重，並且註定了經營積極性必然普遍低落。更不用說，工業危機將使農業危機更爲嚴重，而農業危機又將使工業危機拖延下去，結果就不能不使整個經濟危機深刻化。

三、現在的資本主義和從前的資本主義不同，它是壟斷資本主義，這就註定了，儘管生產過剩，各種資本主義聯合也必然要竭力設法保持商品的壟斷高價。顯然，這種情況使商品基本消費者人民羣衆因危機而特別痛苦，使他們遭到破產，因而不能不使危機拖延下去，不能不阻礙危機的消除。

四、目前的經濟危機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資本主義總危機早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就爆發了，它破壞着資本主義的基石，促進了經濟危機的到來。

這意味着什麼呢？

首先，這意味着：帝國主義大戰及其後果加深了資本主義的腐朽，破壞了資本主義的平衡；我們現在處於戰爭和革命的時代；資本主義已經不是唯一的和包羅萬象的世界經濟體系；除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外，還存在着社會主義體系，它日益成長，日益繁榮，它同資本主義體系相對抗，而且它的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就顯示出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動搖着資本主義的基礎。

其次，這意味着：帝國主義戰爭和蘇聯革命的勝利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 and 附屬國的基石；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已經威信掃地；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已經不能像從前一樣爲所欲爲了。

再其次，這意味着：在戰爭期間和戰爭以後各殖民地 and 附屬國都出現並成長了本國的年輕的資本主義，它們在市場上有成效地和老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競爭，因而使爭奪銷售市場的鬥爭尖銳化和複雜化。

最後，這意味着：戰爭給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留下了沉重的遺產，就是企業的經常開工不足和已經由失業後備軍變爲失業常備軍的千百萬失業大軍，這些情況在這次經濟危機爆發以前就已經給資本主義造成許多困難，而在危機期間還必然會使情況更加複雜。

這就是使世界經濟危機加深並尖銳化的各種情況。

必須承認，目前的經濟危機是至今一切世界經濟危機中最嚴重和最深刻的危機。

二、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尖銳化

世界經濟危機最重要的一個結果，就是世界資本主義所具有的各種矛盾的暴露和尖銳化。

(甲) 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爭奪銷售市場的鬥爭、爭奪原料的鬥爭、爭奪資本輸出的鬥爭正在暴露並尖銳化。現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對勢力範圍和殖民地的舊的劃分感到不滿。他們看到力量對比起了變化，必須與此相應地重分銷售市場、原料產地、勢力範圍等等。這些矛盾中主要的是美英之間的矛盾。無論是成品輸出方面或是資本輸出方面，鬥爭主要是在美英之間進行的。只要拿起任何一份經濟方面的報紙，任何一份關於商品和資本輸出的文件看一下，就會相

信這一點。鬥爭的主要場所是南美、中國以及老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 and 自治領。這個鬥爭中的優勢——而且是肯定的優勢——是在美國方面。

除了這個主要的矛盾，還有許多非主要的但相當重要的矛盾，如美日之間、德法之間、法意之間、英法之間的矛盾等等。

毫無疑問，由於危機的日益發展，爭奪銷售市場、爭奪原料、爭奪資本輸出的鬥爭一定會逐月逐日地激烈起來。

鬥爭的手段是：關稅政策，廉價商品，低息貸款，重新部署力量和建立新的軍事政治聯盟，擴充軍備和準備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最後，發動戰爭。

我講過，危機已經擴展到一切生產部門。但是有一個部門沒有被危機波及。這個部門就是軍事工業。儘管有危機存在，但是它還一直在發展。各資產階級國家在瘋狂地擴充軍備和重整軍備。爲了什麼呢？當然不是爲了閒談，而是爲了戰爭。戰爭是帝國主義者所需要的，因爲它是重分世界，重分銷售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的唯一手段。

十分明顯，在這種環境中，所謂的和平主義已奄奄一息，國際聯盟正活活腐爛，『裁軍方案』已墮入深淵，而海軍裁軍會議則變成革新和擴充海軍的會議。

這就是說，戰爭危險將加速增長起來。

讓社會民主黨人去空談和平主義，空談和平，空談資本主義的和平發展等等吧。社會民主黨在德

國和英國執政的經驗表明：和平主義不過是他們掩蔽準備新戰爭所必需的假面具而已。

(乙)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的矛盾正在暴露並將尖銳化。我所指的戰敗國主要是德國。毫無疑問，由於危機的爆發和市場問題的尖銳化，對德國的壓迫將更加厲害，因為德國不僅是一個債務國，而且是一個極大的輸出國。可以把戰勝國和德國之間形成的特殊關係描繪成一座金字塔，美國、法國、英國以及其他國家擺着老爺架子坐在塔頂上，手裏拿着寫着『付款！』字樣的楊格計劃⁽²⁵⁾，德國被壓在下面，已經筋疲力盡，但不得不竭盡全力來執行償付千百億賠款的命令。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這就是『羅迦諾精神』⁽²⁶⁾。如果以為這種情況對世界資本主義毫無影響，那就是絲毫不懂實際生活。如果以為德國資產階級能在最近十年內付出二百億馬克，而身受『自己的』和『外國的』資產階級雙重壓迫的德國無產階級會讓德國資產階級從他們身上榨取這二百億馬克而不發生激烈的戰鬥和震動，那就是發了瘋。讓德國和法國的政治家們去假裝相信會有這種奇蹟吧。我們布爾什維克是不相信奇蹟的。

(丙)帝國主義國家同殖民地 and 附屬國之間的矛盾正在暴露並尖銳化。經濟危機的日益增長不能不使帝國主義者加緊壓迫作為主要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的殖民地 and 附屬國。的確，這種壓迫已經達到極點。歐洲資產階級實際上現在和『自己的』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和北非洲的殖民地正處於戰爭狀態。『獨立的』中國實際上已經被劃分為幾個勢力範圍，而反革命的國民黨軍閥集團執行着帝國主義陣營中自己主子的意志，彼此混戰，使中國人民遭受災難。

應當認為，詆毀俄國駐華使館人員是破壞中國『和平和安寧』的罪魁的騙人胡說已經徹底破產了。無論在中國南部或中部都早已沒有俄國的使館了；可是那裏却有英國、日本、德國、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使館。無論在中國南部或中部都早已沒有俄國的使館了；可是在彼此混戰的中國軍閥那裏却有德國、英國和日本的軍事顧問。那裏早已沒有俄國使館了；可是那裏却有英國、美國、德國、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國家的大砲、步槍、飛機、坦克和毒氣。結果怎樣呢？我們現在在中國南部和中部看到的不是『和平和安寧』，而是受歐美『文明』國家資助和指使的最瘋狂最帶破壞性的軍閥戰爭。我們看到的是各資本主義國家『文明傳播』工作的一幅十分耐人尋味的圖畫。只是不明白，這究竟和俄國布爾什維克有什麼關係？

如果以為帝國主義者這樣橫行無忌不會受到懲罰，那就太可笑了。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已經用建立蘇維埃和紅軍來回答了他們。據說那裏已經成立了蘇維埃政府。我認為，如果這是事實，那是毫不奇怪的。只有蘇維埃才能把中國從徹底破產和貧困中拯救出來，那是毫無疑問的。

至於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非洲等等，那末這些國家的有時帶有民族解放戰爭形式的革命運動正在發展，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資產者老爺們打算把這些國家淹沒在血泊裏，依靠警察的刺刀，求助於甘地一類的人物。毫無疑問，警察的刺刀是一個靠不住的支柱。以前沙皇政府也曾經竭力依靠警察的刺刀，但是結果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支柱呢，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至於甘地一類的幫手，那末沙皇政府也有過一大羣各式各樣的自由主義妥協分子做幫手，但是結果也不過得到了狼狽的下場

而已。

(丁)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暴露並尖銳化。危機已經使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壓迫變本加厲。危機已經激起了資本主義合理化的新浪潮，使工人階級的狀況更加惡化，使失業人數增多，使失業常備軍擴大，使工資降低。這些情況當然使形勢革命化，使階級鬥爭尖銳化，並推動工人去進行新的階級戰鬥。

因此，工人羣衆中的社會民主主義幻想正在破滅和消失。自從有了社會民主黨人執政的經驗（破壞罷工、組織同盟歇業並槍殺工人），關於『生產民主』、『工業和平』、『鬥爭的』、『和平方法』一類騙人的諾言，在工人聽來已分明是一種惡意的嘲弄了。現在還能找到很多工人相信社會法西斯分子的欺騙宣傳嗎？有名的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的工人遊行示威（反對戰爭危險）和一九三〇年三月六日的工人遊行示威（抗議失業）⁽⁶⁾，都表明工人階級中的優秀分子已經拋棄了社會法西斯分子。經濟危機將使工人中間的社會民主主義幻想受到一次新的打擊。在因經濟危機而陷於破產和貧困之後，工人中間還相信『每個工人』有可能通過參加『民主化的』股份公司發財致富的人現在已經爲數不多了。不用說，危機將給一切諸如此類的幻想以致命的打擊。

工人羣衆離開社會民主黨就是表示他們轉向共產主義。實際情形也確實是這樣。在共產黨影響下的工會運動的發展，共產黨在選舉中獲得的成就，有共產黨員參加和領導的罷工浪潮，經濟罷工轉爲共產黨員所組織的政治抗議，同情共產主義的工人的羣衆性的遊行示威在工人階級中得到極熱烈

的響應，——這一切都表明：工人羣衆認定共產黨是能和資本主義作鬥爭的唯一政黨，是值得工人信賴的唯一政黨，是可以而且值得跟着它去爲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的唯一政黨。這就是羣衆向共產主義方面的轉變。這就是使我們各兄弟共產黨變成工人階級的廣大羣衆性的黨的保證。只是共產黨員必須善於估計形勢和恰當地利用形勢。各國共產黨向資本家在工人階級中的代理人社會民主黨展開了不調和的鬥爭，粉碎了所有一切離開列寧主義而幫助社會民主黨的傾向，因而證明他們是站在正確道路上的。必須使他們永遠堅定地站在這條道路上。因爲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指望把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爭取過來，並順利地準備無產階級迎接即將來臨的階級戰鬥。因爲只有這樣，才能指望進一步擴大共產黨的影響，提高共產黨的威信。

因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而尖銳到極點的世界資本主義各種基本矛盾的情況就是這樣。

這一切事實說明什麼呢？

說明資本主義的穩定就要終結。

說明羣衆革命運動的高潮將更加猛烈地增長起來。

說明世界經濟危機在許多國家裏必定會轉爲政治危機。

第一、這就是說，資產階級在對內政策方面將從進一步法西斯化中尋找擺脫現狀的出路，爲此就利用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一切反動勢力。

第二、這就是說，資產階級在對外政策方面將從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中尋找出路。

最後，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制止戰爭危險時，將從革命中尋找出路。

三、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

(甲)上面我已經談過世界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但除了這些矛盾以外，還有一種矛盾。我說的是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之間的矛盾。誠然，不能把這種矛盾看做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它是整個資本主義和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之間的矛盾。但是，這一點並不妨礙它瓦解和動搖資本主義的基礎。不僅如此，它還徹底揭露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並且使它們交織在一起，成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生死存亡問題。因此，每當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開始尖銳化的時候，資產階級就把視綫轉向蘇聯方面，看看能不能靠犧牲蘇聯這個蘇維埃國家來解決資本主義的某個矛盾或所有一切矛盾；因為它是革命的堡壘，單是它的存在就使工人階級和殖民地革命化，它阻礙組織新戰爭，阻礙重新瓜分世界，阻礙資本家去支配它的廣大的國內市場，而這個市場特別在現在發生經濟危機的時候是資本家尤其感到需要的。

由此就產生一種冒險襲擊蘇聯和進行武裝干涉的趨勢，這種趨勢一定會隨經濟危機的擴大而加強起來。

目前這種趨勢的最明顯的代表者是現今的資產階級法國，它是博愛的『泛歐』計劃的故鄉，凱洛格公約的『搖籃』，世界一切侵略性的軍國主義國家中最富於侵略性的軍國主義國家。

但是，進行武裝干涉是吉凶難測的。這一點資產階級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們想，如果武裝干涉進行得順利；結局是蘇聯失敗；那就好了。但是，如果結局是資本家失敗，那怎麼辦呢？要知道，已經有過一次武裝干涉遭到破產了。既然在布爾什維克力量薄弱時進行的第一次武裝干涉遭到破產，那末怎能保證第二次武裝干涉不會同樣遭到破產呢？大家都看到，現在布爾什維克不論在經濟上、政治上或在國防準備上都強大得多了。而且又怎樣對付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呢？他們不讓對蘇聯進行武裝干涉，他們一定會反對武裝干涉，並且一旦發生武裝干涉，他們會打擊資本家的後方。對蘇聯加強貿易聯系豈不是更好嗎？況且這連布爾什維克也並不反對。

由此就產生了一種和蘇聯繼續維持和平關係的趨勢。

這樣，我們就看到兩種因素和兩種相反的趨勢：

一、執行破壞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聯系的政策，對蘇聯進行挑釁性的襲擊，公開地和隱蔽地準備對蘇聯進行武裝干涉。這些都是威脅蘇聯國際地位的因素。這些因素所產生的結果是：英國保守黨內閣和蘇聯絕交，中國軍閥強佔中東鐵路，對蘇聯實行財政封鎖，以羅馬教皇爲首的教權派對蘇聯進行『討伐』，外國間諜組織我國專家進行暗害活動，組織如『連納金礦』⁽¹⁾的某些職員所幹的爆炸和放火等事件，謀害蘇聯使節（波蘭），故意阻撓我國貨物的出口（美國、波蘭）等等。

二、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同情並支持蘇聯，蘇聯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威力增長，蘇聯的國防力量加強，蘇維埃政權始終不渝地執行和平政策。這些都是鞏固蘇聯國際地位的因素。這些因素所產生的結

果是：中東鐵路衝突事件順利解決，和大不列顛恢復邦交，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聯系加強等等。

蘇聯的外部狀況是由這些因素的鬥爭決定的。

(乙)有人說，妨礙改善蘇聯和資產階級國家的經濟聯系的絆脚石是債款問題。我認爲這不是討債的理由，而是侵略分子鼓吹武裝干涉的藉口。我們在這方面的政策是明確而有充分根據的。在給予我們貸款的條件下，我們同意償付一小部分戰前債款，把它當做貸款的附加利息。沒有這個條件，我們不能而且也不應當償付債款。向我們多要一些嗎？有什麼理由？借用這些債款的是已經被革命推翻的沙皇政府，蘇聯政府是不能對沙皇政府的債務負責的，這難道還不知道嗎？有人談到國際法和國際義務。但是，『盟國』老爺們是根據什麼國際法把貝薩拉比亞從蘇聯手中奪去，把它交給羅馬尼亞的貴族去奴役呢？法國、英國、美國和日本的資本家和政府是根據什麼國際義務進攻蘇聯，干涉蘇聯，掠奪蘇聯整整三年之久，致使蘇聯人民遭到慘重損失呢？如果這叫做國際法和國際義務，那末什麼才叫做掠奪呢？（笑聲，鼓掌。）『盟國』老爺們既然幹出這種掠奪勾當，也就沒有權利援引國際法和國際義務，這不是很明顯嗎？

其次，有人說，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妨礙建立『正常』關係。資產者老爺們爲了防止宣傳的有害影響，往往用『邊防綫』和『鐵絲網』來把自己隔開，把看守『鐵絲網』的光榮差使開恩交給波蘭、羅馬尼亞、芬蘭等國。據說德國因爲人家似乎不願意委託它看守『邊防綫』和『鐵絲網』而嫉妒。顯然用不着證明，關於宣傳的濫調並不是反對建立『正常關係』的理由，而是鼓吹武裝干涉的藉口。既然

本國具有適於布爾什維主義思想生長的土壤，那末一個人要是不願意成爲可笑的人，又怎能把自己和這種思想『隔開』呢？沙皇政府也曾經企圖把自己和布爾什維主義『隔開』，但是大家知道，沒有能『隔開』。所以沒有能隔開，是因爲布爾什維主義到處都在生長，不是從外部而是從內部生長起來的。看來，除了中國、印度和印度支那以外再沒有別的國家被更嚴地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隔開』了。結果怎樣呢？不管有怎樣的『邊防綫』，布爾什維主義還是在那裏生長着，並且會繼續生長，因爲那裏顯然存在着有利於布爾什維主義的條件。這和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宣傳有什麼關係呢？如果資本家老爺們能設法把自己和經濟危機、羣衆的貧困、失業現象、低微工資以及對勞動者的剝削『隔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時他們那裏也就不會有布爾什維主義運動了。但是，問題正在於一切壞分子都力圖藉口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宣傳來爲自己的軟弱或無能辯護。

其次，有人說，絆腳石是我們的蘇維埃制度、集體化、反富農鬥爭、反宗教宣傳、對『學者』中的暗害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別謝多夫斯基之流、索洛蒙之流和德米特利也夫斯基之流等等資本奴僕的被驅逐。這未免太滑稽可笑了。原來他們不喜歡蘇維埃制度。但是我們也不喜歡資本主義制度呀。（笑聲，鼓掌。）我們不喜歡的是他們那裏有數千萬失業者被逼得挨餓受窮，而一小撮資本家却佔有億萬財富。但是，既然我們已經同意不干涉他國內政，那末也就不值得再提這個問題了，這不是很明顯嗎？集體化、反富農鬥爭、和暗害分子作鬥爭、反宗教宣傳等等，是我國憲法所確定的蘇聯工農不可剝奪的權利。蘇聯憲法是我們應當而且一定要最徹底執行的。因此很明顯，誰不願意尊重我

國憲法，誰就可以走開，隨便到什麼地方去都行。至於別謝多夫斯基之流、索洛蒙之流和德米特利也夫斯基之流等等，那我們今後也仍然要把這種人當做對革命有害無益的廢品拋掉的。讓那些特別同情廢物的人去抬舉他們吧。（笑聲）我們革命的磨盤磨得很好。它把一切有用的東西取出來交給蘇維埃，而把廢物拋掉。據說在法國巴黎的資產者中間，這種廢品大有銷路。好吧，那就讓他們盡量輸入吧。不錯，這會使法國貿易平衡表進口項多少加重一點，而這是資產者老爺們始終反對的。但是這已經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了。我們還是不要去干涉法國內政吧。（笑聲，鼓掌。）

妨礙蘇聯和其他國家建立『正常』關係的『障礙』就是這樣。

由此可見，這種『障礙』是臆造的『障礙』，是用來作為進行反蘇宣傳的藉口的。

我們的政策是主張和平並和一切國家加強貿易聯系的政策。實行這個政策的結果，我們和許多國家的關係改善了，簽訂了許多有關貿易、技術援助等等的協定。其次，實行這個政策的結果，蘇聯參加了凱洛格公約，依照凱洛格公約精神和波蘭、羅馬尼亞、立陶宛等國簽訂了世所共知的議定書，和土耳其簽訂了延長友好中立條約有效期限的議定書。最後，實行這個政策的結果，儘管戰爭挑撥者屢次挑釁和冒險襲擊，我們還是保住了和平，沒有讓敵人把我們捲入衝突。今後我們還要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繼續執行這個和平政策。別人的土地我們一寸也不要，自己的土地呢，自己的土地一寸也不給任何人。（鼓掌）

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是這樣。

任務在於今後仍然要用布爾什維克所特有的無比堅強的精神繼續執行這個政策。

二 社會主義建設的日益高漲和蘇聯的內部狀況

現在談談蘇聯的內部狀況。

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着經濟危機和失業人數日益增多的情況，與此相反，我國內部却呈現着國民經濟日益高漲、失業人數日漸減少、的景象。大工業成長起來了並加快了自己的發展速度。重工業鞏固了。工業中的社會主義部分大大地擴大了。農業中的新力量——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成長起來了。兩年前我國發生過穀物生產危機，當時的糧食收購主要是依靠個體經濟，現在重心已經轉到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方面，穀物危機可以說已經基本上解決。基本農民羣衆完全轉到集體農莊方面了。富農的反抗被打破了。蘇聯的內部狀況更加鞏固了。

這就是目前蘇聯內部狀況的一般情況。

現在讓我們看看具體材料。

一、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甲)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即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之前，包括林業、漁業等等在內的

全部農業總產值（按戰前盧布計算）爲一百二十三億七千萬盧布，即等於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六點六；而在下一年度，即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已經達到百分之一百零七點二，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百分之一百零九點一，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據農業的發展情況來看，將不會低於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三到百分之一百一十四。

可見整個農業的產值雖然增長較慢，但是在不斷增長。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即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之前，包括麵粉工業在內的全部大小工業的總產值（按戰前盧布計算）爲八十六億四千一百萬盧布，即等於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二點五；而在下一年度，即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已經達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二，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百分之一百四十二點五，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據工業的發展情況來看，將不會低於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八十。

可見整個工業是在空前迅速地增長。

（乙）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即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之前，我國全部鐵路貨物周轉量爲八百一十七億噸公里，即等於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七，而在下一年度，即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已經達到百分之一百三十四點二，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百分之一百六十二點四，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據一切材料看來，將不會低於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九十三。至於新鐵路的建設方面，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即從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算起，鐵路網長度已

經由七萬六千公里增加到八萬公里，等於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六點七。

(丙) 如果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國內中介貿易額爲一百（三百一十億盧布），那末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流轉額已經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四點六，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六十點四，而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據一切材料看來，流轉額將爲百分之二百零二，即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增加一倍。

(丁) 如果以我國所有信貸機關一九二七年截至九月三十日的綜合平衡表上的數額爲一百（九十一億七千三百萬盧布），那末到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已經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一，而到一九二九年九月三十日已經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一點一，即比一九二七年增加一倍。

(戊) 如果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國家總預算爲一百（六十三億七千一百萬盧布），那末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國家預算已經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五點五，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六點七，而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已經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四點四，即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預算增加一倍（一百二十六億零五百萬盧布）。

(己) 我國對外貿易額（進出口）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爲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四十七點九，而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已經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六點八，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七點九，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據一切材料看來，將不會低於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

(庚) 總括起來說，全部國民收入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增長的情形如下（按一九二六——一九二

七年度的不變價格計算）：根據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材料，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國民收入爲二百三十一億二千七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二百五十三億九千六百萬盧布，即增加了百分之九點八；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二百八十五億九千六百萬盧布，即增加了百分之十二點六；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的國民收入，根據一切材料看來，應不低於三百四十億盧布，即在一年內將增加百分之二十。可見在報告所涉及的三年內，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十五以上。

如果注意到美國、英國、德國這樣的國家的國民收入平均每年增加不超過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八，那就應當承認，蘇聯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真正是超記錄的。

二、工業化的成就

在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不是自發地進行的，而是遵循一定的方向即遵循工業化的方向，是在工業化的標誌下，在工業在國民經濟總體系中的比重增大的標誌下，在把我國由農業國變爲工業國的標誌下進行的。

（甲）從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總產值中的比重來看，整個工業和整個農業的對比關係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的變動情形如下：在戰前，工業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的比重爲百分之四十二點一，農業的比重爲百分之五十七點九；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工業的比重爲百分之四十五點二，農業的比重爲百分之五十四點八；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工業的比重爲百分之四十八點七，農業的比重爲百

分之五十一點三；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據一切材料看來，工業的比重應不低於百分之五十三，農業的比重則不超過百分之四十七。

這就是說，在國民經濟總體系中，工業的比重已經開始超過農業的比重，我們正處在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前夜。（鼓掌）

（乙）從工業在國民經濟的商品產值中的比重來看，工業所佔的優勢更加鮮明。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工業的商品產值在國民經濟的商品總產值中的比重為百分之六十八點八，農業的商品產值的比重為百分之三十一點二，而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工業為百分之七十一點二，農業為百分之二十八點八；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工業為百分之七十二點四，農業為百分之二十七點六；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據一切材料看來，工業將為百分之七十六，農業將為百分之十四。

農業的情況所以特別不利，其原因之一就是農業帶着小農和商品率很低的性質。同時很明顯，這種情況必將隨農業規模的擴大（通過建立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隨農業商品率的提高而發生相當的變化。

（丙）但是，一般的工業發展情況還不能使人看到工業化速度的全貌。爲了看到全貌，還必須弄清楚重工業和輕工業的對比關係的變動情形。因此，應當認爲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生產（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的不斷增大是工業化發展的最鮮明的標誌。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生

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生產在全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爲百分之二十七點二，日用品的生產的比重爲百分之七十二點八，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生產的比重爲百分之二十八點七，日用品的生產的比重爲百分之七十一點三，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據一切材料看來，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生產的比重將爲百分之三十二點七，日用品的生產的比重將爲百分之六十七點三。

如果不是拿全部工業，而只是拿納入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計劃的、包括工業一切基本部門的工業來看，那末，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日用品的生產的對比關係的情況就更好：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生產與日用品生產的比例爲百分之四十二點七比百分之五十七點三；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百分之四十四點六比百分之五十五點四；而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據一切材料看來，將不低於百分之四十八比百分之五十二。

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在工業化的標誌下，是在鞏固和發展本國重工業的標誌下進行的。這就是說，我們已經發展了並繼續擴展着我國經濟獨立的基礎——我國的重工業。

三、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地位及其增長速度

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在工業化的標誌下進行的。但是，我們需要的並不是隨便一種工業化。我們需要的工業化是保證社會主義形式的工業對小商品形式的工業尤其是對資本主義形式的工業所佔

的優勢日益增長的工業化。我國工業化的特點在於它是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保證工業中的公營部分戰勝私營部分，小商品經濟部分和資本主義部分的工業化。

下面就是關於各個部分的基本投資和總產值增長情形的一些材料。

(甲) 如果拿工業中各個部分的基本投資的增長情形來看，那末我們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形：公營部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基本投資為十二億七千萬盧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為十六億一千四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為二十億四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為四十二億七千五百萬盧布；私營部分和資本主義部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基本投資為六千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為六千四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為五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為五千一百萬盧布。

第一、這就是說，工業中公營部分的基本投資在這期間增加了兩倍以上（即增加到百分之三百三十五）。

第二、這就是說，私營部分和資本主義部分的基本投資在這期間減少了五分之一（即減少到百分之八十一）。

私營部分和資本主義部分是依靠原有資本維持的，並且正在走向滅亡。

(乙) 如果拿工業中各個部分的總產值的增長情形來看，那末我們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形：公營部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總產值為一百一十九億九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為

一百五十三億八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一百八十九億零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二百四十七億四千萬盧布；私營部分和資本主義部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
的總產值爲四十億四千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三十七億零四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三十三億八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三十三億一千萬盧布。

第一、這就是說，工業中公營部分的總產值在三年內增加了一倍多（即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六點二）。

第二、這就是說，工業中私營部分和資本主義部分的總產值在同一時期內幾乎減少了五分之一（即減少到百分之八十一點九）。

如果不是拿全部工業的產值，而只是拿大工業（即標準工業）的產值並按公營和私營兩部分來觀察，那末公營部分和私營部分的對比關係如下：公營部分在全國大工業的產值中的比重，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爲百分之九十七點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百分之九十八點六，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百分之九十九點一，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百分之九十九點三；私營部分在全國大工業的產值中的比重，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爲百分之二點三，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百分之零點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百分之零點九，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百分之零點七。

由此可見，大工業中的資本主義成分已經走向滅亡。

很明顯，『誰戰勝誰』的問題，即在工業方面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成分還是資本主義成分

戰勝社會主義的問題，已經由社會主義形式的工業取得勝利而解決了，徹底而確定不移地解決了。
(鼓掌)

(丙)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關於納入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計劃的國營工業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的發展速度的材料。如果以納入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計劃的社會主義工業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
的總產值爲一百，那末這種工業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總產值已經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七點四，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五十八點六，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將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九點八。

這就是說，納入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計劃的、包括工業一切基本部門和全部重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在三年內增加了一倍多。

不能不承認，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大工業都不曾有過這樣飛快的發展速度。

這種情況也就使我們有根據說五年計劃四年完成。

(丁) 某些同志對於『五年計劃四年完成』這個口號抱着懷疑態度。就在最近，還有一部分同志認爲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四)批准的五年計劃是幻想。更不必說資產階級論客了，他們一聽到『五年計劃』四個字就驚訝得目瞪口呆。但是，如果我們從五年計劃在頭兩年的實行情況來看，那末實際情形怎樣呢？五年計劃最高方案執行情況的檢查向我們說明什麼呢？它不僅說明我們能在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而且還說明我們許多工業部門能在三年內甚至在兩年半內完成五年計劃。在機會主義

警廳中的懷疑分子看來，這可能是難以置信的。但這是事實，否認這個事實是愚蠢的和可笑的。

請你們自己判斷吧。

按照五年計劃規定，石油工業到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應當出產價值九億七千七百萬盧布的產品。但實際上它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就已經能夠出產價值八億零九百萬盧布的產品，即等於五年計劃所規定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產值的百分之八十三。可見我們在不過兩年半的時間內就可以完成石油工業方面的五年計劃。

在泥炭工業方面，按照五年計劃規定，我們到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應當得到價值一億二千二百萬盧布的產品。但實際上它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就能夠生產價值一億一千五百萬盧布以上的產品，即等於五年計劃所規定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產值的百分之九十六。可見我們在兩年半內，甚至更早些，就可以完成泥炭工業方面的五年計劃。

按照五年計劃規定，普通機器製造業到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應當生產價值二十億五千八百萬盧布的產品。但實際上它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就能夠生產價值十四億五千八百萬盧布的產品，即等於五年計劃所規定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產值的百分之七十。可見我們在兩年半至三年內就可以完成普通機器製造業方面的五年計劃。

按照五年計劃規定，農業機器製造業到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應當生產價值六億一千萬盧布的產品。但實際上它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就能夠生產價值四億盧布的產品，即等於五年計劃

所規定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產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可見我們在三年內，甚至更早些，就可以完成農業機器製造業方面的五年計劃。

按照五年計劃規定，電器工業到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應當生產價值八億九千六百萬盧布的產品。但實際上它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就能夠生產價值五億零三百萬盧布的產品，即等於五年計劃所規定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產值的百分之五十六以上。可見我們在三年內就可以完成電器工業方面的五年計劃。

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的空前發展速度就是這樣。

我們正加速前進，將要在經濟方面和技術方面趕上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

(戊)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在產量方面已經趕上了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並不是說我國工業已經達到了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的水平。不，還遠不能這樣說。不能把工業發展的速度和工業發展的水平混爲一談。我們有許多人竟把它們混淆起來，認爲既然我們達到了空前的工業發展速度，那末我們也就已經達到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發展水平。這是根本不對的。

例如拿我國發展速度很高的電力生產來說吧。在電力生產方面，我們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差不多使發電量增加到百分之六百，而美國在同一時期發電量只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八十一，加拿大只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一十八，德國只增加到百分之二百四十一，意大利只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二十二。可見我們在這方面的速度簡直是空前的，超過了其他一切國家。但是，如果拿這些國家電力生產

的發展水平（例如一九二九年的）來和蘇聯的發展水平比較一下，那末蘇聯的情況是遠不能令人滿意的。儘管蘇聯電力生產的發展速度是空前的，但是，它在一九二九年的發電量只有六十四億六千五百萬瓩時，而美國却有一千二百六十億瓩時，加拿大有一百七十六億二千八百萬瓩時，德國有三百三十億瓩時，意大利有一百零八億五千萬瓩時。

可見差別是很大很大的。

這樣看來，就發展水平來說，我們比所有這些國家都落後。

例如再拿我國生鐵的產量來說吧。如果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生鐵產量爲一百（二百九十萬噸），那末我國生鐵產量在三年內，即從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九十（五百五十萬噸）。可見發展速度是很高的。但是，如果從我國生鐵生產的發展水平來看，並把蘇聯的生鐵產量和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產量比較一下，那末情況就很難令人滿意。首先，我們只是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才達到並超過戰前生產的水平。僅僅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們得出一個確定不移的結論：如果不進一步加快冶金業的發展速度，我國全部工業生產的命運就會受到威脅。至於我國和西方各國生鐵工業的發展水平，那末我們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形：一九二九年，美國的生鐵產量爲四千二百三十萬噸，德國爲一千三百四十萬噸，法國爲一千零四十五萬噸，英國爲七百七十萬噸，而蘇聯的生鐵產量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終結時却總共只有五百五十萬噸。

可見差別是不小的。

這樣看來，就生鐵生產的發展水平來說，我們比所有這些國家都落後。

這一切說明什麼呢？

這一切說明：

(一) 不能把工業發展速度和工業發展水平混爲一談；

(二) 我國工業在發展水平方面遠遠落後於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

(三) 只有進一步加快我國工業的發展速度，我們才有可能在經濟方面和技術方面趕上並超過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

(四) 那些胡說必須減低我國工業發展速度的人，是社會主義的敵人，是我們階級敵人的代理人。(鼓掌)

四、農業和穀物問題

上面我談的是包括林業和漁業等等在內的整個農業的情況，沒有把農業劃分爲幾個主要部門來談。如果從整個農業中抽出幾個主要部門，例如穀物業、畜牧業和技術作物業來看，那末根據國家計劃委員會和蘇聯農業人民委員部的材料，可以看到如下情形：

(甲) 如果以一九一三年的穀物播種面積爲一百，那末各年度穀物播種面積的變動情形如下：一

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爲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六點九，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百分之九十四點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百分之九十八點二，而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據一切材料看來，播種面積將達百分之一百零五點一。

令人注意的是，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穀物播種面積縮減的事實。這種縮減並不像右傾機會主義者營壘中的那些無知之徒胡說的那樣，是由於穀物業的退化，而是由於七百七十萬公頃的秋播作物（佔蘇聯秋播作物的百分之二十）的遭災。

其次，如果以一九一三年的穀物總產值爲一百，那末我們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形：一九二七年爲戰前標準的百分之九十一點九，一九二八年爲百分之九十點八，一九二九年爲百分之九十四點四；而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材料看來，將達百分之一百一十。

這裏同樣令人注意的是一九二八年的穀物總產值的減少，這是因爲烏克蘭和北高加索的秋播作物的遭災。

至於說到穀物總產值中的商品部分（農村外的流轉），那末情況就更加值得注意了。如果以一九一三年穀物產值中的商品部分爲一百，那末一九二七年的商品產值爲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二八年爲百分之三十六點八，一九二九年爲百分之五十八，而在今年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材料看來，至少將爲百分之七十三。

由此可見，就穀物播種面積和總產值來說，我們只是在今年一九三〇年才達到並稍微超過戰前

標準。

其次，由此可見，就穀物中的商品產值來說，我們遠遠沒有達到戰前標準，而且就是在今年也還會比這個標準差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這就是在一九二八年顯得特別尖銳的我國糧食困難的根源。

這也就是穀物問題的根源。

(乙) 畜牧業方面的情形大致也是這樣，但具有更令人不安的徵兆。

如果以一九一六年各種牲畜的頭數各為一百，那末各年度的情形如下：一九二七年，馬為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八點九，牛為百分之一百一十四點三，綿羊和山羊為百分之一百一十九點三，豬為百分之一百一十一點三；一九二八年，馬為百分之九十四點六，牛為百分之一百一十八點五，綿羊和山羊為百分之一百二十六，豬為百分之一百二十六點一；一九二九年，馬為百分之九十六點九，牛為百分之一百一十五點六，綿羊和山羊為百分之一百二十七點八，豬為百分之一百零三；一九三〇年，馬為一九一六年標準的百分之八十八點六，牛為百分之八十九點一，綿羊和山羊為百分之八十七點一，豬為百分之六十點一。

可見如果注意到最近一年的材料，那就可以看到畜牧業已經開始縮小的明顯徵象。

從畜牧業特別是肉類和脂油的商品出產率來看，情形更令人不安。如果以各年度的肉類和脂油的總產值為一百，那末肉類和脂油的商品出產率如下：一九二六年為百分之三十三點四，一九二七年

爲百分之三十二點九，一九二八年爲百分之三十點四，一九二九年爲百分之二十九點二。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規模狹小而商品率低的畜牧業經濟已經呈現出不穩固和經濟上不可靠的明顯徵象。

這就是說，畜牧業在最近一年不是超過一九一六年的標準，而是有離開這個標準下降的明顯徵象。

這樣一來，隨着我們基本上已經在順利解決的穀物問題之後，在我們面前又出現了肉類問題，其緊張性現在已經顯現出來，亟待解決。

(丙) 供給我國輕工業以原料的技術作物的發展却是另一種情景。如果以一九一三年的技術作物播種面積爲一百，那末情形如下：棉花，一九二七年爲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七點一，一九二八年爲百分之一百三十一點四，一九二九年爲百分之一百五十一點四，一九三〇年爲百分之二百一十七；亞麻，一九二七年爲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六點六，一九二八年爲百分之九十五點七，一九二九年爲百分之一百一十二點九，一九三〇年爲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甜菜，一九二七年爲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六點六，一九二八年爲百分之一百二十四點二，一九二九年爲百分之一百二十五點八，一九三〇年爲百分之一百六十九；油料作物，一九二七年爲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七十九點四，一九二八年爲百分之二百三十點九，一九二九年爲百分之二百一十九點七，一九三〇年將不低於百分之二百六十。

技術作物總產值方面的情形大體上也同樣良好。如果以一九一三年的總產值爲一百，那末情形如下：棉花，一九二八年爲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一十點五，一九二九年爲百分之一百一十九，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材料看來，將爲百分之一百八十二點八；亞麻，一九二八年爲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一點六，一九二九年爲百分之八十一點五，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材料看來，將爲百分之一百零一點三；甜菜，一九二八年爲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三，一九二九年爲百分之五十八，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材料看來，將爲百分之一百三十九點四；油料作物，一九二八年爲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一點九，一九二九年爲百分之一百四十九點八，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材料看來，將爲百分之二百二十。

由此可見，如果不把一九二九年遭受螟蟲災害的甜菜收穫量計算在內，那末技術作物業方面的情形是比較良好的。

然而，就是在這裏，在技術作物業方面，由於小經濟佔優勢，將來可能發生而且大概一定會發生嚴重的動搖和不穩固，就像受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影響最少的亞麻和油料作物在上述數字中所反映的那種動搖和不穩固一樣。

這樣，在我們面前就擺着下列幾個農業問題：

- (一) 如何保證技術作物區有足够的廉價糧食來穩定技術作物的生產狀況；
- (二) 如何保證畜牧區有足够的廉價穀物和飼料來發展畜牧業並解決肉類問題；

(三) 如何徹底解決當前農業中的主要問題——穀物問題。

可見穀物問題是農業系統中的基本環節，是解決農業其他一切問題的鑰匙。可見解決穀物問題是解決農業的其他許多問題的首要任務。

但是，解決穀物問題，從而把農業引上蓬勃發展的道路，這就是要根本消滅農業的落後狀態，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裝備農業，供給它新的科學工作幹部，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商品率。沒有這些條件就想解決穀物問題。

在個體小農經濟的基礎上能不能實現這一切條件呢？不，不能。所以不能，是因為小農經濟無力採用和掌握新技術，無力充分提高勞動生產率，無力充分增加農業的商品率。剩下的只有一條道路：擴大農業規模，建立以現代技術裝備起來的大農莊。

但是蘇維埃國家不能走建立資本主義大農場的道路。它只能夠而且只應該建立以新技術裝備起來的社會主義型的大農莊。我們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就是這樣的農莊。

由此就產生了建立國營農場和把個體小農戶聯合為集體大農莊的任務，這是解決一般農業問題特別是穀物問題的唯一道路。

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後，特別是在一九二八年初發生嚴重的糧食困難以後，黨在自己的日常實際工作中已經走上了這條道路。

必須指出，我們黨早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當我們還沒有發生嚴重的糧食困難的時候，就已經

把這個根本問題作為實踐任務提到日程上了。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人所共知的『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直截了當地說：

『在目前時期，把個體小農經濟聯合並改造為大規模集體經濟這一任務應該作為黨在農村中的基本任務。』(四七)

再援引一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中央的總結報告中有一段話也許不是多餘的，這段話同樣明確而肯定地提出了根據集體化原則消滅農業落後狀態的問題。請看報告中是怎樣說的：

『出路究竟在哪裏呢？出路就在於把分散的小農戶轉變為以公共耕種制為基礎的聯合起來的大農莊，就在於轉變到以高度的新技術為基礎的集體耕種制。』

出路就在於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強迫手段而用示範和說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農戶聯合為以公共的協作的集體的耕種制為基礎，利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採用集約耕作的科學方法的大農莊。

別的出路是沒有的。』(四八)

五、農民向社會主義方面的轉變與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建設的發展速度

農民向集體化方面的轉變不是一下子開始的。這個轉變也不能一下子開始。固然，黨早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就宣佈了集體化的口號。但是要使農民大批轉向社會主義，僅僅宣佈口號還不夠。

要達到這個轉變，至少還必須具備一個條件，就是要使農民羣衆自己相信黨所宣佈的口號是正確的，並且當做自己的口號來接受它。所以，這個轉變是逐漸準備起來的。

準備了這個轉變的是我國發展的整個進程，是我國工業發展的整個進程，首先是供給農業各種機器和拖拉機的工業的發展。準備了這個轉變的是對富農堅決鬥爭的政策，是我們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以新方式進行的、使富農經濟受到貧農和中農羣衆監督的糧食收購工作的進程。準備了這個轉變的是使個體農民習慣於集體經營的農業合作社的發展。準備了這個轉變的是集體農莊網的建立，農民從那裏檢驗了集體經濟形式對個體經濟的優越性。最後，準備了這個轉變的是分佈於全蘇聯的、以新技術裝備起來的國營農場網的建立，農民從這裏有可能相信新技術的力量和優越性。

如果把我們的國營農場只看做糧食泉源，那就錯了。其實，國營農場和它的新技術，它對周圍農民的幫助，它的空前的經營規模，是促使農民羣衆轉變並推動他們走上集體化道路的領導力量。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開始的、在我國生活中開闢了一個大轉變時期的有千百萬貧農和中農參加的羣衆性的集體農莊運動，正是在這種基礎上產生的。

爲了有充分準備地迎接並領導這個運動，中央採取了哪些措施呢？

中央採取了下列三方面的措施：建立和資助國營農場；建立和資助集體農莊；以及組織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的生產，並通過機器拖拉機站和拖拉機隊等等把這些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供給農村。

(甲) 早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就通過了一個決定，要在三四年內建立一批新國營農

場，要它們在這一期限終結時至少能出產一億普特的商品糧食。後來這個決定經中央全會批准了。當時就成立了穀物托拉斯來負責執行這個決定。同時還通過了關於鞏固原有國營農場並擴大其播種面積的決定。當時成立了國營農場管理總局來負責實施這個決定。

不能不指出，這些決定曾經遭到我們黨內機會主義者的激烈反對。當時有人說，投入國營農場的錢是『白扔了的』錢。同時，黨內機會主義分子所支持的『學者們』也批評說，建立大規模的國營農場是辦不到的和荒謬的。但是，中央不顧一切仍然執行了自己的路線，並把它貫徹到底。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資助國營農場撥出了六千五百七十萬盧布（周轉性短期貸款除外）。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撥出了一億八千五百八十萬盧布。最後，本年度撥出了八億五千六百二十萬盧布。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交給國營農場使用的拖拉機有一萬八千台，共計三十五萬匹馬力。

這些措施產生了怎樣的結果呢？

穀物托拉斯的播種面積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十五萬公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一百零六萬公頃，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將達四百五十萬公頃，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將達九百萬公頃，而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即在五年計劃期末，將達一千四百萬公頃。國營農場管理總局的播種面積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四十三萬公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八十六萬公頃，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將達一百八十萬公頃，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將達二百萬公頃，而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將達二百五十萬公頃。烏克蘭國營農場管理局的播種面積一九二八—一九二九

年度爲十七萬公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二十八萬公頃，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將達五十萬公頃；而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將達七十二萬公頃。糖業總局的播種面積（穀物播種面積）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七十八萬公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八十二萬公頃，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將達八十六萬公頃，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將達九十八萬公頃，而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將達九十九萬公頃。

第一、這就是說，到五年計劃期末，僅僅穀物托拉斯的穀物播種面積就將等於全阿根廷現有的穀物播種面積。（鼓掌）

第二、這就是說，到五年計劃期末，全國國營農場的穀物播種面積的總和，要比全加拿大現有的穀物播種面積多一百萬公頃。（鼓掌）

至於國營農場的穀物總產量和商品穀物產量，那末各年度的變動情形如下：全國國營農場的穀物總產量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九百五十萬公担，其中商品部分爲六百四十萬公担；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一千二百八十萬公担，其中商品部分爲七百九十萬公担；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據一切材料看來，將達二千八百二十萬公担，其中商品部分將爲一千八百萬公担（一億零八百萬普特）；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將達七千一百七十萬公担，其中商品部分將爲六千一百萬公担（三億七千萬普特），如此等等。

這就是我們黨建立國營農場的政策已經取得的和預期的成果。

按照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政治局關於建立新國營農場的決定，我們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應當從新建的國營農場至少取得一億普特的商品糧食。但實際上我們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單是從新建的國營農場就能取得二億普特以上。結果超額完成計劃一倍。

原來那些嘲笑過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的人是把他們自己狠狠地嘲笑了一頓。

按照蘇維埃代表大會批准的五年計劃規定，到五年計劃期末，全國各系統的國營農場的播種面積應為五百萬公頃。但實際上國營農場的播種面積今年已達三百八十萬公頃，而明年即五年計劃的第三年度將達八百萬公頃。

這就是說，我們將在三年內完成並超額完成國營農場建設的五年計劃。

按照五年計劃規定，到五年計劃期末，國營農場的穀物總產量應為五千四百三十萬公担。但實際上國營農場的穀物總產量今年已達二千八百二十萬公担，而明年將達七千一百七十萬公担。

這就是說，在穀物總產量方面，我們將在三年內完成並超額完成五年計劃。
五·年·計·劃·三·年·完·成！

現在讓那些資產階級論客及其機會主義應聲蟲們去胡說什麼不能在三年內完成並超額完成國營農場建設的五年計劃吧。

(乙)至於集體農莊的建設，情況就更好。

早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央全會就通過了關於集體農莊建設的如下決定：

『堅定不移地實現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所提出的「把個體小農經濟聯合並改造爲大規模集體經濟」這一任務，這種集體經濟是建築在新技術基礎上的自願聯合，它無論從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或從保證迅速提高農業生產率和商品率方面來說，都是高級形式的穀物經濟。』（見一九二八年中央七月全會『關於根據整個經濟狀況而採取的糧食收購政策』的決議）^{（四七）}

後來黨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的決議和一九二九年中央十一月全會關於集體農莊運動的專門決議^{（四八）}都肯定了這個決議。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農民開始根本轉向集體農莊，大批中農加入集體農莊，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通過了『關於集體化的速度和國家幫助集體農莊建設的辦法』的專門決議。

在這個決議中，中央

（一）確認農民已經大批轉向集體農莊，並且有可能在一九三〇年春超額完成集體農莊建設的五年計劃；

（二）確認以集體農莊生產代替富農生產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和其他條件已經具備，因此，宣佈必須從限制富農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三）預計按公有化原則耕種的播種面積在一九三〇年春就將大大超過三千萬公頃；

（四）把蘇聯分爲三類地區，並規定每類地區基本上完成集體化的大致期限；

（五）改變土地規劃方法以利於集體農莊，並改變資助農業的方式，規定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

度至少給集體農莊五億盧布貸款；

(六) 確定集體農莊運動中的勞動組合形式爲當前集體農莊制度的基本環節；

(七) 駁斥了黨內那些藉口機器和拖拉機不夠而企圖阻撓集體農莊運動的機會主義分子；

(八) 最後，警告黨的工作人員要防止集體農莊運動中可能發生的過火行爲，避免用從上面下命令的方式來建立集體農莊的危險，因爲這種危險會造成以集體化兒戲代替真正的羣衆性集體農莊運動的威脅。

應當指出，中央的這個決議受到我們黨內機會主義分子的極端敵視。有些人議論紛紛，說中央陷入幻想，說中央把人民的金錢『濫花』在『不存在的』集體農莊上去。右派分子洋洋得意，預言我們『必定』失敗。但是，中央不顧一切，既不顧右派的庸俗嗤笑，也不顧『左』傾分子的急躁和狂妄，堅定不移地執行了自己的路線，並把它貫徹到底。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資助集體農莊撥出了七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撥出了一億七千萬盧布，本年度則撥出了四億七千三百萬盧布。此外，又撥出了六千五百萬盧布作爲集體化基金。規定了優待集體農莊的辦法，結果使集體農莊的財力增加了二億盧布。把剝奪富農的價值四億多盧布的產業交給了集體農莊。交給集體農莊使用的拖拉機不下三萬台（共計四十多萬匹馬力），此外，還有拖拉機管理總局的七千台拖拉機爲集體農莊服務，國營農場系統也用拖拉機幫助集體農莊。今年貸給和幫助集體農莊的種子有一千萬公担（六千一百萬普特）穀物。最後，在建立機器

馬匹站方面也給了集體農莊直接的組織上的幫助，這種機器馬匹站已經有七千處以上，使用的馬不下一百三十萬匹。

這些措施產生了怎樣的結果呢？

集體農莊的播種面積一九二七年為八十萬公頃，一九二八年為一百四十萬公頃，一九二九年為四百三十萬公頃，一九三〇年包括春季播種面積和秋季播種面積至少為三千六百萬公頃。

第一、這就是說，三年來集體農莊的播種面積增加到四十倍以上。（鼓掌）

第二、這就是說，現在我國集體農莊的播種面積相當於法意兩國播種面積的總和。（鼓掌）

至於集體農莊的穀物總產量及其商品部分，那末情形如下：一九二七年集體農莊出產了四百九十萬公担，其中商品部分為二百萬公担；一九二八年出產了八百四十萬公担，其中商品部分為三百六十萬公担；一九二九年出產了二千九百一十萬公担，其中商品部分為一千二百七十萬公担；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材料看來，將出產二億五千六百萬公担（十五億五千萬普特），其中商品部分至少將為八千二百萬公担（五億多普特）。

必須承認，在一般說來發展速度相當快的我國工業中，任何一個部門都未曾有過像集體農莊建設的這樣空前的發展速度。

所有這些數字說明什麼呢？

首先，它們說明，三年來集體農莊的穀物總產量增加到五十倍以上，其中商品部分增加到四十倍

以上。

第二、它們說明，我們今年有可能從集體農莊方面取得佔全國商品穀物產量一半以上的商品穀物。

第三、它們說明，今後決定農業及其基本問題的命運的不再是個體農民經濟，而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

第四、它們說明，我國消滅富農階級的過程正在極其迅速地進行。

最後，它們說明，國內已經發生的經濟變動使我們有充分根據肯定說，我們使農村走上了新的道路，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從而保證了社會主義建設不僅在城市中而且在農村中順利進行。

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的決議中規定，到一九三〇年春按公有化原則耕種的集體農莊播種面積應為三千萬公頃。而實際上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三千六百萬公頃。結果超額完成了中央的計劃。

原來那些嘲笑過中央的決定的人是把自己狠狠地嘲笑了一頓。無論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或集體農莊運動中的過火行為，都沒有給我們黨內的機會主義空談家幫了什麼忙。

按照五年計劃規定，到五年計劃期末，集體農莊的播種面積應為二千零六十萬公頃。而實際上集體農莊的播種面積今年已達三千六百萬公頃。

這就是說，我們在兩年內就已經超額完成集體農莊建設五年計劃百分之五十以上。（鼓掌）

按照五年計劃規定，到五年計劃期末，集體農莊的穀物總產量應爲一億九千零五十萬公担。而實際上集體農莊的穀物總產量今年就將達二億五千六百萬公担。

這就是說，我們在兩年內就將超額完成集體農莊穀物產量五年計劃百分之三十以上。
五年計劃兩年完成！（鼓掌）

現在讓那些機會主義的長舌婦去胡說什麼不能在兩年內完成並且超額完成集體農莊建設五年計劃吧。

六、工人和農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狀況的改善

由此可見，無論在工業方面或在農業方面，社會主義部分蒸蒸日上發展都是無可懷疑的事實。從勞動者的物質生活狀況方面來看，這意味着什麼呢？

這意味着：已經爲根本改善工人和農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狀況奠定了基礎。
爲什麼呢？怎樣奠定的呢？

第一、因爲社會主義部分的增長，首先就意味着城鄉剝削成分的縮減，它們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的下降。這就是說，工人和農民的收入在我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必然因剝削階級收入的減少而增加。

第二、因爲在公營（社會主義）部分增長的條件下，先前用於供養剝削階級及其奴僕的那一部分國民收入，今後必將留在生產內部，用於擴大生產、建設新工廠、改善勞動者的生活。這就是說，工

人階級的人數和力量必將增加，而失業現象必將減少以至消失。

最後，因為公營部分的增長既然使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狀況得到改善，也就意味着國內市場的容量不斷擴大，工人和農民對於工業品的需求日益增長。這就是說，國內市場的發展將要超過工業的發展，並推動工業向前發展，使它不斷擴大。

這一切以及諸如此類的情況都使工人和農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狀況得到不斷改善。

(甲) 首先談談工人階級人數增多和失業人數減少的問題。

僱傭勞動者的人數(失業者除外)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爲一千零九十九萬人，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一千一百四十五萬六千人，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一千一百九十九萬七千人，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據一切材料看來，至少爲一千三百一十二萬九千人。其中體力勞動者(包括農業工人和季節工人)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爲七百零六萬九千人，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七百四十萬四千人，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七百七十五萬八千人，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八百五十三萬三千人。其中大工業的工人(職員除外)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爲二百四十三萬九千人，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二百六十三萬二千人，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二百八十五萬八千人，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三百零二萬九千人。

這就是說，我國工人階級的人數在不斷增加；三年來僱傭勞動者增加了百分之十九點五；體力勞動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點七；產業工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點二。

現在談談失業問題。應當說，在這方面無論勞動人民委員部或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都搞得非常混亂。

一方面，根據這兩個機關的材料看來，我國約有一百萬失業者，其中具有起碼的熟練程度勞動者佔百分之十四點三，而百分之七十三左右是所謂腦力勞動者和非熟練勞動者，並且後者中絕大多數是和工業生產沒有發生過關係的婦女和少年。

另一方面，根據這些材料看來，我們又異常缺乏熟練的勞動力，勞動介紹所只能滿足我們各企業所需要的勞動力的百分之二十，因而我們不得不急速地、匆忙地訓練毫不熟練的人，把他們培養成熟練工人，以滿足我們各企業的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需求。

請試試弄清這筆糊塗賬吧。不過至少有一點很清楚，就是這些失業者既不是我國工業的失業後備軍，更不是我國工業的失業常備軍。結果怎樣呢？甚至根據勞動人民委員部的材料看來，最近失業人數也已經比去年減少七十多萬人。這就是說，截至本年四月三十日止，失業人數已減少百分之四十二以上。

這就是我國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部分增長的又一成果。

(乙) 如果從國民收入按階級分配的情形來看，那末成果就要顯得更加驚人。國民收入按階級分配的問題，對於工人和農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狀況說來，是一個根本問題。無怪乎德國、英國、美國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力圖把這個問題弄得模糊不清以利於資產階級，他們時常發表一些這方面的

『完全客觀的』調查資料。

根據全德統計局的材料，一九二九年德國國民收入中工資比重為百分之七十，資產階級收入的比重為百分之三十。根據美國聯邦商務委員會和國家經濟研究局的材料，一九二三年美國國民收入中工人收入的比重為百分之五十四強，資本家收入的比重為百分之四十五強。最後，根據經濟學家鮑萊和斯坦姆的材料，一九二四年英國國民收入中工人階級收入的比重稍低於百分之五十，資本家收入的比重稍高於百分之五十。

當然，不能相信這些調查的結論。所以不能相信，是因為在這些調查材料中除了純經濟方面的錯誤以外，還有另一種錯誤，其目的在於一方面隱瞞資本家的收入，把它說少一些，另一方面誇大工人階級的收入，把它說多一些，並且把那些領取高薪的官吏也算在工人裏面。至於這些調查資料往往不把農場主和一般農業資本家的收入計算進去，那就更不用說了。

瓦爾加同志對這些材料做了批判性的分析。他得出了如下的結論：原來工人和其他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城鄉勞動者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在德國為百分之五十五，在美國為百分之五十四，在英國為百分之四十五，資本家收入的比重在德國為百分之四十五，在美國為百分之四十六，在英國為百分之五十五。

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就是這樣。

蘇聯的情況又怎樣呢？

請看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材料：

(甲) 我國工人和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勞動農民的收入在全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百分之七十五點二（其中城鄉工人收入的比重爲百分之三十三點三），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百分之七十六點五（其中城鄉工人收入的比重爲百分之三十三點二），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百分之七十七點一（其中城鄉工人收入的比重爲百分之三十三點五）。

(乙) 富農和城市資本家收入的比重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百分之八點一，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百分之六點五，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百分之一點八。

(丙) 手工業者（其中大部分是勞動者）收入的比重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百分之六點五，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百分之五點四，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百分之四點四。

(丁) 國家部分（其收入就是工人階級和一般勞動羣衆的收入）收入的比重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百分之八點四，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百分之十，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百分之十五點二。

(戊) 最後，所謂其他方面（指撫卹金）收入的比重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百分之一點八，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百分之一點六，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百分之一點五。

由此可見，在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剝削階級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約爲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而在我們這裏，在蘇聯，剝削階級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却不超過百分之二。

正因為如此，才出現了這樣的驚人事實：據美國資產階級著作家鄧尼說，美國在一九二二年，『私有者的百分之一掌握了全部國民財富的百分之五十九』，而英國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度，也是據鄧尼說，『全部私有者中不到百分之二的人佔有了全部國民財富的百分之六十四』（見鄧尼『美國在征服不列顛』）。

在我們蘇聯，在蘇維埃國家裏能不能發生這種事情呢？顯然不能。蘇聯早就沒有而且也不能有這樣的『私有者』。

可是，既然蘇聯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只有將近百分之二的國民收入落入剝削階級手中，那末其餘大量的國民收入到哪裏去了呢？

很明顯，這部分收入是留在工人和勞動農民手中。

蘇維埃政權的力量和它在千百萬工農羣衆中的威信的泉源就在這裏。

蘇聯工人和農民的物質福利不斷增進的基礎就在這裏。

（己）根據這些決定性的事實，就完全可以了解爲什麼工人的實際工資不斷提高，工人的社會保險費預算不斷增加，對貧農和中農的幫助不斷加強，用於建築工人住宅、改善工人生活、婦嬰保健工作的經費不斷增多，因此，死亡率特別是兒童死亡率減低而蘇聯人口不斷增加。

例如大家知道，工人的實際工資（社會保險費和從利潤中撥做改善工人生活的基金也計算在內）已經增加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七。最近三年來，僅僅工人的社會保險費預算一項，就從一九

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九億八千萬盧布增加到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的十四億盧布。最近三年來（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婦嬰保健工作的經費爲四億九千四百萬盧布。學前教育（幼兒園、露天幼兒園等）經費在同一時期爲二億零四百萬盧布。工人住宅的建築經費爲十八億八千萬盧布。

當然，這並不是說，爲大大增加實際工資所必需的一切都已經做到了，再不能把實際工資提得更高了。如果說還沒有做到這一點，那就應當歸咎於我們一般供應機關的官僚主義，首先和特別是消費合作社的官僚主義。根據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材料，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國內商業中的公營部分在批發方面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在零售方面佔百分之八十九以上。這就是說，合作社不斷排擠私營部分而成爲商業方面的壟斷者。這當然很好。但不好的是，這種壟斷在若干情形下是對於消費者有害的。原來合作社雖然在商業方面幾乎佔據壟斷地位，但它們寧願供應工人以『收入』較多即利潤優厚的商品（服飾品等等），不去供應工人以『收入』較少而爲工人所更需要的商品（農產品）。因此，工人需要的農產品約有百分之二十五不得不多花錢到私人市場去買。更不必說，合作社機關最關心的是平衡表，因此即使中央領導機關發下極嚴厲的指令，但它們還是遲遲不減低零售價格。可見合作社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像社會主義經濟，而像一種沾染了某種耐普曼習氣的特殊經濟。既然合作社不執行認真提高工人實際工資的任務，試問，誰需要這樣的合作社，它的壟斷對工人又有什麼好處呢？

雖然如此，在我國，實際工資還是逐年不斷提高，這說明我國制度、國民收入的分配制度和工

資方面的整個方針是有可能抵銷和彌補合作社所造成的種種缺陷的。

此外，如果再加上許多其他因素，如提高公共飲食業的作用，減低工人住宅費用，設立工人和工人子女的巨額助學金，舉辦文化服務等等，那就可以大胆地說，工人工資增加的百分數比我們某些機關的統計數字要大得多。

把這一切綜合在一起，再加上八十三萬多產業工人（佔總數百分之三十三點五）改行七小時工作制，一百五十多萬產業工人（佔總數百分之六十三點四）改行每周五日工作制，再加上爲工人廣泛設立的休養所、療養院和天然療養地（最近三年來有一百七十多萬工人在這裏休養過），——所有這一切都爲工人階級造成了很好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使我們有可能培養出身強力壯、愉快活潑、能把蘇維埃國家的威力提到應有的高度、並能挺身保衛它使它不受敵人侵犯的新一代工人。（鼓掌）

至於對農民的幫助，無論是對個體農民或對集體農民的幫助（包括對貧農的幫助），最近三年（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在信貸和國家預算方面至少撥出了四十億盧布。大家知道，在這三年內，僅僅種子幫助一項，撥給農民的穀物就不下一億五千四百萬普特。

無怪乎我國工人和農民一般都生活得不壞，一般人口死亡率比戰前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六，兒童死亡率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二點五，我國人口每年增加約三百萬人。（鼓掌）

至於工人和農民的文化生活狀況，那末在這方面也是有一些成績的。但是這些成績很小，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滿意。如果不算各種工人俱樂部、農村閱覽室、圖書館和今年有一千零五十萬人參加的

識字班，那末文化教育事業的情況如下：本年度初等學校學生有一千一百六十三萬八千人，中等學校學生有一百九十四萬五千人，工業技術學校、交通學校、農業學校和普通生產技術訓練班學生有三十三萬三千一百人，中等專業學校和同等程度的職業學校學生有二十三萬八千七百人，高等學校和高等技術學校學生有十九萬零四百人。這一切就使蘇聯識字人數的百分數能够由戰前的百分之三十三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二點六。

現在的主要問題是過渡到初等普遍義務教育。我所以說這是『主要問題』，是因為這種過渡是文化革命方面的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步驟。而向這方面過渡的時機早已成熟了，因為現在我們已經具有在蘇聯各個地區實行初等普遍義務教育的一切必要條件。

在過去，我們不得不『在各方面，甚至在學校經費方面都實行節約』，以『挽救和恢復重工業』（列寧）。但是，最近我們已經恢復了重工業，並且正在把它向前推進。因此，現在已經到了我們應當着手徹底實行初等普遍義務教育的時候了。

我認爲，如果代表大會在這個問題上通過一個肯定的、十分堅決的決定，那是完全正確的。
(鼓掌)

七、增長中的困難，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全綫進攻

我已經講過我們在發展國民經濟方面的成就。我已經講過在工業方面、農業方面以及在按社會

主義原則改造整個國民經濟方面的成就。最後，我還講過在改善工人和農民的物質生活狀況方面的成就。

但是，如果以為這些成就就是我們『輕而易舉、平平穩穩』取得的，是所謂自流產生的，不需要特別努力，不需要聚精會神，不經過鬥爭和震動，那就錯了。這樣的成就是不會自流產生的。事實上，這些成就就是我們在和困難作堅決的鬥爭中，在爲克服困難而進行的嚴重而長期的鬥爭中取得的。

我們大家都在談論困難。但不是人人都了解這些困難的性質。然而困難這一問題對於我們是有極重大意義的。

我們的困難的特點是什麼，這些困難的後面隱藏着哪些敵對力量，我們怎樣克服這些困難？

(甲) 在說明我們的困難時，至少應當注意到下面一些情況。

首先，必須估計到我們目前的困難是改造時期的困難。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這些困難和我國經濟恢復時期的困難根本不同。恢復時期的問題是要充分利用原有工廠和在農業原有基礎上幫助農業，而目前的問題是要根本改建、改造工業和農業，改變它們的技術基礎，用現代技術去裝備它們。這就是說，我們面臨的任務是改建國民經濟的整個技術基礎。這就需要大量增加國民經濟的投資，需要有能掌握新技術並且能推進新技術的較有經驗的新幹部。

第二，應當注意到，在我國改造國民經濟不僅限於改建它的技術基礎，同時還要改變社會經濟關係。我這裏指的主要是農業。在已經聯合起來並實行社會主義化的工業方面，技術改造基本上已經

具備現成的社會經濟基礎。在這方面，改造的任務就是加緊排擠工業中的資本主義成分。農業方面的情况就不是這樣簡單了。改造農業的技術基礎當然也是追求同樣的目的。但是我國農業的特點是：小農經濟仍佔優勢，小經濟不可能採用新技術，因此，不同時改變舊的社會經濟結構，不把個體小經濟聯合為大規模集體經濟，不把農業中的資本主義連根剷除，就不可能改建農業的技術基礎。

顯然，這些情况不能不使我們的困難複雜化，不能不使我們克服這些困難的工作複雜化。

第三、應當注意到，我們在國民經濟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既然是要剷斷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並打倒舊世界的一切勢力，也就不能不引起這些勢力的拚命反抗。大家知道，實際情況正是這樣。在我國工業各部門中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層進行的惡毒的暗害活動，在農村中富農反對集體經濟形式的兇暴鬥爭，機關中那些充當階級敵人代理人的官僚主義分子對蘇維埃政權的各種措施的怠工行為——這就是我國的垂死階級現時的主要反抗形式。很明顯，這些情况是不能有助於我們改造國民經濟的工作的。

第四、應當注意到，我國的垂死階級的反抗並不是脫離外界而孤立進行的，而是受資本主義包圍支持的。不能把資本主義包圍看做單純的地理上的概念。資本主義包圍——這就是說，蘇聯周圍存在着敵對的階級力量，它們決心要在精神上，在物質上，或用財政封鎖的方法，必要時甚至用軍事干涉的方法來支持我們蘇聯內部的階級敵人。事實證明：我國專家的暗害活動，富農的反蘇維埃行動，焚燒和炸毀我們的企業和建築物的行為，都是受到外來的資助和慫恿的。帝國主義世界不願意讓蘇

聯站穩脚跟並有可能趕上以至超過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它們就援助蘇聯內部的舊勢力。很明顯，這種情況也不會有功於我們的改造工作。

但是要全面說明我們的困難，還必須注意一種情況。這裏指的是我們的困難的特殊性。這裏指的是我們的困難不是衰落中的困難或停滯中的困難，而是增長中的困難，高漲中的困難，前進中的困難。這就是說，我們的困難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困難根本不同。在美國，當人們談到困難的時候，指的是衰落中的困難，因為美國現在正經受着危機即經濟衰落。在英國，當人們談到困難的時候，指的是停滯中的困難，因為英國已經有好幾年處於停滯狀態，即停止向前發展。而當我們談到我國的困難的時候，指的既不是衰落，也不是發展中的停滯，而是我國力量的增長，我國力量的加強，我國經濟的前進。到某某時候前進多少，多製造出百分之幾的產品，多播種幾百萬公頃土地，提前幾個月建成工廠，築好鐵路，——這就是在我國當人們談到困難時所指的一些問題。所以，我們的困難和美國或英國等國的困難不同，我們的困難是增長中的困難，是前進中的困難。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的困難是這樣一些困難，它們本身就包含着克服它們的可能性。這就是說，我們的困難的特點在於它們本身就給我們造成克服它們的基礎。

由此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

首先，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的困難不是因細小和偶然的『毛病』而引起的困難，而是階級鬥爭引起的困難。

第二、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的困難後面隱藏着我們的階級敵人，這些困難由於我國的垂死階級拚命反抗，由於這些階級得到外援，由於我們自己的機關裏存在着官僚主義分子，由於我們黨內某些黨員缺乏信心和因循守舊而複雜起來。

第三、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要克服這些困難，首先必須打退資本主義分子的進攻，鎮壓他們的反抗，從而為迅速前進掃清道路。

最後，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既然我們的困難是增長中的困難，所以困難的性質本身就給我們提供了鎮壓階級敵人所需要的可能性。

但是要利用這些可能性並把它們變成現實，要鎮壓階級敵人的反抗和克服困難，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組織向資本主義分子的全綫進攻，並且孤立我們自己隊伍裏的阻礙進攻、張皇失措、在黨內散佈不相信勝利的思想的機會主義分子。（鼓掌）

別的辦法是沒有的。

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會在布哈林的資本主義分子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幼稚公式中尋找出路。我國過去不是現在仍然不是按照布哈林的公式發展的。我國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按照列寧的『誰戰勝誰』的公式發展的。是我們打垮、壓倒他們剝削者，還是他們打垮、壓倒我們蘇聯的工人和農民，——同志們，問題就是這樣擺着的。

總之，組織社會主義全綫進攻，——這就是我們在開展整個國民經濟改造工作時所面臨的任務。

黨正是這樣了解自己的使命的，它組織了向我國資本主義分子的進攻。

(乙)但是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一般是否可以舉行進攻並且是全綫進攻呢？

有些人以為進攻是和新經濟政策抵觸的，新經濟政策實質上就是退却，退却既然終止，新經濟政策就應當廢除。這當然是蠢話。這種蠢話或者是來自根本不懂列寧主義、竟想『一下子』『廢除』新經濟政策的托洛茨基分子；或者是來自同樣根本不懂列寧主義、竟想以『新經濟政策有被廢除的危險』的胡說來作為拒絕進攻的藉口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如果新經濟政策只是退却，列寧就不會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正當我們最徹底地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說『退却終止了』。列寧在談到退却終止的時候不是同時又聲明我們打算『認真而長期地』實行新經濟政策嗎？只要提出這個問題，就能了解什麼新經濟政策和進攻抵觸的胡說是多麼荒謬了。實際上，新經濟政策不只是預計到退却和容許私營商業活躍，即在保證國家起調節作用的條件下容許資本主義活躍（新經濟政策的最初階段）。實際上，新經濟政策同時也預計到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縮小私營商業的活動範圍，相對地和絕對地縮減資本主義成分，公營部分日益超過，非公營部分，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的現今階段）。實行新經濟政策是為了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分子。我們轉入全綫進攻時還不廢除新經濟政策，因為私營商業和資本主義分子還存在，『自由的』商品流轉還存在；但是，我們確實在終止新經濟政策的最初階段，開展它的下一階段即新經濟政策的現今階段，這一階段是新經濟政策的最後階段。

請看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一年以後所說的話：

『我們現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後退，但是我們這樣做是爲了先後退幾步，然後再快跑，更有力量地向前跳。僅僅是在這樣一個條件下，我們才在施行我們的新經濟政策時向後退却。我們現在應該在什麼地方和怎樣實行改編、調整、改組，以便在退却之後開始極頑強地向前進攻，這一點我們還不知道。爲了把這一切行動進行得有條不紊，就應當像俗語所說的那樣：不是三思而是百思而後行。』（『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九九頁）

看來是很清楚了。

但是這裏有一個問題：轉入進攻的時候是否已經到了呢？進攻的時機是否成熟了呢？

列寧在另一個地方，也是在一九二二年說過，必須：

『同農民羣衆，同普通的勞動農民結合起來，並開始向前移動，其速度雖比我們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極點，但整個羣衆却真正會同我們一道前進』……『到了一定的時候，這個運動就會加快到我們現在所夢想不到的速度。』（『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四三頁）

但是這裏還是這個問題：這樣加速前進，加快我國發展速度的時候是否已經到了呢？我們在九二九年下半年轉入決定性的全綫進攻，時機選擇得是否正確呢？

黨對於這個問題已經給了明確而肯定的答覆。是的，這樣的時機已經到了。

是的，轉入全綫進攻的時機，黨是選擇得正確的。

工人階級積極性的不斷增長和黨在千百萬勞動羣衆中的威信的空前提高說明了這一點。

貧農和中農羣衆的積極性的不斷增長和這些羣衆向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根本轉變說明了這一點。

我們在工業發展方面以及在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成就說明了這一點。

我們現在不僅有可能以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代替富農生產，而且還能夠超過富農生產幾倍，這個事實說明了這一點。

我們已經基本上解決了穀物問題並貯存了一定數量的糧食後備，把生產商品穀物的重心從個體生產方面轉到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方面，這個事實說明了這一點。

這一切都證明，轉入全綫進攻和宣佈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的時機，黨是選擇得正確的。

如果我們聽從了布哈林集團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的話，如果放棄了進攻，減緩了工業的發展速度，延遲了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發展，並以個體農民經濟爲基礎，那會怎樣呢？

我們就一定會破壞我國工業，斷送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落得沒有糧食而爲富農的橫行掃清道路。我們就會落得一場空。

如果我們聽從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的『左』傾機會主義者的話，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在我們還沒有任何可能以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代替富農生產的時候展開進攻，那會怎

樣呢？

我們就一定會在這次進攻中遭到失敗，暴露出自己的軟弱，加強富農和一般資本主義分子的陣地，把中農推入富農的懷抱，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落得沒有糧食。我們就會落得一場空。

結果都是一樣。

無怪乎我國的工人說：「向「左邊」走，却到了右邊。」（鼓掌）

有些同志認為在社會主義進攻中主要的是高壓手段，如果不強化高壓手段，那就沒有進攻。

這種看法對不對呢？這當然是不對的。

高壓手段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是進攻的必要因素，但它是輔助的，不是主要的。在我國目前條件下，在社會主義進攻中主要的是加快我國工業的發展速度，加快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發展速度，加快從經濟上排擠城鄉資本主義分子的速度，動員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動員羣衆反對資本主義。你們儘可以逮捕並流放幾萬幾十萬富農，但如果你們不同時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加速建立新的經濟形式，用新的經濟形式代替舊的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破壞並消滅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在經濟上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產基礎，那末富農終究還會復活和生長起來的。

另一些人認為，社會主義進攻就是一味前進，不必做相當的準備，不必在進攻進程中重新部署力量，不必鞏固已經奪得的陣地，不必利用後備力量來擴大勝利，如果出現了某些現象，例如一部分農民退出集體農莊，那就是說『革命退潮』了，運動低落了，進攻中止了。

這種看法對不對呢？這當然是不對的。

第一、任何一次進攻，即使是最順利的進攻，也不免在戰綫的個別地段稍被突破和略為冒進。如果根據這一點就說進攻中止了或進攻失敗了，那就是不懂進攻的實質。

第二、過去沒有而且也不會有任何順利的進攻可以不必在進攻進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可以不必鞏固已經佔領的陣地，可以不必利用後備力量來擴大勝利並把進攻進行到底。如果一味前進，就是說不遵守這些條件，進攻就必然遭到挫折和失敗。一味前進就是置進攻於死地。我們國內戰爭的豐富經驗說明了這一點。

第三、『革命退潮』通常是在運動低落的基礎上產生的，而一部分農民退出集體農莊是在運動繼續高漲的基礎上產生的，是在包括工業建設和集體農莊建設的我國全部社會主義建設繼續高漲的基礎上產生的，是在我國革命繼續高漲的基礎上產生的，怎能把這兩者加以類比呢？這兩種完全不同的現象之間會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丙）在我國目前條件下，布爾什維克進攻的實質是什麼呢？

首先，布爾什維克進攻的實質是：動員羣衆提高階級警惕性和革命積極性去反對我國的資本主義分子；動員羣衆發揮創造主動性和自動精神去反對我們機關和組織中的官僚主義，因為官僚主義埋沒了蘊藏在我國制度內部的巨大的後備力量，使我們不能利用；組織羣衆競賽和掀起羣衆勞動高潮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開展社會主義建設。

其次，布爾什維克進攻的實質是：改造工會、合作社、蘇維埃以及其他各種羣衆組織的全部實際工作以適應改造時期的需要；在這些組織裏建立由最積極最革命的工作人員組成的核心，排擠和孤立機會主義分子、工聯主義分子和官僚主義分子；驅逐這些組織中的異己分子和蛻化分子，從下面提拔新的工作人員。

再其次，布爾什維克進攻的實質是：盡量動員資金投入我們的工業，投入我們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並調派優秀黨員去開展這一切工作。

最後，布爾什維克進攻的實質是：動員黨本身去組織進攻的全部工作；鞏固和砥礪黨組織，驅逐官僚主義分子和蛻化分子出黨；孤立和排擠脫離列寧路線的右傾和『左』傾分子，把真正的堅定的列寧主義者提拔到重要崗位上去。

這就是目前布爾什維克進攻的基礎。

黨是怎樣實現了這個進攻計劃的呢？

你們知道，黨最徹底地實現了這個計劃。

首先，黨開展了廣泛的自我批評，使羣衆的注意力集中在我們建設工作的缺點上，集中在我們各組織和各機關的缺點上。早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就已經宣佈必須加強自我批評。一方面，揭露出黨的個別環節缺乏革命嗅覺的沙赫特事件和各工業部門中的暗害活動，另一方面，反富農的鬥爭和我們農村組織中所暴露的缺點，這一切進一步推動了自我批評的開展。中央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

的公告中，中最終地確定了開展自我批評運動，號召黨和工人階級的一切力量「不顧情面地」展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評。黨擯棄了來自敵對營壘的、目的在於破壞蘇維埃政權威信和削弱蘇維埃政權力量的托洛茨基主義「批評」，宣佈自我批評的任務就是無情地揭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來改進我們的建設工作和鞏固蘇維埃政權。大家知道，黨的號召得到了工人階級羣衆和農民羣衆極熱烈的響應。

其次，黨組織了廣泛的反官僚主義運動，提出了把異己分子和官僚主義分子從黨、工會、合作社和蘇維埃組織中清洗出去的口號。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六日關於提拔工人參加國家機關和吸收廣大工人監督蘇維埃機關（工廠自願輔助運動）的著名決議中，就是這個運動的繼續。大家知道，這個運動激起了工人羣衆高度的熱情和積極性。開展這個運動的結果，黨在勞動羣衆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工人階級對黨的信任加深了，幾十萬工人加入了黨，整個整個的車間和工廠的工人通過決議要求入黨。最後，開展這個運動的結果，我們的組織清除了許多保守分子和官僚主義分子，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擺脫了舊的機會主義的領導。

其次，黨在各工廠組織了廣泛的社會主義競賽，掀起了羣衆性的勞動高潮。黨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關於競賽的號召把這件事情引上了軌道。突擊隊正在把它向前推進。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它所領導的青年工人，使競賽和突擊運動不斷取得具有決定意義的成就。必須承認，我們的革命青年在這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現在已經毋庸懷疑，各工廠的社會主義競賽，幾十萬工人的相互報告在競賽方

面所獲得的成績，突擊運動的廣泛開展，即使不是目前我國建設事業中的最重要事實，也是最重要的事實之一。

只有瞎子才看不見羣衆心理上和他們對待勞動的態度上所發生的巨大轉變，這種轉變根本改變了我們工廠的面貌。不久以前，在我們這裏還有人說什麼競賽和突擊運動是『臆造』的，『沒有根據』的。現在這些『聰明』人甚至不值一笑了，他們簡直被認爲是過了時的『聰明人』。現在競賽和突擊運動是已經爭得的和已經鞏固的事情。我國參加社會主義競賽的工人已經有兩百多萬，而參加突擊隊的工人也不下一百萬，這都是事實。

競賽中最突出的地方是：競賽使人們對勞動的看法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它使過去被認爲是可恥而沉重的負擔的勞動變爲光榮的事情，榮耀的事情，英勇豪邁的事情。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決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這樣的事。在他們資本家那裏，爲社會所稱道的最合心願的事情是收地租，靠利息生活，不從事勞動，認爲勞動是下賤的事情。相反地，在我們蘇聯，爲社會所稱道的最合心願的事情是能夠成爲備受千百萬勞動者尊敬的勞動英雄，突擊英雄。

競賽中應當認爲同樣突出的一個事實是：競賽在農村中也開始展開了，它已經把我們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捲進去了。無數的事實都表現出千百萬國營農場工作人員和集體農莊莊員的真正勞動熱情，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兩年前誰能想到競賽和突擊運動能獲得這樣的成就呢？

再其次，黨動員了國家的財力來發展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供給國營農場許多優秀的組織者，派出兩萬五千名先進工人去幫助集體農莊，提拔了集體農莊中的優秀分子擔任集體農莊的領導工作，開辦了許多集體農莊員訓練班，從而為培養堅定而有經驗的集體農莊運動的幹部奠定了基礎。

最後，黨按戰鬥規範整編了自己的隊伍，重新武裝了報刊，組織了兩條戰綫的鬥爭，粉碎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殘餘，當頭擊潰了右傾分子，孤立了調和分子，從而保證了為順利進攻所必需的隊伍在列寧路綫基礎上的統一，而且正確地領導了進攻，制止了右派營壘中的漸進論者以及集體農莊運動中的『左』傾過火分子，並把他們引上了正確的道路。

這些就是黨為進行全綫進攻所採取的主要措施。

大家都知道，這場進攻在我們各方面的工作中都獲得了勝利。

正因為如此，我們能够克服我國國民經濟改造時期的許許多多困難。

正因為如此，我們能够勝利地克服我國建設中的最大困難——使基本農民羣衆轉到社會主義方面來的困難。

外國人有時探聽蘇聯的內部狀況。但是，蘇聯的內部狀況是穩固的、不可動搖的，這難道還有什麼可以懷疑的嗎？請看看資本主義國家吧，看看這些國家裏危機和失業的增長，看看這些國家裏的罷工和同盟歇業，看看這些國家裏的反政府的遊行示威。試問這些國家的內部狀況怎能和蘇聯的內部狀況相比呢？

必須承認，蘇維埃政權是世界上現存一切政權中最穩固的政權。（鼓掌）

八、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還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這樣我們就看到了蘇聯內部狀況的面貌。

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狀況的面貌。

於是自然就發生一個問題：如果把這兩種狀況加以對照和比較，那末會得出什麼結論呢？

這個問題所以特別有意思，是因為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活動家，各色各樣的資產階級報刊，從明顯的資本主義報刊到孟什維克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報刊，都在異口同聲地叫喊資本主義國家的『繁榮』，蘇聯的『滅亡』，蘇聯『財政經濟的破產』等等。

那末，在分析了我們蘇聯的狀況和他們資本主義國家的狀況以後所得出的結論是什麼呢？讓我們舉出幾個大家都知道的主要事實吧。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無論在工業方面或在農業方面都是經濟危機和生產衰落。

在我們蘇聯這裏，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都是經濟高漲和生產發展。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勞動者的物質生活日益惡化，工人的工資日益減少，失業人數日益增多。

在我們蘇聯這裏，勞動者的物質生活日益提高，工人的工資日益增加，失業人數日益減少。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罷工和遊行示威日益增多，以致喪失了千百萬個工作日。

在我們蘇聯這裏，沒有罷工，工人和農民的勞動熱情不斷高漲，給我國增加了千百萬個額外工作日。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內部狀況尖銳化，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運動日益增長。

在我們蘇聯這裏，內部狀況穩固，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團結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民族問題尖銳化，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以及菲律賓羣島等地民族解放運動不斷增長並轉變爲民族戰爭。

在我們蘇聯這裏，民族友愛的基礎日益鞏固，民族和睦有保障，千百萬蘇聯各族人民羣衆團結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人們張皇失措，情況日益惡化。

在我們蘇聯這裏，人們相信自己的力量，情況日益改善。

有人在空談什麼蘇聯的『滅亡』，資本主義國家的『繁榮』等等。要是說那些如此『突然地』落入經濟危機漩渦而至今還未能爬出衰落泥沼的人必然滅亡，豈不更正確嗎？

爲什麼他們資本家遭到如此嚴重的失敗，而我們蘇聯却取得這樣重大的勝利呢？

有人說，國民經濟狀況在很多方面取決於資本的多寡。這當然是對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危機和蘇聯呈現高漲不是因爲我們的資本多，他們的資本少嗎？不，當然不是。誰都知道，蘇聯的資本比資本主義國家少得多。如果這裏問題決定於積累的情況，那末我們就應當發生危機，而資本主義國家

却應當呈現高漲了。

有人說，經濟狀況在很多方面取決於經濟工作幹部的技術水平和組織才能。這當然是對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危機和蘇聯呈現高漲不是因為他們的技術幹部少，我們的技術幹部多嗎？不，當然不是！誰都知道，資本主義國家的在技術上有經驗的幹部比我們蘇聯多得多。我們從來不隱瞞而且也不打算隱瞞，在技術方面我們是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意大利人的學生，而首先和主要是美國人的學生。不，這裏問題並不決定於技術幹部的多寡，雖然幹部問題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也許問題的答案是我國的文化水平比資本主義國家高吧？也不是。誰都知道，我國人民的一般文化水平比美國、英國和德國低。不，問題不在於人民的文化水平，雖然文化水平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也具有莫大的意義。

也許這裏的原因在於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者的個人才幹吧？也不是。危機是隨資本主義統治的產生而產生的。資本主義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已經有一百多年了，每隔十二年、十年、八年或更短的時間就發生一次。資本主義的所有政黨，資本主義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動家，從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經試用自己的力量『預防』或『消滅』危機。但是他們都失敗了。既然如此，胡佛及其集團也遭到失敗又有什麼奇怪呢？不，這裏問題不在於資本主義的領導者或政黨，雖然資本主義的領導者和政黨在這裏也有不小的作用。

那末問題究竟在哪裏呢？

蘇聯雖然文化落後，資本不足，缺少技術熟練的經濟工作幹部，但它却處在經濟日益高漲的狀態，並且在經濟建設戰綫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而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雖然資本充足，技術幹部很多，文化水平比較高，但是，他們却處在經濟危機日益加深的狀態，並且在經濟發展方面接二連三地遭到失敗，原因在哪裏呢？

原因在於我們的經濟制度和資本家的經濟制度不同。

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合理。

原因在於蘇維埃經濟制度比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優越。

什麼是蘇維埃經濟制度呢？

蘇維埃經濟制度就是：

(一) 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政權已經被推翻而代之以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政權；

(二) 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即土地和工廠等已經從資本家那裏奪取過來並轉為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所有；

(三) 生產的發展所服從的不是競爭和保證資本主義利潤的原則，而是計劃領導和不斷提高勞動者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原則；

(四) 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爲了保證剝削階級及其爲數衆多的寄生僕役發財致富，而是爲了不斷

提高工農的物質生活和擴大城鄉社會主義生產；

(五) 勞動者的物質生活狀況的不斷改善和勞動者的需求(購買力)的不斷增長既然是擴大生產的日益增長的泉源，因而也就保證勞動者免遭生產過剩的危機，免受失業增長和貧困的痛苦；

(六) 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是國家的主人，他們不是爲資本家而是爲自己勞動人民做工的。什麼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呢？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就是：

(一) 國家政權屬於資本家；

(二) 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集中在剝削者手裏；

(三) 生產所服從的不是改善勞動羣衆物質生活狀況的原則，而是保證資本主義高額利潤的原則；

(四) 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爲了改善勞動者的物質生活狀況，而是爲了保證剝削者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

(五) 資本主義合理化和生產迅速發展是以保證資本家獲得高額利潤爲目的，因而不免要受到千百萬勞動羣衆的貧困生活和物質生活水平下降的阻礙，因爲千百萬勞動羣衆不總是能够滿足自己的甚至是最底最低限度的需求，這種情況必然爲不可避免的生產過剩的危機、失業的增長和羣衆的貧困造成條件；

(六) 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是被剝削者，他們不是爲自己而是爲別的階級即剝削階級做工的。這就是蘇維埃經濟制度比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優越的地方。

這就是社會主義經濟組織比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優越的地方。

正因爲如此，在我們蘇聯這裏經濟日益高漲，而在他們資本家那裏經濟危機日益加深。

正因爲如此，在我們蘇聯這裏，羣衆的消費（購買力）的增長總是超過生產的增長，推動生產向前發展，而相反地在他們資本家那裏，羣衆的消費（購買力）的增長從來趕不上生產的增長，並且總是落在生產後面，往往使生產陷入危機。

正因爲如此，在他們資本家那裏，在危機期間以銷毀『剩餘』商品和焚燬『多餘』農產品來保持高昂價格、保證高額利潤被認爲是完全正常的現象，而在我們蘇聯這裏，人們會把犯這種罪行的罪人送到瘋人院裏去。（鼓掌）

正因爲如此，在資本家那裏，工人舉行罷工和遊行示威，組織革命鬥爭反對現存資本主義政權，而在我們蘇聯這裏，千百萬工人和農民在展開偉大的勞動競賽，決心挺身捍衛蘇維埃政權。

正因爲如此，蘇聯的內部狀況堅固穩定，而資本主義各國的內部狀況則動盪不定。

必須承認，如果一種經濟制度竟不知道怎樣來處置自己生產出來的『多餘』產品，而在羣衆普遍遭到貧困、失業、飢餓和破產的時候却不得不把它們焚燬掉，那末這種經濟制度本身就給自已宣判了死刑。

最近幾年是檢驗和在實踐中考驗兩種對立的經濟制度即蘇維埃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時期。這幾年來，說蘇維埃制度『滅亡』和『破產』的預言真是太多了。關於資本主義『繁榮』的談論和讚頌則更多。結果怎樣呢？這幾年的事實再一次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一種不合理的經濟制度，而蘇維埃經濟制度則具有許多優點，這些優點是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全民性的』……資產階級國家所不敢夢想的。

列寧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俄共（布）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中說：

『現在，我們主要是用我們的經濟政策去影響國際革命。世界各國所有的勞動者毫無例外地（絕非誇大）都注視着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這是已經達到的。資本家要抹殺、隱瞞是絕對辦不到的，因此，他們就拚命尋找我們在經濟方面的錯誤和我們的弱點。世界規模的鬥爭已轉到這個戰場上來了。我們一旦解決了這個任務，那我們就一定會最終地在國際範圍內取得勝利。』（『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一三頁）

應當承認，列寧提出的任務我們黨正在勝利地完成。

九、當前的任務

（甲）一般任務

（一）首先是蘇聯全國工業的正確分佈問題。不管我們怎樣發展國民經濟，都不能撇開工業這一

國民經濟領導部門的正確分佈問題。目前的情況是：我國工業和我國國民經濟基本上都是依靠烏克蘭煤礦鋼鐵基地。顯然，沒有這樣一個基地，要實現國家工業化是不可能的。而我們的烏克蘭燃料鋼鐵基地就是這樣一個基地。

但是，只有這一個基地，今後是否能滿足蘇聯南部、中部、北部、東北部、遠東和土爾克斯坦各地區的需要呢？一切材料說明，這是不可能的。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個新情況是：這個基地對於我們已經不夠了。新情況是：今後在大力發展這個基地的同時還要立即開始建立第二個煤礦鋼鐵基地。應該成爲這個基地的是烏拉爾——庫茲涅茨克聯合工廠，就是說，要把庫茲涅茨克的煉焦煤和烏拉爾的鐵礦結合起來。（鼓掌）由於正在下新城建設汽車製造廠，在車里雅賓斯克建設拖拉機製造廠，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建設機器製造廠，在薩拉托夫和諾沃西比爾斯克建設聯合收割機製造廠，由於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的有色金屬工業不斷發展，需要在東部建立許多修理廠和許多基本冶金工廠；最後，由於決定在諾沃西比爾斯克和土爾克斯坦建設紡織廠，——由於這一切，就絕對需要立即着手在烏拉爾建立第二個煤礦鋼鐵基地。

你們知道，我們黨中央在關於烏拉爾鋼鐵工業托拉斯的決議（五）中所提出的主張正是這樣。

（二）其次是蘇聯全國農業各基本部門的正確分佈問題，即我國各地區按農作物種類和農業部門實行專業化的問題。很明顯，在小農經濟條件下，要嚴格實行專業化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可能，是因爲小經濟是不穩固的經濟，它沒有必需的後備，因而不得不在自己的土地上種植各種各樣的作物，以

便在一些作物遭災時好依靠另一些作物。同樣很明顯，不保證國家掌握一定的糧食後備，也不可能實行專業化。現在，當我們已經過渡到大經濟並且保證國家掌握了糧食後備的時候，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向自己提出按作物種類和農業部門正確實行專業化的任務。而這件事情的起點就是徹底解決穀物問題。我說這是『起點』，因為不解決穀物問題，不在畜牧區、產棉區、甜菜區、亞麻區和烟草區設立大批糧倉，就不能向前推進畜牧業和技術作物業，就不能保證我國各地區按作物種類和農業部門實行專業化。

任務在於利用已經發掘出的可能性並把這項工作向前推進。

(三) 其次是工業和農業方面的幹部問題。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經濟工作幹部，我們的專家、技術人員和經濟工作人員的技術水平很低。使問題複雜化的因素是一部分和從前的企業主有聯系的並且受到外國方面慫恿的專家領導了暗害活動。使問題更加複雜化的因素是我們許多做經濟工作的共產黨員在這方面缺乏革命警惕性，常常在精神上做了暗害分子的俘虜。然而，在我們面前擺着改造整個國民經濟的巨大任務，它需要大批能夠掌握新技術的新幹部。因此，幹部問題就真正成爲我們十分迫切的問題。

我們在採取下列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

1. 堅決和暗害分子作鬥爭；
2. 盡量關心和照顧已經和暗害分子劃清界限的絕大多數專家和技術人員（我指的不是烏斯特里

雅洛夫一類高談闊論和裝模作樣的人，而是那些老老實實和工人階級一起工作的真正的科學工作者）；

3. 組織國外的技術援助；

4. 派遣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到國外去學習並一般地吸取技術經驗；

5. 把技術學校移交給各有關經濟機關，以便最快地培養出足夠的工農出身的技術人員和專家。
任務在於展開實現這些措施的工作。

(四) 反官僚主義鬥爭問題。官僚主義的危險，首先在於它埋沒了潛藏在我國制度內部的巨大的後備力量，使我們不能利用，它力圖打消羣衆的創造主動性，用文牘主義束縛它，結果使黨的每一新的創舉都變成瑣碎無聊的小事。其次，官僚主義的危險在於它反對檢查執行情況，企圖把領導機關的重要指示變成脫離實際生活的紙上空文。有危險的不單是而且主要也不是我們機關留用的那些舊官僚主義分子，而是——特別是——那些新官僚主義分子，即蘇維埃的官僚主義分子，其中『共產黨員』官僚主義分子也決不是扮演末等角色。我指的是那些把文牘主義的命令和『指令』奉爲偶像的『共產黨員』，他們力圖用這樣的命令和『指令』來代替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和農民羣衆的創造主動性和自動精神。

任務在於擊破我們機關和組織中的官僚主義，消滅官僚主義的『風俗』和『習慣』，爲利用我國制度的後備力量，爲發揮羣衆的創造主動性和自動精神掃清道路。

這個任務是不輕的。它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但是，如果我們真正想按照社會主義原則來改造我們國家，那就無論如何應該解決它。

在反官僚主義鬥爭中，黨進行着四方面的工作：開展自我批評，組織對執行情況的檢查，清洗機關以及從下面提拔工人階級中的忠誠的工作人員參加機關工作。

任務在於竭盡全力來執行一切措施。

(五) 提高勞動生產率問題。如果不在工業和農業方面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我們就不能解決改造的任務，就不僅不能趕上並超過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而且連自己的獨立生存也不能保住。因此，提高勞動生產率問題對於我們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黨為解決這個問題採取了下列三方面的措施：不斷改善勞動者的物質生活狀況，在工業企業和農業企業中建立同志的勞動紀律以及組織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這一切都是已在已改進的技術和合理的勞動組織的基礎上實行的。

任務在於繼續開展實現這些措施的羣衆運動。

(六) 供應問題。這裏包括充分供應城鄉勞動者必需品的問題、使合作社機關適應農需要的問題、不斷提高工人的實際工資的問題以及減低工業品和農產品價格的問題。關於消費合作社的缺點，我已經講過了。必須消滅這些缺點並力求實現減低價格的政策。至於商品缺乏（『商品荒』）的現象，那末我們現在已經有可能擴大輕工業的原料基地和發展城市日用品的生產了。糧食供應可以說已有

保證。比較困難的是肉類、乳製品和蔬菜的供應。很可惜，這個困難在幾個月內是不能消滅的。至少需要一年才能克服這個困難。一年以後，首先是由於有了爲克服這個困難而建立起來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我們將有可能充分保證肉類、乳製品和蔬菜的供應。當我們已經擁有糧食後備和紡織品、大量建築着的工人住宅、廉價的公用事業服務的時候，再掌握這些產品的供應，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掌握決定工人預算和工人實際工資的一切基本因素。這就是說工人實際工資的迅速提高得到完全可靠的保證。

任務在於使我們的各組織在這方面開展工作。

(七) 信貸和貨幣流通問題。合理地組織信貸事業和正確地調度後備資金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重大的意義。黨爲解決這個問題採取了下列兩方面的措施：把全部短期信貸業務集中於國家銀行，在公營部分中實行非現金結算。這樣，第一、國家銀行就變成計算產品生產和分配的全國性機關；第二、有大量貨幣從流通中抽出。毫無疑義，這些措施一定會促使（而且已經在促使）全部信貸事業走上正軌，促使我們的切爾文得到鞏固。

(八) 後備問題。一般國家，特別是我國，沒有後備是不行的，這一點我已經說過好幾次，現在用不着再重複了。我們在糧食、商品和外匯方面是有一些後備的。我們的同志們在這段時期內已經能夠感覺到這些後備的良好作用。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只有「一些」後備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在各方面都有更豐富的後備。

因此，任務在於積蓄後備。

(乙) 工業方面的任務

(一) 主要問題是加速發展鋼鐵工業。要知道，我國的生鐵產量只是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才達到並超過戰前標準。這對我國整個國民經濟來說是個很大的威脅。要消除這個威脅，就必須加速發展鋼鐵工業。到五年計劃期末，我們需要的生鐵不是五年計劃所要求的一千萬噸，而是一千五百萬到一千七百萬噸。如果我們願意真正開展我國的工業化事業，我們就無論如何應當完成這個任務。

布爾什維克應當表明他們是能夠完成這個任務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應當拋開輕工業。不，不是這個意思。直到目前為止，爲了恢復重工業，我們曾經在各方面節約，包括在輕工業方面節約。但是，重工業我們已經恢復了。只是需要使它繼續發展。我們現在可以轉向輕工業並使它加速向前發展。我國工業發展中的新現象之一，就是我們現在有可能同時加速發展重工業和輕工業。棉花、亞麻和甜菜的播種計劃今年已經超額完成，羅布麻和人造絲問題已經解決，這一切都說明我們有可能真正地向前推進輕工業了。

(二) 實行合理化、降低成本和提高產品質量問題。我們的許多企業在實行合理化方面有不少缺點，降低成本的計劃完不成，產品質量低劣，這些情況不能再容忍了。這些缺點和缺陷壓着我國整個

國民經濟，使它不能向前進展。已經是而且早就洗去這種可恥污點的時候了。

布爾什維克應當表明他們能夠完成這個任務。

(三) 一長制問題。破壞企業中實行一長制的現象也使人不能容忍了。工人時常埋怨說：「工廠裏沒有人作主」，「工作中沒有秩序」。我們不能再容忍我們的企業由生產有機體變成議會。歸根到底我們的黨組織和工會組織應當了解，不保證實行一長制，不建立工作過程中的嚴格的責任制，我們就不能解決改造工業的各項任務。

(丙) 農業方面的任務

(一) 畜牧業和技術作物業問題。現在，當我們基本上已經解決穀物問題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着手同時解決當前迫切的畜牧業問題和技術作物業問題了。解決這兩個問題時，我們應當走解決穀物問題所走過的道路。就是說，通過建立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它們是我們政策的據點）逐步改造目前的小農畜牧業和技術作物業的技術基礎和經濟基礎。『養牛托拉斯』、『養羊托拉斯』、『養豬托拉斯』、『牛油牛奶托拉斯』加上畜牧業集體農莊；現有的技術作物業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這些就是解決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的起點。

(二) 繼續展開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建設問題。幾乎用不着多說，這個問題對於我們來說是我們整個農村建設中的首要問題。現在連瞎子都能看見，農民從舊到新，從遭受富農奴役到享受集體農莊

自由生活的巨大的根本的轉變已經實現了。舊的一切一去不復返了。富農階級註定要滅亡，並且一定會被消滅。剩下的只有一條道路，集體農莊的道路。而集體農莊的道路對我們來說已經不是陌生的沒有體驗過的道路。農民羣衆親自用各種方式體驗過和檢驗過這條道路。他們體驗到並認定這條道路是使農民擺脫富農奴役、擺脫貧困、擺脫愚昧的新辦法。這就是我們取得成就的基礎。

農村中的新運動怎樣繼續發展下去呢？走在前面的將是國營農場，它們是改造農村舊經濟結構的中堅。跟在它們後面的將是大批集體農莊，它們是農村新運動的據點。這兩個系統協同工作，就給蘇聯各地區的完全集體化創造了條件。

集體農莊運動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它已經從農民本身中間提拔了集體農莊事業的幾千個組織者和幾萬個鼓動者。現在已經不單單是我們這些老練的布爾什維克，而且還有集體農莊的農民，集體農莊事業的幾萬個農民組織者和鼓動者將要自己舉着集體化旗幟前進。而農民鼓動者是集體農莊運動出色的鼓動者，因為他們能找到爲其餘農民羣衆明白易懂而又能够接受的道理來說明集體農莊的好處，而這些道理是我們這些老練的布爾什維克連想都想不到的。

有人發出必須放棄全盤集體化政策的論調。聽說連我們黨內也有這種『思想』的擁護者。但是，只有那些自覺或不自覺地和共產主義的敵人勾結在一起的人，才能說出這種話。全盤集體化的方法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方法，沒有它，就不可能完成蘇聯各地區集體化的五年計劃。如果不背叛共產主義，不出賣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利益，那又怎麼能放棄這個方法呢？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一切都會『順利地』和『正常地』進行。集體農莊內部的動搖還是會發生的。來潮和退潮還是會發生的。但這不能而且也不應當引起集體農莊運動建設者的驚惶。這更不能成爲集體農莊運動蓬勃發展的嚴重障礙。集體農莊運動無疑是健全的運動，它一定能不顧一切，不顧個別阻礙和困難而達到自己的目的。

任務在於準備力量並做好工作來進一步開展集體農莊運動。

(三)使機關盡量接近區和村的問題。毫無疑問，如果不實行區域劃分，我們就不能展開改造農業和發展集體農莊運動的巨大工作。擴大鄉而把它們改爲區，取消州而把它們改爲較小的單位（專區），最後，成立省作爲中央的直接據點，——這就是區域劃分的概況。區域劃分的目的是使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經濟機關和合作社機關接近區和村，以便有可能及時解決農業的一些迫切問題，即發展農業，改造農業等問題，我再說一遍，在這個意義上說，區域劃分給了我們整個建設事業很大的好處。

但是，使機關實際接近並且真正接近區和村所應做的一切，是否都做到了呢？沒有，沒有都做到。現在集體農莊建設的重心已經轉到區級組織方面。集體農莊建設和農村的其他一切經濟工作，包括合作社方面、蘇維埃方面、信貸方面、收購方面的一切經濟工作都集中到區級組織。爲了展開這一繁雜工作，供給區級組織所需要的和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員是否已經够了呢？毫無疑問，供給區級組織的工作人員是非常不夠的。出路何在呢？爲了改正這個缺點，保證我們各個工作部門的區級組織

都有足夠的必要的工作人員，需要做些什麼呢？爲此至少需要做到兩件事情：

(一) 撤銷專區，(鼓掌) 因爲它已經變成省和區之間的一道不必要的隔板，拿空出來的專區級工作人員來加強區級組織；

(二) 使區級組織直接和省(邊區委員會、民族共和國中央委員會)發生關係。

這樣就會徹底完成區域劃分的工作，徹底完成使機關接近區和村的工作。

大家聽到將要撤銷專區都鼓掌歡迎。當然，專區是應當取消的。但是，如果以爲這樣我們就有權痛罵專區，像有些同志在『真理報』上所做的那樣，那就錯了。不應當忘記，專區曾經担负過巨大的工作，起過很大的歷史作用。(鼓掌)

同樣我認爲，在撤銷專區這件事上過分急躁也是錯誤的。中央已經通過撤銷專區的決定(五)。但中央決沒有認爲這件事應當立刻進行。很明顯，在撤銷專區以前，必須做好必要的準備工作。

(丁) 運輸方面的任務

最後是運輸問題。運輸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大意義是用不着多說的。運輸不僅對國民經濟有重大意義。大家都知道，它對國防也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儘管運輸具有重大意義，可是運輸業，運輸業的改造還是落後於一般的發展速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會有使運輸變成國民經濟中可能阻礙我們前進的『薄弱環節』的危險，這還用得着證明嗎？難道還不是結束這種情況的時候了嗎？

情形特別糟的是內河運輸。實際情況是：伏爾加河航務局的運輸量剛剛達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六十，而德涅泊河航務局的運輸量只達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四十。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和四十——這就是內河運輸所能記入自己的『成績』表的一切。不用說，這是很大的『成績』！難道還不是洗去這種恥辱的時候了嗎？（喊聲：『是時候了！』）

歸根到底，任務在於用布爾什維克精神從事運輸事業並把它向前推進。

*

*

*

黨的當前任務就是這樣。

爲了實現這些任務，需要做些什麼呢？

爲此，首先和主要的是必須繼續開展對資本主義分子的全綫進攻並把它進行到底。目前我們政策的中心和基礎就在這裏。（鼓掌）

三 黨

現在來談談黨的問題。

上面我已經談過蘇維埃經濟制度比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優越的地方。談過我國的制度在爭取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鬥爭中給我們提供的巨大可能性。談過如果沒有這些可能性，如果沒有利用這些可

能性，我們就不能得到我們在過去這個時期中所獲得的那些成就。

但是這裏有一個問題：黨是否正確地利用了蘇維埃制度給我們提供的那些可能性呢？黨是否埋沒了這些可能性，因而妨礙了工人階級徹底發揮自己的全部革命力量呢？黨是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這些可能性來全面展開社會主義建設呢？

蘇維埃制度提供了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可能性還不是現實。要把可能性變成現實，就必須具備許多條件，其中黨的路綫和正確執行這條路綫起着遠非次要的作用。

舉幾個例子來談談。

右傾機會主義者斷定說，新經濟政策保證我們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因此可以不必為工業化的速度、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發展等等操心，反正勝利的到來會所謂自流地得到保證。這種說法當然是不對的，愚蠢的。這樣說，就是否認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否認黨對這個建設事業所負的責任。列寧決沒有說過，新經濟政策保證我們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列寧只說過，『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證我們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但是，可能性還不是現實。要把可能性變成現實，首先必須擯棄機會主義的自流論，必須改建（改造）國民經濟並向城鄉資本主義分子堅決進攻。

其次，右傾機會主義者斷定說，在我國制度內不存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發生分裂的基礎，因此可以不必為制定對待農村各社會集團的正確政策操心，反正富農會長入社會主義，而工農聯盟會所

謂自流水地得到保證。這種說法同樣是不對的，愚蠢的。只有那些不了解黨的政策（而且還是執政黨的政策）是決定工農聯盟命運的基本因素的人，才會這樣說。列寧決沒有認為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沒有分裂的危險。列寧說過，『在我國社會制度內不存在必然發生這種分裂的基礎』，但是，『如果在這兩個階級之間發生嚴重的階級分歧，那末分裂將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列寧認為：

『我們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以及我們全黨的主要任務在於留心注視可能產生分裂的情況並預防這種情況，因為我們共和國的命運歸根到底將取決於農民羣衆是跟着工人階級走，忠實於和工人階級的聯盟呢，還是讓「耐普曼」即新資產階級把他們和工人拆開，使他們和工人分裂。』（五）

可見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分裂並不是不可能發生的，但也決不是一定要發生的，因為在我國制度內存在着防止這種分裂和鞏固工人階級和農民聯盟的可能性。爲了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需要做些什麼呢？爲了把防止分裂的可能性變成現實，首先必須埋葬機會主義的自流論，必須挖掉資本主義的根，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並由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由此可見，必須把我國制度所具有的可能性，和利用這些可能性即把這些可能性變成現實嚴格區別開來。

由此可見，完全可能有這樣的情況：勝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黨沒有看到這些可能性或者不會

正確地利用這些可能性，因此得到的會不是勝利而是失敗。

但是這裏還是這個問題：黨是否正確地利用了蘇維埃制度給我們提供的那些可能性、和優越性呢？黨是否盡了一切力量來把這些可能性變成現實，從而保證我國建設事業獲得最大勝利呢？

換句話說，黨和黨中央在過去這個時期中是否正確地領導了社會主義建設呢？

在我國目前條件下，爲了保證黨的正確領導，需要做些什麼呢？

要保證黨的正確領導，除了其他一切條件外，還必須使黨的路綫正確；必須使羣衆了解黨的路綫的正確性並積極擁護這條路綫；必須使黨不要僅限於制定總路綫，而要天天領導這條路綫的實現；必須使黨同脫離總路綫的各種傾向以及對這些傾向的調和態度作堅決鬥爭；必須使黨在反對這些傾向的鬥爭中錘鍊自己隊伍的統一和鐵的紀律。

黨和黨中央爲實現這些條件做了些什麼呢？

一、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問題

(甲)黨在目前的基本方針，就是由社會主義在經濟戰綫的個別地段上的進攻轉入在工業方面和農業方面的全綫進攻。

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主要是工業化代表大會。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主要是集體化代表大會。

這些都是給總進攻做準備。

和過去各個階段不同，第十六次代表大會面臨的時期是社會主義全綫總進攻的時期，是加緊工業方面和農業方面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

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是社會主義在全綫展開大規模進攻、消滅富農階級和實現全盤集體化的代表大會。

簡略地說，我們黨的總路綫的實質就是這樣。

這條路綫是否正確呢？

是的，是正確的。事實說明，我們黨的總路綫是唯一正確的路綫。（鼓掌）

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綫上所獲得的勝利和成就證明了這一點。過去這個時期黨在城鄉社會主義建設戰綫上所獲得的決定性的勝利，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在實行不正確政策的結果。只有正確的路綫才能使我們獲得這樣的勝利。

我們的階級敵人，資本家和他們的報刊，教皇和形形色色的主教，社會民主黨人和阿布拉莫維奇及唐恩一類的『俄國』孟什維克近來對我們黨的政策所發出的瘋狂號叫證明了這一點。資本家和他們的奴僕咒罵我們黨，這就是說我們黨的總路綫是正確的。（鼓掌）

現在大家都知道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命運證明了這一點。托洛茨基分子營壘中的先生們曾經胡說什麼蘇維埃政權『蛻化』，什麼『特米多爾』，什麼托洛茨基主義『必然勝利』等等。而事實上結果怎

樣呢？結果是托洛茨基主義瓦解了，完蛋了。大家知道，一部分托洛茨基分子和托洛茨基主義決裂了，並在他們的代表人物的許多聲明中承認黨是正確的，自認托洛茨基主義是反革命的。另一部分托洛茨基分子則確實蛻化爲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事實上成了爲資產階級報刊搜集聯共（布）情報的人員。而本該『蛻化』（或者『已經蛻化』）的蘇維埃政權却依然健在並在建設社會主義，在勝利地給我國資本主義分子及其小資產階級應聲蟲以致命打擊。

現在大家都知道的右傾分子的命運證明了這一點。他們曾經胡說和叫喊黨的路綫會『招致滅亡』，蘇聯『必遭災禍』，必須把國家從黨和黨的領導手裏『拯救出來』等等。而事實上結果怎樣呢？事實上結果是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各個戰綫上都獲得了極大的勝利；而本想『拯救』國家但後來承認自己的看法錯誤的右傾分子集團現在却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了。

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革命積極性的日益提高，千百萬勞動羣衆對黨的政策積極擁護，以及工人和集體農民所發揮的那種巨大的使我國的敵人和朋友都感到驚異的空前未有的勞動熱情證明了這一點。至於那些標誌着對黨的信任加深的事實，如整個整個的車間和工廠的工人申請入黨，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到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期間黨員人數增加了六十多萬，單是今年第一季度就有二十萬人入黨，那就更不用說了。這一切不是表明千百萬勞動羣衆認識到我們黨的政策正確性並決心擁護它，又是表明什麼呢？

必須承認，如果我們黨的總路綫不是唯一正確的路綫，那就不會有這些事實。

(乙)但是，黨不能僅限於制定總路綫。它還應該天天檢查總路綫的實際執行情況。它應該領導總路綫的實現，在工作進程中修訂已通過的經濟建設計劃，使它日趨完善，糾正和防止錯誤。

我們黨中央是怎樣完成這項工作的呢？

中央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在加快速度和縮短期限方面修改五年計劃並使它更加精確，檢查各經濟組織執行規定任務的情況。

下面舉出中央根據提高建設速度和縮短完成期限的精神修改五年計劃的幾項重要決議。

在鋼鐵工業方面：五年計劃預定生鐵產量在五年計劃最後一年度達到一千萬噸；而中央的決定則肯定這個定額太低，認為應該把五年計劃最後一年度的生鐵產量提高到一千七百萬噸。

在拖拉機製造業方面：五年計劃預定拖拉機產量在五年計劃最後一年度達到五萬五千台；而中央的決定則肯定這個任務太輕，認為應該把五年計劃最後一年度的拖拉機產量提高到十七萬台。

汽車製造業的情形也是這樣。五年計劃原定在五年計劃最後一年度生產十萬輛汽車（載重汽車和輕便汽車），而中央則決定增加到二十萬輛。

有色金屬工業和農業機器製造業的情形也一樣。有色金屬工業的產量比五年計劃初定數字增加一倍多，農業機器製造業的產量也比五年計劃初定數字增加一倍多。

至於聯合收割機的製造，就更不用說了。它根本沒有被列入五年計劃，而它的產量在五年計劃最後一年度至少要達到四萬台。

在國營農場建設方面：五年計劃預定到五年計劃期末播種面積擴大到五百萬公頃；而中央的決定則肯定這個定額太低，認為國營農場的播種面積到五年計劃期末應達到一千八百萬公頃。

在集體農莊建設方面：五年計劃預定到五年計劃期末播種面積擴大到兩千萬公頃；而中央的決定則肯定這個定額顯然太低（這個定額今年就已經超過了），認為到五年計劃期末蘇聯農業集體化基本上應告結束，集體農莊的播種面積到那時應當佔蘇聯目前個體農戶耕種的全部耕地的十分之九。
(鼓掌)

如此等等。

一般說來，中央就是這樣領導黨的總路綫的執行，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工作的。

有人會說，中央把五年計劃初定數字改動得這樣厲害，這是在破壞計劃工作的原則並損害計劃機關的威信。但是，只有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分子才會這樣說。對於我們布爾什維克來說，五年計劃並不是什麼固定的一成不變的東西。對於我們來說，五年計劃也和任何計劃一樣，不過是一個大致的計劃，應當根據各地的經驗，根據計劃執行的經驗來修訂它，使它精確、完善。任何五年計劃都不能估計到潛藏在我國制度內部的一切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只有在工作進程中，在各工廠、各集體農莊、各國營農場、各區等等實現計劃的進程中才能發掘出來。只有官僚主義分子才會認為編制計劃是計劃工作的結束。編制計劃不過是計劃工作的開始。真正的計劃領導只是在計劃編制以後，在進行了實地檢驗以後，在實現計劃、修訂計劃和使計劃精確的過程中才展開。

正因為如此，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與共和國各計劃機關一致認為必須按照提高建設速度和縮短完成期限的精神，根據實際經驗修訂和改善五年計劃。

在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討論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十年計劃^{〔五〕}的時候，關於計劃工作和計劃領導的原則列寧這樣說過：

『我們黨的綱領不能始終只是黨的綱領。它應當成爲我國經濟建設的綱領，否則它就不能是黨的綱領。它應當用黨的第二個綱領即用恢復整個國民經濟並使它達到現代技術水平的工作計劃來補充……我們應當採取一個相當的計劃；當然，這只會是一個大致的計劃。黨的這個綱領不是那樣不可改變，像我們的真正黨綱一樣只能在黨的代表大會上修改。不，這個綱領每天在每個工廠裏，每個鄉鎮中都會加以改進、充實、完善和變更……各地在注意科學和實踐的經驗的同時，應當不斷地努力爭取比原定期限更早地完成計劃，以便使羣衆看到，經驗能夠使我們縮短完全恢復工業所需要的漫長時期。這全靠我們自己。讓我們在每一個工廠、每一個機車修理廠、每一方面都改善經營管理，這樣我們就一定會縮短期限。而且我們也正在縮短它。』（『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二頁、第四八三頁、第四七九頁）

可見中央變更和修改五年計劃、縮短期限和提高建設速度是沿着列寧指示的道路前進的。

中央提高建設速度和縮短五年計劃完成期限依據的是哪些可能性呢？依據的是蘊藏在我國制度內部的只有在工作進程中才能發掘出來的那些潛力，依據的是改造時期給我們提供的那些可能性。

中央認為，在按照社會主義原則組織生產的條件下，改造工業和農業的技術基礎可以發掘出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夢想不到的那些加快速度的可能性。

只有這些情況才能解釋下面的事實：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的產值在最近三年內增加了一倍多，而它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又要比本年度增加百分之四十七，僅僅這個增加額就等於戰前全部大工業的產值。

只有這些情況才能解釋下面的事實：國營農場的建設在三年內就會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集體農莊的建設在兩年內就已經超額完成五年計劃。

有這樣一種理論，按照它的說法，只在恢復時期才可以有高速度發展，一進入改造時期，建設速度就應當逐年急劇減低。這個理論叫做『遞減曲綫』論。這種理論是為我們的落後辯護的理論。它和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它是一種蓄意讓我國永遠保持落後狀態的資產階級理論。在過去或現在和我們黨有關係的人們之中，堅持和鼓吹這種理論的只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分子。

關於托洛茨基分子有這樣一種說法，說他們是超工業化主義者。但是，這種說法只有一部分是正確的。這種說法只有在講到恢復時期末期的時候才是正確的，因為那時托洛茨基分子確實曾經發揮過超工業化的幻想。至於改造時期，托洛茨基分子在建設速度方面却是最極端的最低速度派和最卑鄙無恥的投降派。（笑聲，鼓掌。）

托洛茨基分子在他們的政綱和宣言中並沒有提出有關速度的數字材料，只是一般地空談速度。

但是有一個文件，其中托洛茨基分子用數字表達了他們對國營工業發展速度的看法。我指的是那份根據托洛茨基主義原則所寫的國營工業『固定資本恢復問題特別會議』的報告書。簡略分析一下這個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寫成的文件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有意思，是因為它完全反映了托洛茨基分子的遞減曲綫圖。

這個文件提議，投入國營工業的資金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爲十五億四千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十四億九千萬盧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十三億二千萬盧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十億六千萬盧布（均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價格計算）。

托洛茨基分子的遞減曲綫就是這樣。

實際上我們投入了多少資金呢？實際上我們投入國營工業的資金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爲十億六千五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十三億零四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十八億一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四十七億七千五百萬盧布（均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價格計算）。

布爾什維克的上升曲綫就是這樣。

根據這個文件，國營工業的產值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應增加百分之三十一點六，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增加百分之二十二點九，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百分之十五點五，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增加百分之十五。

托洛茨基分子的遞減曲綫就是這樣。

實際上我們的情況是怎樣的呢？實際上國營工業的產值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十九點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點三，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點三，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而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將增加百分之四十七。

布爾什維克的上升曲綫就是這樣。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他的『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一書中，專門爲這個投降主義的遞減曲綫論辯護。他在那本書裏直截了當地說，既然『戰前擴大工業基本上是靠建立新工廠』，而『目前擴大工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靠利用舊工廠和充分利用原有設備』，那末，『隨着恢復過程的終結，增長率自然會大大減低』，並且他提議『在最近幾年內，把工業的增長率提高到不僅超過戰前增長率百分之六的一倍，而且超過兩倍，也許還要多』。

總之，工業每年增長三個百分之六。這究竟等於多少呢？每年總共增長百分之十八。因此，在托洛茨基分子看來，國營工業的產值每年增長百分之十八是改造時期計劃加快發展速度的最高限度，應當作爲理想來追求。現在把托洛茨基分子的這種淺薄的小聰明和我們最近三年來產值的實際增長（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爲百分之二十六點三，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爲百分之二十四點三，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爲百分之三十二）比較一下，把托洛茨基分子的這種投降主義哲學和國家計

劃委員會擬定的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的控制數字（增加百分之四十七，超過恢復時期產值增加的最高速度）比較一下，你們就會看出托洛茨基分子的『遞減曲綫』論的全部反動性，就會看出托洛茨基分子對改造時期所具有的可能性是多麼不相信。

正因為如此，托洛茨基分子現在叫喊工業和集體農莊建設的布爾什維克發展速度『過快』。

正因為如此，托洛茨基分子現在和我們的右傾分子是區分不開的。

很明顯，不粉碎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分子的『遞減曲綫』論，我們就既不能展開真正的計劃工作，也不能提高建設速度和縮短建設期限。爲了領導實現黨的總路綫，爲了修訂和改進五年建設計劃，爲了提高建設速度和防止建設中的錯誤，首先要擊破和消滅反動的『遞減曲綫』論。

中央正是像上面我所說的那樣做的。

二、黨內事務的領導問題

也許有人會以爲，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實現黨的總路綫的工作，在我們黨內是平平穩穩進行的，沒有鬥爭，也沒有緊張活動。同志們，這是不對的。事實上這個工作是在同黨內種種困難作鬥爭中，是在同一般政策方面和民族問題方面脫離列寧主義的各種傾向作鬥爭中進行的。我們黨不是生存和活動在真空中。它是生存和活動在實際生活當中，受着周圍環境的影響。而我們的環境，大家知道，是由各種不同的階級和社會集團構成的。我們對資本主義分子展開了大規模的進攻，我們大大

向前推進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展開了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建設。這些現象對於剝削階級不會沒有影響。通常伴隨着這些現象的是垂死階級的破產，農村富農階級的破產，城市小資產階級各階層活動地盤的縮小。很明顯，這一切不能不使階級鬥爭更加尖銳，不能不使垂死階級對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反抗更加激烈。如果以為這些階級的反抗不會在我們黨的隊伍裏有某種反映，那是可笑的。而這種反抗也確實在黨內有了反映。我們黨的隊伍裏的種種脫離列寧路綫的傾向，也就是垂死階級反抗的反映。

如果不同時和我們黨內各種傾向作鬥爭，如果不克服這些傾向，不能和階級敵人進行勝利的鬥爭呢？不，不能。所以不能，是因為後方有階級敵人的代理人，有不相信我們的事業並且千方百計阻礙我們前進的人，就不可能對階級敵人展開真正的鬥爭。

因此，同脫離列寧路綫的各種傾向作不調和的鬥爭，是黨的當前任務。

為什麼右傾是現在黨內的主要危險呢？因為它反映着富農危險，而富農危險在目前，在展開大規模進攻和根除資本主義的時候，是國內的主要危險。

要克服右傾，消滅『左』傾，為全黨最緊密地團結在列寧路綫的周圍掃清道路，中央必須做些什麼呢？

(甲) 首先必須肅清黨內托洛茨基主義的殘餘，肅清托洛茨基主義理論的遺毒。作為一個反對派的托洛茨基集團早已被我們擊潰和拋棄了。現在托洛茨基集團是一個竭力向資產階級報告我黨情況

的反無產階級和反蘇維埃的反革命集團。但是，托洛茨基主義理論的殘餘，托洛茨基主義的遺毒還沒有完全從黨內清除出去。所以，必須首先肅清這些遺毒。

托洛茨基主義的實質是什麼呢？

首先，托洛茨基主義的實質在於否認靠我國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力量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如果最近期間勝利的世界革命的援助不能及時到來，我們就應該向資產階級投降，為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掃清道路。可見這是一種用世界革命勝利的『革命』詞句做掩蔽來否認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資產階級觀點。

抱有這種觀點，能不能發動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發揮勞動熱情，開展社會主義競賽，參加羣衆性的突擊運動，向資本主義分子展開大規模進攻呢？顯然不能。如果認為幹過三次革命的我國工人階級發揮勞動熱情和參加羣衆性的突擊運動是爲了給資本主義土壤施肥，那就愚蠢了。我國工人階級掀起勞動高潮不是爲了資本主義，而是爲了徹底埋葬資本主義並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你們打消工人階級對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信心，也就是摧毀競賽、勞動高潮、突擊運動的一切基礎。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要發動工人階級掀起勞動高潮、開展競賽並組織大規模進攻，首先就必須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關於我國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理論。

第二，托洛茨基主義的實質在於否認吸收基本農民羣衆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可能性。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工人階級無力領導農民從個體農民經濟轉上集體經濟的軌道；如果最

近期間世界革命的勝利不能及時到來援助工人階級，農民就會恢復舊的資產階級制度。可見這是一種用世界革命勝利的『革命』詞句做掩蔽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有力量有可能領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觀點。

抱有這種觀點，能不能發動農民羣衆參加集體農莊運動，組織羣衆性的集體農莊運動，消滅富農階級呢？顯然不能。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要組織農民的羣衆性的集體農莊運動並消滅富農階級，首先就必須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關於不可能引導勞動農民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資產階級理論。

最後，托洛茨基主義的實質在於否認黨內有鐵的紀律的必要，認爲黨內有組織派別集團的自由，認爲有成立托洛茨基主義政黨的必要。在托洛茨基主義看來，聯共（布）不應當是統一和團結的戰鬥的黨，而應當是一些各有自己的中央、自己的紀律、自己的報刊等等的集團和派別的集合體。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宣佈黨內有組織政治派別的自由。這就是說，既然黨內有組織政治集團的自由，那末國內也就應當有組織各種政黨的自自由，即應當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制。可見這是要用『黨內民主』、黨內『制度的改進』的詞句做掩蔽來承認黨內有組織派別集團的自由，直至容許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組織各種政黨的自自由。知識分子集團間的派別爭吵的自由並不是黨內民主；而黨所開展的廣泛的自我批評和黨員羣衆的高度積極性才是實際的、真正的黨內民主的表現，這是托洛茨基主義所不能了解的。

對黨抱有這種觀點，能不能保證黨的鐵的紀律，保證黨對階級敵人進行勝利鬥爭所必要的鋼鐵般的統一呢？顯然不能。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要保證黨的鋼鐵般的統一和無產階級的紀律，首先就必須埋葬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理論。

事實上的投降主義是內容，『左的』詞句和『革命』冒險主義的姿態是掩蔽和吹噓投降主義內容的形式，——這就是托洛茨基主義的實質。

托洛茨基主義的這種兩重性反映了正在破產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兩重地位，這種小資產階級受不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力圖『馬上』跳到社會主義，以免遭到破產（由此產生了政策上的冒險主義和歇斯底里），如果這樣做不可能，就對資本主義做任何讓步（由此產生了政策上的投降主義）。

正因爲托洛茨基主義具有這種兩重性，所以它好像『猛烈』攻擊右傾分子，而結果總是和他們這些不帶假面具的投降主義者結成聯盟。

而黨內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發生過的『左的』過火行爲又是什麼呢？這種過火行爲在某種程度上是企圖（固然是不自覺的）在實踐中在我國恢復托洛茨基主義傳統，恢復托洛茨基主義對中農的態度。這種過火行爲的產生是由於在政策上犯了列寧所說的『過分採用行政手段』的錯誤。這就是說，我們某些同志爲集體農莊運動的一些成就所陶醉，竟不以建設者的態度，而主要是以行政人員的態度去對待集體農莊建設問題，因而犯了一系列極嚴重的錯誤。

我們黨內有這樣一些人，他們以爲不該制止『左』傾過火分子。他們認爲不該得罪我們的工作人員，不該反對他們的陶醉情緒，即使這種情緒造成了錯誤。同志們，這是胡說。只有那些硬要隨波逐流的人才會這樣說。這些人永遠也不能領會列寧路線：在環境要求的時候，在黨的利益要求的時候，要逆流而進。他們是尾巴主義者，不是列寧主義者。黨所以能使我們整批整批的同志轉上正確的道路，黨所以能糾正錯誤並獲得成就，就是因爲它爲實現總路線能毅然決然地逆流而進。這也就是實踐中的列寧主義，領導中的列寧主義。

正因爲如此，我認爲不克服『左的』過火行爲，我們就不能在集體農莊運動中取得現在所有的那些成就。

和托洛茨基主義殘餘及其在實踐中的遺毒進行鬥爭的情形就是這樣。

關於過去是或者現在還是由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領導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問題，情形就有些不同了。

關於右傾分子，不能說他們不承認蘇聯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不，他們是承認的，這就是他們和托洛茨基分子不同的地方。但右傾分子糟糕的地方在於他們表面上承認在一個國家內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却不願意承認建成社會主義所必不可少的鬥爭方法和手段。他們不願意承認，大力發展工業是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整個國民經濟的鑰匙。他們不願意承認，必須同資本主義分子作不調和的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必須向資本主義展開大規模進攻。他們不了解，這一切方法和手段是保持

無產階級專政和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所必不可少的一套措施。他們以爲社會主義可以悄悄地、自流地建成，不必經過階級鬥爭，不必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他們以爲資本主義分子要就是無聲無息地自行消亡，要就是長入社會主義。但是，這種奇蹟歷史上不曾有過，所以右傾分子實際上是滾到否認在我國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觀點上去了。

關於右傾分子，也不能說他們否認有吸收基本農民羣衆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可能性。不，他們是承認的，這也是他們和托洛茨基分子不同的地方。但是，他們表面上承認，同時却否認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所必不可少的方法和手段。他們不願意承認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是吸收基本農民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基本手段和『大道』。他們不願意承認，不實行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就不能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農村。他們認爲農村能够悄悄地、自流地轉上社會主義軌道，不必經過階級鬥爭，只要通過供銷合作社就行了，因爲他們相信富農會自行長入社會主義。他們認爲目前主要的不是高速度發展工業，也不是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而是『放縱』市場的自發勢力，『解放』市場，給個體經濟以至農村資本主義分子『解除羈絆』。但是，富農是不能長入社會主義的，而『解放』市場就等於武裝富農階級和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所以右傾分子實際上是滾到否認有吸收基本農民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可能性的觀點上去了。

正因爲如此，右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進行的鬥雞式的鬥爭通常是以和托洛茨基分子進行組織聯盟的幕後談判而告終的。

右傾機會主義的基本罪過在於它脫離列寧的階級鬥爭的觀念而滾到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觀點上去了。

毫無疑問，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那就會使工人階級完全解除武裝，使農村資本主義分子武裝起來，並使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機會增多。

右傾分子不主張成立另外一個政黨，這是他們和托洛茨基分子又一個不同的地方。右傾分子的首領們公開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向黨投降了。但是，如果根據這一點就認為右傾主義已經被埋葬，那就愚蠢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力量不是拿這種情況來衡量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力量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在於一般資本主義分子特別是富農對黨施行的壓力。正因為右傾反映着垂死階級主要分子的反抗，所以右傾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

這就是黨認為必須同右傾作堅決的不調和的鬥爭的原因。

毫無疑問，如果不同右傾作堅決鬥爭，不孤立右傾的領導分子，我們就不能動員黨和工人階級的力量，動員貧農和中農羣衆的力量去展開社會主義的大規模進攻，建立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恢復我們的重工業，消滅富農階級。

黨內的『左』傾和右傾的情形就是這樣。

任務在於今後還要繼續進行兩條戰綫的不調和的鬥爭，既反對代表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的『左』傾，又反對代表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右傾。

調和鬥爭。
任務在於今後還要繼續和黨內那些不懂或假裝不懂必須堅決進行兩條戰綫鬥爭的調和分子作不

(乙) 如果我們不談談黨內在民族問題方面所存在的傾向，那末我們就不能看出黨內反對各種傾向的鬥爭的全貌。我指的第一是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傾向，第二是地方民族主義傾向。這兩種傾向不像「左」傾或右傾那樣明顯和頑固。可以把它們叫做爬行的傾向。但這還不是說它們不存在。不，它們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它們還在發展。這一點是絲毫不容懷疑的。所以不容懷疑，是因為階級鬥爭尖銳化的普遍氣氛，不能不使在黨內有着反映的民族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尖銳起來。因此必須揭穿和暴露這兩種傾向的真面目。

在我國目前條件下，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傾向的實質是什麼呢？

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傾向的實質是：企圖抹殺語言、文化和生活習慣方面的民族差別；企圖準備撤銷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區；企圖破壞民族平等權利原則；破壞黨關於機關民族化與報刊、學校及其他國家組織和社會組織民族化的政策。

這類傾向分子在這方面所持的出發點是：既然在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下各民族應該融合成一體，而它們的民族語言則應該變成統一共同語言，那末現在已經是消滅民族差別和放棄支持以前被壓迫的各族人民發展民族文化的政策的時候了。

在這方面，他們還引證列寧的話，不正確地引用列寧的話，有時簡直是歪曲和誣蔑列寧。

列寧說過，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各民族的利益必將融合成一個整體。——由此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現在已經是撤銷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區來維護……國際主義的時候了嗎？列寧在一九一三年同崩得分子爭論時說過，民族文化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由此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現在已經是消滅蘇聯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來維護……國際主義的時候了嗎？

列寧說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民族壓迫和民族壁壘是會消滅的，——由此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現在已經是廢除照顧蘇聯各族人民的民族特點的政策轉而採取同化政策來維護……國際主義的時候了嗎？

如此等等。

毫無疑問，民族問題上的這種傾向尤其因為它是戴上國際主義假面具並以列寧的名字做掩蔽的，所以是一種最精緻因而也是最危險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

第一、列寧從來沒有說過，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勝利以前，在一個國家內，民族差別應該消失，而各民族的語言應該融合成一種共同的語言。恰恰相反，列寧說過一些與此完全相反的話，他說：『各民族間和各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甚至在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以後也還要保持很久很久。』①（『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二頁）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忘記了列寧的這個基本指示，怎麼還能引證列寧的話呢？

不錯，有一位過去是馬克思主義者，而現在是叛徒和改良主義者的考茨基先生武斷地說過和列寧教導我們的完全相反的話。他反對列寧的意見，斷言如果十九世紀中葉無產階級革命在德奧聯邦獲得勝利，那就會形成一種共同的德語並使捷克人德意志化，因為『單是掙脫了束縛的交換的力量，單是德意志人所帶去的現代文化的力量，就能不用任何強制的德意志化而使落後的捷克小資產者、農民和無產者變成德意志人，因為他們這種沒落的民族已經不能給予他們任何東西』（見『革命和反革命』德文版序言）。

顯然，這種『觀念』是和考茨基的社會沙文主義完全吻合的。一九二五年我在東方民族大學的講話中就曾經駁斥過考茨基的這種看法。但是，一個肆意妄為的德國社會沙文主義者的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胡說，對於我們願意徹底做國際主義者的馬克思主義者說來，難道還能有什麼積極的意義嗎？

誰對呢，是考茨基還是列寧？

如果是考茨基對，那末爲什麼像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這樣比較落後的民族，雖然和大俄羅斯人的關係要比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關係更加密切，但是並沒有因爲無產階級革命在蘇聯的勝利而俄羅斯化，相反地，却作爲獨立的民族復興和發展起來了呢？爲什麼像土爾克明人、柯爾克茲人、烏茲別克人和塔吉克人（更不用說格魯吉亞人、阿爾明尼亞人和阿捷爾拜疆人等等）這樣的民族，雖然他

們落後，但是他們非但沒有因為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而俄羅斯化，相反地，却復興和發展成獨立的民族了呢？我們可敬的傾向分子爲了追求表面的國際主義而落入了考茨基的社會沙文主義的魔掌，這不是很明顯嗎？他們主張在一個國家內即在蘇聯一國內有一種共同的語言，實質上是力圖恢復先前佔統治地位的語言即大俄羅斯語言的特權，這不是很明顯嗎？

這哪裏是國際主義呢？

第二、列寧從來沒有說過，消滅民族壓迫和把各民族的利益融合成一個整體就等於消滅民族差別。我們消滅了民族壓迫。我們消滅了民族特權並確立了民族平等權利。我們消除了蘇聯各民族間舊意義上的國界，即界碑和關稅壁壘。我們確立了蘇聯各族人民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一致。但這不是說我們這樣就把民族差別即民族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等消滅了呢？顯然不是這個意思。既然民族差別即民族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等還存在，那末在目前的歷史時期取消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區的要求就是一種違反無產階級專政利益的反動要求，這不是很明顯嗎？我們的傾向分子是否了解，現在取消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區，這就是使蘇聯各族千百萬人民羣衆不可能使用本族語言受教育，使他們不可能有使用本族語言的學校、法院、行政機關、社會組織以及其他組織和機關，使他們不可能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呢？我們的傾向分子爲了追求表面的國際主義而落入了反動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的魔掌，忘記了，完全忘記了對蘇聯各族人民，無論是大俄羅斯人或非大俄羅斯人都同樣有效的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文化革命口號，這不是很明顯嗎？

第三、列寧從來沒有說過，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發展民族文化的口號是反動的口號。恰恰相反，列寧向來主張幫助蘇聯各民族人民發展本民族的文化。正是在列寧而不是在別的什麼人的領導下，在黨的第十次大會上擬定並通過了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決議中直截了當地指出：

「黨的任務在於：幫助非大俄羅斯各族勞動人民趕上走在前面的俄國中部，幫助他們：（甲）在他們那裏發展和鞏固適合於這些民族的民族生活習慣條件的形式蘇維埃國家制度；（乙）在他們那裏發展和鞏固使用本族語言的，並由熟悉當地居民生活習慣和心理的本地人組成的法院、行政機關、經濟機關和政權機關；（丙）在他們那裏發展使用本族語言的報刊、學校、劇院、文娛事業以及一般文化教育機關；（丁）廣泛地建立和發展使用本族語言的普通教育性質的和職業技術性質的訓練班網和學校網。」（卷）

列寧完完全全擁護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發展民族文化的口號，這不是很明顯嗎？

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民族文化口號，就是否認蘇聯境內非大俄羅斯各族人民發展文化的必要性，否認各該族人民受普遍義務教育的必要性，而讓各該族人民去受反動的民族主義者的精神奴役，這難道不是很明顯嗎？

列寧確實曾經認為資產階級統治下的民族文化口號是反動的口號。但是難道還能有別的看法嗎？

什麼是民族資產階級統治下的民族文化呢？這是一種資產階級內容和民族形式的文化，其目的

是用民族主義的毒素來毒化羣衆和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

什麼是无產階級專政下的民族文化呢？這是一種社會主義內容和民族形式的文化，其目的是用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羣衆。

如果不背離馬克思主義，怎麼能把這兩種根本不同的東西混爲一談呢？

列寧反對資產階級制度下的民族文化的口號時，打擊的是民族文化的資產階級內容，而不是它的民族形式，這難道不是很明顯嗎？

如果以爲列寧把社會主義文化看做是一種無民族性的，即沒有某種民族形式的文化，那就愚蠢了。崩得分子有一個時候確實曾經把這種荒謬見解硬加在列寧身上。但從列寧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列寧嚴厲地抗議過這種誣讒，斷然和這種荒謬見解劃清了界限。難道我們可敬的傾向分子真的要步崩得分子の後塵嗎？

既如上述，我們的傾向分子的論據還剩下什麼呢？

除了玩弄國際主義旗幟和誣讒列寧以外，什麼也沒有剩下。

傾向於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人認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就是民族文化瓦解和消滅的時期，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實際情形恰恰相反。事實上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是社會主義內容和民族形式的民族文化的繁榮時期，因爲在蘇維埃制度下各民族本身並不是普通的『現代』民族，而是社會主義民族，它們的民族文化按內容說也不是普通的資產階級文化，而是社會

主義文化。

看來他們不懂得，隨着使用本族語言的初等普遍義務教育的施行和鞏固，民族文化必將更加有力地發展起來。他們不懂得，只有在發展民族文化的條件下才能真正使各落後民族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他們不懂得，列寧的幫助和支持蘇聯各民族人民發展民族文化的政策的基礎正在於此。

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我們主張各民族的文化在將來融合成一種有共同語言的共同（無論在形式上或在內容上）文化，而同時又主張在目前即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要繁榮民族文化。其實這一點也不奇怪。應該讓各民族的文化發展和繁榮起來，發揮出自己的全部潛力，以便為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時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成一種有共同語言的共同文化創造條件。在一個國家內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繁榮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民族文化，是為當無產階級在全世界取得勝利和社會主義深入日常生活時候，它們能融合成一種有共同語言的共同的社會主義（無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文化，——列寧關於民族文化問題的提法的辯證性正在於此。

有人會說，這樣提問題是『矛盾的』。但是，我們在國家問題上難道不也是有這樣的『矛盾』嗎？我們主張國家的消滅。而我們同時又主張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加強這個至今存在的一切國家政權中最強大最有力的政權。高度發展國家政權是為給國家政權的消滅準備條件——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公式。這是『矛盾的』嗎？是的，是『矛盾的』。但這是生活中的矛盾，它完全反映着馬克思的辯

證法。

或者拿列寧關於直到分離的民族自決權問題的提法來說吧。列寧有時把民族自決這一論題表述為一個簡單公式：『爲聯合而分離』。你們想一想吧：爲聯合而分離。簡直會覺得這是一種奇談怪論。但是，這個『矛盾的』公式却反映着馬克思辯證法的一個生活中的真理，這個真理使布爾什維克能够攻克民族問題方面最難攻下的堡壘。

關於民族文化的公式也必須這樣說：在一個國家內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繁榮民族文化（和語言）是爲了給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時期各民族的文化（和語言）消亡並融合成一種共同的社會主義文化（和一種共同的語言）準備條件。

誰不懂得我國過渡時期的這種特殊性和『矛盾性』，誰不懂得歷史過程的這種辯證法，誰就根本不成其爲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的傾向分子糟糕的地方在於他們不懂得而且也不願意懂得馬克思的辯證法。

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傾向的情形就是這樣。

不難了解，這種傾向反映着從前佔統治地位的大俄羅斯民族中的垂死階級想恢復自己已經喪失的種種特權的意圖。

由此就產生了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危險，這是黨內在民族問題方面的主要危險。地方民族主義傾向的實質是什麼呢？

地方民族主義傾向的實質是：力圖獨樹一幟並在本民族的狹隘範圍內閉關自守，力圖抹殺本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力圖用脫離社會主義建設總流的方法防禦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力圖漠視那些使蘇聯各民族勞動羣衆接近和聯合的東西，而只看到那些能使他們彼此疏遠的東西。

地方民族主義傾向反映了過去被壓迫民族中的垂死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不滿，反映了它們想單獨成立自己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並在那裏確立自己的階級統治的企圖。

這種傾向的危險在於它培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削弱蘇聯各族勞動人民的團結並幫助干涉者。

地方民族主義傾向的實質就是這樣。

黨的任務在於：同這種傾向作堅決鬥爭，保證對蘇聯各族勞動羣衆進行國際主義教育所必需的條件。

我們黨內的各種傾向，即在一般政策方面的『左』傾和右傾和在民族問題方面的兩種傾向的情形就是這樣。

我們黨內的狀況就是這樣。

現在，當黨在爭取實現總路綫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的時候，當我們黨的列寧路綫在全綫奏捷的時候，許多人有忘掉各種傾向分子在我們的工作中給我們所造成的那些困難的傾向。不僅如此，某些有庸俗看法的同志直到現在還認為本來可以不必和各種傾向分子作鬥爭。不用說，這些同志是極其錯誤的。只要回顧一下，回憶一下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分子所幹的那些勾當，只要回想一下過去這個

時期和各種傾向作鬥爭的歷史，就會了解黨內這種庸俗看法是多麼空虛和無聊了。毫無疑問，如果沒有制裁各種傾向分子，沒有在公開鬥爭中擊潰他們，我們就不會獲得現在我們黨理應引以自豪的那些勝利。

我們黨在反對脫離列寧路線的各種傾向的鬥爭中成長和鞏固起來了。它在反對各種傾向的鬥爭中鍊成了自己隊伍的列寧主義的統一。現在誰也不能否認這個不容爭辯的事實，就是全黨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團結在自己的中央委員會的周圍。現在大家都不得不承認：黨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統一和團結；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是我們黨少有的一次代表大會，這裏不再有能够拿出自己的特殊路線來對抗黨的總路線的定形的和團結的反對派。

爲什麼黨能取得這種決定性的成就呢？

黨所以取得這種成就，是因為它在反對各種傾向的鬥爭中始終執行着原則性的政策，從來沒有墮落到暗中拉攏和玩弄外交欺騙手腕的地步。

列寧說過，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我們所以能在反對各種傾向的鬥爭中取得勝利，是因為我們忠實地一貫地遵守了列寧的這個遺訓。（鼓掌）

* * *

同志們，我就要講完了。

總的結論是什麼呢？

在過去這個時期中，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戰綫上取得了一系列決定性的成就。我們所以取得這些成就，是因為我們能够高舉偉大的列寧旗幟。如果我們想要勝利，那我們今後還應當高舉列寧的旗幟，保持它的純潔無瑕。（鼓掌）

總的結論就是這樣。

我們舉着列寧的旗幟在十月革命的戰鬥中獲得了勝利。

我們舉着列寧的旗幟在爭取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鬥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就。

我們舉着這面旗幟在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必將獲得勝利。

列寧主義萬歲！（熱烈鼓掌，經久不息。全場歡呼。）

載於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真理報」第一七七號

註 釋

(一)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於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舉行。全會研究了下列問題：(一)關於黨內事務；(二)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會議的問題；(三)關於清黨。全會批准了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關於黨內事務的決議，並在特別決議中斥責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的右傾機會主義活動。全會同意政治局提出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關於發展農業的途徑和減輕中農賦稅、關於反官僚主義鬥爭的總結和最近任務等提綱，並決定把提綱提交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會議審查。全會還決定把基本上同意的關於清洗聯共(布)黨員和候補黨員的提綱提交黨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審查。約·維·斯大林在四月二十二日全會會議上發表了「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的演說。(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二九頁至第四四七頁)——(正文第三頁)

(二) 指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在頓巴斯的沙赫特區及其他區內活動的資產階級專家反革命組織的暗害活動。——(正文第十二頁)

(三) 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討論了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活動的總結報告，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討論了消除帝國主義戰爭危險的辦法，共產國際綱領、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問題、蘇聯的經濟狀況和聯共(布)黨內的狀況，批准了共產國際章程。代表大會在決議中指出了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增長必然會引起資本主義穩定的動搖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急劇尖銳化。代表大會根據工人階級鬥爭的新條件規定了共產國際的任務，並動員各國共產黨加緊同右傾這個主要危險以及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作鬥爭。代表大會指出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這些成就對於鞏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陣地的意義，並號召

全世界勞動者保衛蘇聯。約·維·斯大林參加了大會的領導工作，被選為代表大會主席團委員、綱領委員會委員以及草擬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任務的提綱的政治委員會委員。——（正文第十九頁）

（四）指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舉行的有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和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參加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正文第二十四頁）

（五）講壇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思想流派之一，主要是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方面。十九世紀後半期產生於德國，後來在英國、美國和法國廣泛流行。這個流派的代表們，即在大學講壇上發表言論（因此稱為「講壇社會主義」）的自由資產階級教授們，反對馬克思主義和正在發展的革命工人運動，抹殺資本主義的矛盾，鼓吹階級調和。講壇社會主義者否認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性和剝削性，硬說資產階級國家能夠用社會改良的辦法使資本主義完善起來。恩格斯關於德國講壇社會主義者曾經寫道：「講壇社會主義者在理論方面從來沒有提高到傾向於博愛的庸俗經濟學家的水平，而現在他們已經墮落到俾斯麥國家社會主義的真正辯護者的水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二十七卷第四九九頁）在俄國，合法馬克思主義者鼓吹過講壇社會主義者的資產階級自由派改良主義思想。俄國的孟什維克、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政黨和現代右翼社會黨人力圖使工人運動服從資產階級的利益，鼓吹資本主義和平地、逐漸地長入社會主義，因而也就滾到講壇社會主義方面去了。——（正文第三十一頁）

（六）指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至十二日舉行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正文第四十五頁）

（七）『青年國際』（Jugend Internationales）雜誌是國際社會主義青年組織聯合會的機關刊物，於一九一五年九月至一九一八年五月在蘇黎世出版。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一年該雜誌作為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刊物出版（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曾以『青年共產國際』的名稱出版）。——（正文第六十二頁）

（八）見『列寧文集』第十四卷第二五〇頁至第二五九頁。——（正文第六十九頁）

（九）『社會民主黨人文集』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在弗·伊·列寧直接領導下於一九一六年出版的。出了一九一六年十月和十二月兩期。——（正文第六十九頁）

（十）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一九一八年），布哈林及其所領導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同托洛茨基一起在黨內進行了反對列寧的激烈鬥爭，要求繼續戰爭，其目的是要把還沒有軍隊的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置於德國帝國主義的打擊之下。一

九三八年，在反蘇維埃的「右派」托洛茨基聯盟的審判案中查明，布哈林及其所領導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同托洛茨基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曾經一起策劃了反對蘇維埃政府的秘密的反革命陰謀，其目的是要破壞布列斯特和約，逮捕和殺害弗·伊·列寧、約·維·斯大林、雅·米·斯維爾德洛夫，成立由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組成的政府。——（正文第九十頁）

(二)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經濟委員會就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國民委員會經濟委員會。——（正文第九十二頁）

(三) 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會議討論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關於發展農業的途徑和減輕中農賦稅，關於反官僚主義鬥爭的總結和最近任務，關於清洗和審查聯共（布）黨員和候補黨員等問題。代表會議的主要問題是第一個五年計劃。代表會議否決了右傾投降主義者所維護的五年計劃「最低」方案，通過了在任何條件下都必須執行的「最高」方案。代表會議斥責了右傾，指出它是完全拒絕黨的列寧政策的表現，是直接轉到富農立場上去，並號召黨給予這個時期的主要危險右傾以及對各種離開列寧路線的傾向的調和情緒以懲滅性打擊。代表會議聽取了維·米·莫洛托夫的關於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和約·維·斯大林在這次全會上所發表的演說「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見本卷第三頁至第九十六頁）的傳達報告，並一致通過了「關於黨內事務」的決議。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開展社會主義競賽告蘇聯全體工人和勞動農民書。（第十六次代表會議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四八頁至第四九九頁）——（正文第九十六頁）

(四) 弗·伊·列寧「怎樣組織競賽？」（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三六七頁、第三六八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三〇五頁、第三〇六頁）。——（正文第九十八頁）

(五) 特別遠東軍是一九二九年八月當中國反革命命將軍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挑起中東鐵路事件時建立的。「警鐘報」是特別遠東軍政治部的機關報，於一九二九年創刊。——（正文第一二二頁）

(六) 「青年團真理報」（日刊）是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和莫斯科委員會的機關報，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創刊。「列寧主義概論」一文發表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七日「青年團真理報」第二八二號上。——（正文第一二三頁）

(七)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主義科學院召開的全國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至二十七日舉行。參加代表會議的有科學研究機關的代表，農業高等學校和經濟高等學校的代表，雜誌和報紙編輯部的代表。出席的代表共有三百零二人。約·維·斯大林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代表會議的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發表了「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的演說。——（正文第一二六頁）

〔七〕見「列寧文集」第十一卷第三六八頁。——（正文第一三二頁）

〔八〕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頁至第八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六九二頁。——（正文第一三三頁）

〔九〕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三頁。——（正文第一三三頁）

〔十〕弗·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一九二二年俄文版第六十六頁（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六年俄文版第十六卷第二部第四五六頁）。——（正文第一三五頁）

〔十一〕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第十一卷第七十一頁至第八十三頁。——（正文第一三九頁）

〔十二〕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一一頁至第二一五頁。——（正文第一四七頁）

〔十三〕「國外」雜誌由馬·高爾基主編，於一九三〇年創刊，一九三二年改組為雜誌式的報紙，一九三八年停刊。——（正文第一五四頁）

〔十四〕「紅星報」是軍事政治性的日報，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創刊。自一九四六年三月起是蘇聯武裝力量部的中央機關報。——（正文第一五六頁）

〔十五〕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七十三頁至第八十二頁。——（正文第一五七頁）

〔十六〕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會議「關於發展農業的途徑和減輕中農賦稅」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五五頁至第四六九頁。——（正文第一五七頁）

〔十七〕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五〇頁至第三六八頁。——（正文第一五七頁）

〔十八〕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制定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指示」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

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三〇頁至第三四九頁。——（正文第一五七頁）

〔二九〕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三三頁至第三三二頁。——（正文第一五七頁）

〔三〇〕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就是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的學生。——（正文第一六一頁）

〔三一〕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三一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八八三頁。——（正文第一六一頁）

〔三二〕弗·伊·列寧『皮梯利姆·索羅金的寶貴自供』（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一七一頁）。——（正文第一六一頁）

〔三三〕『魯賓主義』和『機械主義』是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派別。孟什維克魯賓從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立場修正馬克思的學說，閹割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內容，暗害式地轉移經濟學家對研究蘇聯經濟問題的注意力，使他們陷於煩瑣的爭論和抽象的議論。『機械主義』是在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方面從庸俗的機械主義立場來歪曲馬克思主義，即否定唯物主義辯證法而代之以資產階級的均衡論。右傾分子的理論家布哈林是機械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機械主義者在政治經濟學方面否認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矛盾，否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在歷史上的暫時性，並把資本主義的規律性搬到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正文第一六六頁）

〔三四〕這裏所指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發表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真理報』第七十三號上（並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五四八頁至第五五一頁）。——（正文第一七七頁）

〔三五〕聯共（布）中央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關於集體化的速度和國家幫助集體農莊建設的辦法』的決議，並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五四四頁至第五四七頁。——（正文第一八三頁）

〔三六〕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三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討論了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總結報告，關於工業五年計劃執行情況的報告，關於集體農莊運動和發展農業的報告以及關於工會改造時期的任務的報告。代表大會一致批准了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路線和工作，建議中央今後繼續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布爾什維克速

度，爭取五年計劃四年完成，堅定不移地在全綫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進攻和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代表大會指出了農業發展中的轉變的全世界歷史意義，由於這個轉變，集體農民成了蘇維埃政權的真正的、堅固的支柱。代表大會委託黨中央委員會繼續執行堅定不移的和平政策並鞏固蘇聯的國防力量。代表大會做出了關於全力發展重工業並在蘇聯東部建立新的強大的煤礦鋼鐵基地，關於改造一切羣衆組織的工作和加強工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關於吸引全體工人和勞動羣衆參加社會主義競賽等指示。代表大會徹底揭露了右傾機會主義，認爲它是富農在黨內的代理人，並宣佈右傾反對派的觀點和聯共（布）黨的黨籍不能相容。代表大會責成各級黨組織加強對民族問題上的兩種傾向（大國沙文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堅決執行列寧的保證廣泛發展蘇聯各族人民的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化的民族政策。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是作爲社會主義在全綫展開大規模的進攻、消滅富農階級和實現全盤集體化的代表大會而載入黨的史冊的。維·斯大林於六月二十七日在代表大會上做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並於七月二日做了關於這一報告的結論。（關於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第四一頁至第四一四頁。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五五三頁至第六一六頁）——（正文第二〇七頁）

（三七）聯邦準備銀行體系是美國的銀行組織，於一九一三年成立。設立在全國最重要的中心城市的十二家聯邦準備銀行統一和控制了美國各銀行的全部活動，是壟斷資本的工具。聯邦準備銀行體系由聯邦準備局（一九三三年改稱聯邦準備銀行經理會議）領導。聯邦準備局由美國總統任命，完全掌握在財政寡頭手中。爲美國資本主義辯護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美國的金融界和政府當局會把聯邦準備銀行體系看做保障國內經濟免遭危機的手段。胡佛總統企圖利用聯邦準備銀行體系來制止一九二九年爆發的危機，結果完全失敗了。——（正文第二一三頁）

（三六）楊格計劃是向德國索取賠款的計劃，是以該計劃的制定者美國銀行家楊格得名的。這個計劃於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由法國、大不列顛、意大利、日本、比利時、美國和德國專家委員會通過，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日在海牙會議上被最後批准。這個計劃規定德國賠款總額爲一千一百三十九億馬克（折成外匯計算），應在五十九年內付清。賠款方面的一切清算事宜由美國所操縱的國際清算銀行經手。成立這個銀行是楊格計劃的一項主要條款，是美國壟斷資本控制歐洲各國的貿易和貨幣流通的手段。按照楊格計劃，德國工業免除償付賠款，賠款的全部重担都壓在勞動者的身上。楊格計劃爲更迅速地恢復

德國軍事工業的潛力創造了條件，這是美國帝國主義者爲發動對蘇聯的侵略所力求達到的。——（正文第二一九頁）

（三九）指帝國主義國家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至十六日舉行的羅迦諾（瑞士）會議上所締結的條約和協定。旨在鞏固凡爾賽條約所建立的歐洲戰後秩序的羅迦諾協定，使主要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化並引向準備新的戰爭。（關於羅迦諾會議，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二七一頁至第二七七頁）——（正文第二一九頁）

（四〇）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爆發十五周年）的抗議戰爭挑撥者的遊行示威和罷工以及一九三〇年三月六日的抗議迅速增長的失業現象（由於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危機）的遊行示威，在法國、德國、英國、美國、波蘭和歐美其他國家的許多城市和工業中心都會舉行。抗議運動完全是在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領導下進行的。——（正文第二二一頁）

（四一）『泛歐』計劃是建立歐洲各國反蘇聯盟的計劃，是由法國外交部長布利安於一九三〇年五月提出的。按照這個計劃，結成『聯邦』的歐洲應該是一條反蘇的統一戰綫，而『聯邦』的執行機關『歐洲委員會』應該是準備進攻蘇聯的司令部。此外，布利安計劃打算確立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的領導權，因而遭到了英國、意大利和美國的反對。『泛歐』計劃因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而沒有實現。——（正文第二二三頁）

（四二）指美國、法國、德國、大不列顛、波蘭、意大利、日本、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時和不列顛各自治領於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起在巴黎簽訂的非戰公約。它們沒有邀請蘇聯參加締結凱洛格公約的談判，其目的是要把蘇聯排除於公約的規定推理所及的國家範圍以外，按照公約規定，締約各國必須拒絕以戰爭作爲國家政策的工具。公約的發起人（法、美、英三國）以『普遍和平』的總感詞句爲掩飾，打算把公約變成孤立和反對蘇聯的工具。蘇聯政府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五日的聲明中揭穿了公約的真正目的。美、英、法三國政府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不得不聲明邀請蘇聯簽訂公約。蘇聯政府加入了凱洛格公約，它是首先批准這個公約的政府之一，並向鄰國提議締結關於立即執行公約所定義務的協定。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蘇聯、波蘭、羅馬尼亞、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在莫斯科簽訂了這樣的協定，後來土耳其和立陶宛也加入了這個協定。——（正文第二二三頁）

（四三）『連納金礦』是英國的股份公司，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在蘇聯承租西伯利亞的金、銅、鐵等等礦產地進行開採和經營。按照租借合同的條件，『連納金礦』公司應當建設一些新的採礦工業企業和改造承租的廠礦。由於該股份公司沒

有履行自己的義務並使承租的廠礦和其他企業遭到破壞，蘇聯政府取消了租約，並且把該公司在蘇聯進行間諜活動和暗害活動的工作人員交付法庭審判。——（正文第二二四頁）

〔四〕蘇聯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莫斯科舉行，討論了蘇聯政府的報告、蘇聯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關於發展農業和農村合作社建設的問題。代表大會的中心問題是討論和通過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代表大會同意蘇聯政府的總結報告，批准了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擬定了發展農業和農村合作社建設的途徑，選出了新的一屆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正文第二三六頁）

〔四〇〕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五五頁。——（正文第二四六頁）

〔四一〕約·維·斯大林向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所做的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十卷第二六一頁。——（正文第二四六頁）

〔四二〕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九三頁。——（正文第二五一頁）

〔四三〕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七日舉行，討論了關於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國民經濟控制數字、關於集體農莊建設的總結和今後任務、關於烏克蘭的農業和關於農村工作、關於成立蘇聯全聯盟的農業人民委員部、關於中央七月全會（一九二八年）的培養技術幹部的決議的執行情況等問題。全會認為宣傳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和宣傳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的觀點與留在聯共（布）黨內不能相容，並決定取消布哈林這個右傾投降主義者的急先鋒和領導者的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資格。全會指出蘇聯已進入對農村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社會主義大農業的時期，並擬定了許多有助於鞏固集體農莊和廣泛開展集體農莊運動的具體措施。（全會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五〇〇頁至第五四三頁）——（正文第二五一頁）

〔四四〕指發表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真理報」第一二八號上的聯共（布）中央關於開展自我批評「告全體黨員，告全體工人書」（並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四二年版卷下第八〇七頁至第八〇九頁）——（正文第二七四頁）

〔四五〕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關於提拔工人參加蘇維埃機關和吸收廣大工人自下監督蘇維埃機關（關於工廠自願輔助運動）」的決議發表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六日「真理報」第七十四號上。——（正文第二七四頁）

〔五〕指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關於烏拉爾鋼鐵工業托拉斯的工作」的決議。該決議發表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八日『真理報』第一三五號上。——(正文第二八四頁)

〔五〕聯共(布)中央「關於撤銷專區」的決議發表在一九三〇年七月十六日『真理報』第一九四號上。——(正文第二九三頁)

〔善〕弗·伊·列寧「關於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綱要給維·米·莫洛托夫的信」(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三三頁至第二三四頁)。——(正文第二九五頁)

〔善〕弗·伊·列寧「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四四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一〇一九頁)。——(正文第二九六頁)

〔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舉行。代表大會的主要問題之一是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所擬定的國家電氣化計劃。代表大會在自己的決議中把電氣化計劃評定為「偉大的經濟創舉的第一步」。約·維·斯大林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給弗·伊·列寧的信中關於俄羅斯電氣化計劃寫道:「最近三天我有機會讀完了『俄羅斯電氣化計劃』彙編……一本出色的、編得很好的書。一個不帶引號的、真正統一的和真正國家的經濟計劃的傑出草案。這是現代唯一的馬克思主義嘗試,要給經濟落後的俄國的蘇維埃上層建築奠定在目前條件下真正現實而唯一可能的技術生產基礎。」(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五十頁)。——(正文第三〇二頁)

〔善〕指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生大會上所做的『論東方民族大學的政治任務』的演說(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三八頁至第一四〇頁)。——(正文第三一六頁)

〔至〕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五五九頁。——(正文第三一八頁)

年 表

(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

一九二九年

-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工作。
- 四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議上發表『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的演說。
- 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第十六次全國代表會議的工作。
- 四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全國代表會議上被選入關於發展農業的途徑和減輕中農賦稅的決議起草委員會。
- 四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 五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在紅場舉行的五一慶祝典禮，檢閱莫斯科衛戍部隊和首都勞動者的遊行隊伍。
- 五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和頓巴斯礦工代表團談話。

五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美國委員會會議上發表關於美國共產黨內的右傾派別分子的演說。

五月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羣衆的競賽和勞動熱情的高漲』一文（米庫林娜『羣衆的競賽』一書序言）。這篇文章在五月二十二日『真理報』第一一四號上發表。

五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發表關於美國共產黨內狀況的演說。

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蘇聯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五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蘇聯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爲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聯盟蘇維埃委員。

六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和維·米·莫洛托夫與森林工業工作人員代表團談話。

七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寫信給費里克斯·康同志。

七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電賀烏克蘭共產主義青年團建團十周年。賀電在七月十二日『真理報』第一五七號上發表。

七月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檢閱黑海艦隊戰艦隊的演習。

七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訪問了『紅色烏克蘭號』巡洋艦，出席了紅海軍戰士的文娛晚會，並在巡洋艦艦誌上題詞。

十月三十日

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二周年，約·維·斯大林向特別遠東軍致賀電。賀電在十一月七日『警鐘報』第五十二號和『真理報』第二五九號上發表。

十一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寫『大轉變的一年』一文。這篇文章在十一月七日『真理報』第二五九號上發表。

十一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在紅場舉行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二周年慶祝典禮，檢閱莫斯科衛戍部隊和首都勞動者的遊行隊伍。

十一月十日至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十一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議上發表演說，揭露布哈林反對派首領們的派別活動。

約·維·斯大林被聯共(布)中央全會選入最後修訂關於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國民經濟控制數字的決議和起草關於布哈林右傾集團的決議的委員會。

十一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被聯共(布)中央全會選入關於集體農莊建設的總結和今後任務的決議修訂委員會。

十一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蘇聯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

十二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的『必要的修正』一文在『真理報』第二九八號上發表。

十二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寫信答謝祝賀他五十壽辰的一切組織和同志。該信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真理報』第三〇二號上發表。

十二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國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發表『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的演說。演說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真理報』第三〇九號上發表。

一九三〇年

一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爲慶祝斯大林格勒從白衛分子手中解放十周年給斯大林格勒工人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二號上發表。

一月五日

聯共(布)中央根據約·維·斯大林的提議通過『關於集體化的速度和國家幫助集體農莊建設的辦法』的決議。決議在一月六日『真理報』第六號上發表。

一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寫信給阿·馬·高爾基。

一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論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問題』一文。這篇文章在一月二十一日『真理報』第二十一號和『紅星報』第十八號上發表。

一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在大劇院舉行的弗·伊·列寧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

二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寫『答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同志們』一文。這篇文章在二月十日『真理報』第四十號上發表。

二月十三日

根據許多組織、工人大會、農民大會以及紅軍士兵大會的請求，授予約·維·斯大林第二枚紅旗勳章，表彰他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綫上的巨大功勳。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授予約·維·斯大林以勳章的決議在二月二十三日『真理報』第五十三號上發表。

二月二十二日

爲慶祝第一騎兵集團軍建立十周年，約·維·斯大林向該集團軍致賀電。賀電在二月二十三日『真理報』第五十三號上發表。

約·維·斯大林答覆伊熱夫斯克工廠工人的來信，祝他們順利完成爲紅軍生產武器的計劃。覆信在三月二日『伊熱夫斯克真理報』第五十一號上發表。

約·維·斯大林出席莫斯科蘇維埃爲紀念紅軍建軍十二周年和第一騎兵集團軍建立十周年而在大劇院舉行的慶祝大會。

三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的『勝利衝昏頭腦』一文在『真理報』第六十號上發表。

不遲於三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起草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關於反對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的路線』的決議。決議在三月十五日『真理報』第七十三號上發表。

三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答覆別澤羅斯同志的來信。

四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的『答集體農莊莊員同志們』一文在『真理報』第九十二號上發表。

四月二十一日

爲祝賀列寧格勒斯大林金屬工廠提前出產蘇聯第一台大型渦輪，約·維·斯大林向該廠工人致賀電。賀電在四月二十三日『列寧格勒真理報』第一一二號上發表。

四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向工業學院第一期畢業生致賀電。賀電在四月二十六日『真理報』第一一五號上發表。

四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爲祝賀土爾斯坦—西伯利亞鐵路建築工程竣工和開始通車給該鐵路建設者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一一五號上發表。

五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在紅場舉行的五一慶祝典禮，檢閱部隊和首都勞動者的遊行隊伍。

年 表

五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於特別騎兵旅建立十周年紀念日給該旅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一二七號上發表。

五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被黨的紅色勃列斯尼亞區和巴烏曼區代表會議選爲出席聯共(布)莫斯科省代表會議和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五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答覆姆·拉法伊爾同志的來信。

六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祝賀羅斯托夫農業機器製造廠全體人員提前完成建廠工作。賀電在六月十七日『真理報』第一六五號上發表。

約·維·斯大林答覆克拉斯諾達爾邊區卡涅夫區集體農莊莊員的賀信。覆信在六月十八日『紅旗報』(克拉斯諾達爾)第一三七號和六月十九日『真理報』第一六七號上發表。

六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祝賀斯大林格勒拖拉機製造廠的工人提前完成建廠工作和蘇聯第一個拖拉機製造廠開工。賀電在六月十八日『真理報』第一六六號上發表。

六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全會批准了政治局向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提出的提綱，並批准約·維·斯大林爲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第一項議程(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的報告人。

六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做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